

国民党敌后抗日

游击队



孙挺信 著 ● 中日长江大决战系列

GUOMINDANG DIHOU KANG RI YOU JI JUN



孙
挺
信
著

游 击 军

(川)新登字 018 号

责任编辑:张蔚河

梁 凌

封面设计:长湖信

*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军

孙挺信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成都九里堤)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军区军医学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10 字数:22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1022—562—6/K·021

定价:6.80 元



1. 在山东敌后抗战的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
2. 在吕梁山敌后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
3. 李家钰将军和全体将士转战于太行山、中条山敌后。



整装待发的游击部队



转战于河湖港叉的游击军

身着伪装服的游击军出击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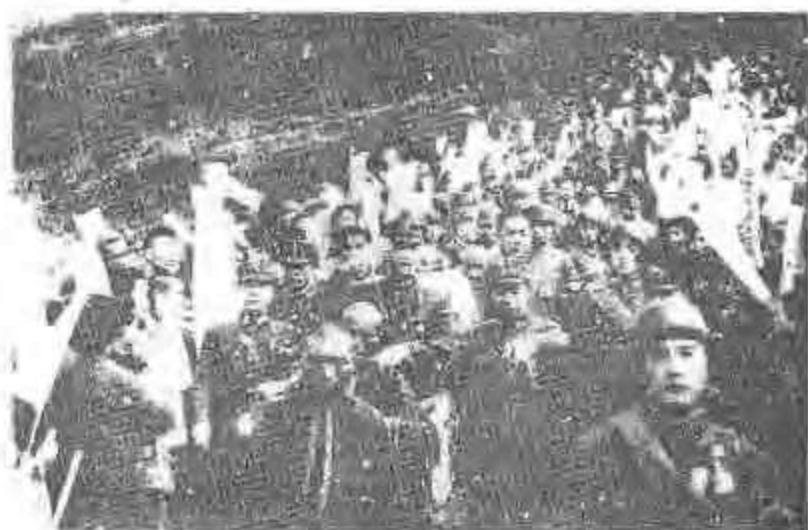


女游击队员的英姿



- 1. 大军向狼山挺进
- 2. 在绥远敌后抗战的西盟女英雄王奇俊
- 3. 在绥西敌后抗战的傅作义将军
- 4. 转战于阴山地区的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





1. 上海浦东地区忠义救国军司令丁××与美军萧约少校
2. 日伪军向江南地区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发动“清乡”，在精卫视察苏南“清乡”区。
3. 战斗中的游击队
4. 在苏北敌后作战的缪徵流军长
5. 浙东童子军大刀队

1	1
2	2
3	3





华南游击武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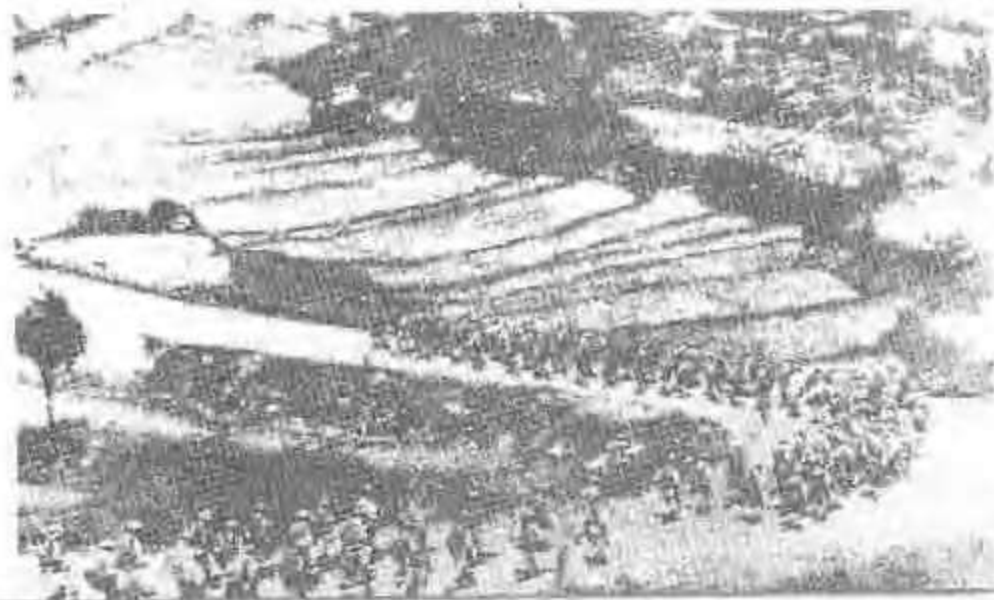


大别山游击总
指挥李品仙将
军在淮南前线



严陈以待的大别山
游击军阵地

在大别山中自由运
动的游击军





黄泛区游击军



敌后实行兵农结合

到敌人后方去





第3军军长周淮源上将



第98军军长
武上敏将军



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
周爰中将



第51军114师师长
方叔洪中将

在敌后抗战中殉
国的游击军将领



第34军暂编第45师师长
王凤山少将



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师长
刘桂五中将



东北游击队总司令
唐聚五中将



第五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
刘震东中将

序

廖伯康

聂荣臻元帅指出：“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这是一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同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联合进行的神圣的民族战争。”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军》一书的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在敌后同八路军、新四军一道并肩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和游击队的事迹。在抗战的艰难时期，李家钰、武士敏、唐聚五、傅作义、卫立煌、范筑先、马占山等人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和游击武装，在敌后英勇作战，早已为人民所肯定。同时，也有某些顽固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违背抗日统一战线要求，发动“磨擦战”，同室操戈，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给敌后的全民抗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本书对有关的史实，也作了揭露和记述。这对于吸取历史教训，启迪后世，我想是会有裨益的。

今天，历史又在召唤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积极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尽早实现祖国统一，振兴

0058/03

中华的大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杨成武同志说得好，对国民党方面高层人物的评价，“是功绩就讲功绩，是过失就讲过失，一段时间有功就讲一段时间有功，一段时间有过就讲一段时间有过。哪怕是劣迹昭著的人，只要做了一点好事也不回避和隐讳。这就说明：任何人只要为祖国、为民族做了有益的事情，人民就不会忘记他，爱国就是一家人”。青年作家孙挺信同志在写作中力求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批判那些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和事，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目 录

序

- | | |
|---------------------|-------|
| 第一章：华北大破袭 | (1) |
| 第二章：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 (11) |
| 第三章：战斗在吕梁山上 | (63) |
| 第四章：立马中条 | (81) |
| 第五章：太行风雨 | (99) |
| 第六章：狼山喋血 | (129) |
| 第七章：泛区豪杰 | (146) |
| 第八章：扎根大别山 | (180) |
| 第九章：鲁苏逐鹿 | (211) |
| 第十章：挥戈江南 | (248) |
| 第十一章：华南烽火 | (292) |
| 后记 | (308) |
-

第一章 华北大破袭

1. 风雨飘摇的重庆统帅部

1940年夏季。

日军在长江中游大举西犯，攻占了宜昌要域，打到了四川的大门口，直接威胁着重庆统帅部的生存。

接着，日军陆、海军航空部队从沙市、宜昌、广州、南宁、河内等基地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施以规模空前的毁灭性轰炸。几个月来，山城重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恐怖的空袭警报、敌机轰炸声中颤抖、流血、燃烧。

华北的局势又骤然严重了。

华北日军向晋南豫北黄河北岸大量集结兵力，扬言要进攻潼关、洛阳，掠取西安，进而深入川西盆地。

蒋介石一次次地向北战场各军长官通报敌情，令其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同时，他也深知，黄河天险不可能真正挡住日军。如何制止日军的南进，这是当时面临的最为迫切而严峻的问题。

此时，在北平。正一心想着向黄河以南进攻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却得到各地日伪特务的报告：

——八路军在各游击根据地内，正向各村各户突击征收面粉，屯积军粮，组织民夫队、担架队、战地救护队等。

——井陘煤矿地区的居民纷纷离家远去，他们似乎得到了什么异常消息，才有这种反常行动。

——独立混成第4旅团司令部从阳泉报告：近来，发现很多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在附近闲逛，市场上买卖东西的人，几乎半数都是新面孔。

——石家庄地区日军铁路守备队报告：该地区铁路沿线的修理工具突然失窃较多，估计是八路军游击队给弄跑了，他们收集这些东西有何用意，情况不明。

最后，各地日伪军纷纷报告：八路军从“地下”冒出来了，他们正向根据地以外移动，集结兵力，声称这是要南下太行山和吕梁山，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一死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见报大喜：“好！只要国共两军内战再起，无需皇军再费大的力气，便可灭亡中国了！”

日军伸长了脖子，盼望着华北大规模的“磨擦”战早日爆发。

8月20日，深夜。

蒋介石在处于风声鹤唳的重庆，得到从北战场传来的一则消息：在河北、山西北部广大地区，同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这些地方属于八路军的游击区。蒋介石想肯定是小股土八路在敌后骚扰，于整个华北的局势并无大的影响。

接连几天传来的情报，就使他感到有些纳然了。原来，20日夜间开始的战斗，并不是小股武装的骚扰。在东起山东德州，北至北平近郊，南到河南安阳、山西长治，西至洪洞、离石、寨上、神池等百余个县的土地上，几乎都响遍了抗日的枪声炮

声爆炸声。

蒋介石搔着精光的脑袋，怎么也不敢相信土八路竟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在如此空旷的地域展开如此宏大的战场。

何应钦将军送来电报一件。是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过叶剑英参谋长打来的。

何念道：“……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限期截断该线，彻底毁灭铁路交通，及主要公路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截断其交通，以彻底粉碎敌寇进犯西北之企图，争取整个战局之好转。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余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申明……”

接下去，朱、彭的电报呈报了参战的一百零五团兵力的具体部置、作战地域和任务划分。

何应钦念着电报，几个参谋熟练地在地图上钉三角形纸片，作上标记。电报念完，百团大战的军事部署图就标出来了。

蒋介石盯着地图，仍不敢完全相信，心里嘀咕道：会不会是虚张声势，夸大其词？

军令部一个高参进来报告：据刚收听到的敌人方面的广播消息，华北第18集团军大举破坏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已炸毁铁路桥十多处，铁路破坏严重，其中乏驴岭至地都段铁路、桥梁、碉堡、电话杆电话线，皆被悉数破坏，并占领大同的井陘煤矿，将所有的矿井机器全部炸毁了。

蒋介石这才相信了，华北，正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游击大破袭战。

2. 蒋介石悟出了游击战真谛

百团大战的枪炮声着实激动了冀南、晋西、晋南敌后的国民党游击军们，一个个磨拳擦掌，都要抄起家伙杀将出去，痛痛快快地与八路兄弟并肩战斗，跟凶恶的日本侵略军大干一仗。尽管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在几个月前还同八路军在吕梁山、太行山搞过“摩擦”。现在，当那杀敌的枪炮声传来，他们把一切恩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民族的生存，炎皇子孙的心又跳到了一块。

太行山南麓的庞炳勋、孙殿英、范汉杰激动了！

中条山的卫立煌激动了！

吕梁山南段的阎锡山激动了！

太岳地区的第93军刘戡将军也激动了！

他们分别制定了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出击日军的作战计划。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接连向重庆统帅部打去电报，以异常兴奋的心情和亲切的口吻报告：我第十八集团军百团大战继续取胜，华北日伪军乱成一团，晋南日军沉不住气了，纷纷沿同蒲铁路和太行山北上增援。

蒋介石听说华北日军乱了阵脚，晋南日军被调北上，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也就在这时，他仿佛悟出了点什么新的东西。游击战？原来游击战的窍门在这里：将自己隐蔽得严严实实，把敌人的根底瞅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敌人，专拣敌人软弱处揍（即敌之水陆交通线、兵站、仓库以及分散之敌等等）。

蒋介石心里嘀咕道：土八路真有两下子，难怪在十年内战中，调集了那么多国军，拼足了底气，一次次地围剿，却总是整不倒他们。

现在，他悟出了游击战的真谛。立即向全国各战区各部队发出一道训令：

查游击战术要旨即在准备充分，行动秘密与侦察周到，而其基础则在敌后各预区之民众参以组织与爱护，各战区应以十八集团军此次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自本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机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在此游击期间，第一要义，务使敌军不能抽调其在各地区之部队，破坏其十月间秋季攻势，造成与我军有利形势。仰各战区迅即遵循本会迭次下达关于游击之训令，以及本会所示之趣旨，切实研究，拟定整个游击计划。一面实施，一面具报。……

日军遭到百团大战全面袭击，损失惨重，这才回过神来，八路声称南下与中央军决一雌雄，只是为了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兵力。而那些在阳泉街上邈达的男子，亦是八路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个经常出入于阳泉车站的男子，现在才搞清楚，他是八路军某部的参谋长。

游击战，搞得华北的大日本皇军都有点神思惶忽了。

恼羞成怒的日军调集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报复，同时，他们印刷了大量的传单、布告，用飞机装到战场上空撒，让进攻的部队沿途张贴。他们在布告、传单上大肆造谣，挑拨国

共两党和军队的团结，说你们八路军现在从“地下”冒了出来，跟大日本皇军面对面干硬仗，其结果只有被全部消灭。你们在这里跟皇军干大仗，蒋介石才高兴呢，杂牌军、中央军都在背后拍手称快，他们希望你们被皇军消灭干净等等。

朱德、彭德怀当即打电报给蒋介石，告之以上情况。

蒋介石对日军的卑鄙伎俩感到愤慨，向阎锡山、卫立煌等华北敌后抗战的将领，下达了全面出击敌人，策应第十八集团军百团大战的命令。

命令发出之后，蒋介石又打电报给朱、彭。电称：

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

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接着，他告诉朱彭，他已下令华北有关部队立即出击，与十八集团军并肩作战，狠狠打击倭寇，望二位将军速飭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3. 华北国军大破袭

坚持在敌后太行山、吕梁山和中条山中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如同猛虎出山，扑向敌人，展开了一场大破袭战。至此，华北国、共军队的大破袭战，同时在东西宽约四百多公里，南北长约六百多公里的土地上进行，历时一个多月。

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有三支国民党的军队。其中，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部队，以吕梁山南段为根据地，卫立煌的第一战区部队，以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晋东南和冀西南太行山南麓，驻有河北省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三个军，和河北民军等游击部队。

华北南部的国军与北部的八路军无论是采用的战略战术还是杀敌卫国的热情，都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游击战场。由数十万游击大军和无数的人民群众，在广阔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战争史上罕见而宏伟的奇观。

南部战场上的国军，按地域分为东、南、西三个集团。

东集团。

该集团以庞炳勋第24集团军之第40、新5、第27三个军，加上中条山第14集团军的93军和第9军，共五个军和数以万计的地方游击部队。

出击目标为：以庞炳勋集团军主力破袭京汉铁路线之安阳至新乡段，使敌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梗阻，无法运兵策应；以范汉杰第27军主力，从东北方向主攻晋城之敌；以93军两个师的兵力，攻击高平，长治之敌，并彻底破坏长治、高平、晋城间的公路交通线，阻止日军南下救援晋城。93军另一个师（第10师）出击阳城之敌，并阻击从西面增援晋城的敌人，第9军以一部兵力袭击沁阳、博爱地区之敌，以该军主力挺进晋城至博爱间的交通线，扫除沿线敌人据点，彻底破坏道路交通。然后，挥师北进，从西南面助攻晋城。

在东集团发动破袭总攻前，日军从长治、高平、阳城等地抽调了七八千人的兵力，沿高平、长治，向沁源、武乡方向，增援北战场。东集团各部在向长治以南之敌发动全面袭击时，首先以有力兵团，沿途袭击北上之敌，竭力阻止其北上对八路军的攻击。

东集团很快将长治、安阳以南的铁路、公路及通信线路破坏殆尽，将交通沿线敌之据点大部扫除。整个晋东南和冀西南地区的交通处于瘫痪状态。分散之敌不是被消灭，就是自动放

弃据点，赶紧龟缩于各中心城镇，拼死顽抗。

刘戡指挥 93 军的两个师将长治、高平地区的小据点逐一攻克，日军凛于中国军之神威，将兵力收缩到高平、长治两个点上，躲在碉堡工事里，不分白天黑夜，胡乱打枪放炮，惊恐万状。该军一部攻破高平近郊一个据点，炸毁敌粮弹车五十余辆，震撼了晋南之敌。

第 93 军第 10 师亦很快扫灭了阳城外围敌据点，将敌压迫至城内，连续发动猛攻，战况尤烈。

裴昌会指挥第 9 军三个师和丁树本支队，向博晋沿线之敌攻击时，敌已有充分戒备，死守各据点，负隅顽抗。中国军每攻克一个据点，都付出相当重大代价。

战斗最激烈的是晋城。晋城是日军在晋东南守卫的重点，百团大战前，日军即在此赶筑了大量碉堡工事，防御体系完善严密，并驻重兵于此。

范汉杰将军指挥第 27 军为主攻部队，所部各师在城郊与敌激战数日，曾一度攻进城内。但是，日军凭借其坚固工事顽抗，范军伤亡过重，被敌反击了出来。双方在城东北的百官村展开决战，经旬日激战，毙敌千余人，取得重大战果。

南集团。

南集团以卫立煌在中条山的第 4、第 5、第 14 等三个集团军，共六个军和若干地方武装组成，分别从东面攻袭同蒲铁路南段。

与东集团一样，在南集团尚未发起破袭战之前，临汾以南的日军，抽调了四五千人的兵力，向榆次方向北进，企图攻击正在进行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南集团先以有力之一部，积极出击，牵制日军，阻止其北上。

孙蔚如指挥第4集团军各部,从中条山西麓杀出,对运城之敌发动猛攻。日军害怕中国军截断同蒲路,同时,又担心运城以北的安邑飞机场遭到破袭,因此,置重兵固守运城地区。两军在此展开激战。

第4集团军组成若干个游击小分队在夏县地区破袭敌之交通线。又以一部兵力攻击张(店)茅(津渡)大道,围攻沿途日军据点,破坏公路交通。

曾万钟第5集团军从中条山中段出击,将同蒲路至垣"支线段之敌伪据点和铁路破坏殆尽,使之无法通车。同时,以一部兵力向闻喜地区攻击,攻破据点十数个,破坏公路交通,威逼同蒲铁路线。

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指挥各部队,分别向沁水、冀城、绛县、曲沃等地出击,主力直指同蒲铁路线上的侯马车站。将这些地区的公路、电线尽行摧毁。

第93军还派出一个铁道破袭分队,深入到临汾附近,炸毁一列正往南开的军用列车,打死日军百余名。

西集团。

西集团以阎锡山第二战区各军组成。阎锡山又将西集团划分为南、北、中三路大军。

北路军由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将军指挥。以分散多路形式,分别向柳林、离石、汾阳、灵石、洪洞等地区和同蒲铁路线袭击。

中路军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吕瑞英指挥,向同蒲铁路西侧的襄陵、汾城等各处进袭,同时,攻击河津、稷山、新绛等地,与中条山的破袭部队相呼应,形成东西两面攻击同蒲铁路线之势。

南路军由孙楚第8集团军之彭毓斌第34军和魏纯美支队组成，分别破袭黄河三角地带的闻喜、猗氏、万泉、临晋交通线和日军据点。

另以第90军61师一个团，在侯马一带开展游击战，扰乱敌之部署，配合中条山和吕梁山部队对同蒲路发起的东西两面攻击。

华北国共两军所进行的大破袭战，是战争史上的游击战奇观，是国共两党同赴国难，拯救国家民族最为动人的史迹。大战近一个月，至9月中旬，八路军第一阶段作战告一段落，集结兵力，准备转移战场。日军乘机向南增援，至9月下旬，南战场国军各部作战亦告一段落，主力陆续向根据地山中引退，仍以无数小分队继续破袭敌人。

第二章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1. 燃烧的关东大地

1931年9月18日。

宁静的黑夜。沈阳城象个熟睡的婴儿，躺在沃野千里的辽河平原的怀抱里，安祥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就在这时，一场罪恶的阴谋正在进行，战争的恶魔已高高举起屠刀，对着这块肥沃的土地，对着那巍峨的兴安岭和美丽的长白山，对着这块土地上那些善良敦厚的人们，发出了阴森恐怖的狞笑。

在浓重的夜暗中，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指挥河本少尉和几个日本兵，鬼鬼祟祟地摸到沈阳城郊柳条沟——中国军队北大营西侧的南满铁路边，将一个炸药包安放到铁轨下，点燃导火绳，然后溜之大吉。

一声沉闷的巨响，炸断了一大节铁轨，也炸碎了这深夜的宁静。当时的时钟正好指向夜里10点。

于是，早已等候在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百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中队长川岛正大尉指挥下，立即向“破坏”铁路的北大营中国军队发动

进攻。

几分钟后，日军炮兵阵地上的榴弹重炮一齐吼叫起来，炮弹呼啸着没头没脑地直朝北大营砸来，顿时火光冲天……

“九·一八”，这个苦难的日子！

日军在东北境内全面进攻，东北沦陷了！

日军在黑土地上建起了“满洲国”。

当时，正处于内战中的中国，只得于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出一道软弱无力的申诉，控告日军侵略了中国的东北，请求世界各国明断公理。国联决定派遣以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前来东北实地调查。

侵略者却在那里狡辩：满洲国是东北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与关东军无关。

当李顿及其调查团成员一踏上黑土地，就感觉到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着复仇的怒火，都响着抗击侵略者的枪炮声。

以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为首的数万义勇军，正奋战于嫩江平原。

以李杜、了超为首的十万吉林自卫军驰骋于松花江流域。

以苏炳文为首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战斗在大兴安岭西边呼伦贝尔草原。

以冯占海为首的吉林义勇军十万大军，正向吉林、长春发动强大攻势。

辽宁省主席兼抗日救国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的十万义勇军，把反抗侵略者的战旗插遍了长白山地区二十余个县……

东北敌后数十万抗日义勇军，用反抗侵略的枪炮声，炸开了“满洲国”的伪装；用民族复仇的大刀，劈开了侵略者的假

面具。

李顿调查团作出结论：日军侵略了中国，“满洲国”是外敌强加给中国东北人民的。

2. 马占山转战嫩江平原

辽宁和吉林两省失陷后，黑龙江省被关在了敌后，日军的进攻迫在眉睫。

10月中旬，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军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将军接到张学良从北平打来的电报，委任其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马占山立即率部进抵齐齐哈尔，组建新的省府，决心领导军民保家卫国。此时，洮索镇守使张海鹏已率部投敌，成了伪军头子。马占山对此切齿痛恨，发出布告，悬赏两万块大洋，拿办张贱人头。

11月4日。日军关东军第2师团和伪军张海鹏部四千余人在飞机和四列铁甲车的掩护下，向齐齐哈尔进攻。战斗首先在嫩江畔的江桥打响，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义勇军将士怀着满腔复仇怒火，士气高昂，奋勇杀敌，打退敌人多次冲锋。

黄昏时，日军因死伤过重，无法突破义勇军防线，便派了一支敢死队，乘着天色昏暗，划着百余只木船，从江桥阵地一侧偷渡，企图迂回包围守军。

马占山对敌人的诡计早有预料，已将一支部队埋伏在敌人可能偷渡的地方的蒿草丛中。当敌船队快接近时，突遭岸上伏兵猛烈扫射。日军纷纷中弹坠入水中，不少船只被手榴弹炸毁炸沉。船队在水中乱成一团，死伤累累，仅少数敌人逃回对岸。

第二天,由张海鹏的伪军打头阵,向江桥阵地发动新的攻击,激战大半天,日伪军死伤一千四百多人,攻势再次受挫。午饭后,日伪军已无力发动冲锋,战场静了下来。

第三天,日伪军的大批援军赶到,五十余门大炮一齐吼叫,将江桥阵地摧毁殆尽。日军的飞机也来助战,在守军阵地上俯冲投弹、扫射,掩护地面部队冲锋。

马占山在第一线阵地与官兵并肩战斗,死死顶住敌人的冲击。同时,他命令骑兵部队向侧面迂回。关东骑兵十分骁勇顽强,挥舞着雪亮的大片刀,风驰电掣般抄到敌侧后,一阵猛冲猛劈,砍得敌人血流成河,抱头鼠窜,攻势又垮了下去。

夜里,义勇军因伤亡过重和阵地尽被敌炮火摧毁,不得不撤出江桥,向后方转移。

马占山以骑兵第1旅和步兵第1旅,在三间房组成第二道防线。以步兵第3旅,在齐齐哈尔城南昂昂溪组成第三道防线。

日军攻占江桥后,迅速增加兵力,以步兵、骑兵和野战炮兵,组成混成攻击部队,在数十架飞机配合下,于11月12日,再次向义勇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马占山指挥部队在三间房、昂昂溪与敌反复争夺血战七天七夜,予敌沉重打击,但马部将士也伤亡极重,防线被敌突破。于11月18日,放弃齐齐哈尔外围阵地,退入城内固守。

19日,又一批日军从长春北上,增援围攻齐齐哈尔之敌。马占山见敌我力量悬殊,城内已无险可守,率领部队和省府机关人员向城东北方向转移,后在黑龙江中部的海伦县城重新树起省政府大旗,号召军民与日寇作斗争。

日军占领了省城齐齐哈尔后,调集大军继续追击围剿义

勇军。

此时，正值隆冬，松嫩平原早已滴水成冰。

马占山及义勇军一直被强敌追击，经常陷入敌包围之中，处境异常艰难。一天，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铃木旅团很不适应冰冻严寒的气候，处境也很困难。将士们顿时来了情绪，纷纷要求反击敌人。马占山立即将主力集中于塔哈尔和林家甸地区，于12月17日，向敌发起突然袭击，激战竟日，歼敌三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但并未能打破敌人的围攻。

日伪军遭此打击，也老实多了，收缩部队，固守阵地，不再贸然追击。在那艰难的寒冬里，战场暂时沉寂下来。

在日伪军围困中，义勇军的给养和弹药补充越来越困难。

马占山带着一队骑兵去野外打猎。战马在雪原上飞奔，他浑身热血也沸腾了起来，他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全中国的民众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民族大军，向侵略者发动排山倒海般的反攻，收复祖国的大好河山。

回到营地，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以本部全体将领名义，向国民政府中央发出通电，以血泪声声的悲愤心情，向中央建议：“召集义勇军大省五万人，小省二三万人，大市一万人，小市三五千人，咄嗟之间，一百万义勇军，不难即日集合完竣”。“以上三十万人驻江海各岸，以七十万人开赴山海关外，”“首先驱逐东三省日军，恢复失地；继则索回台湾，扶助韩国独立，悬此目的，不达不止。”

但是，当时的关内，正陷入激烈的内战，马占山的这个宏伟的计划，只能成为悲壮的幻想。

日军又从锦州调来增援部队，哈尔滨方面的日伪军也向西压迫，对马占山部步步紧逼，包围圈越来越小，马部被置于

全歼的绝境。这时，日军派出汉奸张景惠等人前来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

马占山原本土匪出身，没上过学，但打仗很勇敢，头脑特精灵。他想，我现在处于绝境，若不赶紧想个法子缓和一下，就将全军覆灭。日军看得起俺，要俺归顺皇军，还不如先屈就一下，来个假投降，与小鬼子较一较智能，待渡过了这一难关再作计较。

1932年2月初。“抗日大英雄马占山”投降了，当了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的省长。

3月末，春暖花开，大地复苏。

伪军政部长兼伪省长的马占山从齐齐哈尔城溜了出来，逃到了黑河，重新组织中华民国黑龙江省政府和省军署机关，调整好自己的队伍，通电反正。

5月初。马占山来到海伦，联络起黑龙江，吉林两省义勇军十多万人，组成黑龙江抗日救国军。各路义勇军首领公推马为救国军总司令。

5月15日。马占山指挥各路义勇军向哈尔滨推进。5月下旬，义勇军在呼兰地区大败日寇，并乘胜追击，将敌压迫至松花江边。正当义勇军将全歼敌寇时，马占山的部下程志远却在关键时刻带着人马投敌，将呼海路方面追击日军的义勇军堵住，使敌得以逃脱。

哈尔滨之敌调整阵容，以主力重点打击马占山部，他们向呼海路发动了猛攻，马部不支，向哈尔滨西北的安达地区败退。日军追击到安达附近后，突然转锋北进，一举覆灭了马占山的根据地核心地区——海伦。

马占山失去后方，只得率部游击于齐齐哈尔东北地区。

7月14日。日军以第14,第18两个师团,向马占山都发起大规模围剿。马部伤亡惨重,突出重围后,仓促向兴安岭转移。日军决心彻底解决马占山,以大批兵力紧追不舍,数度将马部包围,终于将其打散。

马占山和少将参议韩述彭带着五名卫士逃进深山老林。日军又紧追而来,声称一定要抓住马占山。他们被敌包围在一个山头,子弹也快打光了,便藏进树丛里,待搜山的几个日军走近,猛然开火,打死了那几个日军,捡了敌人的枪弹,打出了重围。

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此人长象很象马占山,日军以为是马占山,欣喜若狂地向关东军总司令官报告请赏。关东军总司令官也喜得不行,立即把“打死马占山”的消息电告东京的陆军部和天皇元帅。

马占山在大山里与敌周旋,弹尽粮绝,以树皮草根和野果充饥。经过重重艰难险阻,于9月初,只身来到龙门,马上与各路义勇军取得联系,很快又聚集起数千人的队伍。经过一番整顿,于10月中旬分三路向齐齐哈尔城进攻。但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省城没打下来,反倒损兵折将,枉自消耗了义勇军力量。

此后,他的义勇军分驻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的讷河、拜泉、明水、青冈、巴彦等广大地区。

10月以后,他与大兴安岭西边呼伦贝尔盟的苏炳文义勇军取得了联系,计划于12月初分路夹击黑龙江省的日军。

日军窥窃了马、苏的用意,抢先动手,分兵攻击马部和苏部。两部义勇军被敌分割,相互不能救应。

32年12月初,苏炳文部被日军打出了呼伦贝尔草原,败

退到苏联境内。

同年12月中旬，马占山部战败，亦退入苏联。

3. 战马奔驰在呼伦贝尔草原

1932年盛夏。

这是个充满蓬勃生机的季节，白山黑水绿浪翻滚，大豆高粱开花挂果。

在这个季节里，整个东北境内的义勇军也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民众反抗侵略反抗奴役的怒吼声，震撼了关东大地；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吉林，通化、沈阳等各大中心城镇，都分别受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义勇军的包围攻击。中国的国旗成为各路义勇军的战斗旗帜，飘扬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辽河平原和高高的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日军一再向东北增加兵力，进行残酷镇压屠杀，却难以控制形势，呈现四处受击，疲于奔命的狼狈状态。

地处大兴安岭西面的呼伦贝尔草原，此时却显得出奇的宁静，“满洲国”的五色旗和日军的膏药旗在火辣辣的烈日下，在满洲里和海拉尔城的建筑物高处，没精打彩地翻卷着。

这里是“满洲国”内难得的一块安全乐土。

9月，满洲里的军政统治者们，正一心一意忙于筹划组织孔夫子的诞辰纪念大会，虽然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孔丘到底是猴年马月生日，谁也说不清楚，但那里的军政首长们却十分当回事儿，准备得相当认真，并早就打招呼，到孔夫子生日这天，要特地邀请日军方面来喝生日酒，以示隆重庆祝。

日本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特深，有同文同种的历史渊源。但那些被中国人骂为“鬼子”“倭寇”的日本兵，未必就真正了

解孔子为何物。他们只是认为在这全东北义勇军大进攻的时候，这里的中国人却醉心于搞这种“莫名堂”的把戏，正好可以说明日军的殖民政策方法得当。于是，他们当然是给予热情鼓励，大力支持了。

9月27日。当日本驻满洲里的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寿，国际警察队的宇野等人接到满洲里市长及驻军团长吴德霖等人送去的请柬时，都放心大胆地欣然应邀。日军曹长以上的军人也热热闹闹地跟了去，准备借此机会，大打一回孔子“牙祭”，畅饮一盘孔子酒。

当日方“领事”、特务及大大小小的日军头目腾空了肚子，高高兴兴来到孔夫子纪念大会会场——满洲里驻军司令部的楼上时，却没见到可口的酒肉饭菜。会场冷冷清清，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正在纳闷时，突然从两厢冲出许多中国军人，一杆杆硬邦邦的枪管顶住那伙人的腰间软处，大喝不许动。

鬼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闹懵了，傻愣了老半天，才冒出一句，“什么地干活？”

中国军人难得跟他们啰嗦，将那伙人按在楼板上，用指头样粗的麻绳把他们给扎扎实实地捆起来，两个三个夹一个鬼子，象提小鸡似地拖进一间屋子给关了起来。

在这同一时刻，东起齐齐哈尔附近的富拉尔基，西至呼伦贝尔草原的边城满洲里，所有的城镇都升起了青天白日旗。所有交通要点上的日军据点，都被中国军扫除。驻满洲里的日军国际警察队，突被两个营的中国军队包围，日军企图顽抗，当即被毙伤二十多个，其余的见势不妙，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

这一地区与外界的所有交通、通讯都中断了。

关东军拿不准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派了一架飞机前去打探消息。那架飞机在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上空转悠了一阵，大概瞅出点名堂了，正欲返航，燃料却烧光了，只得紧急迫降在朱家坝附近。当地军民忽啦啦围了上去，把机上十多个日军尽行击毙。

这场漂亮的“政变”是由呼伦贝尔地区驻军最高长官苏炳文将军及其幕僚们导演的。

10月1日。海拉尔城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大会向南京当局及海内外通电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任总司令。全体救国军表示，全力讨伐满伪奸贼，誓同日寇血战到底，规复东北大好河山。

苏炳文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树起抗日大旗后，极大地鼓舞了整个东北的民众抗敌热情，嫩江平原的义勇军马占山部，李海青部等纷纷与之联络，并约定共同反攻齐齐哈尔城。

苏炳文的抗日义举，也极大地震动了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他们担心苏、马这两支义勇军劲旅会合，夹击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的日军，再挥师东进，横扫哈尔滨地区的日伪军。于是，他们迅速调集兵力，以一部置于齐齐哈尔西南嫩江畔，阻击苏炳文部的东进；再以主力向齐齐哈尔东北方向出击，重点打击马占山部。

马占山部被优势之敌一再向东北方向压迫，苏炳文部被日军堵在富拉尔基沿江一带，反攻齐齐哈尔的这两支主力无法靠拢，始终未能形成拳头力量。

日军打败了马占山后，立即将主力西调，富拉尔基方面日军增至一个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当时，北国已进入寒冬，嫩

江封冻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立即大显威风,他们在飞机和重炮火力支援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道,向救国军阵地发动猛攻。

苏炳文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数日,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阵地被敌突破,只得退守大兴安岭要隘扎兰屯、碾子山等地,企图将敌人扼制在兴安岭以东,保卫呼伦贝尔地区的安全。

日军为打开大兴安岭雄关,进入呼伦贝尔,不惜血本地投入兵力,与救国军争夺要隘。

11月下旬,兴安岭防线被敌突破,呼伦贝尔失去屏障,无险可守,日军进入了草原地区。

12月4日。苏炳文率领救国军残部四千余人,悲痛地离别可爱的故土,从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

4. 李杜的下江地区十万义勇军

1931年9月21日。

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与哈尔滨地区镇守使张景惠、东北骑兵师长于琛澂等人勾结一起,乘着日军“九·一八”在沈阳的侵华炮声,迫不及待地在哈尔滨城头挂出“吉林省长官公署”的招牌,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为正在拼凑中的伪满洲国充当急先锋。

熙洽等几个汉奸仗着手头掌握有大批伪军武装,又有关东军为其撑腰,肆无忌惮地大干卖国勾当。他以“省军政长官”名义向全省下达命令,要全省各地军政长官必须绝对服从他的节制和指挥,否则,将以大军讨伐之。

地处下江地区的伊兰镇守使李杜,闻知吉林事变,顿时怒

发冲冠，表示决不屈从于日伪军的淫威，更不买熙洽等人的帐，誓与卖国政权势不两立。

此时，马占山已在嫩江畔的江桥打响了抗日救国的第一枪，吉林省的爱国军民顿时热血沸腾，纷纷扯旗抗战。原吉林省军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第23旅旅长赵毅、原吉林省警务处长王之佑、原东铁护路军司令丁超，以及刑占清、王德林等人，都在哈尔滨地区拉起了武装，掀起了吉林省敌后抗战的高潮。

李杜在下江十三个县境内，大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和组织民众，扩充抗日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拥有了数万人的队伍，并与冯占海部取得了联系，商定共同行动，进军哈尔滨。

1932年1月中旬，李、冯两路义勇军同时行动，向哈尔滨挺进。1月26日，两路人马进至市郊，向伪军发动突然攻击，激战数日，将敌防线冲溃，歼敌甚多。伪军招架不住，向南溃败而去，义勇军夺取了哈尔滨城。

李杜、冯占海义勇军进入哈尔滨城后，全城大街小巷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旗，民众自发地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义勇军进城。

1月底，刑占清、赵毅等各路义勇军首领汇聚哈尔滨城，由李杜将军主盟，召开了吉林省抗日将领会议，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大家针对当时所处敌后的困难境地，决定要更加紧密团结，共同对敌作战。一致同意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公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

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的成立，与马占山的义勇军，在松嫩平原形成了两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集团，对吉、黑两省的日伪军构成强大的军事压迫。但是，此时的这两大抗日武装，都

分别将自己孤立于齐齐哈尔和哈尔滨这两个中心城市，虽有一定联系，却并未有统一的指挥。同时，尚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作战行动，都以大兵团正规军运动战的形式；虽是敌后游动作战，却大都采取纯军事行动，而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整个东北的义勇军，虽然作战都异常勇敢顽强，悲壮感人，且声势浩大（日军资料中一说有三十万，一说有一百万；国内资料有说数十万，有说五十万），但大都缺乏游击武装的韧性和弹性，很快就被日伪军打散。

日伪军在如此不利的军事压力下，却瞅准了义勇军的弱点，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打垮了马占山，将其迫于绝境，逼其“投降”。

日伪按平了黑龙江的抗日怒潮后，立即回过头来集中全力攻击吉林省的义勇军。

日伪军集中大批人马向哈尔滨进攻。李杜发起哈尔滨保卫战，企图守住这座大城市。

敌人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向哈尔滨南进攻，义勇军将领赵毅率部在双城地区与敌激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日军余百名的战果，但义勇军亦伤亡不轻，防线经不住日军飞机、坦克的多次撞击而被突破。

日军打开双城防线后，直逼哈尔滨南郊。

此时，于琛激五个旅的伪军从东南迂回进攻，威胁李杜的伊兰方向退路。哈尔滨城陷入危险境地。

2月4日，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向市区进攻。

李杜仍企图力撑防线，保卫哈尔滨城。他命令各路义勇军分头阻击敌人进攻。他自己也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将士们虽然都打得英勇顽强，但防线却一处处被敌人

攻陷，形势愈趋严重。

此时，义勇军内部也出现不稳，个别将领阵前倒戈降敌，一些人又临阵脱逃，或将队伍带离阵地，保持“中立”，静观事态发展。各路人马共同保卫哈尔滨城的阵线已名存实亡。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李杜将军在阵地上指挥督战，虽然把嗓门都喊哑了，也无法止住日伪军进攻的浪潮，急得要自杀殉国，幸被部下劝阻。

2月5日，李杜等将领率领部队向东突围。

日伪军占领了哈尔滨城。

李杜率领义勇军在哈尔滨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数度反攻哈尔滨，兵力消耗日重，未能如愿以偿，只得退回伊兰地区，暂事休整，扩充兵力，以图后举。

4月，马占山在黑龙江省重新举起义旗，指挥部队从北面进攻哈尔滨。李杜大受振奋，决定响应马部行动，从东面向哈尔滨进攻。

李杜将伊兰地区的义勇军分成左中右三路，由第一旅旅长马宪章，自卫军总参谋长杨耀钧和冯占海三人，分任各路总指挥。三路大军沿松花江两岸浩浩荡荡向西挺进，出师皆捷，进展神速，很快就杀到了哈尔滨城下。

日军却看出伊兰后方空虚，以第10师团主力中村支队，在伪江防舰队配合下偷袭伊兰。李杜遭此突然袭击，措手不及，率部转移到了中苏边境的梨树镇。

进攻哈尔滨的三路大军，也因日伪军攻占了伊兰大本营，卡断了后勤补给，攻势顿挫。

吉林省自卫军因此次失败面分崩离析。丁超带了一部分人马，退往偏远的宝清地区，脱离自卫军序列而自打旗号。

冯占海率部南下，建立了吉林省抗日义勇军。

马宪章和杨耀钧率领余部人马于六七月间退回勃利八面通、马桥河一带。

李杜在梨树镇召拢旧部，重新树起抗日大旗，又联合了吉林东部的其他几支武装，建立了抗日联合军，李杜出任抗联总司令，队伍又发展到四五万人的规模。

1932年冬季，日军打败了黑龙江省的义勇军，施用一贯手法，集中优势兵力，回过来进攻吉林省东部的李杜联合军。

李杜率部在勃利、梨树镇等地作战失利，于1933年1月上旬，率领残部由虎林渡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

5. 冯占海及其吉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后，东北民间流传着一首歌：“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

马占山前已述及。“二马占海”即吉林抗日义勇军首领冯占海将军。

冯占海原为吉林省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日军进占吉林城时，冯率部退至官马山，向全省发出抗日讨逆通电，号召民众“群起抗敌，绝不屈服”。

9月底，冯率领所部渡过松花江，北进至五常县，在此发动民众，扩充队伍，仅一个月时间，就将部队扩编到两万多人，成为一支很有份量的抗日武装。

11月初，根据张学良的指示，义勇军在哈尔滨以东的宾县成立吉林临时省政府，冯占海被委任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当月12日，冯占海在五常县宣誓就职。

1932年1月下旬，冯率部北进，配合李杜丁超部进攻哈

尔滨。进城后，各路义勇军联合组成吉林自卫军，冯占海任副总司令。2月初，日伪军大举进攻哈尔滨，自卫军抵敌不住，退往伊兰。4月下旬，自卫军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失败，冯占海率部南退。

其后，冯以五常、方正、延寿等地为游击区，一边与敌伪作战，一边扩大武装，至32年6月初，所部已拥有五万余人，编为十二个旅，四个支队，三个团另一个营。部队正式更名为吉林抗日义勇军，冯占海任总指挥，宫长海为副总指挥。义勇军总指挥部设在五常县。

6月下旬。义勇军兵分两路进攻哈尔滨，在城郊与日伪军血战竟日，因敌人兵力雄厚，且有几十辆装甲车和二十多架飞机助战，哈尔滨城未能打下，遂掉头南下，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榆树县城之敌，一举击败守敌，攻克县城，捣毁日军旅团司令部，击毙日军指挥官大川少将，阿布大佐，高喜少佐以下日军官兵多人，取得重大胜利。

冯部又乘胜打下了舒兰、五常等县城，义勇军声威更壮，爱国民众加入队伍者日众。同时，活动于舒兰一带的抗日武装田霖等部，也加入了冯占海的义勇军，新编了若干个旅和支队。至32年7月，冯部已拥有七万余人的兵力，号称十万大军。

32年夏季。日军因军事上的需要和对东北的经济掠夺，抓来大批劳工，强迫他们修筑拉法至哈尔滨的铁路。冯占海派田霖第16旅和陈玉清第17旅前往破袭。田、陈两旅官兵自制地雷若干，在修路沿途掩埋，多次爆炸敌人，并炸毁敌兵车一辆，炸死日军四十多个。日军的筑路工程因屡次遭到义勇军袭击，无法进行下去，只得中断工程。

9月上旬,义勇军以一部兵力南下佯攻长春,牵制日伪军兵力。另以主力从舒兰地区南下,直扑吉林城,于9月12日一度攻克该城,歼敌数百,俘敌五百余人。

关东军受到极大震动,急调重兵讨伐吉林义勇军。冯部在长、吉地区与敌鏖战半月之久,部队十分疲惫,难以立脚。

9月下旬,冯占海召集本部主要将领开会,商讨对策,决定将主力转移热河,以部分零散部队留在敌后,沿吉林至敦化铁路线和五常、榆林地区打游击。

会后,冯占海率领主力数万人,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往热河转移。途中迭遭敌军前堵后追打击,进入瞻榆、开鲁一带四百余里宽的草原和茫茫沙漠,供给十分艰难,部队减员甚多。

1933年1月,冯占海义勇军到达开鲁地区,此时,所部仍有四万余兵力,改称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将其正式改编为第63军,委冯占海为中将军长兼该军第91师师长。

6. 唐聚五长白山中举义旗

恒仁誓师

1932年3月1日。

关东军在沈阳宣布成立“满州国”,向全世界发出《满州新国家宣言》。

3月9日,早已被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废除的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又由日军弄上“满州国”皇帝的宝座。

中国的板土被日军战刀砍掉了一大块,一片浓重的阴云

笼罩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马占山、李杜、李海清、冯占海、王德林、黄显声、项青山、张海天、李纯华等人率领义勇军，在黑龙江、在吉林、在辽西和辽南同日军展开了极为悲壮的血战。

辽宁省东部——东边道。这里与朝鲜半岛一江相隔，关东军就是通过鸭绿江源源不断地侵入东北的。

3月21日，上午。

恒仁县师范学校内，红旗猎猎，人山人海，全副武装的队伍整齐地列队大操场上，神情庄重地静静等待着。

操场前面的主席台上，横空拉起一幅白布，上书墨色大字：“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誓师大会”。

九点许，鲜红的太阳从长白山那边露出脸儿来，大地更加灿烂辉煌。

一行人来到会场，场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道，让那一杆子人走上主席台去。

走在前头那个身着军服，佩上将军衔的中年人，就是自卫军的总司令唐聚五。他在这个大会尚未召开之前是东边道驻军第3团的上校团长，他的自卫军总司令和上将军衔是由张学良提出经国民政府认可的。

主持大会的人宣布大会开始，接着宣读了张学良的委任状，宣布东北民众自卫军正式成立。会场外头轰轰地放了三响礼炮，场上鼓锣齐鸣，军号嘹亮，红旗招展。

一面国旗缓缓升起。

全场军民情不自禁地起立注目，悲壮地低哼国歌。

之后，由唐聚五发表就职演讲。他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讲道：“同胞们，去年秋天的九一八事变，我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沦为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备受惨毒。我们含辛茹苦，忍气吞声，已达半年之久。我们采取隐忍态度，是希望求得公理之伸张，而维护远东之和平。但是，倭寇却得寸进尺，不顾公理人道，利用汉奸，建立伪国，强迫我东北人民承认，侮辱我中华民族之人格！他们企图以灭亡朝鲜之手段，来灭亡我东北，以待牛马之惨虐待我之人民！”

“同胞们，我们已经忍无可忍。我决心顺应社会之舆情，应民众之邀请，率领本部将士和广大民众，共襄义举，自卫图存，讨逆救国！”

“同胞们，国难当头，今不奋起，要待何时？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我决心率领全军与敌决一死战，前仆后继，不灭敌寇，誓不生还！”

唐聚五激动万分，说到此处，嗖地抽出随配战刀，割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字。

全场军民深受感动，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

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有数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加自卫军。

当天，唐聚五等以辽宁民众救国会名义，向国内外发出通电：

国民政府、各省市政府、北平绥靖长官公署张主任（学良）、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国外华侨、各抗日师团长、各报馆、各法团钧鉴：

倭贼国寇，祸我邦家，企望疆土，野心靡矣。近复强迫民众，承认伪国……东北三省，我千万同胞，焉能任其宰割？彼愈压迫，而我愈反抗。人本必死之心，家家具灭贼

之志，倭寇将以灭我而自灭。本会应同胞之要求，受良心之督责，爰择于三月二十一日，大举义师，讨伐贼逆。海枯石烂，壮志不渝。誓必歼倭贼于必尽，灭汉奸于绝无。使日月重光，山河复旧……

十万义勇军驰骋东边道

3月末，东边道的辑安、新宾、本溪、临江、清原、宽甸、柳河、辉南、庄河等二十余县市境内，举旗抗战的民众大军，如雨后春笋，顿成燎原之势。

4月初，第16路军司令孙秀岩和第一支队司令姜中天分别率部向通化城挺进。

通化城当时驻有伪公安局长孟瑞堂的警察部队和于芷山的伪军第2团。

义勇军屯兵城郊，向伪军发出通告，令其立即退出县城。孟瑞堂自恃有日军撑腰，纠集伪警察进行顽抗。姜中天的第一支队发起攻击，把伪警察队打得惨败。孟贼带着残余人马冲出城去，夺路而逃。

伪军第2团团团长廖某，见义勇军人多势壮，来势汹涌，士气旺盛，自知难以对抗，未敢轻举妄动。当伪警察队被打垮逃走后，更慑于抗日队伍的威力，只得声称欢迎义勇军进城。

义勇军住进通化城后，日军纠集了数百名警察，妄图夺回通化。义勇军在横道河子将敌包围痛击，取得大胜。

4月下旬，唐聚五带领总司令部和郭景珊的第7路军从恒仁来到通化。不久，张学良从北平派人前来通化，将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改名为辽宁抗日民众自卫军。

唐聚五的自卫军以通化地区为中心根据地，从 32 年 4 月至 33 年初，在东边道与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搏斗，其战斗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2 年 4 月至 8 月中旬。日伪军企图扑灭抗日武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敌后，其伪军主力龟缩于山城镇。5 月初，于贼亲率伪军二千多人，从山城镇直扑新宾县城。占领该地后，于贼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唐聚五命令李春润第 6 路军，郭景珊第 7 路军反攻新宾。

李、郭带领队伍乘着夜暗出发，当晚将新宾县城四面包围，翌日拂晓发起总攻，第 6 路军打北面和西面，第 7 路军从东边和南边进攻。义勇军人多势众，冲锋的人群如同潮水涌流，喊杀声震天动地。激战三个钟头，突破伪军阵地，义勇军扑进城去，伪军仓慌逃跑。

这一仗，击毙日军大佐冢农昔，伪军死伤三百余人，被俘百余。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数百条，子弹万多粒。战斗中，第 6 路军司令李春润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左手挨了敌人一枪。

6 月上旬。关东军以官本联队配合于芷山一团伪军，从山城镇进攻柳河三源浦，企图围剿孙秀岩第 16 路军，进而摧毁唐聚五在通化的总司令部。

孙秀岩令张弘和阎润亭两旅，埋伏在敌必经之路的一条狭长谷地。

日军怕死，令伪军在前头开路，后头又要伪军断后。

义勇军让过前头的伪军，待日军进入埋伏地段后，才下令猛然开火。这时，前面的伪军已出“口袋阵”，后头的伪军掉头

就跑。日军被义勇军死死包围痛击，左冲右突，乱成一团，日军的炮火也失去了作用。

经过一场恶战，日军宫本联队被歼灭大半。第16路军缴获轻重机枪十挺，步枪千余支，迫击炮四门，日本战马十多匹。

5月末，于芷山命令伪军团长姜全我为司令，原凤城公安大队长徐文海为副司令，纠集大批伪军和汉奸武装，侵占了宽甸县北部的牛毛坞镇。

郭景珊第7路军，张宗周第5路军和第13路军支队司令王东山部，合力反攻牛毛坞。由张宗周任前敌总指挥。

三路军头头商定，王东山部打西边，郭景珊部打北边，张宗周打东边。

总攻发起后，敌人以猛烈炮火集中轰击西边，王东山部被打乱阵脚，攻势也垮了下去。接着，第5路军在东边也抵敌不住，退了下去。

敌人最后集中优势兵力，将郭景珊的第7路军围困在老道岭一个高地上，再施以密集炮火狠狠炸。

义勇军在敌包围中，死伤累累，郭司令的随身副官也被敌炮火炸死了。同时，断水断粮，天气燥热，又饿又渴，处境困难。但他们的战斗意志毫不动摇，拼死打退敌人一次次冲锋。渴得实在受不了，就喝自己解的尿。直到第三天上，唐玉振的第1路军赶到，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才把第7路军救了出去。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军林銑十郎部从朝鲜的满浦、渭原、楚山等地渡过鸭绿江，配合李寿山的伪鸭绿江军，占领了辑安县城（今集安县）。高德隆在距县城一百八十里多的青沟子打出第18路军战旗，不断以小股武装袭扰敌人。

6月间，唐聚五派了第7路军和总部卫队师的一个旅，前

去支援高部收复辑安县城。经两天行军，援军赶到辑安的石庙子，当天夜里在庙里召开军事会议，分派了各路军的战斗任务。

翌日拂晓，攻城战斗打响。攻打北门的第7路军遭到日军顽强阻击，反复冲锋均无进展。攻打西门的总部卫队师一个旅，被日军用机枪组成的猛烈火网封锁住通沟河，无法靠近城门。

高德隆的部队在东门亦受到敌人火力严密封锁。南门紧靠滔滔作浪的鸭绿江，日军防守薄弱。高司令令一部兵力在东门佯攻，虚张声势，吸引敌火力；再令团长王殿阳带一个小队，潜到南门，搭上绳索，攀沿城墙，迅即收拾了守门日军，打开南门。

义勇军蜂涌而入，敌人乱了阵脚，从东、西门突围。从西门逃出的日伪军，徒涉通沟河时，大部被义勇军击毙在水中。

义勇军收复了辑安边城。这一仗，双方伤亡都较大。

第二阶段：1932年8月至9月末，义勇军向敌全面进攻。

唐聚五的义勇军到8月初，已发展到十万余人的队伍，经过半年的战斗，多次打退日伪军的进剿、扫荡，收复东边道二十余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战果。

8月15日，张学良派遣的石培基等人到达通化城，来入代表东北救国会和张将军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自卫军总司令。

8月21日，唐聚五在通化城召开隆重大会，宣布成立辽宁省政府，任命了省府各厅厅长和新增设的六个方面军的总指挥。

大会正进行时，日军飞机两次飞临通化城上空投弹，炸死

炸伤军民二百多名。

省政府成立后，唐聚五与各地义勇军联络，决定会攻沈阳城。

8月28日，数万义勇军从四面八方同时攻打沈阳。计参加这次大战的部队有：

唐聚五部自卫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李春润的两个旅。

东北救国会委任的辽南各抗日武装：于德林第一军区第9路军；李云浦第二军区第18路军；林子升第三军区公安队。沈阳公安第三分局邢某团队；第七分局严某团队；第八分局的警察团队等等。

围攻沈阳的战斗规模宏大，各路义勇军战斗十分勇猛。有一路义勇军攻入日军大东航空处，放火烧毁飞机仓库，焚烧敌机二十余架。但因日军炮火太猛，义勇军伤亡较重，攻城战斗打到29号，未能突破缺口，只得收兵回防。

9月初，唐聚五在通化城召开各路军司令会议，决定采取积极主动行动，更多地收复失地。

会后，李春润指挥第一方面军一部，进攻南杂木的日军。南杂木地处清原和沈阳的咽喉要道，为沈阳日伪军进出北面的要地，双方在此争夺十分激烈，战斗呈白热化状态。

第3路军司令唐乐三，亲率所部三千余武装挺进南杂木后方，分三路奇袭抚顺县营盘的日军，一举夺取营盘，并撤毁了该地至南杂木的铁轨，炸断了这一地段的桥梁。

南杂木之敌陷入困境，惊慌失措地向南溃逃，龟缩进抚顺老巢。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秀岩也于通化军事会议之后，指挥所部从柳河、辉南地区向敌伪发动进攻。在辉南碗口岭将敌一

部包围，经过一场激战，歼其大部，并迫其一部投降。

碗口岭之战取得胜利后，孙部会同王凤阁第 19 路军挥师南下，直逼伪军于芷山老巢山城镇。义勇军将山城镇四面合围，发动强攻，竟日激战，数次突破敌城防阵地。由于伪军火力太猛，伤亡较重，未能攻占全城。

义勇军将敌围攻了两天，这时，一千多名日军从沈阳赶来增援，并以飞机配合作战，义勇军伤亡增大，只得撤出战斗。

9 月 12 日。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张宗周和第六方面军郭景珊，分别率部向宽甸地区的日伪军进攻。战斗首先在牛毛坞打响，义勇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夹击牛毛坞之敌，敌凭借坚固据点顽抗一阵，因义勇军攻势甚猛，渐感招架不住，遂撤出牛毛坞，向南溃逃。

义勇军乘胜追击，连克三道沟和宽甸县城两地。

在此期间，鸭绿江和图们江附近的各路义勇军纷纷打出国界，袭击在朝鲜境内的日军。

驻安图的李连科义勇军，从龙滚洞渡江，在朝鲜境内四处袭击日军，捣毁日军警察所，毙敌军、警多人。

驻于长白山的义勇军李魁梧部，暗渡鸭绿江，在朝鲜老乡的引导下，在朝鲜三水城一带开展游击战，大肆破袭敌哨所和小股日军，搞得敌人鸡犬不宁。

驻辑安的义勇军王殿阳部，从白马浪过江，袭击并捣毁了白马浪江心岛上的日军警察所，擒杀日方军警和朝奸众多。然后，深入朝鲜境内，继续寻机杀敌。

第 18 路军团长张义臣部从老虎哨偷渡鸭绿江，秘密挺进到朝鲜的渭源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

临江地区的义勇军徐达山部，先以少数人员潜入朝鲜境

内,发动当地人民起来反抗侵略,与朝鲜民众建立了密切联系。接着,徐达山亲率大队在下马厰处突破日军的鸭绿江封锁线,部队在对岸上岸后,又在朝鲜民众的掩护和配合下,顺利挺进到朝鲜境内的慈城地区开展游击战。后来,他们同深入朝鲜境内的李魁梧义勇军取得了联系,两支人马采取共同行动,相互支援配合,先后攻破朝鲜的江界、慈城两郡城、歼灭大量日军和朝奸,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战热情。

第三阶段:1932年10月至1933年初。日军反扑围剿,自卫军失败。

10月,关东军调集两个精锐旅团,和伪军李寿山的鸭绿江军,于芷山部,伪警察部队,以及驻朝鲜的日军一部,在几十架飞机配合下,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对东边道的义勇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发誓要扑灭这一地区的抗日烈焰。

首先进犯的是伪军李寿山部配合从朝鲜中江镇过江的大批日军,围攻临江县城的徐达山第8路义勇军。义勇军寡不敌众,从县城撤退乡间。

唐聚五得知临江告急,命令郭景珊率第7路军和总司令部卫队师一部,以及魏荫楼的骑兵队,星夜兼程,驰援临江。大队人马赶到八道江,与徐达山的部队会合,随即向临江县城发起反攻。

日伪军兵力雄厚,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火力强大猛烈,又有飞机助战。义勇军连续攻打了几夭,未能突破敌阵地,且伤亡很大。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郭景珊也在战斗中腿部负伤。

此时,向北面和南面进攻的日伪军,已快攻抵通化地区,整个形势极为不利。郭景珊见反攻临江难以见效,便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向抚松方向转移。

南路进攻的敌人，以铃木旅团为主力，从安东向北推进。义勇军邓铁梅部在凤城、岫岩、宽甸等地与敌激战，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铃木旅团夺取宽甸后，继续北进，冲破恒仁地区义勇军的防线，锋芒直指通化重地。

北路敌军，以茂木旅团为主力，从吉林市南下，与南路的铃木旅团形成南北对进合击态势。茂木旅团冲溃了盘石、桦甸、辉南、金川等地区的义勇军防线后，接着又占领了柳河、新宾等地。

10月下旬，通化城已陷入南北两路敌人包围夹击中，情况十分严峻。唐聚五率领总部警卫师撤出通化，向东北抚松退去。

唐聚五到达濛江县境时，整个东边道的义勇军基本上已被敌人冲散。义勇军个别首领发生动摇，暗中通敌，准备投降。唐聚五见大势已去，自己也难以立足，便将余部数千人交由郭景珊带领，自己则和副官王凤山化装出走，秘密进关，去北平找张学良。

郭景珊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昼伏夜行，向关内转移，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行军，于1932年11月底，到达凌源县。不久，奉张学良之令，这支队伍改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军团。唐聚五为总指挥，郭景珊任副总指挥。

7. 王凤阁密林深山扎营盘

坚持守土抗战

1932年隆冬。

日军茂木旅团和铃木旅团南北进击，在通化城会师，攻占

了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大本营。此时，东边道号称二十万之众的抗日武装，大部溃散，各路军司令仅带着少数残余人马败退到了濛江地区。

日伪军还在大肆清剿，追击抗日武装。

部队麇集荒野，天寒地冻，给养无着，人心浮动。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最关心的是自卫军向何处去。

唐聚五在二道花园召集各路军司令开会，共同商讨自卫军的出路问题。会上，唐首先分析了敌我所处形势，提出将全军分为若干股小部队，避开强敌，潜出日伪军封锁线，开进关内去找张学良。

多数司令都表示赞同。

突然，一位身材魁伟壮实的中年人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唐聚五的主张。他说我们举旗抗日，为的是保土保民，把侵略军赶出去。因此，无论困难多大，我们都要坚持手不离枪，人不离乡，坚持战斗。日伪军虽然强大，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敌后骚扰和消耗他们，他们就无法在这里立脚。这样，对于配合张学良将军从关内发兵打回东北，收复失地，有重要意义。

他就是第 19 路军司令王凤阁。

他的主张仅得到第 18 路军司令高德隆的支持。于是，辽宁自卫军各路人马，都纷纷向关内退去。王凤阁和高得隆的队伍留了下来。

王凤阁的队伍仍有数千人，他们离开城市，退向通化以东的大罗圈沟的头道沟至十道沟山区，以及鸭绿江畔的辑安地区，还有一部分深入到柳河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高德隆的第 18 路军仅剩下一个团数百人，他与团长王殿阳一起率领这支队伍，又回到了第 18 路军的发祥地临江的红

土崖一带活动。

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还有浑江以北的杨靖宇抗日武装，在临江八道沟一带是朝鲜青年金日成的游击队活动，他们都曾有过共同战斗，互相支援的经历。

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

王凤阁带领他的队伍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与敌周旋，积极主动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狠狠打击敌人。日伪军对此感到很恼火，连续出动大批兵力，对王凤阁进行扫荡。

1933年7月。日军出动人马进剿大罗圈沟、老岭一带。王凤阁的队伍化整为零，在山林间袭扰敌人。其中一股游击队在老岭南阳岔伏击敌人，打死日军十多名，待敌人的援军赶来时，小分队早已转移到西沟密林深处去了。

王凤阁带领一支队伍转进时，在果松川与三百多名日军遭遇，双方队在地上仓促开火，打了一阵，日军见义勇军人数不多，且武器陈旧，火力不强。决心要将义勇军消灭掉。他们散开队形，成包围态势进攻。哪知王凤阁的部队练就了一手游击战的本领，迅速而灵巧地攀缘悬崖陡壁，转眼间就占领了山上制高点，居高临下尽情地射杀敌人，反将敌人压迫到沟底。

大批日军很快赶到，把王凤阁的队伍包围在山上。他们认为这下定将王凤阁剿灭。

义勇军临危不惧，坚守在山上，沉着应战，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天黑后，他们突然发起反冲锋，杀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由于他们路径熟悉，又习惯于山地运动，很快就跑得无影无踪，甩掉了强敌，安全转移。

日军在大罗圈沟、老岭一带瞎转了二十多天，处处挨打，丢下许多尸体和枪械马匹，败兴而去。

王凤阁取得了大罗圈沟、老岭反清剿的胜利后，游击区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当年9月，他命令部队分两路向西挺进，以图拓展新的游击区。一路由第一旅旅长于子忱率领，向辑安以西挺进；另一路由王凤阁亲自带领，向通化以西的三棵榆树、大泉源、西江甸子等地出击。

由于敌我战力悬殊，义勇军又离开了所依托的山区根据地，向西发展遭到强敌打击而受挫。王凤阁只得率部向原驻地撤退，途中在大庙沟的哈塘沟遭到三百多日伪军堵截。义勇军分成三路秘密赶回，将敌打溃。取得西进以来第一次胜利，部队也得以顺利回到老营地。

日军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王凤阁的义勇军，特地调来作恶多端、心狠手辣的汉奸纪大作当通化县警察署长。纪某一上任，便带领伪警察队大肆扫荡游击区。

王凤阁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日军，曾几次写信劝告纪某，不要死心踏地为侵略者卖命，并警告其不要再对义勇军张牙舞爪，否则，将对他不客气。纪某丧尽了中国人的良心，不但不听规劝，反而更加嚣张，疯狂进攻游击区。

王凤阁决心狠狠教训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10月中旬，他将所部主力秘密转移到大庙一带，以迅猛的动作，一举将前来扫荡的纪大作及其伪警察队全部包围在一条沟底，打死打伤伪警察三十多人，俘虏八十多人。缴获长短枪八十多支，子弹若干。纪大作骑着战马，乘乱逃掉。

王凤阁感到十分惋惜，说：“本想打只狼的，没想到狼逃了，只打到些小兔子，真是没意思。”

33年12月。日军再次调集大批兵力,对老岭一带进行围剿。王凤阁率领主力巧妙地钻出敌人铁围,秘密转进到了敌人的老巢通化附近的西荒沟和城北石棚子。在这里封锁了消息,安心地休息。

日军劳命丧财前去扫荡,却扑了个空,没找到王凤阁主力,便在游击区内大肆烧杀。

王凤阁得知民众遭难,立即抽出几个小分队,佯攻通化城。先由几个突击队员摸到通化城墙下,向里甩了几个手榴弹。小分队这时便在城郊放枪,大肆活动,虚张声势。城内少数守敌惊慌失措,混乱不堪,赶紧派人前去老岭送信。

扫荡老岭的敌人听说王凤阁主力在攻通化城,赶紧收兵回城。

王凤阁带着队伍也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建设山寨堡垒。

王凤阁部队的全体官兵,都佩带统一的臂章。臂章正中是青天白日旗,上书“辽宁民众自卫军”。国旗右边印有“救国”,左边印着“爱民”等字。

王凤阁对部队约束甚严,所部有个上士文书,企图强奸一民女。王下令将其枪毙示众。其部有一个营三百余人,原为土匪,投降自卫军后匪性不改,军行所至,袭扰百姓,造成很坏影响。王下令下了这三百多人的枪,并将其全部清除出自卫军。

1934年上半年,日伪军接连进剿,并在游击区内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王凤阁在大罗圈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为了减轻游击区内民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今后应改变战略,即不在游击区内迎击敌人,改由不断派出突击队到敌占区进行袭击破坏,变敌人的后方为他们的前方。

33年初到34年上半年,日伪军的多次围剿扫荡均因义

勇军依托深山密林掩护和民众的支援而告失败。于是，日军认为民众使义勇军如鱼得水，要消灭义勇军，必先割断他们与民众的联系。夏季以后，日伪军采取向山区修造公路大道，以利军事进剿行动，同时，强迫山民归并村屯，集中居住。并烧毁了山区许多民房，企图以此来困死义勇军。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王凤阁命令部队在密林深处，选择有利地形，建造山寨兵营，每个山寨都构筑有坚固严密的战壕工事、明碉暗堡和四通八达的交通地道。同时，还在山寨上办起了被服厂，手榴弹制造厂，枪械修配厂、粮食加工厂，大量储藏军粮，以作长期坚守的打算。

他们的武器制造厂，还发明制造了一种名叫“火箭炸弹”的东西，它是用一层层厚纸捆扎成弹筒，再涂上油漆，前头装上炸药，后头用泥胶封严，安上引信和火药，再绑一根木条子作尾翼。射程百米左右，命中率较低。他们将这种武器用于攻打城镇，取得理想效果。于是，便大量生产。有时，当敌机在阵地上空盘旋时，他们便将十几支火箭炸弹一齐朝天上放，那些火箭同时爆炸后，在百米空中形成一大片浓烟，使敌人在天上看不清义勇军的阵地，而无法投弹扫射。

血染玉皇山

王凤阁以坚固的山寨堡垒为据点，在深山里坚持抗战，几年来战旗不倒，给敌人以狠狠打击。1936年，敌人的进攻加剧，山寨被敌人的炮火一处处摧毁，到今年秋天，第19路军仅剩下二三百人，已无力与优势之敌相抗衡，只得化整为零，转进于更深的密林。

在荒偏的深山老林里，他们的处境也更加艰难了。冬季到来后，吃的住的成了大问题。1937年初的一天，王凤阁和十几名战士，以及王的妻子张氏和小儿子小金子，被饥饿折磨得站立不住，他们来到孤砬子沟，在这里弄到一些牛肉，正架锅烧煮，牛肉尚未煮熟，一股伪军就追了上来，他们只得一边抵抗一边撤退。敌人却穷追不舍。

这天夜里，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老虎顶的地方，便在这里住了下来。半夜，王凤阁的手枪不慎走火，枪声引来了不少敌人，他们又陷人重围。在激战中，随从的十几个战士先后战死，敌人蜂涌而至。王凤阁连同妻子儿子以及尚存的几个战士，全部被俘。

1937年4月24日。

天下着菲菲细雨，象人在哭泣。

通化城里被日军宣布戒严。马车、洋车和行人，一律不准通行。

通化东关玉皇山后柳条沟，三里长的大道两旁，站着荷枪实弹的日伪军。后边聚集着许多居民，男女老幼，人人脸上都笼罩着悲愤的阴云。

上午九时，两辆刑车缓缓开来。前头车箱上站着堂堂正正的王凤阁，他被日军冠之以“罪大恶极的反满抗日匪首”头衔。王凤阁平静地看着道路两旁成千上万张痛苦的脸孔，心里感到莫大慰藉。

第二辆车上坐着王凤阁年轻的妻子张氏及四岁的儿子小金子。他们也没有畏怯的神色。

刑车在两个新挖就的土坑前停住，几个日本兵把王凤阁架了下来。他站在土坑旁，仰首对着昏沉沉的天空，他悲叹这

破碎的河山，他带着他那支弱小的义勇军，在敌后，历尽千辛，竭力坚持着，从 32 年初到 37 年初，艰难地支撑了六个年头，他一天天地盼着，盼着强大的中国军队打回东北。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张学良将军还没回来？南京政府为什么还不出动强大的兵团北进抗日？

一个日本兵要他跪下去。他凛然道：“我活着没向侵略者下跪，死也要作个站着的鬼！”

几个日本兵只得将他强按坐在地上。

一个丑陋凶恶的日军在他身后举起寒光闪闪的大片刀。

一颗不屈不挠的中国人的头颅滚落到地上，鲜红的血喷出老远，浇洒在黑色土地上。

日本兵把怀抱小儿子的张氏押了过来，要她站到另一个土坑边。张氏固执地站到丈夫尸体的土坑这边，镇定地对刽子手们说：“我们活着一处作人，死了一处作鬼！你们杀吧！”

罪恶的枪声响了。

张氏和小金子一起跌扑进土坑。

老乡们都哭了，他们坚持说那天天也哭了。

8. 宋国荣坚持在磐石山

二道岗哗变

1932 年 6 月中旬。

这天，驻在磐石的日军铁路守备队得到个情报，说二道岗一带有抗日武装在活动。于是，由部分日军和伪警察、伪保卫队，以及驻磐石附近的伪军第 5 旅 13 团第 1 营的一、三连，组成讨伐队。

讨伐队从磐石镇出发，浩浩荡荡地赶到二道岗，抗日武装早已转移了。日伪军扑了空，便抓来一个姓崔的朝鲜族农民，逼他说出抗日武装的去向，那位农民招供不出，鬼子们恼羞成怒，对那农民施以暴刑。往他嘴里灌辣椒水，鞭抽棒打上大挂。折磨了一阵，他们又往那农民肚子里灌水，把肚子灌得鼓鼓的，再用脚踢，整得那个农民惨叫不止。

伪军第1营3连的一些士兵听到惨叫声，涌进屋去，见了那情景，不忍让同胞受难，一个班长上前阻止，却遭到日军蛮横的喝斥。那个班长顿时大怒，举枪朝日军射击，当场击毙屋内的几个日军。

3连的官兵纷纷响应，举枪造反。

3连连长吴长胜同情部属的民族义愤，挺身而出，指挥全连与敌就地展开战斗。打了半个来钟头，吴连长便带着部队退进了深山密林。

第1营营长宋国荣得知3连哗变，心中十分不安。此时，第5旅旅长打来电话，限令他迅速平息叛乱，并将第3连中的“反满抗日”首犯吴长胜等人捕捉法办。

第1营有4个连，一、三连驻在磐石镇附近，营部和另两个连驻黑石镇。宋国荣也是个有良心的军人，因迫于形势暂时附合日伪，暗中却一直在加紧积蓄力量，准备举事。3连在二道岗哗变，迫使他公开走上抗日道路。

为了防止日伪军的报复，宋营长立即命令住在磐石城郊的一、三连留守部队，火速向黑石靠拢，并派人到深山密林中寻找3连。

找到3连后，来人向吴长胜转交了宋营长的亲笔信，信中说他本人对3连的行动表示完全支持，并告知，宋本人也决心

率全营官兵公开举旗抗战。嘱3连继续在深山隐蔽，待彻底摆脱危境后，相机转回黑石镇，与全营会合。

吴长胜等人这才安了心，稳定了情绪。

黑石镇聚义

宋国荣收拢本部人马，在黑石镇亮出抗日旗号，大力扩充武装。前来投军的青壮年络绎不绝，宋的四个连，很快扩成了四个团。在这期间，他还收编了若干股游杂武装及各色反满抗日队伍，分别将其组编为若干个团队。于是，宋营长转眼间变成了宋军长。

宋国荣收编的主要团队有：

孟团。该部为在黑石一带活动的孟子荣游击队和驿马地区姜振的伪自卫团。这两部被收编后，编成团，令其在辉南石道河子一带活动。

赵团。原为磐石西北部的绿林队伍。团长赵宝山，绰号赵小胡儿，此人身材短小粗胖；圆圆脸上嵌一双机灵的小眼珠，唇上蓄着一撇小胡须，玩一手好枪法，作战勇猛，性格刚烈，被人们称作战场上的赵疯子。

马团。原为黑龙江省马占山部的一个连，在公主岭一带被日军打溃后，向南流窜，一路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到达磐石北部后，被宋国荣收编为团。先在吉昌一带活动，后转移到磐石与辉南之间打游击。

宁团。原为在海龙二道岗一带号为“串江龙”的绿林好汉，首领是关内逃荒到东北的贫苦农民宁国福、宁国禄兄弟。“九、一八”事变后，宁氏兄弟乘乱而逃，邀集山民占山称王。投奔宋

国荣后，编为团，令其在海龙二道岗至磐石间的朝阳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高团。原为从呼兰流窜到双阳土顶子一带的地主武装，被宋收编为团。几个月后，该团在其首领高锡甲带领下，将队伍拖回呼兰投降了日军，变成了伪自卫团。

曹团。该团首领是呼兰三区区长曹葛飞，他在当地组织了不少破产农民，编为队伍，又收编绿林好汉“南侠”、“东侠”、“西侠”的队伍。该部人强马壮，较有战斗力。其中“南侠”编为一个营，营长阎有胜是当地有名的血性汉子，身材魁伟，留八字须。他在乱世中拉起一支绿林队伍，报号“南侠”，占山为王。“东侠”也编为一个营，营长刘兴汉作战特别勇敢，胆量过人，他拉起号为“东侠”的绿林队伍，在当地很有影响。“西侠”首领姓姜，他的绿林队伍多为破产农民，作战顽强，战斗力不容轻视。曹团主要活动地区为北起磐石城，南到辉南城。

殿臣队。该队首领名叫傅殿臣，五短身材，罗圈腿，一副凶神恶刹相，并配以两颗暴牙。吃饭更特别，恰似顽猴抓食。此人枪法奇准，真正是指哪儿打哪儿。殿臣队亦是一股活动于磐石、桦甸、双阳、永吉等广大地区的绿林武装，共有三千余众。傅殿臣其人可谓老资格的山林队，他于民国初年即在呼兰、驿马一带哨聚山林，打家劫舍。当地曾流传民歌一首：“江东王林，江西殿臣，翻箱下底，打骂穷人。”日军占领东三省后，民族危亡在即，傅殿臣同其他绿林人物一样，视日寇为不共戴天之敌。宋国荣派人与之联络谈判，终于争取傅殿臣这支实力较强的绿林好汉，并入了宋氏抗日义旗之下。

天虎队。天虎队也是一支绿林武装。它由山东逃荒到磐石的难民天虎于“九、一八”后拉起队伍，其主要成员都是山东

逃难来磐石一带的农民。宋国荣举旗抗日后，这支队伍很快就归并在宋氏门下。

此外，到黑石镇聚义举事的还有这一地区众多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组织的队伍。

宋国荣的队伍很快发展为一万多人，势力扩展到长春东南和吉林以南的双阳、伊通、海龙、辉南、磐石、桦甸、抚松等广大地区。南部与通化地区的唐聚五自卫军建立了联系，北部与冯占海的义勇军相呼应，成为吉林省中部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游击武装。

北平吹来盛夏的风

长白山的盛夏，万木葱笼，生机盎然。

清晨，一辆马车从朝阳镇出发，沿着山间大道，向着深深的原始野林奔去。赶车老头手上那条鞭儿甩得啪啪地响，膘悍的枣红马四蹄点地，“得得”地跑。马脖子上的铜铃清脆悦耳，在林间回荡。

马车上坐着一位英姿飒爽的东北大姑娘，油亮的短发在清新的山风中飘抚，秀美的眼儿好奇地打量着林间的花草和不时从路边草丛里奔逃而去的小动物。

中午，这辆马车来到了磐石南部的大泉眼屯附近，突然从两旁树丛中跳出十多条手拿钢枪的汉子，他们拦住去路，大声吆喝“抓住汉奸！”

那姑娘坐在大车上，镇静地观察着眼前这伙拦路的强人。

那伙人围上来，为首的一个家伙大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

姑娘说：“串亲的。”

“到这深山老林来串什么亲？我看你肯定是个奸细。”

姑娘坦然问道：“请问你们是什么人，是要劫道还是抗日的好汉？”

那汉子怒目圆睁，吼道：“谁在劫道？我们是抗日的队伍！”

那姑娘乐了，“若你们真是抗日的，就请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

那伙人狐疑地打量着她。一个瘦精精的人把枪杆一摆，喝道：“少跟她啰嗦，我看她准是鬼子派来的奸细，先一枪嘞了再说。”

那头儿把枪一扬，命令道：“下来，跟我们走！”

他们将那姑娘押到一个小屯，来见一个别短枪的壮汉。当那姑娘听说此人就是宋军曹团的“东侠”刘兴汉营长时，取下左脚上的布鞋，撕开鞋帮，从里边拿出一块黄绸布。

刘兴汉看了绸布上的字和大印，原来这是一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护照和介绍信，顿时激动得不得了。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九、一八”后，由张学良支持并在北平组织的，它是东三省敌后抗日武装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姑娘名叫徐春圃，是“九、一八”后流亡到北平的中学生，当时才十八岁。由于其抗日救国态度坚决，并积极投身救亡图存活动，成为救国会中一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她曾以救国会特派员身份，数次化装潜回东北各地，执行救国会交给的任务。此次，她亦是受爱国会军事部之派遣，前来敌后寻找新近举旗抗战的宋国荣部队，联络该部加入到统一的救国会抗日武装行列。

徐春圃告诉“东侠”，她要面见宋军长，传达救国会军事部

的重要指示。并说她带有军事部对该部军长以下主要军官的委任状。

“东侠”立即命令一个队员，飞马前去报告宋国荣。

天黑前，宋国荣带着几个团长和十多个卫士骑马赶来。进屋后，宋国荣等人神情庄重地向徐春圃敬军礼。

徐春圃撕开另一只布鞋帮子，取出一块白绫子(委任状)，慎重其事地宣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决定将宋军长部正式编为第8路义勇军，宋军长为该路军司令。

宋国荣如同“圣旨下”一样庄重严肃地双手接了委任状，并再次向漂亮的女特派员敬了个标标准准的军礼。

大家围坐在一起，迫不急待地打听少帅张学良的近况，追问“少帅什么时候发兵反攻东北”。

徐女子告诉他们，张学良将军正在积极准备反攻之事，并说少帅和救国会都十分关心敌后的抗日活动，期望他们能发展壮大武装，多消灭敌人。又说，她这次从北平出发时，少帅和救国会的人都只是听说宋营在吉林省中部起事了，但这支部队到底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驻扎，首领叫什么名字等等都不清楚，只听说领头的营长姓宋，所以，特派她来寻找联络，那委任状上只写了“宋司令”，而没写宋的名。

宋国荣等人听说少帅和救国会如此关心他们，激动得都流了眼泪。

女特派员的到来，如同盛夏凉爽的清风，迅速传遍了全军，将士都受到极大振奋。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调动全军杀敌卫国的热情，宋国荣请小徐姑娘暂留军营，对全军各部作一次巡视和宣传鼓动。

徐春圃欣然应允。

于是，她在宋司令亲自陪同下，骑着威武雄壮的高头战马，先后到磐石、桦甸、双阳、伊通、海龙、辉南等宋军各部驻地巡视，以特派员身份检阅队伍，对广大官兵宣讲抗战救国思想。每到一处，她的演讲都使将士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誓死救国”，“收复领土”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在那些日子里，徐春圃为鼓动将士们的抗日热情和坚定必胜信心，在宋司令和卫队陪同下，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经常翻山越岭，穿越密林沼泽。行军途中，有时干粮用完，她便同卫士们一起去挖野菜，采集野果充饥。在野外经受烈日的暴晒，在参天树荫下躲避暴雨，生活异常艰苦。当她看到肥硕的獐狍，轻盈的野鹿成群地游戏于茫茫野林，漂亮的山鸡、野鸟鸣啭于枝叶丛中，从内心里感到祖国的可爱，为了收复故土，恢复自由，再苦再累也值得。

转战吉中

1932年夏季。宋国荣的队伍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又在徐春圃的宣传鼓动下，全体将士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杀敌复土的热情空前高涨。宋国荣决定，调集力量攻打磐石城。

8月9日夜间。各路人马个个臂佩“东北抗日救国军”红色袖套，按照统一约定的时间地点，抵达磐石城外，进入战斗位置。

天亮前，东门城楼上突然火光冲天——总攻信号。

四周伏兵蜂涌而起，杀声震天。

伪军、伪警察和伪保安队，迫于义勇军强大的声威，有的保持中立，静待在兵营，未敢轻举妄动；有的大开城门，迎接义

勇军进城，死心踏地为日寇效命的，与义勇军发生了激战。

宋国荣的队伍冲进城后，首先砸开了监狱大门，放出被关押的爱国人士和无辜同胞。

日军和大部分伪军龟缩到城东南的守备队内，利用坚固的炮楼、工事和高大建筑物，与义勇军顽抗。

在民族大义感召下，住在城东大营的伪军和伪保卫队一千多人，冲出营房，加入到义勇军的行列，共同向日军发动进攻。

住在城西烧锅院内的伪军一个山炮连，也调转炮口，向日军守备队驻地开炮。

日军为了阻止抗日武装的进攻，把守备队附近的房屋全部烧光，使义勇军的冲锋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火力射界之下。

战斗持续了三天，义勇军未能攻破敌军据点。第四天上午，从吉林市方向飞来的日军飞机，对义勇军进行疯狂扫射轰炸。

宋部多为刚拉起的民众武装，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绿林好汉，没受过防空训练，见了敌机，惶惶失措，四处乱跑，被敌机扫射、炸死者特多。

下午，有一股日军的骑兵队从吉林市方向赶到，从西门攻进城内，与日军的守备队合为一处，增强了防守力量。此时，朝阳镇的日伪军也向磐石方向出动。

宋部经四天交战而未攻破日军守备队，亦未能控制磐石城全部，现在面临日伪军里应外合夹攻危险，只得十分遗憾地放弃原计划，下令撤出磐石城。

各路人马在城东北之磨盘山密林中会合。

日军见宋部人多势众，声势浩大，便将整个磐石地区定为

“匪区”，迅速增调兵力，进行大规模围剿。特别是宋部根据地黑石镇，受到的攻击更重，遭日军飞机连续轮番轰炸。

宋国荣率领队伍从密林里向北转移。留守黑石镇的部队，也因敌机轰炸甚烈和日伪军的清剿，无法立脚，搬了“家当”躲进密林深山，向北转移。经三天艰苦行军，在驿马一带的密林中，追上了宋国荣的司令部。

第8路义勇军一边在密密的树林中游动，一边瞅准机会打击敌伪。先后攻克过烟筒山、吉昌和朝阳山等城镇。义勇军队伍也时聚时分，有所发展，仅傅殿臣手下，此时就聚集了五千多人。

1932年10月中旬。义勇军决定去攻打伪满州国的“新京”（长春）东南的重镇双阳。结果，因敌防守严密，又因“新京”之大批日伪援军赶来。义勇军在双阳与强敌碰了一个硬仗，未能打下该城，赶紧撤出战斗，掉头朝东南游动。

这年初冬，队伍来到桦甸，决定合力攻打城内的伪军第13团。义勇军大队人马强攻一天，壮烈牺牲者无数，却未能攻下桦甸城。

这时，北面有吉林的日军守备队乘坐大卡车前来增援，已接近桦甸；西边有磐石的日伪军的大批增援部队，也快到达桦甸。

宋国荣面临严重局面，只得下令撤出桦甸战场，向呼兰方向转移。翌日清早，部队在呼兰东岗处，钻进日伪军设下的伏击圈，突遭四周敌伪强大火力袭击。不久，敌机也前来投弹轰炸。义勇军死伤惨重，大伤元气。

悲壮的结局

1932年冬季。

宋国荣几千人的队伍，由于一直未能建立一个可靠的根据地，部队的休整补充，以及给养等方面，都面临严重困境。将士们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备受痛苦。为了生存下去，等待将来，宋国荣不得不将部队分散活动，以中队为单位，寻找食物。

在严重的困境中，孟团在辉南县石道河子一带，宁团在海龙县北二道岗一带，被日伪军紧逼，宣布投降。

1933年解冻之后，第8路义勇军，包括部分“投降”了敌人的部队，又重新聚集起来。跟着，日伪军的讨伐也更加疯狂了。与敌人周旋到今年秋天，宋国荣的队伍在磐石地区无法立脚，又向辉南一带转移。苦撑到冬天，他们再次面临去冬的困境。傅殿臣的主力三个团，在烟筒山向日军守备队缴械投降，跟随殿臣队的一些小股绿林团队，也降的降，散的散。殿臣队的投降，使第8路义勇军受到很大削弱。

不久，曹旅刘团（原曹团刘营）团长刘兴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使全军士气受到很大打击。

第8路义勇军副司令王文久感到前途无望，内外交困，离开部队，解田归田，回黑龙江老家去了。

宋国荣带领残留下来的队伍，继续在深山老林里同日伪军作战。1935年夏天，宋指挥所部向吉林城郊的二道河之敌进攻，遭到重大失败，部队再次减员消耗。之后，他带着残部回到磐石以北的驿马地区。日伪军为了彻底扑灭这一地区的抗

战火种，以大批兵力进山清剿。义勇军内无粮秣，外无救兵，处于绝境。

宋国荣深感走投无路，在敌后再也无法立脚，带着痛苦的心情，向大家宣布：部队就地遣散，各奔前程而去。

9.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数十万东北义勇军的敌后抗战中，最为悲壮，最具特色的是义勇军中的大刀会杀敌卫国义举。

义勇军中的大刀会员脚蹬东北山民特有的靰鞡，赤裸着上身，口中念着法师传授的神秘咒语；油黑粗壮的臂膀挥舞寒光闪闪的大砍刀。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与侵略军展开肉搏，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谱写了一曲曲千古不朽的悲壮的颂歌。

大刀会在东三省的抗战中声势浩大，几乎各地义勇军队伍中，都有大刀会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本节所说大刀会，仅为辽东地区的部分会众组织。

1932年3月20日。

孙秀岩在东来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6路军时，在这支杂七杂八的队伍中，有一杆镶有白边的黑色大旗分外惹人注目，黑布旗帜上神秘的坎封符号中缀有“义心会”三个大字。

在这杆神秘的黑色大旗下，有六百多名手持大刀的汉子，列成一个整齐的方队，个个都显得神威活现。这就是由东来大刀会组成的第16路义勇军第47团。

会后，大刀会随第16路义勇军浩浩荡荡向通化开进，兵不血刃地进占了通化城。义勇军在师范学校大操场上召开军民庆功大会。孙秀岩为了扬扬义勇军之军威，特令第47团大

刀队在操场中间扯开场子，表演了各套神功，使军民大开眼界，博得阵阵喝彩声。

过了几天，日伪军不甘心将通化城这一战略要地落入义勇军手中，纠集数百人的兵力，在酒井绍二中队长带领下，向通化进犯，企图前来夺取通化城。

第16路军前出迎敌，在横道河子将敌人包围。双方打了一阵，就由大刀队发动冲锋。会员们高举大砍刀，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勇冲击，很快突入敌阵，展开肉搏。大刀会员杀法刁钻骁勇，砍得日寇人头滚滚落地，杀得敌人胆颤心惊，大败而逃。

1932年5月。

临江县公安队长徐达三响应唐聚五的抗日号召，聚集各地民众武装，并与本县境内的大刀会联合，成立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8路。

参加徐达三义勇军的大刀会计有：红土崖大刀会五百余人，首领刘刚；板石沟大刀会四百多人，首领张宝泰；以及蚂蚁河的“救国爱民铁甲军”乌旗会，半截沟的无极会，错草顶子的青旗会，吴家营的乌旗会，四通沟的黄旗会，六道沟的带子会。还有号称红旗会，红枪会，兰旗会，白旗会的大刀会等，共有数千会众。

徐达三为了防止日军从鸭绿江那边入侵，将大刀会和其他义勇军分驻于临江一带江畔，严阵以待，加强巡逻警戒。

6月初旬的一天夜里，驻扎朝鲜中江郡一带的日军，乘坐木船若干艘，向临江偷渡进犯。被大刀会发现，用土枪土炮向敌轰击。日军的船队无法靠岸，便掉转船头顺江而下，在义勇

军防守薄弱的望江楼一带靠了岸，然后向临江县城迂回。

日军登岸后，一路猛攻猛打，义勇军其他队伍顿时慌了手脚，争先恐后地撤退而去。唯有大刀会会员们，与敌死拼死战，寸土不让，血战一场之后，才从县城一带撤出，向青沟子方向转移。

6月上旬。

义勇军向临江县城发动反攻。八道江的八十余名大刀会员，在大法师刘青山率领下，向县城冲锋。

有二十多名日军，见冲来的都是些使刀舞棒的山民，便想同中国的山民们玩玩刀法。他们钻出据点，端着枪刺嚎叫着迎击冲来的大刀队。

刘青山一马当先，手使七尺红缨枪一杆，在敌阵中左挑右刺，如入无人之境，转眼之间就挑死五个鬼子。其他鬼子一看情况不妙，掉头往据点里跑。

据点里的日军也用机关枪疯狂扫射，大刀会员被打死十多人。进攻受阻，大法师刘青山不幸中弹牺牲。

在这同时，青沟子、岭东等各路大刀会都分别担任攻打县城的先锋。会员们扑进敌阵，挥舞大刀长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肉搏。在这次战斗中，大刀会砍死日军涩谷少佐和佐藤队长等。但大刀会也死伤特重。

6月20日，夜晚。

临江县境内的各路大刀会相约会聚县城四周，决定再次攻打县城，寻敌复仇。他们吸取前次进攻县城的教训，采用乘夜暗奇袭的办法打击敌人。

刘大摆率领的青旗会众，将卧虎山顶一个日军据点包围，不声不响地“摸”掉了日军哨兵。跟着涌进据点，把正在酣睡的

二十几个鬼子全部砍死。

刘刚带领红土崖大刀会员，也摸上了卧虎山顶的另一个据点，将十几个鬼子砍死，扛了敌人的一门小钢炮和枪支弹药，迅速撤退而去。

黄金传带领的一队大刀会员，向南围子进攻，双方短兵相接，一顿大刀猛劈，砍跑了据点的日军。接着，他们又以突然的手段，袭击了铧炉据点的敌人。

天亮前，大刀会自动撤离战斗，隐没于深山密林。这一夜成功的奇袭，大刀会共消灭日军五十余人。

7月上旬。

自夜袭临江县城之敌取得胜利后，大刀会和其他义勇军受到很大鼓舞，收复临江的信心更足了。他们经过周密的策划后，又一次于深夜齐集于县城附近。

参加这次行动的除临江的各路大刀会外，还有抚松县的花脖子大刀会四百多人。

不幸的是，他们的这次行动计划，却被奸细黑狗子事先报告了敌人。那天夜里五时许，当各路大刀会按计划，分别向日军进袭时，突然遭到日军火力猛烈扫射，各路人马都受到惨痛伤亡。

抚松花脖子大刀会首领姚某首先饮弹身亡。他的四百多人的队伍当即被敌扫射，死伤近半，在敌阵前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红土崖大刀会在接近敌据点时，猝然遭到敌机关枪猛烈扫射，伤亡二十多人。

六道沟，四道沟和青沟子等地的大刀会员，共伤亡数百人。

大刀会遭到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后，便四分五裂了。有的队伍分散活动；有的当即瓦解溃散，会员们各自回家种田；有的进入长白山密林，继续游击小股敌寇；有的被其他武装收编；有的回家后遭到日伪势力追查清算，只得带了全家离乡背境，远走避难。还有的邀集深山占山为王，既当土匪又打日伪。

1932年6月。

第18路义勇军司令宋国荣当时还是伪满警备部队营长，他的营部和第二、四两连驻扎黑石镇。营部与磐石县城的电话线经常被唐聚五部义勇军的一股大刀会破坏，弄得宋国荣十分恼火，便派了八十多人的队伍驻扎到电线经常被破坏的细林屯。当天夜里，这支队伍就被蜂涌而来的大刀会给团团围住。大刀会员们在营房外头大喊大叫，要他们缴枪。

大刀会都曾声称练就了“叫天天门开，叫地地门开，刀枪不入”的神功。因此，他们上阵，大都是堂堂阵阵，昂首挺胸，在精神上给敌人以很大威胁。

宋部在开来细林屯之前，就做好了破大刀会神咒的准备——弄了许多黑狗血，因传说黑狗血是镇压邪魔妖怪的最厉害的东西。由于有黑狗血壮胆，他们便放心大胆地布阵抵抗，向冲锋的大刀会员猛烈开火，当即打死十多个，其他的见势不妙，纷纷退了去。

不久，宋国荣率部起义，参加到抗日行列。他的队伍中也收编和联合了不少大刀会。宋部攻打磐石城的日军守备队，就是让大刀会打头阵。手持钢刀、披头散发、光着膀子的大刀会员往前冲；红枪会的人列成威武雄壮的方阵，端着红缨枪在大刀会后头跟进；士兵们趴在街道两旁的阴沟边，端着枪掩护。

战阵蔚为壮观，大刀会和红枪会的死伤也够悲壮的了。

大约一个月后，长白山区洪水泛滥，黑石镇附近一片汪洋，城镇成为一座水中孤岛。

辽宁民众自己军的一股大刀会千多人，再次包围了黑石镇的宋国荣部义勇军，声称如不交出粮饷，就要踏平黑石镇，如果按他们要求交了粮饷，两军可罢战，并结为同盟。

宋国荣对此不予理睬。双方发生冲突火拼。宋部用机关枪对付从街道那边蜂涌而来的大刀会，当即打死二百多人。

大刀会见此尸山血海，队伍顿时溃乱，蜂涌而向后逃跑。结果，相互拥挤冲撞，纷纷坠入洪水中。

伏在城墙上的宋部官兵，把在水中溃逃的大刀会员当活靶子打。顿时，只见水中人头攒动挣扎，大刀会员的热血染红了滚滚洪流，死尸顺着中流急水沿江飘去。

这一回，宋国荣的第18路义勇军打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大刀会的战斗，共打死打伤大刀会五百多人。

1932年冬。

宋国荣率部攻打桦甸之敌。桦甸城外拉有三道电网，电网外是开阔地，易守难攻。

宋部的大刀会员担任主攻，打头阵。先由一百五十名会员手持大刀向前冲锋，到了电网前，他们挥动大片刀猛砍通了电的铁丝网，真是手起电闪，百十名队员，纷纷触电坠倒，死伤累累。

大刀会员们没有一个人往后退和表示犹豫，源源不断地往前涌去，挥刀乱砍，竟然砍断了两道电网。

1932年5月下旬。

伪军一个团和一部分地方武装,侵占了辽宁民众自卫军的牛毛坞驻地。唐聚五派第5、第7、第13等三路军反攻。

第13路军司令王东山就是大刀会首领,该路军大部为手持大片刀的大刀会员。在那次战斗中,第13路军的大刀抵不住敌人的大炮钢枪,伤亡过重,首先败下阵来,使第7路军被敌包围,差点遭敌全歼。

1932年8月。

大刀会首领鞠抗捷等人在辽东庄河地区联络各路大刀会抗战,这支大刀会拥有会员三千多人,控制了该县一半的地区,他们在各地开展游击战,袭击小股日伪军,打得这一地区的日伪势力不敢抬头。

12月中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命令驻于安东的靖安游击队一部,前往庄河地区围剿大刀会。

靖安游击队是1931年10月,关东军司令部为对付各地义勇军而下令组建的一支特殊武装。它共有五个支队,以日军充任大小指挥官和战斗骨干,再收买了东北境内数千名贯匪和军事素质好的伪军为其队员。由日军骑兵联队长森秀树大佐任司令。

日满合编的这支靖安游击队,武器装备特别好,火力很强。队员都配有战马,行动快速。对东北民众犯下了累累血债。

靖安游击队司令森秀树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后,亲自带领了一百六十人的骑兵赶到庄河地区,驻扎在大刀会活动频繁的土城子。他想,如果马上进攻,也可能大刀会会分散转移。为了聚而歼之,他声称要跟大刀会堂堂正正地阵前厮杀,一决高低。以此来激怒和引诱贯于阵前拼杀的大刀会上

钩。

大刀会首领鞠抗捷等人却是有勇有谋的人，他们认真分析了敌人的意图，制定了作战计划。认为敌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且敌为骑兵，堂堂对阵，大刀会肯定要吃亏。决定以近战夜袭取敌。具体战斗计划为，以鞠抗捷率领二千五百多名会员包围土城子，以姜子敬率领五百名武艺高强的刀手，组成夜袭突击队，从西北面发动奇袭。

深夜，姜子敬带领队伍潜到敌营附近，突然发起攻击。他们冲进敌营，趁敌混乱之际，将其砍死一部。

森秀树在睡梦中被喊声惊醒，赶忙组织一些队员，迅速抢占了一所民房，在房顶和门窗处架起机枪，阻止潮水般涌来的大刀会员。

姜子敬带了十多名刀手，闪到屋后，猛然破门而入，砍死日军机枪手。

大刀会员趁机扑了过来，将屋内和房上的敌人，全部消灭。

敌靖安游击司令森秀树也在这里被大刀会员砍死。

第三章、战斗在吕梁山上

1. 蒋介石不让日军过黄河，也不准阎锡山、卫立煌的一兵一卒过黄河。

1937年11月初。

蒋介石正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南北战事。突然从北方传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告急电，称日军已攻占山西省会太原，请示该战区今后的行动事宜。

统帅部长官们感到战场局势严重；当日军第19师团一部和第20师团突破娘子关、直指榆次，与从北面南下的第5师团主力和关东军东条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使太原陷落的同时，日军第108、第14、第16、第10等师团，分别从石家庄和德州南下，攻占了济南和京汉铁路之彰德。

山西境内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为中条山，中间是太岳山地，河山纵横错落，四壁险阻，在军事上素称华北脊梁。若日军控制了这几道山脉，黄河便无险可言。日军西可攻西安，窥窃成都平原；北面解除华北大平原日军之侧背威胁；南可掠取豫省，直下武汉，置整个中原于被动局面。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力主确保山西战略要地，

以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建立巩固的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

蒋介石当即拍板定案：电令阎锡山，其部坚持敌后抗战，不让日军过黄河，同时，也不准第二战区一兵一卒过黄河。

白崇禧立即拟定大本营对第二战区的命令：“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

翌年二月，白军大举进攻，将第二战区各部队别逼压至晋西和晋南黄河岸边，决计将其打出山西省界。

由于军情万分险恶，阎锡山向统帅部去电，请求将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撤过黄河。

白崇禧以蒋介石大本营名义回电：此前已有命令，第二战区任何部队不得撤过黄河，战区司令长官部身为战区之指挥中枢，更应为全军之表率，岂能例外。

阎锡山只得打消撤过黄河的打算。

此时，蒋介石收到第83师师长刘戡自晋南前线发来的密电一件，说山西境内各部被强敌攻击压迫，“麋集于晋东南及晋西南各山地中，”数十万大军由于遭日军的围攻和山区环境的恶劣，大部分官兵南渡黄河，退出山西之心似箭。

山西战略要地必须保持。

蒋介石对山西境内国军的困难毫不同情，当即命令各路援军赶到黄河南岸，在潼关、陕州、灵宝等处摆开阵势，架起百十门重炮，日夜不停地轰击黄河对岸，威慑日军，阻止其突破黄河天险。同时，也以憾动天地的炮声警告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卫立煌和全体官兵，黄河就是国家存亡的生死线，往后退半步也不行，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想想看，韩复榘不遵命令，刚在武汉被枪毙了。你阎老西要是违抗了统帅部的命令，也不

例外。

第二战区部队后退无路，只得回过头来，在山地与敌周旋，经过艰苦奋斗，逐步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吕梁山、太行山、中条山和太岳山区的游击根据地。

2. 吕梁山中守土抗战

1938年2月。

阎锡山带领晋军闪避到汾河两岸，亦即同蒲铁路西侧，依托吕梁山雄关险道，逐次抗击日军进攻。当时的晋军仅有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的三个军，以及战区直辖的几个师。这些部队经过忻口会战和太原会战，伤亡减员较大，有的师、团徒有其名，无法再战。

日军的进攻异常凶猛。

在吕梁山北段，何柱国的第2骑兵军，被日军追着在山地乱跑。赵承绶的骑1军遭重大损失，几乎成了空架子。

因为有统帅部的命令，不准第二战区长官部过黄河，阎锡山只得带着战区指挥机关，同部队一起在吕梁山中乱钻。后来在吕梁山南段的吉县山中总算暂时立住脚跟，撑起长官司令部的帐棚，指挥部队作战。

2月19日。

日军第20师团数万人深入到隰县以北的川口地区。王靖国将军指挥第19军在此与敌接战，双方争夺特别激烈。

第二天，第70师215旅旅长赵锡章奉命增援川口，所部在隰县杨村堡与日军遭遇，展开惨烈血战，赵旅长在战斗中身中七弹，壮烈殉国。

2月22日。隰县战况危急，双方在此呈决战态势。阎锡山

命令第 61 军军长陈长捷将军率部火速增援。陈部翻山越岭，驰赴隰县，立即投入战斗。陈将军亲临前沿督战，全军将士誓死保卫家乡，与敌血战三天三夜，该军伤亡官兵竟达八千余人！

2 月 26 日。隰县终于失陷。阎锡山在吉县的指挥部面临十分危险境地。

日军继续在吕梁山中寻找第二战区部队决战，决意将其彻底歼灭。阎锡山在吕梁山中的核心基地乡宁、吉县相继被强敌攻占。

这时，阎锡山收到国民政府电令一件：任命他兼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并再次令其率领山西军民“守土抗战”，坚持敌后游击战，牵制华北日军，不使其南下。

阎锡山的各部队，被敌人分割封闭于吕梁山各处，相互自顾不暇。

日军在山区清剿了一阵，未能寻找到阎部主力，只得陆续撤出吕梁山区，回防铁路沿线。

3 月下旬。

阎锡山在山中与敌周旋了将近一个月，见吉县之敌已呈孤立状态，遂下令第 61 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发动反攻。该师将敌四面合围，连日发起猛攻。敌战力不支，弃城逃窜。该师于 3 月 26 日克复吉县县城。敌军马上纠集大批兵力向吉县杀了个回马枪，该城再度陷入敌手。

4 月初。阎锡山调集第 61 军全部，全力反攻吉县，经数日激战，终于将敌打溃。与此同时，阎部其他各部也发动反攻，先后恢复了吕梁山南段根据地。

阎锡山的晋军为保卫吕梁山根据地，与日军血战近两个

月，战斗力大为削弱，几个军都几乎成了空架子。根据地也只有晋西南吕梁山一隅，仅七八个较完整的县。

1938年春季反围剿结束后，阎决心苦心经营，扩军备战，恢复兵力，以图发展。

过了不到三个月，局势又骤然巨变。日军调集大军围攻徐州，企图报台儿庄之仇未逞，便恼羞成怒地从徐州西进，企图夺取郑州，再南下席卷武汉。与之相呼应，山西境内之敌，亦蠢蠢蠢动，妄图大举南下，突破黄河天险，策应沿陇海路西犯之敌。

阎锡山接到蒋介石电令：出击当面之敌，策应黄河以南战事，务必牵制住日军，不使其过黄河。

于是，阎锡山只得命令尚未得到整补的部队，向日军交通要道同蒲铁路线出击，牵制日军兵力，阻敌南下。

首先出击的是吕梁山北段的部队，他们使同蒲铁路北段交通断绝。5月下旬，吕梁山南段部队纷纷出动，展开灵活机智的破袭战，先后攻克洪洞、襄陵、蒲县等城镇。并与敌反复争夺交通要点。

7月2日，集中优势兵力，向蒲县之敌发起进攻，一连冲破日军数道防线。这一仗，毙敌七百余人。

同时，阎的另一部向南攻击，一度打下安邑、运城重镇，使日军铁路交通瘫痪。

向北出击的部队，数度攻下离石、柳林、中阳等县城，与敌争夺激烈。

12月下旬。

阎锡山在吉县城东的小河边开办军事训练班，集训所属部队校尉级军官。

日军以第20、第108两个师团为主力，配以特种部队，共计数万人马，兵分六路进攻吕梁山南段根据地，其目的就是要将阎的部队歼灭或赶过黄河。

阎锡山摸准了日军的心理和目的，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下令各地行政官员广泛动员民众，实行空室清野，不给敌人以可利用之物资，并组织民众，协助部队开展游击战，袭击敌人。又令战区主力部队避开敌人锋芒，转进山中隐藏待机，仅以若干零散部队，对冒进之敌作象征性的节节抵抗。在总的战略上向强敌“示弱”。

当日军进抵吉县附近时，阎锡山命令战区长官部和省府机关人员，于大白天撤离吉县，向西“败退”。

同时，又密令王靖国将军乔装打扮成阎的模样儿，乘坐上老阎的二人抬轿子，在大批卫士簇拥下，慌慌张张地从吉县穿城而过，照西边黄河渡口而去，佯装阎逃离山西，西渡黄河，以迷惑敌寇。

天黑以后，阎锡山才带领少数参谋人员潜出吉县县城，转移至吉县东山五龙宫地区。这时，他收听到敌方广播，称“皇军进攻吉县，已将王靖国主力击溃，阎锡山着青衣小帽，乘二人小轿，逃往黄河以西。”

阎锡山听后敞怀大笑，不无得意地对参谋们吹嘘道：“小日本鬼子上俺当了！他们出动大军围攻吕梁山，目的就是要把俺老阎赶过黄河去。看样子他们认为目的达到了，对吕梁山的进攻也该结束了，下面该看咱们的了！”

1939年1月上旬。

因为根据地人民在地方政府动员组织下，实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进入吕梁山根据地的六路日军，变成了瞎子、聋子，

找不到吃的喝的,同时,因交通运输线迭遭游击队破坏,后勤补给困难,部队疲惫不堪。游击队在各地大势破袭骚扰,日军兵员消耗日重,无法在根据地立脚,似有动摇撤退迹象。

躲藏于山中的阎锡山,见下手的火候到了,遂下令全线反攻。

主力部队和游击武装,从山地扑将出来,向撤退之敌穷追猛打,接连收复了大宁、吉县、蒲县、乡宁等县城。南面,将敌追到新绛附近;中路,第二战区以主力乘胜追击,跨过汾河,一度攻下同蒲铁路上的赵城重镇。反攻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吕梁山南段根据地。

同年2月,日军又出动二万余兵力,分数路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陈长捷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王靖国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截断了敌后交通。

赵承绶第1骑兵军在离石、方山、岢岚一带诱敌深入,苦战旬余,毙敌二千余人,再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保住了晋西根据地。

3. 根据地建设

1939年冬季。

顽固派挑起事端,山西境内发生“十二月事变”,酿成晋军与新军以及八路军的摩擦战。事后,阎锡山被迫接受中共的调停,于1940年4月达成停止武装冲突,一致抗日的协议,并划定以汾阳至军渡公路为界的军事分界线,界南为阎锡山第二战区部队活动区域,界北为新军和八路军的活动地区。

此后,阎锡山的根据地就被固定在吕梁山南段这块狭小的地盘内。

在这次事变中，阎部主力第19、第61两个军和骑1军损失较重。他以此为借口，向蒋介石要求扩军，得到满意的答复。

于是，他将原有的一个集团军三个军另四个直属师的编制，扩充为第6、第7、第8、第13四个集团军八个军，共二十四个师，外加战区直属一旅七团。同时，他还将各地自卫团等改编成六个游击纵队。

编制解决了，扩充兵员成了难题，为求其存在和发展，阎锡山在根据地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致力于军政两途，建设和巩固他那屁股大的一块根据地。

首先，他采用特务手段，巩固其内部的团结。

他加强和扩充在抗战初期发起组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同志会”是一个政党性质的组织，它制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由阎任会长。这个组织的成员为第二战区军政高级长官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他利用这个组织，给尽可能多的人都戴上“同志”的帽子，变成与他“同志”的人，以此建立个人威信，树立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第二战区的各项军政大事，几乎都是通过这条“同志”的线去施以统一指挥。在这个圈子内的人，都尊称阎为“会长”，就象黄埔系军人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一样。

阎锡山在其军队中的特务组织，就是“铁军”。这个组织的纪律更为严密，且带有秘密性质，强调绝对服从最高领袖（阎锡山）。

第二战区部队中几乎所有的师、旅长，都被换成“铁军”的人。因此，可以说这支武装真正置于了阎锡山的绝对领导之下。“铁军”实际上就是与阎锡山“贴心”的代名词。

1941年7月。

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创办了“洪炉训练班”，受训人员为本战区连以上的军事干部、以及政工、保卫、理宣、经济、兵役、学校等各方面的干部。训练的目的在于：将这些成份复杂的“原始的矿石”，“不纯的钢铁”，都弄进“洪炉”中狠狠地冶炼一番，使之成为真正的“钢铁”。

阎锡山对这项工作颇为用劲，亲自研究制定训练计划，策定训练方针。并一时心血来潮，还创作了一首四言打油诗，取名为“洪炉歌”，令人谱上曲，作为洪炉训练的“班歌”，规定学员早晚齐唱。

《洪炉歌》的歌词：

高山大河，化日熏风。
俯仰天地，何始何终。
谋国不豫，人物皆空。
克难洪炉，人才是宗。
万能干部，陶冶其中。
人格气节，革命先锋。
精神整体，合作分工。
组织领导，决议是从。
自动彻底，职务维忠。
抗战胜利，复兴成功。

自1941年起至抗战胜利时止，四年中，洪炉班先后在克难坡、吉县县城、隰县等地举办了四十多期，参加受训的人员达二万余人。这些人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为巩固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军队，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阎锡山在敌后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兵员补充和军粮供给困难。

1939年以后，阎锡山这个山西省的主席，偏安晋西南一隅，能够施行统治权的地方，仅吕梁山南段以吉县为中心的七个县。这里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他的十多万军队长住于此，吃住用基本上就得靠这块土地。

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加上日本鬼子三天两头进山扫荡一番，造成许多地方民不聊生，离乡逃难。出现了“农村无丁，无人种地”的局面，而阎锡山的军营则面临“营盘无兵，无人打仗，部队已到瓦解境地。”

1943年8月15日。

阎锡山在克难坡召开军队师以上军官、地方县级以上行政官员大会，提出了兵农合一政策。

兵农合一的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的，即“编组互助”、“划分土地”、“平均粮银”。

这一政策被阎锡山自吹自擂为举世之创举。他在军政联席会上，喜不自禁地自我吹嘘说这是一个“中国从来没有，就是世界各国也没有”过的济世良策。宣布由他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田土、耕种、壮丁、军粮、赋税，拥军优属等等摊派到人、责任到人。与之相适应的是加强县、乡、村、组各级行政组织建设和施以行政管理，实行“按劳分配”。

会后，阎指派专人在宁乡县搞了十多天的“兵农合一”试点，得到的报告是：贫富皆大欢喜，农民普遍拥护，并歌颂阎的这一政策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什么什么。

阎锡山见了那个报告，喜得脸上都变了形。立即发令：在根据地全面推行。

这还不够，此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攻击一番共产主义。说他的兵农合一政策，是“聚宝盆”，“尽甜无辣”，说“共产主义对

劳动者是先甜后辣,与人土地,收人的粮食再行分配,无论如何巧妙的说法,根本的政治心理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们是按劳分配,对劳动者是尽甜无辣,与人土地,不收人的粮食,使人负担,不要巧妙的说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等等。

阎锡山的兵农合一,仅从解决敌后抗战中吕梁山根据地的兵员补充和粮秣供应困难这一问题而言,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4. 阎锡山说给我七万挺机关枪,我就宣言反蒋反共

阎锡山的吕梁山敌后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但是,他却在抗战中后期曾与日军有过多次数勾达,并企图“投降”。从各方面的资料看,阎、日勾达,首先是日军“有意”,并主动勾引,企图将其拉下水,为其所用,从而在精神上动摇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使抗战阵线崩溃。

日军为使其归顺,任命阎锡山的老部下苏体仁为山西省主席,企图与阎联络。第一军司令官、参谋长虽都热心努力开展该项工作,但阎锡山仍持不即不离的态度。昭和十五年(1940年)二月,田中隆吉少将任第一军参谋长后,即与苏体仁商议,从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同阎有旧交)的亲笔信给阎,开展密切联络,努力铸成友好关系。这项工作即被称为对伯工作。但是,十二月,因田中少将转调陆军省任职,即由继任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继续工作。其中田中少将还到现地作长期访问,以支持这项工作。

(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所编《华北

治安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也说：“对阎锡山的怀柔招抚工作。由于这是对中国方面将领分化瓦解工作的先驱，中央也颇重视。”

1941年6月。

岩松义雄中将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军司令部驻山西太原)，立即致信阎锡山与阎重叙旧谊，以讨共为诱饵，迫不及待地要与阎锡山“友好”。信中说：“当此之际，德高望重之阁下，决然讨共反蒋，不仅余一人之希望，当为中外所赞赏。”

在这封信中岩松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白，他如此热情地要和阎“友好”，“此非余之诱惑阁下，相信我等会在正义的讨共和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斯时东亚之兴废，贵国之将来以及其他良策，敢不仰仗阁下听候垂教，如是乃化干戈为玉帛。”

阎锡山见他的这位二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心情如此激动和迫切，也向对方传递出“愿意”的秋波，于7月3日，派人去太原答礼，并带去阎某人老实不客气的几个实实惠惠的要求和条件：

1. 为维持山西纸币价值，请给伪币五千万元。

2. 为了将来友好反蒋反共，请先充实山西军的实力(声称现老阎手下只有六七万兵力，实际上有正规军十三余万，还有数万游击武装)，第一步应由日方提供武器，以装备三十万兵力，所需武器的具体数量是：步枪二十万条，轻机枪二万挺，重机枪五万挺，大炮五百门。

来人向日方说，以上两点如果日方做到了，阎锡山马上宣言反共反蒋。

如此吊儿郎当的条件，在阎锡山自己看来也是儿戏一番。哪知，日方一见阎的代表前来，就已喜得不行，在他们看来，只要姓阎的答应反共反蒋，当个汪精卫第二，其他什么条件都是次要的。于是，不但满口答应了那些条件，还夸下海口说，只要姓阎的站到日军一边，别说七万挺机关枪，就是七百万挺日军也给。

双方都表现出满腔热情和诚意，意见一致，当即“拍板成交”，起草了协定草案。

9月11日。阎锡山的代表前往临汾与日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的代表，正式在协定上按了手印画了押。该协定称为《临汾协定》。

这可说是中日战争期间的一桩很大的“和平”生意了。

日本人不惜血本，想以军费和大炮机枪为诱饵，钓一个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人当汉奸。当“生意”有了眉目后，岩松义雄将军召集晋绥两省的日军各兵团长开会，在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称，策反阎锡山有着重大的战略目的，东京统帅部也对此寄予极大希望，“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同时以此向中外进行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

阎锡山在困境中满腔热情地与日军大做“和平”生意，企图用一纸反蒋反共的空头支票，去钓日军的五千万块大洋，和二十万条步枪，七万挺机枪和五百门上好的大炮。要知道，这些“硬货”，连头号汉奸汪精卫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日本人要真把那些东西兑了现，姓阎的就凭这些“家伙”，就可轻易地独霸大华北，到那时，日本人在华北的那点兵力，可能就再也奈何不得他阎老西了。

协定在手，阎锡山对投降一事就表现出以往从未有过的热情了。过了不到二十天，他就忍耐不住了，迫不急待地派代表前往太原城，找上日军司令官岩松的门去，要求兑现临汾协定。

这下该轮到阎锡山的那位老朋友岩松义雄耍赖皮了。他说兑现临汾协定没问题，但必须先进行双方首脑（阎锡山同岩松义雄）直接会谈。同时，还要请汪精卫的权威代表参加。会谈地点在日军占领的临汾、田屯镇，或者孝义县城等地的任何一处。会谈时间在本月15日。待会谈之后，双方加深了了解，由阎锡山公开发表了反蒋反共宣言，才能兑现临汾协定。

阎锡山看完他的代表从太原打回的电报，心里咕嘈道：岩松这只狡猾的狐狸。

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当然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日军因一时过份冲动，在尚未弄清阎锡山的真实目的时，便夸下海口，签了那个协定，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肯定反悔了。这会儿日军提出的那些附加条件，目的是要阎先公开宣言当汉奸。同时，日军所谓的双方首脑会谈，目的亦在于大造阎锡山当汉奸的舆论。把会谈的地点定在日军占领区，这就使阎锡山着实有几分“虚火”。他想，俺要到了那里，就成了任其宰割的羊羔了，他们可以用刺刀比着强迫俺老阎装笑脸，与日军、与汪精卫的人握手拥抱亲热，然后再把那些照片在报上登出来，往墙上一贴，那顶汉奸帽儿不就稳稳地戴在了俺老阎的头上了？

阎锡山灵机一动，计上心了，立即向太原方面回电：关于双方首脑在前线会谈之事，本人已做好一切准备，只是会谈地点不能在日方所说的那些地方，而应改在隰县（阎军占领区）。至于发表宣言之事，应按照临汾协定办理，即先兑现了那些

“东西”，再发表宣言。

此后，双方各自坚持以上立场，相互代表谈判也好，电报往来也好，都紧紧围绕以上问题讨价还价。

岩松义雄越来越清楚了，临汾协定上了阎老西的当，他已弄清，“当时阎锡山拥有十几万兵力，但苦于给养不足，士气消沉，缺乏战斗力，受到重庆中央军严厉的督战监视；另一方面不断受到中共方面的蚕食，”因而，“对日军则采取避其锋芒，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阎锡山“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的战力。”

最使岩松感到不安的是，阎口头上声称反共反蒋，但日方却发觉“阎和蒋之间似有密约”。其目的是为了骗取日方的枪炮和大笔军费。

因此，这一回合，以日军“上当受骗”而将“生意”暂时搁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方面又对阎锡山热乎起来，太原那边传过话来，要求尽快进行双方首脑直接会谈，阎锡山仍是那副腔调：把那些东西兑现了，俺就干，否则，没门。

日军通过汉奸梁上椿证实了阎确是为了骗取日方的枪炮和军费。于是，制定了以武力压迫第二战区的计划。

1942年2月。

岩松义雄纠集了五六万兵力，由乡宁至孝义的六百余里间，围攻吕梁山根据地。日军开初估计，阎锡山的部队处于内外交困，毫无战斗力。因此，对阎部十分蔑视，扬言：阎锡山的军队根本就用不着皇军去打，只要在枪头上顶一顶军帽就会吓跑的。

阎锡山为了狠狠教训岩松，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宣称决心进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动

员根据地民众支援军队，配合军队作战。

会后，他调集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对日军作战，并规定凡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奖大洋一百块，并给士兵娶老婆。

日军进入根据地后，军民都动员了起来，积极参战，真正是打得敌人无处躲藏。在孝义县的苏宋庄、汾城县的华灵庙等地，阎军主力与进攻之敌对阵，展开惨烈大血战，打垮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

日军吃了败仗，后悔不该轻敌。于是，又派人前来会谈，邀请阎锡山去太原谈判。

阎也马上派代表前去太原。

日军参谋长花谷正见阎没来，气得破口大骂阎锡山是个大骗子，把世界上的人都骗遍了。花谷知道，阎派代表前来只是虚以周旋，代表根本当不了家作不了主。

日军投入更大兵力进攻根据地，并以强大的炮火向根据地轰击示威。同时通告阎方，限期与日军举行首脑会谈，否则，就踏平阎的山寨老巢。

5月6日。阎锡山在吉县安平村与日军岩松等人举行直接会谈，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会谈破裂，各走东西。

关于这次会谈，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室第六组（专管情报）少将组长的军统特务唐纵，在当时的日记上写道：

阎要求敌伪币五千万元，步枪二十万枝，轻机枪二万挺，重机关枪五万挺，新炮五百门。近敌曾运到法币五千万元，步枪七万五千枝，炮七十门，轻机关枪八十挺，阎以相差过巨，未予接受。

阎锡山与日军“勾达”的事，一直为军统所掌握，蒋介石是十分清楚的。阎的每次勾达活动都由“华北督导团民众服务团

主任”李广和向重庆军统密报。因此，阎的活动与重庆方面是达成某种默契的。

1942年春季，日军连续大规模扫荡，武力示威，都遭到失败。便以重兵置于晋西南根据地四周，进行严密的封锁，断绝一切内外交通，企图迫使阎屈服。

为打破敌之封锁，阎令第34军渡过汾河，挺进到同蒲路以东去作战。该军暂编第45师师长王凤山少将率部进入到万泉县西北地区，与优势之敌血战数日，歼灭大量日军。但王将军却不幸中弹阵亡。

仗打过了，日军与阎锡山之间又进行一次次“联络”，日方总不死心，要把阎拖下水，阎也总不死心，想从日军那儿骗点好处。

1944年春季。

日军发动打通大陆走廊作战第一阶段作战——豫中会战。日军倾巢出动，与汤恩伯、蒋鼎文部队在黄河南边厮杀。黄河北边的日军，也在河岸上架起大炮，朝南岸猛轰，大有举兵南下之势。

阎锡山奉蒋介石之令，全面出击，牵制日军兵力。晋军第61军主力进攻上党之敌。同时，以一部兵力由稷山向晋南三角地带袭扰黄河渡口。

其后，第34军同五千多日军在稷山附近血战兼旬，歼敌五百余人。

4月下旬，汾南日军千余，再度进犯稷山，同第二战区部队激战。

5月下旬，汾城、新绛日军千余兵力，围攻义泉。阎部第68师与敌激战一昼夜，义泉失陷。旋即，第68师和暂编37师会

合，对敌施以反包围，将敌击溃，收复县城。

阎锡山在吕梁山敌后与日军打打停停，直到抗战胜利，几乎从未间断过。

第四章 立马中条

1. 挺进中条山,建立根据地

1938年2月。

山西日军集中十余万兵力,沿同蒲铁路大举南下,阎锡山、傅作义的晋绥军退入了吕梁山区。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该战区南路军总司令卫立煌把主力集结于汾西地区,分别占领同蒲路两侧,待日军南下时,发起全线攻击,血战十余日,歼敌五千余人。卫部各军也有重大伤亡,未能扼止日军南进浪潮,遂下令各军向晋南三角地带、中条山及太岳山区转移。

3月初,日军攻抵晋南黄河北岸,企图以五路大军突破黄河天险,进攻陕西。黄河南岸中国守军以猛烈炮火力阻日军渡河。日军也以强大炮火猛轰对岸。

黄河两岸万炮齐鸣,地动山摇,激烈的炮战持续达半月之久。

日军占领黄河北岸后,晋南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被封闭于敌后。

最先进入中条山区的,是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其中,李

默庵将军的第 14 军在进入山区时,还带去了六百名青年工作队员。

这些朝气蓬勃的男女青年,是 37 年秋,由第 14 军驻武汉办事处,根据李军长的电令,在当地招收的知识青年,送来山西前线随军集训。第 14 军主力当时在晋北作战,便在晋南洪洞县选址开训,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六百名知识青年成为专门宣传、组织群众抗战的工作队员。

李默庵率军进入中条山后,将六百名青年分配到各地作民众动员工作。青年们深入乡村,与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向他们宣传爱国思想,介绍军队英勇抗敌的事迹,激发民众对抗战子弟兵的感情,进而组织他们积极与军队合作,支援军队打仗。

李默庵对部队约束甚严,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使军队扎根于民众之中。

日军严密封锁了中条山,不断出动大批兵力进山扫荡,妄图将抗日部队困死山中。第 14 军和其他敌后部队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得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在中条山站住了脚跟。

军队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是中条山各部队得以生存和战胜敌人的关键。中条山守军主将之一的第 4 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兵在附民’。我军纪律良好,军民融洽,敌与我对战三年,敌我两指挥部相距不及百里,而敌不知我指挥部之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战役中,及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战役中,均获得敌人全部命令,其附图所记我总部、军、师部地点,完全错误,且敌机经常轰炸我阵地,而从未在我高级指挥部投弹,是为证明)。这全由军民一体,共

保秘密，敌探不得进入之效。”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绵亘于平陆、运城、夏县、闻喜、侯马之间，北与太岳相望，南临汹涌澎湃的黄河；它与西北之吕梁山，东北之太行山，互成犄角之势。其战略价值为黄河北岸的天然屏障，进出豫西和陕东的门户。

蒋介石看重中条山，对李默庵等部队转进中条山，并站稳了脚跟，给予很高评价，多次致电嘉奖，称其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国军典范。

为了确保这一战略要地，蒋介石不断为该地增加兵力。

38年5月。在晋东南地区打游击的李家珏第47军，奉蒋介石之命，转进中条山平陆地区。

同年7月。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38军军长孙蔚如被蒋介石委为第31军团军团长，令其火速挺进中条山抗战。孙率领第38军一个师（另一个师已在晋东南敌后抗战），陕西省警备队三个旅和两个骑兵团，东出潼关，跨过黄河，进入中条山。

不久，孙又接蒋介石电令，将第31军团改为第4集团军，辖第38、第96、第47三个军，负责守卫中条山西段。

同年9月。在太行山南麓打游击的第3军军长曾万钟将军接统帅部电令，任命其为第32兵团司令，不久又被委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辖第3、第15、第17三个军，令其从太行山西进，守卫中条山中段。

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辖第14、第93、第98三个军，负责中条山之东段防守。

年底，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防地为河南及安徽省一部，长官司令部设于洛阳城，但他的帅旗常年挂在中条山垣曲地区。

中条山可谓兵山一座。兵力经常保持在二十六个师左右。后来，魏凤楼的河南游击纵队，乔明礼的河北民军也拖进了中条山。此外还有毕梅轩的第6游击纵队等。

卫立煌在中条山的兵力布署态势为：在北面太岳山区保持一个军的兵力，在晋东南地区摆一至二个军，其余都坚守中条山中。

中条山的各部队开山采石，在险要处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严阵以待，众志成城。

中条山敌后根据地是成功的。蒋介石说他们是敌后抗战的国军典范。

1939年5月31日。

周恩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二期抗战的重心》的广播讲话，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在敌后，任务是建立游击根据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又说，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个根据地能象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兵力，则二十个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

2. 八方出击，袭扰敌后

日军看重山西，置华北方面军之主力第1军于山西。日军更看重中条山，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不夺取这道山脉，山西境内强大的皇军，如同被锁进了铁笼子，无论是东进陕西，还是南下豫中都不可能。因此，从中国军队进占中条山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夺取这一战略要地。从38年初至41年初，日军数万人的大规模围攻，就有八次，千把人至百把人的战斗，属小打小闹，几乎每天都在各地发生。

日军虽以重兵置于晋南,占据同蒲铁路沿线和各主要城镇。但中条山地区地形复杂,由于有强大的抗日军队存在,人民群众有了靠山,各种抗日组织十分活跃。因此,这一地区处于两军犬牙交错,有的地方两军驻地可称为我中有敌,敌中有我的局面,游击战争遍地开花。

日军陷入了我强大的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被孤立于各个点线,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许多地方,敌人的据点外面就是阎锡山的山西省基层村、乡、县政府组织和游击队在公开活动。

同时,中条山各部队都分别组织有若干大大小小的游击分队,常年深入敌据点间活动,在人民的配合下,炸碉堡、炸铁路、剪电线,搞得敌人坐立不安,昏头转向。

兹将中条山中国军的部分战斗列述如下:

1938年3月21日。

在黄河南岸强大炮火掩护下,卫立煌率部由河南陕县渡过黄河,向北岸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战力不支,溃败而逃。卫部占领平陆县城。

同年夏季。第3军奉命从晋东南挺进中条山,在闻喜县附近与强敌血战竟日,歼灭日军一部,后转进青山地区。

8月1日。中条山东段部队全面出击,连下阳城、沁水、晋城,击毙日军一千五百余人,俘敌四十余人,缴获汽车二百多辆,装甲车四辆。大批日军丢盔弃甲,向西狼狈而逃。

在中条山部队强大攻势横扫之下,各地日伪势力闻风丧胆,有的随日军逃窜,有的溃散,有的反正投降。8月2日,沁水县伪军徐济部六个大队,携带轻机枪七挺,步枪五百多支,向国军投诚。

7月下旬,日军第20师团和第14师团,向中条山西段发动大规模扫荡战。第38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处打击敌人。8月2日,第38军一部在运城地区与敌第20师团激战,毙敌师团参谋长杵村久藏大佐以下数百人。

8月17日。日军第20师团继续在中条山西部扫荡。千余日军猛攻永济县城,并以飞机轮番轰炸。战至下午七时许,日军攻入城内,守军张希文营与敌展开肉搏战,营长以下全部战死,永济城为日军占领。

12月下旬。数万日军分五路大举进攻中条山和吕梁山。卫立煌部和阎锡山部分别与敌激战,阻止其渡黄河。

38年中秋节前后。

敌牛岛师团纠集日伪军万余人,向中条山西部发动扫荡战。第3、第47两军密切配合,将敌诱至山地有利地区予以痛击,取得反扫荡战的胜利。

同年夏天,李家钰第47军派出一个团前去袭击安邑县城之敌。守城之敌措手不及,弃城溃逃。两天后,闻喜、夏县、运城等地的日军纠合起来,突然包围安邑城,该团与敌死拼血战,伤亡殆尽。

1939年初。

刘戡率领第93军由阳城出发,挺进太岳山区,组织和发动群众,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3月。日军五千多人,沿张茅大道向第4集团军进攻。该部放弃前沿阵地,诱敌深入。第17师主力埋伏在圣人涧一带,第47军在岭峒一带断敌后路。敌进至伏击区,四周伏兵突起,发动猛攻,敌死伤惨重,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溃逃而去。

5月。第3军一个团前去稷王山的天井关,向日军一个联

队挑战,双方打了会儿,该团佯装败退,向侯马方向逃跑。日军果然上当,倾巢出动,拼命追击,进至禹王庙附近,突遭四面伏击,敌死伤盈野,歼敌近半。打了一次漂亮仗。

1939年夏天。

日军第29师团二万余人,从东西两个方向包围夹击沁水地区第93军。军长刘戡率领部队巧妙地避开敌之锋芒,跳出重围,顺利转移到中条山东部之析城山北麓。

该军补充团和工兵营共二千多人,未来得及随主力转移。在团长带领下,从周村镇火速向南山退避。日军主力赶到,仅与该部后卫打了一下,未敢深入南山,眼睁睁看着中国军队钻进了山里。

1939年6月上旬。

日军牛岛第20师团,川岸第37师团之一个旅团,关原六野炮兵第26联队,山炮兵第1联队,配合战斗、轰炸机三十八架,以九路大军扫荡中条山。将第4集团军三个军和独立第46旅包围在平陆以北地区。

日军飞机反复轰炸第47军阵地,以步兵插入该军第104、第178两师结合部,直接攻击驻在南村的军部。李家钰军长及军部人员撤向东北山中指挥作战。该军两个师也被迫放弃前沿阵地,退守第二线阵地,依托险峻地区阻击敌人。

第96军被敌人紧紧包围。军长李兴中带领全军,向敌正面冲击突围,在突围战中歼灭日军步兵一个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缴获山炮五门,枪械、马匹无数。

第4集团军各部经数日血战,跳出敌包围圈,转进至张茅大道以东地区,与敌对峙。同时,派出游击分队若干,开展近战夜战,袭扰疲惫敌人。敌在山中无法立足,很快就退了去。

此次战役称为“66战役”(6月6日开始),前后激战十昼夜,粉碎日军的大扫荡。第4集团军伤亡五千余人。日军死伤近万。战后,日军在运城为“66战役”死者开追悼会,仅士官以上死者的骨灰罐就摆了一千七百多只。

1939年9月。

日军万余,向中条山第5、第4两集团军驻地进攻。占领第4集团军驻地毛家山一带。第5集团军之第3军以五个营的精锐,组成突击队,由左侧出击,打退占领毛家山之敌,并继续迂回到敌主力侧背,控制了张茅大道,使敌陷于被动。第4集团军乘势反击,大败进犯之敌。

1939年12月3日至6日。

日军万余,分路进攻中条山。中国军队在闻喜县东南占领阵地,阻击来犯之敌。日军以重炮猛轰,并有十余架飞机轰炸掩护,双方争夺激烈,阵地失而复得,数易其手。激战四天,日军未能突破防线,且死伤达两千人以上,攻势受挫,进攻中条山的计划流产,息鼓掩旗败兴而去。

1939年12月10日。

第14集团军分别向翼城、绛县等地之日军第41师团及第108师团,发动冬季攻势。经九昼夜激战,敌死伤惨重,向曲沃、新绛败退。

1940年5月。

中条山各部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攻势,整个晋南地区都处在激战的枪炮声中,打得日伪军分途鼠窜。

1940年9月。

中条山部队奉蒋介石命令,全力出击,策应八路军之百团大战。

3. 动用牛刀割“盲肠”

经过几年的较量，日军痛切地感到，中条山根据地简直就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正规战、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打得日军防不甚防。“盲肠”随时随地都可能来一阵“发炎”剧疼。

1940年11月28日。

中国军派遣司令部第一课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从南京飞抵东京，向日军大本营汇报侵华日军1941年度的作战计划。其中第五条是华北日军将在占领区“进行治安肃正”作战。“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

东京统帅部批准了这一计划。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大将根据大本营批准的华北治安肃正方案，立即着手制定了作战计划，将作战的重点放在了中条山。“利用此次增加兵力的机会，方面军对驻于晋南地区的中央军尽量以大的兵力进行作战，”以彻底“扫清黄河以北敌军。”

1941年4月下旬。

“华北方面军按照早已计划准备好的以主要力量对扰乱华北治安的卫立煌部下中央军(二十六个师约十八万人)，彻底进行包围作战。”(摘自《大本营陆军部》)。

5月初。

华北方面军在太原召开所有参战的兵团长会议。由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和作战计划。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大将一脸杀气地对兵团长们训话，“当前，我华北方面军的根本

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歼灭盘距中条山地区的中央军主力,彻底扫灭蒋军在黄河以北之势力。此次作战,经大本营和总军计划批准,关系重大,务求全胜!”

担任中条山作战的直接指挥者为第1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此人亦在会上叫嚣,“本军决心歼灭晋南中央军。目前,从华中转调的两个兵团,以及国内新增部队和从华北各地抽调之部队,都已顺利集结完毕,本军已拥有绝对优势之精兵。此次作战,是自中国事变爆发以来,我军在华北使用兵力最大之一次行动。这是歼灭中条山之敌的绝好时机。

“迄今,我与中条山之蒋军交战已四易寒暑,而未达到目的。现在,当兹蒋政权处于日益窘迫之际,抓住战机,歼灭华北抗日元凶卫立煌麾下之中央军,使彷徨于抗日迷梦的蒋政权震惊,摧毁中国全军的抗日意志,启抗日势力崩溃瓦解之端绪。如达其此战目的,将为处理中国事变带来划时期之进展,自不待言。……”

5月7日。

日军第33、第35、第36、第37、第41、第21等六个师团,和独立混成第7、第16两个旅团的兵力,在大批轰炸机的配合下,分数路进攻豫北孟县、济原,对中条山大举进攻。

8日,日军攻占孟、济两县城及垣曲;10日晨,日军攻占封门口;11日暴雨滂沱,日军冒雨猛进,占领五福渡;12日,日军封锁了黄河沿岸各渡口;13日,中条山各部队被分割包围,战况惨烈,死伤极重。各部开始突围;18日至20日,各部队纷纷突出重围,向敌后转进。至26日,战斗基本结束,突围出来的部队,分别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在晋南坚持游击战,大部退过黄河;另有一部分转入了晋东南太行山区(南麓);武士敏率

领第 98 军转入太岳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

中条山根据地至此覆灭。

4. 中条山区游击战故事七则

东邬岭之战

东邬岭下有一条长二十多华里的狭窄山沟,沟底河水湍急。沁水至翼城的公路傍着河沟通过,公路两侧山势陡峭险要。

1938 年 7 月下旬。

沁水之敌被我优势兵力包围,经数日猛攻,敌人抵挡不住,无力坚守县城。29 日,日军近两千人突围后,向翼城方向落荒而逃。

此时,第 14 军一支在东 邬岭一带打游击的部队,侦知沁水突围之敌正往这边逃跑。游击部队首长认为这是歼敌的极好机会,当机立断,决定在此伏击溃逃之敌。

游击部队立即进入公路两侧山地埋伏,张开“口袋”,等待日军到来。

那天天气特别炎热,游击队官兵伏在山地,忍受着烈日炙烤,汗水浸湿了衣服裤子。为了不暴露目标,谁也没有动一下,谁也没叫一声苦,自觉而严格地遵守战场纪律。

一直等到下午三时许,才见敌人长长的车队从沁水方向开来,不大会儿,敌二百多辆卡车和装甲车全部进入了山沟。

游击部队指挥员正欲发出攻击的信号时,却见车队突然停了下来。接着,鬼子们纷纷跳下车来,脱光了身子扑进公路边的河沟洗澡。

鬼子们也够狼狈的了，这么大热的天，被中国军队围困在县城好几天，昼夜激战不断，命都难保，哪还顾得上洗澡，早已是一身臭汗。突围出来跑到这里，以为完全脱离了险区，便放心大胆地在水中搓汗条儿。

突然，山坡上“砰”地一声枪响。紧跟着游击队的迫击炮吼叫起来，首先炸毁了敌车队的头车和尾车，敌人的二百多辆卡车变成了一条僵死的大虫。

炮弹、手榴弹在敌群开花。

机关枪、步枪子弹象狂风般扫向沟底。

鬼子们乱作一团，光着身子在沟底哇啦哇啦乱窜乱钻。整条山沟都响着隆隆的爆炸声和喊杀声，整条山沟都被硝烟笼罩。日军的一些汽车中弹后，燃起一团团大火。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沟底摆着一千多具日军的死尸，活捉日军四十多个。游击队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那些汽车和装甲车，被洒上汽油全部焚毁掉。

智擒鬼子兵

1938年9月。

副营长胡正烈奉命带领一个连从中条山深入汾西地区打游击。9月2日，他们来到武家庄，老乡们见来了自己的队伍，纷纷围上来向子弟兵们述苦，要求游击队狠狠打击鬼子，为他们出气。

原来，这儿离敌人的据点较近，鬼子们经常骑着战马进村骚扰，他们进村来，见鸡鸭就抓，见姑娘就追。搞得乡亲们人心惶惶，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姑娘媳妇们更是吓得不行，一听

风吹草动,就赶忙往阴沟或柴草堆里躲藏。

胡正烈和游击队员们听了乡亲们的述说,都感到非常愤,表示一定要狠狠教训教训那些作恶多端的侵略军。

过了几天,五个鬼子骑着高头大马向村里奔来,远远地有几个穿着花衣裳的大姑娘正没命地往村里跑。他们飞快地打着马屁股追了来。

到了村里,见那几个女的分别跑进几孔窑洞去了。鬼子们丢下战马,追进去。当那几个家伙刚扑进洞门,就被人冷不防地放翻在地,还没待他们回过神来,一个个就被穿花衣裳的人给按在地上捆了个结结实实。

那几个穿花衣裳的,就是胡正烈和游击队员。

缴获日军大炮

第14军决定攻打侯马车站之敌,事先派了个游击分队到敌后去活动,以便配合大部队的行动。

夜里,游击队摸到距车站二华里的一个山坡上,原打算控制这个高地,以便配合大部队的进攻。不料,他们却在山坡上的松树林中,发现一座小寺庙,庙子里构筑有日军的炮兵阵地,两门山炮昂立在黑暗中。

游击队员们认为若不及时搞掉这个炮阵地,就将给进攻车站的大部队带来极大伤亡。

这时,进攻车站的大部队已发起总攻。游击队趁敌人在阵地上忙乱之机,在庙门外点燃两堆干麦草,片刻之间,火光冲天。同时,游击队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一起响起。

庙内日军不知底细,乱作一团,纷纷从后门潜逃。

游击队冲进庙内，缴获了两门山炮。

铁道破袭战

1938年6月。

李家钰第47军624团5连连长许日军，奉命带领本连和一个爆破组组成的铁道破袭队，前去破坏日军占领的虞乡火车站。

许连长接受任务后，即与驻地水峪村村长联系，要求组织担架队配合行动。村长把青壮年们叫了来，许连长对他们说虞乡车站内存有不少粮食和其他物资，打下车站后，可尽情搬运。

村里所有青壮年都报名参加了担架队。

水峪村距虞乡车站仅二十来里，中间横卧着一道不高的山梁。白天，破袭队和担架队运动到山上隐蔽，天黑后下山。他们来到山下一个名叫东峪村的地方，此地离车站很近，是日军控制区，村上有伪组织。

破袭队把伪职人员找了来，要他们提供车站内敌人的情况。那些人知道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神出鬼没活动，都不敢死心踏地为日军做事，多数人暗中与抗日方面有联系。这个村的伪职人员也如此，他们不但提供了车站内日军的人数、兵力分布以及炮楼外壕沟的宽度深度等情况，还主动要求为游击队带路。

游击队来到车站，不声不响地摸到两个炮楼下，干掉了鬼子的哨兵，将成捆的手榴弹甩进炮楼，炸得敌人昏头转向。

水峪村的青壮年们也热血沸腾了，跟着破袭队战士冲进

站内，四处放火，倾刻之间便把房屋都点燃了，站内变成一片火海。

车站里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惊天动地。

站内之敌遭到突然袭击，慌乱不堪，被击毙五十多个，其余的冲出车站，向西逃跑。

爆破组剪开电网，在铁轨下安放炸药包，将铁轨炸毁三百多米。

天亮前，破袭队和民众扛着战利品撤离车站，凯旋而归。

军民鱼水情

1938年中秋节后。

第140师一支近两百人的游击队前往王家坪一带活动，受命之后，他们于大白天向日军据点林立的敌占区开进。途经夏县城东时，一个高地上据点里的日军，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向他们轰击扫射。

游击队闪进树林隐蔽了会儿，见敌人打了几炮就没声了，轻重机枪也不叫了，一切复归平静。便从树林出来，大摇大摆向目的地行进。

他们已有很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在整个晋南地区，游击队活动一直很频繁，打得敌人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日军以大部队围攻扫荡，小部队追击，什么招数都用上了，对游击队也无可奈何。其后，日军也就有点麻木了。游击队大白天在碉堡据点间穿行，在日军鼻子底下活动，据点里的日军根本不敢出来追击，致多是躲在据点里打上几炮，用机关枪远远地扫射一阵子，或者躲在据点里提心吊胆地静观，只要游击队扛的炸药包

不是去炸他们那个据点，他们也对其听之任之。

游击队来到王家坪，立即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

村长马上为部队安排好住处，又吩咐村民们送铺草，烧开水，忙个不停。

不大会儿，各家各户都送来热腾腾的饭菜。战士们吃着香喷喷的饭菜，说感谢乡亲们的厚爱。乡亲们说不用谢，这是咱们阎长官（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规定的合理负担，是俺应尽的责任。

第二天，住在尉郭镇的李区长特地办席招待这支游击队，欢迎他们来这一地区打游击。

席间，县长对游击队长说，敌人占领县城和主要集镇后，县区政府一直在本县乡村领导人民抗战，县、区长都组织有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

县游击队张大队长也说，咱们的游击队，人、枪都不缺，就是缺子弹，每条枪才有两三粒子弹，遇着人数稍多一点的敌人队伍，就不敢打，放过好多歼敌的机会。

县区游击队是由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负责。第140师游击队则属于中条山卫立煌的游击军。为了支援地方游击队抗战。饭后，游击队送了他们一箱步枪子弹（一千发）和五十枚手榴弹。

张大队长紧紧握住游击队长的手说，我们要用这一箱子子弹去消灭一千个鬼子。

炊事兵杀敌逞英豪

1938年8月下旬。

运城、夏县的日军一千多人，向第 178 师驻地毛家山阵地进攻，战况十分惨烈。

中午，3 连炊事兵李发生挑饭上阵地，见本连阵地已被日军突破，大部分官兵战死。阵地上到处横陈着与敌肉搏中同归于尽的敌我两军的尸体。还有少数几个活着的战士正在战壕中与敌拼刺刀。

李发生看到那些壮烈殉国了的战友尸体，悲愤已极，抽出挑饭的扁担，冲上去向鬼子们脑袋上乱砍，当即打死几个鬼子。又有两个鬼子围了上来，他在与敌人搏斗中，被刺伤八处，仍奋力厮杀，将敌消灭后，他背着缴获的三支三八大盖枪，带着满身刀伤，艰难地走下阵地。

李发生的英雄事迹传遍了中条山区，传遍了全国抗战军民。

蒋介石和卫立煌分别对其明令嘉奖，发给勋章一块，并为他在家乡四川省梓潼县修建新房，作为奖励。

步枪打敌机

1940 年春天。

刘戡第 93 军在太岳山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后，不断派出部队到根据地以外的地区打游击，将敌人的后方变成敌人的前线，阻止其向根据地扫荡。

该军第 166 师 496 团团长江文宝，也奉命率部到根据地外的洪屯公路以北打游击，行军途中被敌人发现。敌人见他们军威雄壮，人数不少，不敢追击，就向山西日军司令部呼叫。

不大会儿，飞来十二架敌机，又是轰炸，又是俯冲扫射。当

时，部队正行进在一道山梁上，左右是陡崖，没法躲避防空，情况极为险恶。

李团长冒着隆隆的爆炸声和遍地硝烟，在山梁上飞跑着，大声命令部队不要慌乱，以排为单位组织集束火力对抗敌机。

这一招果然有效。全团官兵对空射击，竟然击中一架大肚子轰炸机，敌机拖着浓烟坠向山中。两名日军跳伞后，一个重伤毙命，另一个落地后即被中国军包围，见无法逃脱，举枪自杀了。

第五章、太行风雨

在晋东南、冀西南和豫北三角地带的太行山南麓，有一块二十余县范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的西南部与中条山根据地相连接，西北边与太岳区根据地相呼应。黄河以北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十余万游击军在这里坚持了六年的敌后游击战。

1. 国共军队团结御侮

1938年2月。

华北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南下的同时，另以主力沿京汉路南，至河南新乡，转锋西指，沿黄河北岸横扫，山西全境陷落。

蒋介石在严令山西境内所有部队必须坚持守土抗战，不得退过黄河，之后不久，又以军委会名义向晋省各部队发出命令：山西敌后各部队的作战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应以分散、巧妙地运动游击战歼灭日军。同时，将第二战区原划分为左、中、右翼各兵团，改为东、南、北三路军。

东路军，即转进于太行山敌后的部队。当时，计有第18集团军总部（住沁县城南小东岭村），及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之344旅，决死第1纵队。国民党政府军当时在这一地区的

有曾万钟第3军,高桂滋第17军,武士敏第169师,李家钰第47军,朱怀冰第94师,赵寿山第17师,刘戡部第83师,王奇峰骑兵第4师。

东路军总指挥官为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

3月21日。

指挥部在沁县小东岭村的一座庙里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八路军和决死队旅级以上干部刘伯承、薄一波、王新亭等。国民政府军在晋东南地区各部队少将级以上将领三十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

3月23日。彭德怀将军作了题为《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分五个部份:第一,对敌人作战计划的判断;第二,在持久战争中敌我的形势;第三,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意义;第四,华北坚持抗战有利的条件与个别困难;第五,我们第二期抗战的基本任务。

与会将领经过充分的研究讨论,对如何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取得了一致共识。会议还根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的指示,将各县公安局、自卫队等武装,一律改为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

会上,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针对决死队没有实战经验等问题,提出了必须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三打一”战术,为加强决死队的作战指挥,决定派华占云去决死队任参谋长。

东路军将领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决定成立东路军政治干部大队。目的是解决各部队缺少政治干部,特别是下级政治干部的问题。会议结束后不久,政干队就正式成立开

训,第一期集训学员二百多人。赵寿山第17师等部队也派员参加学习训练。政干队学习内容为连队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动员,民运工作,瓦解敌军工作等。

3月底4月初。

日军调集步兵、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共十余个联队三万余兵力,分九路进攻晋东南,企图摧毁太行山区的国共抗日根据地。

进攻太行山区的日军还带有“随军宣抚班”,军行所至,大肆进行“宣抚”,张贴传单、布告、安民告示等等,宣扬日军武力,企图对军民进行恫吓和精神摧毁。

对日军的这次进攻,东路军各部作了充分准备。各军、师都举行了“粉碎敌人围攻誓师大会”,动员大批民众参军参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政治部门编印了大量瓦解敌军的宣传品,连队都配备有喊话队,以作战场瓦解敌军工作。

4月4日。

日军开始全面出动。其战略意图是:以重兵从南北对进合击,东西两面以一定兵力配合策应。进攻重点指向辽县、襄垣、武乡、沁县地区,东、南、西、北九路日军企图在这些地区会师,围歼东路军主力于此。这次反扫荡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四面出动,九路进攻,合围会攻抗战部队的战略受挫。

东面。日军第16师团分三路从河北省境向太行山攻击前进。三路日军中,最强一路为从徙县向辽县进攻之敌。4月12日,该路日军在麻田镇以南遭到王奇峰骑兵师的顽强阻击,八路军的一个连也在敌侧后游击搔扰,配合王师主力作战。

双方激战一天,因王部占有有利地形,且战斗意志旺盛,

使进攻之敌伤亡很大,攻势受挫。于翌日向西窜至西镇,因沿途遭游击分队不断袭击,无法在太行山区立脚,于4月14日掉头向南溃退而去。

东边另一路日军从邢台地区西进,企图在皋落地区与从北面南下之敌会师。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在浆水镇与敌接战,将其堵截,使之未能出河北境土。

东边第三路日军由元氏、赞皇出动,被129师骑兵营及晋东游击支队阻击于昔阳九龙关以东,使其始终未能前进。

西面。日军第20师团之鲤登联队,从洪洞出发,经安泽北上,于4月7日占领沁源县城。该路日军意在封闭晋南我军西退之路,割断太行山与太岳山区的联系。

曾万钟第3军一个旅和决死队一部,以及高桂滋第17军一部,将敌堵在沁源地区,经连日围攻,敌战力不支,于4月14日晚突围南退。

第17军收复沁源县城。

南退之鲤登联队在和川附近,被刘戡第83师一部截击。敌恐其被第17军南下追击,拼死夺路,与刘师部队短兵相接,数次展开惊心动魄之肉搏战。因刘师官兵作战顽强,使鲤登联队在此遭毁灭性打击,毙伤日军千余人(敌弃尸五百余具),残敌南逃至安泽。

北面。日军第109师团和酒井兵团,以及其他特种部队,共万余兵力,北面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敌亦分三路向南进攻,兵力最大的一路为集结于祁县、平遥地区的第109师团和酒井兵团各一部,约五六千人(此路日军亦是九路中最强的一路)。

4月初,北面之敌开始南下,企图在榆社、武乡地区与南

进之敌会师，歼灭根据地中心地带的东路军主力。

武士敏率第 169 师紧急出动，先敌抢占子洪口要隘东西团城铺一带，抢修战壕工事，阻击日军进前。

翌日，日军前锋抵达子洪口地区，接连发动进攻，未能撞开这道险关。日军主力赶到后，在轰炸机的配合下，发动疯狂进攻，武士敏将军指挥将士死守阵地，寸步不让，战况尤烈。但因敌兵力强大，部份阵地被突破陷落敌手。

4 月 14 日。

朱怀冰奉命增援子洪口。朱率领全师部队星夜紧急出动，赶到前线后，从侧后向敌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截断日军后路，打退敌之增援部队，炸毁敌运兵卡车十余辆。

因后方受到突然袭击，进攻子洪口之敌，全线动摇。

武士敏与朱怀冰两师劲旅，协力配合作战，与敌血战数昼夜，将敌打溃。此役，敌死伤千余，其中击毙敌联队长以下数百名。

子洪口阻击战的胜利，是取得反敌九路围攻胜利的关键。

北面第二路日军为第 109 师团一部，由榆次出动，沿浊漳河上游向榆社攻击前进。该敌在马坊地区被八路军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有力牵制，未能深入太行山区。

北面第三路为日军第 109 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及骑、炮、工兵等各一部，由平定出发，南下至昔阳县境后，兵分东西两路向辽县猛插。

东路日军经皋落进至芹泉镇时，遭到汪乃贵支队狠狠打击，死伤数百人，该敌遭此惨败后，向北溃退。

西路日军沿昔阳、和顺、辽县间大道向南猛进，一路顺风地开进了辽县县城。

南面。日军第 108 师团第 105 联队和第 117 联队，分两路北进。

第一路，第 105 联队，在苦米地旅团长指挥下，从长治出动，经黄碾、襄垣、下良镇，一路烧杀，直往北进。该路日军仅在襄垣附近遇到第 3 军若干小股游击部队袭扰，未遇大的阻击，便一路顺风地北上至辽县，与从北面南下之 109 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在辽县县城会了师。

南面第二路日军为 108 师团第 117 联队，在联队长柏崎大佐率领下，从屯留经廉亭，沿大道北上，直奔第 18 集团军总部沁县地区。4 月 8 日，日军进抵沁县段柳附近时，朱总司令才率领总部人员撤离小东岭村。4 月 10 日，敌占领沁县城，继续北窜，占领武乡县城后，又直上至榆社。

第二阶段：东路军各部发动反攻，聚歼孤军深入之敌。

4 月 13 日，南路日军第 117 联队进至榆社，翌日，第 105 联队和 109 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南北对进，在辽县照了面。

从总的战场形势看，日军此时的处境很不妙。九路大军中有六路被堵在根据地外围，而进入太行山区的三路日军，已变成内线，四周都在东路军的封闭之中。

对进入太行山区的日军来说，南面的情况尤为严重。当 117 联队和 105 联队北上后，赵寿山将军趁敌后方空虚，指挥第 17 师，随敌尾进，一举攻占了高平、长子、屯留、壶关等县城，使进入太行山之敌后路断绝，南面成为关门之势。

在太行中心地区，八路军第 129 师主力和第 3 军主力，分别集结于辽县以南山区，正严阵以待。

进入太行山腹地的三路日军，充其量三个联队，并非此次九路围攻中的主力，相对之下成为弱敌孤军深入。

日军深入太行山区后，未找到东路军主力，一无所获，只有对有些村镇、建筑物进行炸、烧，实行所谓的“摧毁根据地设施”。而那些随军宣抚班，本来准备在山区老百姓面前好好施展一番政治宣传的技能，扬扬日军的军威的。但根据地的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把各家各户吃的喝的藏得干干净净之后，都钻进山沟“猫”了起来。宣抚班找不到老百姓，政治工作也做不成了，虚劲也提不成了，带去的那些大捆小捆的政治宣传品也成了无用之物，只好甩给山区老百姓做手纸罢了。

4月13日。

朱德总司令在武乡石盘附近的一个山村，与总部其他将领商量后，决定在浊漳河河谷地带伏击日军。命令第129师主力火速赶往武乡贾豁镇一带待命。

敌117联队北进至榆社后，因不能与北面南下之敌会师，深感孤军深入之危险，又受到八路军115师第344旅一部的不断袭扰，于4月15日掉头南转。退回到武乡段村，再向东行至马家庄、长乐河谷地带，突遭129师主力迂回包围，发起猛攻。

16日，子洪口方面之敌，为了南下救援第117联队，又增加步兵三千，骑兵五百余人，在飞机五架，重炮二十余门的掩护下，拼命撞击守军阵地。武士敏、朱怀冰两师密切配合，顽强阻敌，阵地巍然不动。强敌连攻两日，死伤盈野，攻势再次受挫，于18日息旗掩鼓，向北败退而去。该路日军的南下受阻，保障了东路军在中心地区反攻的顺利展开。

彷徨于辽县地区的第105联队二千余人，突闻第117联队在武乡地区重围中传来的无线电呼救声，于16日下午3时许，倾巢南进，经蟠龙镇前往救援。

第3军以一部兵力前往拦截第105联队,未能如愿。

第105联队与第117联队靠拢,战力增强,鏖战更烈。在重围中杀红了眼的日军,大量施放喷嚏性毒瓦斯,但因风向不对头,毒气倒灌,使日军自己一个个泪流满面,乒乒乓乓喷嚏连天。

第117联队在105联队策应下,向西溃退。在这次战斗中,敌被歼千余人。

此时,第129师主力和第3军主力分别发起反攻,日军呈全面败退,土崩瓦解之势。

第3军一部西进,横扫沿途日军,攻占了武乡。第3军主力南下,4月19日,襄垣守敌千余人向南娥进犯,遭第3军歼灭性打击。随后,第3军乘胜追击,先后攻取了襄垣、潞城,接着马不停蹄地挥师东进,攻取了黎城,并在东阳关截击东逃的日军洒井兵团。4月23日,第3军一部乘势猛进,收复了安泽县城。

八路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129师主力紧追残敌,挥师南下,势如破竹。18日围攻沁县城,敌战力不支,于翌日早上五点钟弃城南逃。该敌在城南白家沟、大桥沟一带被115师第344旅主力截击,歼敌二百余人。

八路军收复沁县后,向长治推进。

4月25日,长治之敌弃城南遁,该城旋为八路军占领。

此时,各路日军纷纷回巢,东路军各部奋勇追击,分别收复榆社、辽县、和顺、涉县、晋城等城镇。

日军的九路围攻宣告失败。

在这次战役中,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相互支援达到空前程度,这是抗日战争中,两党军队在统一指挥下,运用游击

战取胜的范例之一。

从 38 年 5 月至 39 年初的大半年时间里,太行山南麓地区处于相对平静状态,根据地也得到加强和巩固。

2、孙大麻子、庞瘸腿

1939 年春天。

第 40 军军长庞炳勋奉蒋介石之令,从黄泛区东侧的水沼芦苇丛中,率部北上,加强太行山南麓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力量。日军调集大军阻止庞军北进,当第 40 军跨过黄河,进入晋城地区时,即遭大批日军截击,庞军与敌恶战数日,突破敌封锁线,北进至陵川地区。

在这前后,奉调开进这块根据地的还有第一战区精锐范汉杰的第 27 军。先前在这一地区的部队有朱怀冰第 97 军,孙殿英新编第 5 军和其他各种游击部队。

因此,1939 年初及以后,太南根据地主要靠第 40、新 5 和第 27 三个军支撑局面,而最具特点的要算第 40 军军长庞炳勋、绰号“庞瘸子”,和新 5 军军长孙殿英、绰号“孙大麻子”、“孙老殿”。

庞炳勋,河北省新河县南阳村人。因家境清贫,二十岁那年投军,到四十三岁上才在孙岳部队里混了个少校营副,在参与第一次直奉军阀战争中,在长辛店南冈洼被炮弹炸伤了一条腿,治好後走路有点跛,留下了“庞瘸子”的外号。有个搞迷信活动的人告诉他,你生了一副福相,先败(伤)脚下,后来必为贵人。

庞炳勋口才特好,能说会道,又加上作战勇敢,终于得到上司孙岳的赏识。果然在此后不到半年之中,就由少校营副,

接连升为中校营长,上校旅参谋长和威平八县联防总指挥等职。此后五年内,升为旅长、师长、军长。在军阀混战中,庞某左右逢源,八面灵通,先后任过冯玉祥部第3路、第2路军总指挥。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庞炳勋带兵打仗的最大特点是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廉洁爱民,为下级官兵和驻地民众所拥护。他实际掌握的兵力并不多,但他的部队可称得上是一支真正的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或被敌俘虏,或被友军收编,一有机会,他们都纷纷潜返归队。因此,在历年的军阀混战中,连他的对手们也称庞瘸子的部队是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部队。

庞炳勋在抗战将领中,为自己树立猛将形象是1938年初的台儿庄大血战。

那时,庞任第3军团军团长,实际兵力只有五个步兵团而已,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这个桂系杂牌军首领,也对庞军的战斗力大为怀疑。庞奉李宗仁之命,率部去防守山东临沂,他将自己的几个步兵团沿沂水河岸占领阵地。与之相对抗的却是日本陆军中威名赫赫的精锐第5师团。

庞炳勋的部队在沂水一线与日军反复厮杀,迭挫敌锋,后又与张自忠第59军一起,取得了临沂三战三捷,庞炳勋也就因此威名远扬。

第一次临沂大捷,是1938年3月,日军第5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步兵、骑兵、坦克部队协同进攻。庞炳勋在第一线指挥阻敌,血战一天一夜,未让敌人前进一步。

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觉得自己竟败在庞炳勋手下,感到异常恼怒,又向第一线增调援军数千人,发动强大攻势。庞

部官兵死伤严重,但仍英勇抗敌,寸土不让。

正在危急关头,张自忠奉命率第59军赶来增援,并受庞炳勋统一指挥。庞、张两军奋起反击,一日间,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庞炳勋为了激励将士杀敌,其军团指挥部一直设在距第一线阵地仅三华里的地方,敌人的重机枪子弹就能打到该处。

激战至3月18日,第5师团攻势被打了下去,日军分别向莒县、泗水溃退。庞、张两军奋起追击,相继攻克蒙阴、莒县。这一仗,击毙日军旅团长长野及第三大队大队长牟田口等将佐军官多人,日军死伤共四千人以上。

临沂第一次大捷,轰动了全国。3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以临沂告捷,通告勗勉前线各军将领,努力作战。

3月27日,蒋介石特派陈调元赴徐州前线劳军。庞、张两将军,各记大功一次。

3月28日,蒋介石视察前线后返回汉口,颁令嘉勉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三员战将。

3月下旬,庞、张两军继续发扬决战决胜精神,再次顶住了第5师团的疯狂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取得临沂第二次大捷。

4月初,汤恩伯、孙连仲等部奋力围歼台儿庄第10师团。庞、张两军在临沂地区与敌反复厮杀,死死堵住第5师团,不让其救援台儿庄之敌,保证了台儿庄歼敌的全胜。

在4月19日的战斗中,敌国崎支队冲进临沂城,庞、张两军与敌逐街逐巷展开肉搏战。仅此一战,敌国崎支队就在临沂城下遗尸二千一百八十具。取得第三次临沂大捷。

经这两个多月的血战,庞炳勋的部队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蒋介石令其开到微山湖西边沛县一带休整。庞军在此休整了大半年，部队得到补充，战斗力得以恢复和加强。1939年初，奉第一战区长官部之令，开赴黄泛区东侧打游击，没游击几天，就奉令北上。

应该说蒋介石调善打硬仗的庞炳勋进驻太南山区，是有其各方面用意的。

太南根据地另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将领，就是新5军军长孙殿英。

孙殿英又名孙魁元，自称孙老殿，绰号“东陵大盗”、“孙大麻子”、“孙土匪”。河南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人氏。他在抗战初期，是光杆司令一个，实实在在靠发动和组织流氓无产阶级起家，建起了新5军，并在太行山南麓坚持敌后抗战达六年之久。

孙殿英小时候跟母亲乞讨为生，得了天花无钱医治，脸上留下了不少小坑，“孙大麻子”由此得名。孙在流浪中，与大批无业游民混在一起，互相很讲义气，称兄道弟。他与这些人合伙搞赌博，贩鸦片，做生意，二十七岁那年，参加了豫西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

这个组织的成员，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些“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的力量。”

孙殿英是其中一份子。他在豫西大批无业游民中，由于头脑灵光，板眼特多，很快获得许多人的拥戴，当了庙会道的“老

师”。

庙会道为一迷信团体，声称以念符咒等方法就可给人们消灾驱邪治病。由于孙殿英领导有方，庙会道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孙殿英三十三岁那年投军，由于他已具备了一套混世界的手段，不到半年就由士兵升为机关枪连的连长。不久，他率领那一连官兵哗变，钻进豫西伏牛山区打“游击”，到处攻城破寨，打富济贫。庙会道信徒闻讯蜂涌而来，投奔“自己的队伍”，孙殿英的队伍很快就扩大到数千人。

孙殿英拉起“土匪”队伍后，先后几次为各方军阀收编，被委为“旅长”、“师长”、“军长”。

1928年，孙殿英的国民革命军第12军驻防河北蓟县马伸桥，此地与明清两代帝后陵墓（东陵）相邻。孙以搞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交通，派工兵营挖开了慈禧太后和清乾隆皇帝的陵墓，将墓中随葬金银财宝洗劫一空，再把慈禧的尸体扯出棺材，丢到一边。

“东陵大盗”的行动，引起全国舆论界的非议，孙殿英却不以为然，还把盗墓行为自誉为革命。他说满清杀了我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先生有同盟会、国民党革满清的命，冯玉祥有枪杆子逼宫，把末代皇帝赶出皇宫。俺孙老殿枪杆子没几杆，只好崩皇陵，革死人的命。不管盗墓不盗墓，这是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的。

冯玉祥则对他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上，我革的是活人的命，你革的是死人的命。要说挖墓有罪，挖平民墓也有罪，清朝皇帝过去扒了我们多少墓？现在我们已是中华民国了，哪能再

让死去的皇帝蹲在咱共和国的土地上？你干的好！”

1933年，孙殿英被任命为华北第9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热河抗战。他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激战十多天，部队伤亡较重。但他因坚决抗敌，在军民中博得好名声，义勇军和其他零散部队不断投奔他门下，队伍扩大到五万之众。

1934年，孙殿英在与军阀的内战中失利，部队被阎锡山改编，他只身前往太原晋祠“休养”。

抗战爆发后，他被宋哲元委任为冀北民军司令，在房山县城打出冀北民军司令部旗号，派部下沿铁路、公路设站收容游兵散勇和青年学生。同时，派旧部冯养田、刘月亭等回豫西召集旧部。

1938年春，孙退到冀南山区武安、涉县一带时，竟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四五千人的武装。不久，豫西大批庙会道信徒和其他绿林好汉们，纷纷前来投奔“老师”，孙的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

1938年夏天，孙殿英前往汉口找戴笠通关系，联系在敌后打游击之事，得到戴笠热情接待，孙、戴二人结拜为义兄弟。戴向蒋介石推荐孙殿英，说孙在豫西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只要孙老殿一声号召，就将有数万庙会道信徒响应，此人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理想人物。蒋介石听了非常动心，亲自召见了孙殿英，并委其为新编第5军军长。

孙殿英回到华北，将新5军带到河南林县，在此开辟和建立本军的抗战根据地。

3、冀察战区

第40、第27两军进入太南根据地后，日军第20、第35等

师团又调集了数万兵力,于39年7月初,分五路大举进攻,先后占领了襄垣、长治、潞城、壶关、阳城、林县、高平、修武等县城。

太南根据地各军分头行动,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敌人,游击分队散布各地,对敌进行袭扰。战斗持续至7月中下旬,游击军又收复了一些城镇。

8月初,太南地区连降暴雨,山川河流,洪水暴涨。日军对沁阳县城久攻不下,便炸开沁河大堤,河水陡下,泛滥成灾,沁阳县城附近一片汪洋,游击军被困于洪水中。

进犯太行山南麓的各路日军,因受大雨和洪水阻滞,行动困难。根据地军民奋起反攻,游击分队四处出击,敌人在山区立足不稳,于8月8日,全面溃退。

1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命令,将太行山根据地之第40、第27、新5三个军,编为第24集团军,庞炳勋任集团军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部当时驻晋城。

10月8日。

日军牛岛师团再次纠集二万余兵力,在二十多架飞机轰炸掩护下,由长治、长子、壶关、苏店、屯留等地出动,又一次大举扫荡太南根据地。庞炳勋指挥各军英勇抗击进犯之敌,游击分队也利用山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狠狠打击敌人。经十余天激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完全恢复了根据地。

39年冬,太南根据地军民发起冬季攻势,各向当面之敌出击。范汉杰部将长子之敌包围,激战数日,歼敌过半,于12月14日攻取长子城,残敌向北溃逃。范军乘胜猛追,在屯留附近与大批前来接应的日军展开决战,战况惨烈,双方伤亡都很重。

第40军也在同时挥师北进，将潞城之敌包围，连续发动猛攻，歼敌大半，收复潞城。

1940年初。太南地区“摩擦”加剧，朱怀冰第97军主力被歼，余部退过了黄河。3月，中共中央军委与卫立煌谈判调停，于3月中旬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为界，以北为八路军游击区，以南为国民党政府军的游击区。

不久，庞炳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电召庞赴陪都重庆，对其面授机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要庞坚持敌后游击，保持太南根据地，要他与八路军比赛打游击。庞表示一定不辜负蒋介石的信任，打开河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冀察战区为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成立的游击战区，辖区为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现在庞炳勋接手该战区总司令，太南根据地变成了冀察战区。此后，太南地区仍为第24集团军三个军和杜淑等游杂部队，共八九万武装。根据地地盘为高平、陵川等二十余县，仅在冀南磁县挂了一个小角，沾了一点“冀”的地气，到底不枉为冀察战区。

既然太南根据地挂了个冀察战区的牌子，日军也自然要对其特别重视。40年3月中旬，华北日军在北平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策划进行春夏季和秋冬季的大扫荡，决定主要扫荡太南地区的庞炳勋军。

5月初，驻新乡地区的第35师团，在师团长前田治中将亲自带领下，配合太原第1军向太南区进攻。第35师团在进攻晋城的途中，受到太南部队主力的截击，前田治组织部队反击，双方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在激战中将敌歼灭一部，前田治

中将头部、胸部受重伤。敌阵前折主将，军心震动，败退而去。前田治因伤势过重，死于北平日军医院。

1942年5月。

华北日军第1军以步兵十九个大队，先对太行山区北部的八路军进行了疯狂扫荡。

第1军司令官判断：“太行山脉南部的陵川、林县附近为重庆中央军第27军，第40军及新编第5军等在华北保持的唯一据点。”“在其北部地区因与共产党争夺地盘正闹矛盾。”决定以有力部队“南下攻打蒋系庞炳勋军，向易于捕捉之敌寻找战果。”

6月10日。第1军令独立混成第4旅团攻击林县附近的孙殿英新5军。该军刘月亭暂编第3师在距林县城西北二十华里处的崔底附近，凭借雄关险道，构筑复廊阵地，进行顽强抵抗。

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主力万余兵力，从13日开始攻击，多次冲锋均被打垮，死伤盈野。日军对这支“悍匪”部队莫可奈何，只得增调第36师团一部兵力协助进攻。刘月亭师又与强敌激战了三天三夜，给敌以沉重打击。最后，阵地多被敌强大炮火摧毁，官兵战死殆尽，刘月亭师长和部分官兵被俘（刘后来投降了日军）。

日军摧毁了暂3师这块硬骨头后，即向林县以南地区第40军攻击。庞炳勋令小股部队袭扰敌人，主力向陵川地区转移了去。

日军见第40军主力避锋退却，欣喜若狂，认为太南根据地主力无力抵抗，日军应抓住时机勇追猛打，一举剿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第36师团长向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去电，

强烈要求派大军进剿太南根据地。

岩松军司令官同意了这一请求，命令独立混成第3旅团和第36师团主力南下，扫荡太南根据地。6月15日，第1军司令部发布了第四期作战，即围攻太行山南麓的作战命令。

独立混成第4旅团于6月20日从原康盆地出发，独混第3旅团于6月22日从新乡和修武北侧出发，分别沿豫晋省界进攻。

第36师团主力在晋城东北的泽州、高平、潞安等地集结，于6月24日向据守陵川地区的范汉杰第27军发起包围攻击。范军识破敌寇企图，迅速跳出敌包围圈，向南转移。敌第36师团主力二万余兵力，跟在第27军屁股后头穷追了一阵，一无所获，只好掉头来向东扫荡。

数万日军在根据地反复扫荡了几遍，未能捕捉到中国军主力决战，进入根据地之敌遭到游击队袭击，损失不小，于7月初开始向根据地以外撤退。最后留下第36师团继续扫荡，负责摧毁根据地设施，也就是大肆烧杀一番。

第36师团步兵第223联队在林县合涧镇附近“摧毁根据地设施时”，被马法五第106师狠狠教训了一下子，毙敌千余人。

4、兵败太行

1943年，由于太平洋战事吃紧，日军大本营决定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三个师团转往太平洋作战，在抽调之前，对占领区进行彻底的治安肃正。

4月中旬，华北日军集中了十余万兵力，严密封锁了太行山区的铁路、公路线，于4月21日拂晓，对太南根据地发出了

“毁灭扫荡”的命令。敌采取多路穿插，分进合击，分割包围手段，决心彻底歼灭第 24 集团军主力，摧毁太南根据地。

日军进攻的当天，孙殿英的新 5 军就在临淇镇地区陷入强敌重围。庞炳勋第 40 军在林县，第 27 军在陵川，都分别遭到优势之敌突然包围钳击。

第 27 军见敌来势汹汹，锋芒正露，且处于敌强我弱，赶紧避开敌锋，跳出重围，向南退却转移。

新 5 军在日军重围中，处于四面楚歌境地。敌大批飞机对临淇镇和该军阵地反复施以狂轰滥炸。翌日，敌机又至，撒下漫天传单，有劝降的，还有一种传单上印着大字标题：“孙殿英将军通电拥护和平反共救国主张，战地率部起义，弃暗投明”等等。

孙殿英见了那种传单，拍着桌子破口大骂：“这是驴×的日本鬼子捣的鬼！说老子投降倭寇，真是天大的冤枉！”

孙殿英部即为豫西土著无业游民，又以庙会道为其内部联系，其反抗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自然是十分顽强的。因此，日军决意将其彻底解决，以根除太南地区这一心腹大患。

在敌扫荡之初，新 5 军各部即陷入强敌分割包围之中，接着，敌开始紧缩包围圈，特别是加紧对孙殿英部的包围紧缩。到 23 日下午 3 时许，军部四周山头上的日军已可互相呼应，以信号弹，旗语进行联络。

孙殿英组织军部卫队多次突围都告失败，部队官兵大部战死。

四面日军用大炮乱轰一阵，又高声嚷叫要孙殿英投降。

此时，日军又派遣去年 6 月战斗中被俘投敌的新 5 军暂 3 师师长刘月亭前来军部找孙殿英，苦劝其停止抵抗，投降日

军，以保全余下的庙会道弟兄性命。

孙殿英绝望地叹息道：“完了，现在不投降也不行了！否则，玉石俱焚，全军覆灭！”

孙本为悍匪出身，人极奸滑，板眼特多，他在所部大部战死，“所余部队无多，死亦不可，走亦不可”的情况下，心想既然日军要他投降，倒不如先屈就一下，明投暗不投，搞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图将来。他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拜过把子，结为义兄弟，知道军统八方使劲，派遣大大小小的特务打进日汪阵营搞情报，搞策反，倒不如趁此时机，由他孙大麻子打进日伪内部，为重庆的抗战效劳。

孙殿英把自己的想法与戴笠派往新5军做特务工作的文强（以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身份派遣到新5军工作）密商，得到文强的同意。

于是，孙殿英在绝境中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将军发去一个极机密的电报，述说该军所处困境，请其向蒋介石和戴笠转告，请求允许他加入敌方工作（打入日汪内部，作军统地下工作）。

在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敌工情报工作的军统头目唐纵看到蒋鼎文转来的电报，说孙殿英是“卖了淫，还想立贞节牌坊。”

在这同时，第40军的处境也与新5军相似。被优势之敌包围子山中，几经苦战，伤亡严重。庞炳勋令该军第106师就地抵抗，自己率领第39师向外突围。

庞炳勋当时已是六十四岁高龄的人了，且年老体胖，腿又瘸，行动不便。四个人用一把椅子扎了个滑杆将他抬着在山区里，行至九连客时，又与强敌遭遇，旋即被大批日军包围，第

39 师官兵决死搏斗，伤亡奇重。

天黑后，庞炳勋令部队向南突围。他自己则因行走不便，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只留了少数几个卫士在身边，仍留在山中。官兵不忍心丢下自己年老的官长，要把他抬着一起突围，遭庞严厉拒绝，官兵悲痛万分，挥泪离别。

部队乘夜杀出重围，向南转移。

庞炳勋及副官、卫士数人隐藏于陵川与双脑附近的山洞中。敌人得知庞炳勋未随队突围，便出动大批部队，封锁山区，并派部队进山一遍遍地搜索。5月4日，他被搜山之敌发现捕获，随即押往新乡。

此时，蒋介石在重庆得到的情报是：“太行山战事，固然是失败了，但是庞炳勋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他在山里面苦战六昼夜，无饮无食，苦撑不屈。”

在新乡，庞炳勋通过潜伏该地的军统特务的电台向蒋介石请示：“如何自处？”蒋复电指示：“委屈求全”。于是，他也投了敌，搞“曲线救国”。

庞炳勋，孙殿英两军失败后，重庆军事委员会任命刘进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区游击总司令，以陵川地区为根据地，继续开展敌后游击战。

日军见太南地区又燃起了抗日烽火，极为震怒，遂集中大批兵力，于7月开始，再次对这一地区进行残酷扫荡，刘进部队损失过半，与敌苦战两个月多，终因敌我力量太悬殊，无法在太行山立脚，于8月率部南渡黄河。至此，太南根据地为日军扫荡覆灭。

5. 河北平原游击战

1938 年底之前,河北平原的国民党游击武装

1937 年秋,河北全省沦入日军之手,第二战区东路军转入太行山脉坚持敌后抗战,在这同时,国民党的一些人士在太行山脉以东的平原地带纷纷打出抗日旗号,组织游击武装,展开平原游击战,打击侵略军。到 1938 年春夏前后,以冀南为根据地的河北平原游击战,已形成燎原之势。

在冀东宝坻、玉田、遵化、迁安、青龙、都山等数县境内,为唐聚五将军领导的东北游击队六个纵队,近万人的武装。

在冀南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武邑、武强等十余县境,活跃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第 2 路军的万余兵力。

在冀鲁交界的故城、临清一带,有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六七千人,以及赵狗旦的游杂武装若干;在濮阳、清丰一带,为河北濮阳行政督察专员丁树本的万余保安武装,坚持守土抗战。

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的近万人的武装(不久,这支武装改编为新 5 军),在冀豫边区的涉县、武安、林县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在冀中石家庄地区的深泽、赞皇、赵县等地,为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的游击根据地;在栾城、蒿县、晋县、宁晋、束鹿等县,为河北军民副总司令乔明礼的游击武装所控制;在元氏地区为侯如墉的别动队第 4 纵队所控制,以上三支人马,共有三万余兵力。

在冀南巨鹿、南宫一带远离铁路交通的地方，各种游击队遍地皆是，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县城，仍为国民党的保安团队和游击武装控制。

国民党方面在天津地区的游击活动也比较活跃。军统天津站在天津失陷之初，组织了一支两三千人的地下游击队，专门从事暗杀、袭击日伪人员的行动。1937年冬，军统局天津站的地下人员曾澈等人，在青年学生中秘密组织了“抗日杀奸团”，主要从事暗杀敌伪首要分子和破袭敌伪机关的活动。

国民党人所领导的这些游击武装，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未破裂前，尚能同八路军合作，在团结抗敌的旗帜下，共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

国共两党的游击武装，在强敌压境之中，开初阶段处处体现着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团结精神。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组织了几千人的学生干部大队，其中一部分就是由八路军第129师给培训的。

1937年秋，随着战局南移，张荫梧收集了河北境内的几千名高中、大学学生，组成干部大队。日军疯狂南下，干部大队只得撤退到太行山南麓的陵川地区，继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不久，大雪封山，供应奇缺，加上日军紧逼封锁，学员生活相当艰苦。张荫梧通过冀西游击司令杨秀峰与八路军第129师取得了联系，双方商妥，由129师代为培训干部大队的第4、第5、第8三个队和一个剧团，共一千多名学员。训练内容主要为游击战，以及宣传和组织民众工作。

处于困境中的干部大队学员受到八路军指战员的热情欢迎和帮助。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将军还亲自为学员讲课，传授游击战经验。张荫梧的干部大队的学员们同八路军学习、生

活在一起，情同手足，每当上课之前，民军学员们便高唱《国共合作》之歌：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军的雄师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条约取消
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
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国民党、共产党
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
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当时，在华北平原，在太行山麓，无论八路军还是国民党游击军，同声唱出的都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以及“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一枪打一个，一步一前进！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38年2月16日。华北日军精锐土肥原第14师团大举进攻，守军万福麟第53军抵敌不住，向西撤退，丁树本的地方武装，却在濮阳地区大显神威，他们向日军发起突然攻击，打死驻扎濮阳城内的日军百余人，焚烧敌汽油千多桶。守城日军遭此打击，弃城逃跑。

3月18日。华北地区大汉奸王克敏的专车在北平东单牌楼遭游击队狙击，王贱中弹受重伤，同车的日军军官山本荣治被打死。袭击事件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5月初，保定至石家庄的铁路遭民军武装破坏，造成敌军

交通中段。

7月中旬，伪冀东保安队队长周维新在滦县率部反正，参加抗日，通电表示：“在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下，誓为援助国军收复失地而奋斗。”

是月，冀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武装，向平汉铁路线之邯郸站发动声势浩大的攻袭，击毙日军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7月下旬，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汉口对中外记者谈话，宣布河北民军总部现拥有十六个干部大队，十个民军团，并划为六个军区，共有战斗人员一万二千余人，有组织训练之后备力量四万余人，控制着华北敌后五十四县的抗日政权，领导不脱离生产之群众数十万人。张荫梧还宣布，河北民军的武装力量，目前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境内各主要铁路交通线上，与八路军和国民党敌后的军队并肩作战，协同打击日本侵略军及其汉奸走狗。

9月下旬，在冀南游击武装强大压力下，石家庄地区的伪军岳鹏部三千余人宣布反正，在游击队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打死日军三百四十余人，俘虏日军军官三十四名，一度占领了石家庄、正定、元氏等县，使华北日军受到极大震惊。

大军挺进敌后、两权并立和“磨擦战”

华北敌后的游击力量蓬勃发展壮大起来后，国共间的“磨擦”时有发生。

1938年6月。

蒋介石任命原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上将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兼河北游击总司令。鹿某受命之后，立

即从汉口北上，到达洛阳后，着手组建省政府、省党部机关和省游击总司令部。不久，即率领机关人员北进，渡过黄河，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太南敌后根据地，受到孙殿英、朱怀冰等敌后游击将领的欢迎。接着继续北上，于9月15日抵达冀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南宫县。在这里受到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和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等人的热烈欢迎。

鹿钟麟到达河北敌后，深深为民众抗战高昂的士气和雄厚的游击武装力量所激动，他召集敌后行政官员和游击武装领导人会议，声称不辜负中央统帅部和民众的信任，决心率领民众和武装部队，打开华北敌后抗战局面，收复大好河山。

他将侯如墉、赵云祥、夏维礼等许多游击武装，改编为省府部队，并以河北游击总司令名义，加委各地游击司令，使大批游击武装归并于他的旗帜之下。

11月中旬，华北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从平汉线北段石家庄至彰德一线出动，第114师团之秋山旅团从津浦铁路泰安至德州一线出动，对冀南和鲁西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中共在冀南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行署主任杨秀峰带领下转移到了农村。鹿钟麟指责杨秀峰领导的行署机关在敌人扫荡时“不知去向”，宣布取消该行政公署，另委国民党员为专员、县长。

于是，在华北敌后，形成了国、共各自建立的抗日行政组织，这样两权并立的情况，加上日伪势力也在占领区建立汉奸政权，使局面更加复杂化。国、共各自建立的政权转为公开对立，两种抗日武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磨擦”日趋激烈。

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统帅部决定大力发展敌后游击战，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于敌后开辟游击战场，策应正面

战场之决战。会议决定新建立鲁苏和冀察两个完全的敌后游击战区。

冀察战区以鹿钟麟为总司令，庞炳勋、石友三为副总司令，（庞炳勋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辖第40军和新5军，驻太南地区；石友三为第39集团军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辖第69军和高树勋新8军，以及鲁西南部分游击武装，由鲁西南进驻冀南地区），战区游击总指挥官为孙良诚，统辖冀南地区各路游击武装。

石友三率领数万人马从鲁西南敌后浩浩荡荡地北进，38年12月，其主力第69军进入冀南根据地，高树勋的新8军则置于冀南、鲁西北边境一带，加强了冀南敌后的抗战力量。

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侵华日军无力发动新的战略进攻，倾力巩固其占领区，特别是华北占领区。华北日军确定的战略方针为：“首先肃清平原，尔后指向山地。”为达其剿灭华北平原的抗日武装，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就将一部分兵力抽调华北。

1939年1月。

日军以新由武汉开到华北的第10师团主力，及第27师团和第110师团各一部，加上原驻扎于豫北、泰安、德州地区的第114、第114师团各一部，共三万余兵力，对河北省平原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的南号“治安肃正”扫荡战。

日军分东、西两面进攻。

西线。1月27日，日军第10师团长筱塚义雄中将率部从平汉线之石家庄、邢台、邯郸、临城等据点分途出动，采取稳步推进战术，对游击根据地逐片扫荡。到月底，敌先后占据了滏阳河两侧的各个县城，控制起新河至曲州滏阳河主要渡口。

东线。2月初，驻津浦北段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各一部，分别从泊头、德州、聊城出动，向西、北推进，会同西线第10师团，对进夹击冀南地区游击武装。

2月9日。东、西两面之敌攻入冀南根据地中心地区南宫、冀县、枣强等县，根据地内所有县城皆被日军占领。游击军在各地与强敌展开血战，牺牲惨重。

因为石友三等大批正规军浩浩荡荡挺进敌后，河北民军等各路游击武装也声势颇壮，实力雄厚，国民党的敌后政权组织也较完整，在敌后锋芒毕露，因此，他们成为日军大扫荡的重点打击对象，遭受的损失特别惨重，是十分自然的。

战区总司令部和各路游击部队，以及石友三的正规军被日军分割攻击，失去联系。鹿钟麟无法在冀南立足，率领部分专员、县长和战区总司令部、省府、省党部、省游击总司令部机关人员向西转移，于2月底来到了邢台西南的太行山中，一个叫路罗的小镇方才摆脱了强敌的追击。在转移途中，因屡遭日军包围攻击，机关人员大部被打死、冲散，省游击总司令部只有参谋长张知行及二十来个随行人员。

一个星期之后，鹿钟麟从路罗转移到贺家坪，并将机关设于此地，重新召集人马，收拢失散人员。他将各地投奔根据地而来的爱国青年学生，组成政治大队，开办各种训练班，突击培训敌后游击战人材和民众工作人员。学员经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地作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他在困境中竭力苦撑局面，努力恢复根据地。

华北日军对平原地区的游击武装的扫荡接连不断地进行。5月中旬，日军为了消除北平后方之威胁，调动大批兵力，对冀东地区的东北游击队发起猛攻。敌军利用弥天大雾的掩

护,将东北游击队主力包围于迁安县平台山地区。由于敌众我寡战力悬殊,唐聚五将部队分作两部,分别向南、北方向突围。在突围的血战中,唐将军身先士卒,奋勇冲杀,不幸腰部中弹,血染征袍,仍裹伤死战,直到壮烈殉国。东北游击队死伤累累,大部被打散。

7月下旬,冀察地区霖雨成灾,河川泛滥。日军为彻底摧毁游击根据地,决开了沙河、滹沱河北岸河堤,安平、河间等七个县被洪水淹没,被毁良田十七余万顷,六十余万亩庄稼被冲毁,一万多个村庄被洪水吞灭,根据地受灾民众达三百多万人。

39年冬季,冀察战区的敌后部队发起冬季攻势,各路大军高喊收复失地,举兵北进。第97军军长兼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朱怀冰率部从陵川地区,沿太行山北上,进驻沙河,赞皇等地。石友三部二万余兵力,这时也以进攻石家庄,收复失地为口号,率军西进。新8军军长高树勋和冀鲁豫边区的其他游击部队,也频频调动,高喊北上收复失地。

1940年1月,华北发生大规模“磨擦战”,河北民军等损失惨重。石友三败退冀南。朱怀冰、鹿钟麟困于穷山沟中,感到一筹莫展,势孤力单,于40年1月率第97军南撤,途中又发生“磨擦战”,“磨擦专家”朱怀冰第97军主力被歼,余部二千余兵力退到了太南根据地之修武地区。

鹿钟麟退过黄河,被统帅部免去战区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冀察战区总司令职先由卫立煌代理了一段时间,便由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充任。

石友三、高树勋、孙良诚、丁树本等各路人马,麇集于鲁西北与豫、冀三省边区。蒋介石去电,强令石友三等人恢复冀南

根据地，不准其退过黄河。石友三等人曾几次企图北进，均未获成功。

第六章 狼山喋血

黄河在西北高原的黄土地上打了个“冂”形的套。因此，这里就被叫做河套地区。

在“冂”形顶端河段的北岸，越过宽阔空旷的后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有一道雄伟绵延一千余公里的山脉，名叫阴山。

阴山山脉的西端就是险象丛生的大狼山。狼山长三百七十公里，南侧以陡峭的断崖濒临富饶美丽的后套平原，北面则倾斜渐缓。

阴山的中段为起伏巍峨的大青山，大青山南面为土默川平原。在狼山和大青山之间，还有一段名叫乌拉山的山脉，以此为界，东为前套（大青山），西为后套（狼山）。

这一地区，是当时绥远省的中部。

日寇占领地区大致为南沿黄河北岸，西至后套地区的安北，北面为西苏尼特（今苏尼特右旗）、百灵庙一线。由于这里地域辽阔，干旱少雨，利于机械化部队和骑兵部队运动，华北日军和日军驻蒙军置坦克集团和骑兵集团于该地区。

在这一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有八路军第120师的大青山支队，国民党方面的部队有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的部队（主要为骑兵）；绥远省乌蒙西公旗年轻的女王奇俊峰和乌蒙东公

旗女王巴云英等人的蒙族抗日武装；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的正规军，以及受其领导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共有八路部队）和国民兵团六个团。

马占山以陕、晋边区府谷、编关一带为根据地，游击于阴山地区。

傅作义则在狼山东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从1939年春至抗战胜利，与敌长期对抗，并将其武装斗争不断向东发展，在大青山敌后，开辟有一大块根据地。

奇俊峰和巴云英两位蒙古族女性所领导的部队，与傅作义的部队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和伪蒙、伪满军。

1、战马神威——马占山挺进军在阴山的抗战

1937年8月下旬。

中、日两军在上海一带展开大战，华北战事亦进入紧急阶段。蒋介石在南京统帅部召见东北抗战英雄马占山将军，委任他为东北挺进军司令，令其火速北上，组建部队，深入敌后打游击，以配合和策应大军正面作战。

四天后，马占山从南京赶到战云密布的山西大同，打出了东北挺进军的旗帜，组建队伍，准备向敌后“挺进”。

当时，他几乎是光杆司令一个。蒋介石将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2军第6师（师长刘桂五将军）拨给他用，加上李大超的国民兵团，成了他的挺进军骨干力量。

由于他在“九·一八”后，在东北打响抗日救国第一枪，经当时的报纸电台大肆宣传，他在国内外早已享有抗日民族大英雄的美名，因此，在东北地区有较大号召力。他在大同扯起挺进军帐篷后，立即就有部分伪蒙军和伪满军前来投诚报到，

参加到抗日行列。马占山的力量有了一定发展。

马占山将吕存义部改编为骑兵第1旅；伊克昭盟蒙军白海风部编为骑兵第1团（此部后来扩编为新编骑兵第7师）。

9月中旬，日军从张家口方向进攻大同。马占山部迎着日军进攻逆向挺进，进入绥东敌后。9月末，大同日军东条英机兵团，在伪蒙军第1、第2军和飞机、大炮及百余辆坦克的配合下，沿铁路线向绥远进攻。

马占山令刘桂五率骑6师在平泉一线占领阵地，与敌激战五天五夜后，退至旗下营一线布防。

马占山亲率骑兵第1旅和骑兵第1团，在绥远城东大黑河沿岸构筑阵地，严阵以待。

日伪军一部在旗下营一带向刘桂五骑兵挑战，战况激烈，许多阵地失而复得，数易其手。苦战九天之后，双方成僵持状态，敌人只得就地防守，等待援军。

刘师长兵分三路，乘着夜暗，抄袭敌军取得成功。日伪军措手不及，狼狈溃逃。刘部万马奔驰，乘胜掩杀追击。敌向东败退七十余里，逃到卓资山车站方才稳住了阵脚。

此次奇袭，刘部大胜，共毙敌五百余人，缴获军用物资无数。

日军遭此打击后，改变了战术，以一部兵力与刘部保持接触，以主力向凉城迂回攻击。敌夺取凉城后，再拥兵北进，在大黑河一带，将马占山部三面包围。

马将军指挥骑兵部队与敌浴血苦战，终因寡不敌众，阵地崩溃，向西撤退。

刘桂五部亦因敌之迂回侧后，防线顿时震动，速即向西撤退。

10月下旬,挺进军各部退到了后套五原地区。

马占山将军未待部队充分休整,也未能建立根据地,采取纯军事的游动作战,于当年11月中旬,从五原向敌出击。其主力刘桂五部骑兵师,长途奔袭数百里之遥,攻克了东胜,歼敌三百余人。

马占山亦率部从五原转至准格尔旗大营盘一带活动。

1938年3月初。

• 日军冈本部和伪蒙军三个师,分三路围攻马占山驻地。马部突出包围圈,渡过黄河,向敌后出击。

此时,马占山声称拥有挺进军十万之众。3月6日,马占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的挺进军正向敌后大举反攻,打败沿途拦劫之日伪军,进展神速。

3月10日。挺进军威逼托克托县南部,伪蒙军游击司令奇风鸣部刘盛五、贾海岸两个团共六百余人宣布起义,投向马占山部,马将其改编为挺进军,共同向托克托之敌进攻,于19日打下县城。

接着,挺进军在马占山指挥下,向北横扫,袭击了平绥铁路线上之萨拉齐和察素齐等车站。在察素齐车站,俘虏大批伪蒙军;缴获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颇丰,装备了自己的队伍。马占山把大批伪军俘虏集中在站内,对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后,宣布优待俘虏,采取“留去自由”原则。结果,大多数俘虏不愿离去,表示愿意跟随马将军抗日救国。

马占山部冲过平绥铁路封锁线后,分别向归化、武川、百灵庙挺进。

挺进军来势勇猛,造的声势特大,日伪军惊恐万状,立即调集重兵进行围追堵截,决意将其歼灭。

刘桂五的骑兵师夜袭大青山北麓武川县之敌时，日军原口联队千余兵力，在三十辆装甲车支援下，赶来救援，伪蒙军骑兵第25团也及时赶到，从侧翼发起攻击。刘部陷入被动，与敌苦战。

其后，日伪军增援部队不断赶到，计有装甲车七十余辆，骑兵约一个师，以及大批步、炮兵部队，将刘桂五部队合围于武川附近。苦战五昼夜，刘部才突出敌围，向西撤退。

4月22日。

骑6师在固阳附近又遭日军板垣温合部队攻击。骑兵部队抵不住日军装甲部队的凶猛冲击，向山里撤退。日军六十多辆装甲车开着枪炮在后头猛追狠打，三架敌机在天上盘旋俯冲扫射投弹。刘部官兵死伤不断，情形异常险恶。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追击之敌，钻进山区隐蔽。日伪军很快又追了来，严密封锁了山区。

4月下旬，刘部骑兵师仍未突出日伪军封锁区。敌入的包围圈一天天缩小，大小战斗不断。骑兵师战斗减员越来越大，粮秣供给和弹药补充无法解决。

29日，骑6师主力终于被大批日伪军咬住，双方展开惨烈大血战。骑兵师遭敌装甲部队轮番攻击，死伤奇重，血流成河。上午，刘桂五将军在率领骑兵向敌冲杀时，一发炮弹在战马前爆炸，战马被炸死，刘将军腿被炸伤，血染军裤。

刘裹伤督战，至下午四时，遭敌密集炮火猛轰滥炸，刘再次被炮弹炸中，血染阴山，壮烈殉国。

固阳一战，挺进军主力骑6师，损失惨重。

5月初。马占山部从阴山地区南撤，回到陕、晋边区之偏关、府谷一带休整、驻防。

5月中旬，驻凉城的伪满军慕新亚部一千二百余人反正，归投挺进军旗下。马将其改编为新编骑兵第5师，慕任师长。

后来，又有伪满军井得泉率部来投，被马占山改编为新编骑兵第3师。

1939年初。

马占山挺进军一部，随傅作义军挺进狼山地区，参加了创建狼山根据地的战斗。

是年夏天，马占山令经过整休恢复了战斗力的骑6师，在新任师长王照堃率领下，配合何柱国骑2军一部，从偏关地区向阴山敌后出击。

日伪军立即调集机械化兵团进行围攻。在大青山铁圪蛋沟一带，骑6师遭敌包围猛攻，骑6师官兵反复冲杀，双方死伤奇重。突出重围后，骑6师与骑2军在阴山地区游击了一段时间，因无巩固的根据地支持，无法长期坚持，只得向南撤退。

挺进军后来数年的情况大自如此，以偏关地区为基地，不断派骑兵部队挺进阴山游击。

2、创建狼山根据地——

傅作义部在狼山地区的艰苦抗战

1938年冬。

蒋介石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向北方抗战部队高级将领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指出，国军自南岳军事会议之后，其战略重心将放在开辟敌后游击战方面。在敌我处于相持阶段之后，“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

同时指出，华北大部陷入敌手，游击战更显重要。所谓以

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是就全国军队而言,在华北的各部队,几乎都是处于敌后,因此,要以游击战方式打击敌人。

蒋介石赞扬了第 18 集团军和阎锡山,卫立煌等部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迭予倭寇沉重打击,有力支援正面战场之战斗。同时,对黄河北岸敌后个别将领害怕艰苦,企图退过黄河以南的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警告。

在对华北游击战的安排上,除强调必须坚持山西、河北境内之吕梁、中条、太行山外,又有许多重大安排(如成立冀察战区等)。其中对第八战区新的安排是,任命绥远省主席兼第 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令其在近期内率部挺进绥远敌后,开辟以狼山为根据地的敌后游击战。

武功军事会议后,傅作义回到吕梁山北麓,迅速着手挺进狼山敌后的各项准备。

1939 年 1 月。

傅作义将军乘黄河封冻之机,率领第 35 军、何柱国骑 2 军一部,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之新 5 旅、新 6 旅,伊盟蒙古军白海风新编第 3 师等各部数万兵力,从晋西北出发,突破日伪军数道封锁线,跨过冰封雪冻之黄河,进入狼山地区。与一直在这一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门炳岳骑兵第 6 军和蒙古族女英雄巴云英、奇俊峰等人的部队,以及绥远民众自卫军、绥远省国民兵团会合。

2 月,在后套五原城设立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绥远敌后抗战。

傅作义部进入狼山地区后,首先倾全力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置军队于民众之中,以图长期扎根。当年夏初,傅作义在狼山县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前后五期,历时三个多月,对各

级党政干部进行轮训。

随后，任命和派遣了专员、县长到各地区，开展工作，发动民众，恢复各级政权组织，建立游击武装。

日军对傅作义部进入狼山地区十分惊恐，很快纠集了各地兵力，于4月初，向狼山发动扫荡战。

何柱国将军指挥骑2军，门炳岳将军指挥骑6军，在安北、固阳、萨拉齐等地与日伪军拼死作战，掩护和巩固初创中的狼山根据地。何、门两支骑兵部队与敌连续作战，大小战斗共百余回，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进攻。

8月，日伪军又纠集起大批兵力，发动第二次扫荡战，傅作义部分头迎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粉碎敌人军事进犯的同时，傅作义将军任命的专员、县长亦在各地展开工作，恢复各级政府，发动民众，收编和组建游击队伍。形成了正规军与游击武装相配合，根据地与游击区相结合的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战形势，将日伪压迫于点、线之上。

12月中旬，傅作义之主力第35军突然集结于包头附近昆都伦河以东地区。包头是日军驻扎的中心地区，驻于包头城的日军骑兵集团司令官中岛吉藏中将被中国军吓破了胆，赶紧命令驻包头的骑、炮兵一个联队，从西门出城，企图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消灭第35军。

12月20日清早，敌骑、炮兵联队刚出城不久，包头城之敌即受到第35军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敌骑兵集团司令部成了中国军队攻击的主要目标。中岛中将在困境中一面命令部队拼死抵抗，一面电令驻于包头四周的部队火速救援。

驻安北的日军骑兵第14联队，在小林一男大佐率领下，

向包头方向回援，出城十余里，就钻进了中国军队早已设下的埋伏圈，第14联队死伤过半，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亦被当场击毙。

因敌援军从四面赶到，中国军队未能攻下包头，即撤出战斗。但这次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除击毙第14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外，还击毙了日军骑兵第13联队长小原一明大佐等军官，日军共死伤一千余人。炸毁敌坦克四辆，烧毁敌卡车六十余辆。

1940年初。

日军为了“膺惩傅作义”，集中了平绥、同蒲两线之敌，共三万余兵力，配以坦克、大炮和飞机，由黑田重德中将统一指挥，向狼山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重庆统帅部认真研究了敌情，认为日军兵力优势，且配备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同时，黄河封冻，利于敌之机械化部队行动。电令傅作义将军，为暂避敌之锋芒，可将部队南撤至石咀山一带。

傅作义回电，决心“将不离兵，兵不离土”，“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与敌周旋到底。”

他在五原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狼山地区同敌展开大规模游击战，“避不利，找胜利”，要在黄河两岸，狼山山间，待机歼敌，并划分了各部队的游击片区。

在此之前，傅作义各部队已对在狼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作了充分准备。后勤给养部门已把军用物资，粮秣等分散屯积于狼山深处各要点；地方政府还训练了组织民众疏散，空室清野，配合军队打击敌人等活动。

2月初,日伪军大举西进,三天之内先后侵占了五原、陕坝、临河、狼山等县,并在后套地区大举清剿扫荡。

傅作义部主力事先转进狼山山区,躲过了敌人的“三板斧”。

日军占领绥西地区清剿了一阵,未能找到傅部主力决战。因战线拉得太长,恐后方受到山西境内中国军队打击,只得将主力撤回平绥、同蒲路防守,留下日军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及其一部日军和伪蒙军驻守五原地区。

3月。黄河解冻,傅作义认为反攻时机到了,命令董其武将军第101师决开五原东北乌拉壕堤,引黄河水淹没南北两条通道,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行。

又令一百名便衣突击队潜入五原城内,破坏敌之通信设施,并争取了一小股伪军反正,从中掌握了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及口令等情况。

3月21日深夜零时。第35军及各路游击部队发起总攻:第31、第32两师及警备旅,向五原城之敌夹击进攻;第101师和新6旅等部在五原东北,依五加河岸占领阵地,阻击安北,包头方向增援之敌。

五原城之战持续至翌日下午3时许,守城日军联队长大桥大佐、桑原特务机关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被击毙。

水川伊夫在卫队拼死掩护下逃出五原城,躲在隐蔽处,天黑后,与卫队一起向东逃窜,因慌不择路,跑到了乌梁素海(湖边),被宽阔的湖水挡住去路。

天亮后,一个老乡发现了慌里慌张逃窜的这一股日军,立即向在附近打游击的张汉三连长报告。游击队迅速赶来将其包围,经一场激战,水川伊夫中将及其卫队被全部击毙。

五原一战,打掉了绥远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使傅作义部在河套地区牢牢地站住了脚。

3. 蒙古族抗战女英雄奇俊峰

在狼山地区的敌后抗战中,有一个声望显赫的风云人物,她叫奇俊峰。

奇俊峰是她的汉族名字,她是蒙古族,蒙古族名叫色福勒玛,小名平格。当时,她年仅二十三岁。

她在抗战期间的正式职务是:乌拉特前旗协理扎萨克(官名,即执政);绥境蒙政委员会委员兼绥境蒙政会建设委员会主任;乌拉特前旗少将保安司令和防守司令,1939年6月,由蒋介石、何应钦亲自下令将其晋升为中将司令。

当时的新闻界对她有多种称谓:抗战女司令;蒙古族人民的抗战女英雄;帼国女豪杰;乌盟西公旗女王等等。

她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她所领导的那支武装的军事战斗行动。

奇俊峰于1915年旧历4月21生于贺兰山西麓定远营(今巴彦浩特)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五岁时,因姑父病逝,姑父家的儿子又夭折,姑母诺月朋感到十分孤独,商得其父母同意,将奇俊峰带去作伴。她随姑母来到达拉特旗,从此跟随姑母一起生活。

姑母家亦是达拉特旗的旺户,有上等好地数十顷,牛羊上万只。姑母是一个性格倔强,精明狡诈,老谋深算,霸道厉害的女人,但却苦于没有文化。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奇俊峰身上,决心把她培养成有文化、有教养的上层人物。在她七岁时,姑母从五原城和王府里请来两个先生,分别教授她蒙汉文知

识。

奇俊峰出身豪门，天生丽质，且长于领会，在学习上很有进步，经常受到先生的夸赞。

她在其姑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先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出落成一个精明伶俐，相貌出众的美人儿。

在她十九岁那年，姑母作主，把她嫁给了乌拉特前旗四十多岁的扎萨克石拉布多尔吉（石王），当了石王的福晋（满族语夫人、贵妇、妻子的意思）。

两年后，石王死了，奇俊峰却身怀遗腹，于 37 年 3 月生下个胖男孩，正式确定该孩子为乌拉特前旗的扎萨克接班人。二十二岁的奇俊峰便顺理成章地执掌了本旗的军政大权，行使扎萨克职权。

此时，正当日军进攻浪潮狂烈，中国军队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傅作义将军率军入晋抗战，绥远失去支柱，处于一片混乱。由于受日军威胁和压迫，以及受降日分子德王的拉拢和影响，一些旗王投了日伪。在此严重关头，乌拉特前旗跟谁走，倒向何方，是奇俊峰面临的重大问题。

她与姑母诺月朋策划，最后一致看法认为，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无论他们武力多么强大，也绝不倒向它们，以免遭国人千年万年咒骂。现在正值国难当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自当与抗战政府一致行动。

于是，在强敌压迫中，奇俊峰召集本旗军政官员开会，响亮地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第一，坚决接受绥远省政府的领导；第二，旗内人民要团结一致，提防亲日派的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第三，减轻百姓负担，不许向农、牧民乱行摊派；第四，

旗内军队要严守纪律，听从命令，不准轻举妄动，以免为敌利用。

奇俊峰的这些施政决策，受到全旗人民的拥护和各方面的赞许。

在包头中滩一带打游击的共产党游击队负责人于占彪，前往会见奇俊峰，向她宣传八路军的抗战政策，希望与其团结抗日，并送给手枪一支。双方会谈甚融洽。

奇俊峰摆全羊席，用蒙古族最高礼节相招待，同时回赠全鞍战马一匹。

1937年10月中旬。

归绥、包头相继陷落，日伪军占领了安北的大余太一线。德王派伪蒙军第9师的一个骑兵团进驻乌拉山以南的升恒号，就近监视奇俊峰的动向。

伪骑兵团的白团长耳闻乌拉特前旗女王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年轻美女，早已垂涎三尺，耐不住三天两头就往王府跑，见到女王总是没话找话，没事找事，说三道四，纠缠不休，一副下流胚子嘴脸。

老谋深算的诺月朋一眼就看穿那家伙的用意，她担心奇俊峰年轻，没心计，被那家伙迷住心眼给拉下水，倒向日伪那边。每次白团长来，姑母都黑着脸站在一旁作陪，弄得那个蒙奸团长十分尴尬。

奇俊峰与姑母秘密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摆脱日伪军控制，投向抗日行列。她派心腹人员前往五原县，与在这一带抗战的骑兵师长门炳岳联系，表示愿率部赴五原抗战。

门炳岳对女王的决定表示热烈欢迎，与来人策划了她出走的路线、时间，以及门部派兵接应的具体办法。

1938年旧历2月初1。夜。

奇俊峰和姑母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在十多名卫士簇拥下，骑马离开王府，顺着顿达高勒沟急行了一整夜，转入了乌拉山中，翌日早上到达吉尔嘎拉土庙，马不停蹄地继续西行，在途中与门炳岳派来接应的一个骑兵小队会合，安全抵达五原城。

奇俊峰从日伪军占领地区的王府出走，投入抗日阵线的勇敢行动，对鼓舞军民的抗战信心，巩固抗战阵营，无疑具有巨大意义。因此，当门炳岳师长将这情况电告重庆统帅部后，蒋介石立即亲自复电，对奇俊峰慰勉有加。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军政部也分别致电慰问，并发给巨额奖金。

重庆《中央日报》以醒目标题报道了这位从日伪占领区投向抗日行列的蒙旗女王的动人事迹。

不久，重庆军事委员会直接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和防守司令，均授以少将军衔。并由军政部直接按月拨发军费七千元。

5月，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在五原城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奇俊峰着一套崭新的军服，佩带少将军衔，全副武装，英姿飒爽地登上主席台，宣誓就职，表示决心率领全旗蒙民“赤心爱国，坚决抗日到底！”

门炳岳代表军队出席大会，对防守司令部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今后将加强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合作，加强蒙汉民族的团结，狠狠打击侵略军和伪蒙奸势力。

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参谋主任、副官、军需主任，文书等军官，都由门炳岳推荐，并在门师长具体帮助下，招收了二百名蒙旗青年组成乌拉特前旗防守部队，编为二个团。

经过短期军训后,这两个团即开往西山咀以南,乌加河以北一带,参加抗战。

7月10日,日军纠集千余兵力,向后套进攻。奇俊峰那两百人的队伍,与门炳岳的骑兵部队并肩战斗。由于奇俊峰的武装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地物,与敌展开巧妙的游击战。门师骑兵在奇部官兵的导引下,给敌以狠狠打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较大战果。

奇部与门师首战告捷,门炳岳理所当然地把此次战功多分一份给奇俊峰的部队,这就更加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敌士气,多方贺电纷至沓来。

门师因此扩编为骑6军,门本人也荣升骑兵军长。

39年春,傅作义率部挺进狼山地区后,对奇俊峰的抗战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并电告重庆统帅部,今后,奇俊峰部的军需费用均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负责供应,并向奇俊峰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她抗战,有什么要求可直接向他提出。

是年秋末,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电告奇俊峰,蒋介石令她到重庆述职,望其尽快起程赴陪都。

奇俊峰立即组织了述职团,成员有奇俊峰本人,诺月朋,奇的儿子阿拉坦敖其尔,防守司令部上校参谋长黄楚三,中校参谋主任李隽卿,国民党旗党部书记长刘凤池以及卫士等二十余人。

述职团渡过黄河,经杭锦旗南行,途经榆林、延安、抵达西安,一路上都受到军政官员和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在西安,胡宗南将军亲自接待,特地举行各界人士大会,隆重欢迎奇俊峰。胡某在会上介绍了这位抗战女英雄的事迹,称赞她是中国妇女的光荣。

每到一处，奇俊峰都发表演讲，以大量事实控诉日寇对沦陷区蒙古族人民的残酷杀戮和野蛮的经济掠夺，呼吁全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争取最后胜利。

奇俊峰到达重庆后，由门炳岳负责接待（门此时已升任统帅部骑兵总监）。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接见了奇俊峰。军政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长孔祥熙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等高级官员作陪。那天，奇俊峰着全套军服，当蒋、宋夫妇走进客厅时，奇起立，向蒋行军礼。随后敬献锦旗，献给蒋介石的锦旗上题词：“岛夷胆寒”；献给宋美龄的锦旗上写着：“妇女领袖”。

奇俊峰汇报了自己投奔抗日阵营的经过及率领本旗人民奋起抗战的情况，并针对蒙疆敌我形势，向蒋介石提出了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蒙汉民族团结，增强抗战力量的领导工作和其他各项要求和建议。

蒋介石夫妇对奇俊峰的爱国行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说她是一位有胆识的蒙古族女英雄。

蒋介石与何应钦两颗脑袋挨在一起，叽叽咕咕了一阵，当即宣布：奇俊峰由乌拉特前旗少将防守司令晋升为中将司令，并责成军政部直接拨给枪支弹药和数百套军装，以及其他军事物资，以装备和加强奇俊峰的部队。

这次接见持续了三个多钟头，之后，蒋介石夫妇在官邸办了一桌饭菜，与奇俊峰一行共进晚餐。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军政部、蒙藏委员会、内蒙古各盟旗驻渝办事处等单位，均派代表前往述职团驻地看望奇俊峰，还组织了盛大招待会，欢迎她们来到战时首都。孔祥熙，何应钦等人亲自出席。

重庆新闻界更是掀起了一股奇俊峰热潮,《中央日报》等各大报刊,尊称奇俊峰为抗战女司令、女英雄。

重庆妇女界举行专场报告会,宋美龄亲自陪同奇俊峰前去演讲。陪都各界也纷纷举行集会,邀请奇俊峰去演讲。

奇俊峰从重庆回到狼山地区后,在傅作义将军的支持和帮助下,将部队由两个团扩编为三个团,兵员由二百多人增加到六百多人。所属三个团的兵力,以小分队形式,在乌拉山地区配合傅作义部开展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奇俊峰的蒙古族武装是当地人,熟悉地形,且十分骁勇,战功卓著,屡受傅作义副司令长官部嘉奖。

奇俊峰还派出随从副官温格尔和楚伦巴特等人潜返乌拉特前旗敌占区,动员和组织民众起来抗战。并大力开展瓦解蒙伪军的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反蒙伪军的有:原乌拉特前旗西协理三令豹的儿子郝游龙,郝某开初带了二十多人的武装来降,奇俊峰将其任命为所部第一团中队长,又令他回去策反。不久,郝又带了一百多人的武装投入抗日阵营,奇将郝的投诚部队编为防守司令部直属团,郝游龙任中校团长。接着,伪蒙军中队长贺太保带领八十五人投奇俊峰,被奇任命为独立连长。后来,这个独立连协同傅作义的大部队在狼山地区与日伪作战,立下大功,受傅作义通报嘉奖。

奇俊峰的抗战,主要贡献不是军事上的战果,而在于她的特殊身份,对中国各民族团结御辱,巩固抗日阵线所起的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她的这一历史功绩,将与巍巍狼山,与巴彦卓尔盟辽阔的草原同在。

第七章 泛区豪杰

1. 黄泛区象巫师在大地上划下的一条生死线

1938年4月。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沉重打击后，倾注了在华所有兵力（华北、华中两个方面军），从南北两路进攻，企图围歼徐州地区的中国军精锐主力五十余个师的兵力，以达速战速决，一举导向灭亡中国的目的。5月下旬，蒋介石、李宗仁看破日军战略企图，果断地下令：不与日军决战，放弃徐州。中国军队数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敌军重围，顺利转移。

5月下旬。毛泽东穿着一件绉巴巴的旧灰布军装，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称赞徐州大突围是一次“根本避免”了“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并对这种决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许，把它归结为抗日战争决战问题的三类形中的一类。他操着一口湖南腔说：“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4页)。

徐州决战的战略企图落空后,恼羞成怒的日军中央统帅部立即下达了“从北方席卷武汉”的命令。华北日军以六个师团的兵力,在大批飞机和机械化部队掩护下,从徐州地区气势汹汹地沿陇海铁路向西杀来。

第一战区在陇海路沿线的兰封、开封、中牟等地组成若干道防线,终因敌强我弱,抵敌不住,节节西退。

6月9日。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从北方席卷武汉,在郑州花园口将黄河南大堤插开个三百七十余米宽的大口子。滚滚黄河水,如同自天而降,倒灌原野。豫东皖北一马平川,黄河水如同脱缰野马,任其肆虐逞狂,四十余县境地,顿成泽国,远远望去,浊浪滔天,黄水遍地,一片辽阔的汪洋。

日军约四个师团的兵力,被泡在黄河水中,损失惨重。其第14师团和第16师团各大部被阻隔于黄泛区西面,陷入了绝境,遂大肆破坏郑州东边的陇海铁路和郑州以南的京汉铁路线。华北日军先后派出两个工兵联队救援泛区西边的两个师团。

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将泛区西边的日军歼灭。

其后,中国军民费了好大工夫,才将黄河水导入贾鲁河,并沿贾鲁河堆沙垒堤。中国军队在西边布防,与日军对峙,直到1944年豫中会战。

黄泛区从郑州花园口经中牟、尉氏、西华、周口、界首、阜阳迤东南,注入淮河,全长约千华里,最宽处约百余华里。浅处可徒涉,深处需舟渡,泥泞沼泽,芦苇遍地,杂草丛生,成为一特殊的“烂地”。它仿佛是神话中巫师在大地上划下的一道魔

力无边的生死线。

黄河决口成功，挫败了华北日军的进攻锋芒，蒋介石确实是大大松了口气。当天，他在武汉接见外国记者，在谈到目前我国抗战形势时，胸有成竹地说：“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一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它地区以及敌后方，尽量消耗敌人。长期抗战，此为要著。”

2. 黄水遍地，豪杰并起

国民党的泛区游击区，主要指黄泛区东边（亦称水东地区）的日军占领区，它包括豫东、皖北、苏北、鲁西等四省边角地带。

这一地区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可称为名符其实的人杰地灵，英雄豪杰辈出之地。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汉高祖刘邦；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萧何、曹参；魏武帝曹操及魏大将夏侯惇、夏侯渊；南朝宋武帝刘裕；南唐先主李昪，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人，都出生于此地。从上古时期到现代，在这个“边角”地带发生的各种起义，造反和决定一国兴亡的著名战争数不尽数。

这里的人民具有不畏强暴的光荣传统。现在，转瞬间，一道新黄河将他们屏障于凶恶的侵略军铁蹄之下。

黄河决口前，第一、第五两战区各路大军都先后分别南撤、西退。新黄河泛滥后，泛东地区仅有少数未及撤退的零星部队。

6月22日。

黄河决口后仅十来天，泛东地区人民强大的反抗风暴就

已酝酿成熟了。在敌重兵驻扎的开封一带，农民们四处散发传单，发出组织“联庄自卫团”，奋起抗击日寇的号召，他们响亮地提出：“凡我乡亲，各备武装，保卫桑梓，阻止敌军前进，以待国军布防。”

于是，泛东广大农村纷纷组织起联庄会、联庄队、自卫队、看家队等等，几乎各村各镇都有抗敌武装。同时，传统的秘密集社组织红枪会、会道门等也争相亮出号旗，邀集会众，聚义抗日。

留在敌后的县、区、乡长们和回乡的军官（失意军人等），有的以政府合法身份，有的以自己的威望，或树起抗日大旗拉队伍，或将联庄队等组织联合扩大，形成了一支支上千上万人枪的游击部队。一时间，黄泛区群雄并起，敌后抗战的声势极为壮阔。

在苏北。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司令李明扬，早在37年底至38年初期间，即派出许多专门人员，到肖县、永县等地区发动民众，组织地方抗日武装。肖县是李明扬的家乡，他对这一地区的敌后游击尤为重视。后成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李明扬任总指挥，配置一定的游击力量于此地。在这里还有陈太运苏北挺进军的若干个纵队，以及其他游击队。

在鲁西（微山湖以西）。这里几乎成了山东敌后抗战部队的大本营，正规军与众多的游击武装相配合，其抗战的声威一直很壮。

在皖北。38年时，有安徽游击总司令张义纯将军的淮北民众抗日自卫军五六万人的武装；39年初至40年初，是阜阳专员兼游击司令郭造勋所领导的游击武装在此坚持敌后游击战；40年以后，则由原48军参谋长李盛宗将军任安徽第三区

行政专员兼皖北地区的游击司令，所辖游击部队为第五战区第 11、第 14 两个游击纵队和第 7 独立支队，以及其他游击队若干。

在豫东。38 年初，主要为冯玉祥将军西北军的三个部下宋克宾、魏凤楼和张岚峰等人拉起的数万人的民众武装（张岚峰不久即投降日军，成为该地区最大一股伪军）。其后，第一战区调整部署，设立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由第 3 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将军任总指挥。骑兵第 2 军军长何柱国将军从晋西北调赴泛区后，兼任边区游击副总指挥。在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之下，又设豫东游击总司令部，由杜淑任总司令。以正规军在新黄河西岸设防，作坚强后盾，以部份正规军和众多的游击队深入泛东敌后作战。

在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和豫东游击总司令部之下，先后组成游击第 1、2、4、7、8、12、16、17、19、24、27 等数十个纵队，及游击第 2、4、6、9、10、11、14、28、30 等十余个支队。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辖的还有豫鲁边区游击指挥部，指挥官为刘耀庭，该部拥有山东民军第 1 支队和自卫军第 2、第 3、第 4 等三路军。

新四军彭雪枫支队亦在此地开展游击战。

这一地区对日军来说，真是一块烂透了的地方，在这以后的六年中，只要他们（日伪军）向西走一步，就会被深深地陷进这烂地里，而不能自拔。

在 38 年夏秋、武汉大会战期间，泛区各游击部队纷纷出击，扒铁路、炸桥梁，攻据点，打城镇，打得日军昏头转向，整个泛区都被游击部队造翻了天，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兵力。

7 月 13 日。鲁西敌后游击部队向日军发动强大攻势，一

举攻克巨野、菏泽、定陶三座县城，歼灭大批日军。残敌突围后向济宁方向溃逃。7月23日，游击部队经旬日激战，又打下了曹县等城镇。

7月13日。皖北的敌后部队与自卫军配合，向日军发动排山倒海般的攻势，歼灭了涡阳县城守敌。16日，又攻下了蒙城。各路游击军乘胜追击，将四千余兵力的日军围困于舒城，经连日猛攻，歼敌大部。残敌杀出重围逃窜。

7月14日。挺进豫东的游击军和当地游击队向日军发起大规模袭击战。先后夺取了太康、鹿邑、杞县等城镇，歼灭日伪军一部。

8月初。豫东游击军和各地游击队集中数千人的兵力，突然将柘城之敌紧紧包围，经数日激战，歼敌大部，于8月7日攻克县城。

9月末。游击军和各地民众武装集中优势力量，向陇海铁路线之敌发动袭击，拔出敌人大批据点，于10月1日攻占民权县城，截断了敌之铁路运输线。旋即又将一股日军包围于睢县附近，经反复冲杀，歼敌五百余人，俘虏二十四人，缴获山炮等武器一批。

1939年，泛区的游击军更加成熟，队伍更趋稳定，游击战亦更加灵活机动。

年初，奉令挺进豫东泛区的庞炳勋第40军，将敌后游击战推向一个高潮。第3集团军的第81师，在贺粹之将军率领下，深入泛东敌后，紧紧依靠人民的支援，与当地游击武装密切合作，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每战皆捷，战果辉煌。

泛东地区的日伪军被游击军搅得日夜坐卧不安，为了支撑这一占领区的局势，于2月7日，从徐州出动了万余日军，

分三路东犯，对泛区进行春季大扫荡。游击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待敌进至太康地区时，突将其包围，发起勇猛攻击，血战三天三夜，歼敌千余兵力，俘敌一批，缴获枪炮弹药无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战。

8月初。日军调集兵力数千人，再次由徐州地区分数路向铜山、肖县、砀山等地区的游击武装，进行大扫荡。该地区游击队集中兵力，与敌激战四天，挫败了敌人的进攻锋芒，扫荡之敌被迫退回原驻地。

12月初。泛东地区游击军响应统帅部的冬季大反攻号令，向敌发起全面攻袭。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孙桐萱将军以游击各纵队、支队向陇海铁路线发起大规模破袭战，彻底截断了罗王至兰封、兰封至内黄间的铁路运输；另以游击队向通许、淮阳、鹿邑之敌发动攻击。第3集团军主力亦挺进泛东，在孙桐萱亲自指挥下，向开封之敌发起强大攻势。具有游击战丰富经验的第81师官兵，在贺粹之指挥下，将兰封之敌，打得狼狈逃窜。在整个冬季攻势期间，泛东地区的铁路，公路交通大部被游击队破坏，敌人陷于全面瘫痪和被动挨打状态。

3. 宋克宾在泛东拉起的抗日队伍和魏凤楼东征

宋克宾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1937年冬受冯派遣，回到豫东地区家乡组织抗日队伍。由于冯玉祥曾当过豫省主席，在这一地区声望较高，又加上宋为本地人，在乡亲中亦有很大影响。所以，当他树起抗日大旗，一经号召，青壮年加入者蜂涌而至。

宋部势力迅速扩张发展，由商丘漫延至虞城、夏邑地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见宋在动员组织民众方面有两下

子,于38年3月任命其为该战区豫东民运指导员。宋克宾有了这块合法的牌子,其活动更加积极,拉的队伍更加人多势壮。这时,冯玉祥又指派在身边工作的伊进前往豫东,帮助宋某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38年6月,黄河决堤后,程潜委任宋克宾为河南第二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所辖区域为泛东夏邑、商丘、永城等十二个县。宋以地方行政官员和保安司令名义,发出守土抗战号召,在敌后大量吞并和扩编地方武装,到10月末武汉会战结束时,他已拥有一万多人的游击武装,编为四个总队,每个总队辖两个团(魏凤楼为第一总队司令)。

宋部在泛东以鹿邑、永城等地为游击根据地,控制有五六个县的政权,其游击战的声势颇为响亮。

1939年初,由于第一战区调整泛区游击武装的兵力和其他种种原因,宋克宾被免去专员和保安司令职务。宋率部东进至商丘一带,决心继续北上,去河北找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该部第3总队一个叫王化荣的团长不愿离开豫东,率部哗变,扣押了总队司令,迫使第3总队留在了泛区永城一带,坚持游击战。4月,日军在泛区大肆扫荡。王化荣带全部兵力与优势之敌硬顶硬拼,结果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灭。后来,王率残部在泛区与敌周旋,部队很快又有了发展,被第一战区改编为第4游击支队。

宋克宾率部北上受阻,后来变成了张岚峰“和平救国军第1军”之第3路军(伪军),宋任第3路军司令。1940年6月,宋等人率部反正,投入第一战区,其后就消声匿迹了。

魏凤楼,河南省西华县人。1913年投奔冯玉祥部当兵,1937年前,在冯部历任战士、班长、连、营、团、师、军长,中将

军衔。

1937年12月，冯玉祥的第六战区在华北战败，四十一岁的魏凤楼离开冯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他回乡时带有一批轻武器。

魏凤楼首先联络家乡有名望的绅士和保甲长，在他们的支持协助下，组织和扩大看家队，将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统计造册，编成看家队的队员。又在看家队员中挑选一批精干人员，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

就象做生意的人需要立一个正而八经的公司和一块工商执照，才便于经营一样，魏凤楼为了便于号召广大民众，扩大抗日武装，急需一个合法的“名义”。他为此几次跑到河南省政府找当时的省主席商震，希望给个“名义”（县长之类的职务，实在不行，给个省府参议也将就了），但他的要求遭到商主席的拒绝。气得魏中将再也不跑省府那条路了。

38年3月，魏凤楼终于得到了一个合法的“名义”——出任西华县第一区区长。魏中将并不计较这个职务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尴尬，满怀信心地投入全部热情和精力去做抗日的工作。在一个月之内，他将看家队发展到几十个村子，实行村与村之间的横向联合，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民众抗日队伍，其中拥有枪支的人员就有四百多人，编有百余人的手枪队一个，手枪队队员每人发长短枪各一支，大片刀一把；特务大队一个，约三百余人，该大队除每人发步枪一支外，还配备有迫击炮两门，轻机枪十几挺。

这支武装着统一的紫花布服装，如同迷彩服似的别具风格。

黄河决堤后，魏的家乡西华和扶沟、周口、项城、沈丘等县

的大部分土地都泡在了水中。

6月中旬,魏凤楼出任扶沟县县长。他邀约一批在乡的原西北军的落伍军人为骨干,组成战时县政府和各区、乡政府。他利用各级行政人员和专门组成的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发动青壮年参军参战。同时,广泛收集民间枪支,组织人员在泛区黄水中到处打捞中日两军大战后散落在水中的武器,结果收获不小,摸起来数百条长短枪和大批弹药,还捞起来几门钢炮,将这些武器摆到坝上暴晒几天,擦上枪油,仍是上好的杀敌武器。

有了武器,队伍也就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人,编为三个大队,一个手枪连。

两个月后,魏凤楼应宋克宾之邀,决心率部离开扶沟,渡过黄泛区,到敌后去打游击。38年9月1日清晨,他带着那一千二百余人的队伍,在扶沟县城东门外护城河岸边上了船,沿着贾鲁河南下。

船儿顺流而下,一路上,东南方向黄水滔滔,一片广阔的汪洋,无数村庄泡在水中,只露出一部分屋脊和树梢。

当天下午,他们到达西华县城,在此住宿一夜,翌日早饭后,部队沿着西华至周口的河堤开进。经一个白天的急行军,到达周口镇沙河南岸。第三天,部队沿沙河南岸继续行进。第四天,冒着滂沱大雨向南挺进,下午抵达纸店河南岸,部队分散住扎于几个村庄的民房中。其后,他们在这里派人征集渡船,准备干粮,做东渡黄泛区的准备。

东渡黄泛区这天,天气阴晦,雨丝绵绵,可能是上游下了暴雨,黄水暴涨,百余里宽的泛区,恶浪滔天,强风阵阵。

船队顶风击浪艰难行进,向东渡行了数十里水路,来到白

马驿附近，这里水浅，船只都陷在无尽的泥沼中。部队只得下船去，踩着烂泥进入白马驿。

白马驿处于泛区中心，四周都是泛滥的黄水。部队在这里休整了几天，于9月中旬继续东渡，终于到达泛东鹿邑县境。

鹿邑县也被水淹达五百余平方公里，是灾情较重的地区。日军到此溜了一圈，见遍地泥水，无法立脚，旋即就撤走了。

魏凤楼率部到达泛东后，被宋克宾委任为鹿邑县长兼该县抗日总司令。他立即组织了若干个工作团分赴水陆交错的广大农村，宣传和组织民众，发展游击武装，清除汉奸势力，很快就把这一地区的敌后抗战工作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红枪会的对抗。这一地区农村中红枪会势力特别强大，38年5月，第五战区部队在徐州突围时，有一路国军突破敌涡河封锁线，向西南撤退时，大批日军跟踪追击而来，鹿邑县的红枪会在贾滩镇一带拦腰杀出，给猛进之敌突然袭击，日军措手不及，死伤无数。红枪会打了个漂亮仗，缴获不少日军武器和东洋战马，把自己武装起来。同时，也因这一次漂亮的胜仗，使他们目中无人起来，企图独霸这一地区，不准日伪军染指，也不准其他抗日武装进驻。

魏凤楼的队伍进入鹿邑后，不断受到红枪会武装的袭击。

魏凤楼以县长名义发出《告红枪会同胞书》宣传大敌当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希望红枪会立即停止与抗日武装的“摩擦”。其后，魏又将各地红枪会首领请到县府，尊以上宾，谦恭备至地号召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都要好好学习红枪会在贾滩镇英勇杀敌的精神，经过一番安抚，红枪会首领们受了感动，表示愿意接受县府领导，并以抗日农民自卫团的旗号开展游击战。

38年冬,日伪军从柘城向鹿邑进攻,县城一度为敌人占领。魏凤楼令各路人马迅速向县城靠拢,与敌打了一仗,日伪军见抗日武装人多势众,料知寡不敌众,逃出县城,赶紧向柘城方向退缩而去。

1939年春季,魏凤楼的队伍已发展到五千余人。这时,伊进奉命来到魏部,加强了这支抗日队伍的领导和指挥力量。不久,魏被免去鹿邑县长职务,部队被改编为第一战区游击第1纵队,魏任纵队司令,伊进任副司令。

第1纵队直属孙桐萱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仍留泛区配合敌后游击军开展游击战。其后,魏、伊率部到柘城、睢县、杞县等地开辟游击区,与小股日伪军交战多次。比较大的战斗有睢县马路口伏击战,牛王谷堆攻尖战,高寨、千叶寨等战斗,歼敌颇多。该部曾多次破袭开封一带的陇海铁路,围攻日伪军据点。

39年秋天,魏凤楼指挥部队围攻柘县西北约五十华里处的土里岗日军据点时,敌死守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魏亲临前沿指挥,他身边的警卫皆被敌打死,他的左大腿也中了两枪,腿骨断碎。接着,腹部也挨了一枪,伤势危重。部下们将他从战场上拖了下来。

不久,魏被送过黄泛区西边就医,第1纵队也由敌后调到泛西驻防。

冯玉祥将军曾对魏凤楼寄予厚望,特地叫人转告,叫他好好打日本鬼子,今后为他铸铜像以表彰功勋。

4. 张岚峰成为最大的伪军头目

张岚峰,河南省柘城县人,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的外甥

女婿。1922年5月投军入冯部西北军，历任骑兵排长、连长；1925年初，被西北军选送去日本学习军事，1928年5月，因参加留学生组织的抗议日军侵华，被校方开除。回国后，任炮兵团长，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军官教育团教育长、旅长、师长。1933年春，三十一岁的张岚峰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19军军长。

1937年冬，张回到家乡柘城，在陇海铁路沿线设站招收落伍军官，组织抗日游击队。翌年初，他被地方绅士推举为柘城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民众抗日自卫军副司令。

日军占领徐州后，豫东形势紧张。6月初，黄河决口，豫东形势一片混乱，张以县警备队的两个中队为骨干，在柘城县西白庄扯旗抗日，收容游兵散勇和地方零散武装，几天之中，便拉起了一千多人的队伍。

驻扎在柘城县城的日军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写信给张劝降，张在柘城地主士绅头面人物的一致同意并共同签名后，前往日军司令部会谈，达成“和平救国”方案。之后，他向各地农民联庄自卫队发出通知，说只要我们不打日军，日军也不会向我们进攻。这样，就可实现局部“和平”。

在张的诱惑下，一些土匪和游杂武装会聚旗下，队伍得到迅速壮大。

1939年夏，张岚峰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豫东招抚使名义，从日军那里弄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活动经费，在商丘设立豫东招抚使公署，先后收编、改组豫东皖北地区以“抗日游击队”名义活动的土匪和各色武装若干。一些敌后游击武装，在遭到日军疯狂扫荡、清剿，加上供给艰难，无法立足时，也借用张岚峰那块“和平”招牌，暂避风险，一旦羽翼丰厚，又“反正”归营，

扯旗抗战，如李宣德、魏凤楼等。

张岚峰的伪和平救国军，在39年时编有四路军另两个支队。第一路军由曹大中任司令，辖有四个团的兵力，由活动于商丘、亳县一带的打着抗日游击队旗号的土匪武装崔华山、袁天柱、郭××等部改编而成。第二路军由李中毅任司令，辖三个团。由活动于鹿邑、柘城、夏邑等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及夏邑县的地方，保安团刘文跃部改编而成。第三路军由原河南省第二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宋克宾的第二保安总队改编，宋克宾任司令。第四路军由第一战区豫东游击部队李宣德部改编，李任司令。第一支队以杨树森为司令，辖两个团另一个特务营，由柘城县各乡士绅私人武装改编。第二支队由宋克宾部之第三保安总队改编，孙敬轩任司令，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另外，张部还编有一个独立团，由韩循先任团长，由柘城韩楼地区的地主武装改编。

此时，张岚峰的伪和平救国军第1军有二万三千多兵力，日军为其装备了数十辆军用大卡车和大批重武器。兵种配备有步、骑、炮、工兵等，是一支装备精良，兵种齐全的庞大武装。日军不惜花血本，精心安排和装备这支精锐部队，意在使其成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样板。

但是，日军的打算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点儿。

1939年8月15日。第四路军司令李宣德率领所部四千余人，拿着日军刚刚配发的钢枪大炮，突然宣布“反正”，掉过枪口打日本鬼子。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喜不自禁，立即委任李为游击司令。第一战区长官部将李部编入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编为游击第4纵队，李为纵队司令。

张岚峰在泛东拉起的那支武装，使重庆方面十分眼馋。蒋

介石密派第3集团军旅长王凌霄携带了一张“委任张岚峰为新编第7军军长”的委任状和五十五万元开拔费，潜入商丘，对张进行策反。同时，冯玉祥也派李连山前往泛东，劝张反正。张回答来者，说他现在力量还很单薄，未答应立即反正的要求。

驻扎在泛区西岸周家口、界首一带的骑2军军长何柱国将军（兼豫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却在暗中扎扎实实地做着张岚峰的部将们的工作。经一段时间的勾达联络，策反工作有了很大突破。

1940年6月29日。张岚峰到开封参加日军召开的军事会议，所部第一路军司令曹大中，第二路军司令李中毅，第三路军司令宋克宾，第二支队司令孙敬轩等人，带着一万七千余兵力和上好的日造轻重武器，浩浩荡荡地开过黄泛区，与何柱国的部队会合，加入到抗日行列。

张岚峰那二万三千余人的装备精良的武装，在半年时间里，有二万一千多人投入了抗日行列，他的“和平救国军第1军”变成了仅有两千来人的空架子。

张岚峰并不在意，竟然在两个月内，又拉起一万多人的队伍。汪精卫仍命其为“和平救国军第1军”，辖四个师。后来，张部伪军不断扩编膨胀，1943年秋，其部被汪精卫升编为第2集团军，不久，又将其扩编为第四方面军，张岚峰升为中将司令。

长期来，张岚峰与重庆方面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42年秋，他多次协助重庆方面的“经济游击队”到敌占区购运布匹等物资，并与重庆的军统特务王兆槐，韩瑰生等人暗中来往。

1944年9月，正当日军为打通大陆走廊，在中国战区大

肆疯狂进攻之时，张岚峰却看穿了日军外强中干的本质，接受了蒋介石新编第3路军总司令的委任。45年8月，抗战胜利，张岚峰率其大部兵力投入国民党军。其部第56师师长魏凤楼，第55师副师长王继贤，第18师师长杜新民等，先后率部加入八路军。

5. 国共合作，勇刺敌囚

军统河南站的地下人员，也在黄泛区搞开了地下游击活动，他们潜伏“地下”，惩罚罪大恶极的日伪头目，搞得日伪军坐卧不安。

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是日军重点扶持的一个大汉奸。他死心踏地紧随日军，对抗日志士大开杀戒，犯下累累血债。河南军统站行动队的组长牛子龙，派了几个地下人员专门搞他的“行动”，不久，干净利落地将刘兴周暗杀了。

泛东地区的日伪军和汉奸势力感到惊恐万状。驻于开封城陕甘会馆的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更是又震惊又气恼。他主持制定了一个消灭河南军统站的报复计划，命令汉奸特务组长权沈斋派人打入军统内部，搞清军统地下人员的组织情况，再行一网打尽。

权沈斋四处物色打进军统的人选。

牛子龙通过地下人员的侦察，很快得到了这一重要情报。他将这一情报报告了河南军统站站长，站长指示牛某，将计就计，派人诈降，打进日特核心，搞掉对军统人员威胁最大的华北日军特务头子吉川少将。

牛子龙得到指示后，也在四处物色打进敌特内部的人员。偶见一道郑县政府悬赏捉拿要犯吴凤翔的通缉令。通缉令说

吴某本为该县在押人犯，前不久在监狱组织暴动，越狱潜逃，特予通缉拿办。

牛某对吴凤翔的情况十分了解。原来牛子龙在抗战前，曾在郑县师范学校任教，吴凤翔是该校学生，两人有较深的师生之谊。后来，吴参加了共产党，因输送青年去延安，被郑县的顽固派抓捕关押，吴不服，组织人犯暴动，凭着他一身高强的武艺，越狱潜逃。

牛子龙看着那道通缉令，不觉眼前豁然开朗。心想，凭这一道通缉令，吴凤翔就成了最理想不过的诈降人物。他立即派人寻找，得知吴凤翔越狱后，逃到郑县与襄城之间的小磨山中，现已拉起了一支队伍。

牛子龙派心腹特工，带上他的亲笔信，前往小磨山中去见吴凤翔。经过来人一番赌咒发誓的表白和劝说，吴决心为了民族的利益，放弃个人和党派之间的恩怨，跟随来人秘密前往郑州城。

吴凤翔与牛子龙相见，说了一阵师生旧谊的亲热话。牛说我们决定派人打进日军特务机关，刺杀日军特务头子吉川贞佐将军。你的条件最为合适，因为你是国民党郑县政府通缉的要犯，前去诈降容易骗住敌人。

吴凤翔表示，只要牛答应了他的四个条件，他就同意干这一桩“买卖”。他的四个条件是：第一，事成之后，郑县政府解除对他的通缉令；第二，释放他的老婆和哥哥（郑县政府发出通缉后，没抓住吴，就把吴的妻子和哥哥扣押起来）；第三，发给行动奖金二十万元；第四，此次任务异常危险，若吴在行动中不幸伤亡，请对其亲属以应有的抚恤。

牛子龙当即答应了全部条件。

1940年2月19日。

吴凤翔潜入开封城，住在牛子龙的一个亲戚家里，根据牛子龙的计划，首先对吉川身边的大红人、汉奸特务组长沈权斋施以重金贿赂。在权某受贿上钩后，吴即提出自己因被通缉、走投无路，要求“归顺皇军”。权某对此表现出毫无兴趣。

吴与牛子龙分析了这一情况后，决定进一步投放“诱饵”，仍争取从权某身上打开缺口。吴再次去见权沈斋，说他在小磨山中拉有一支队伍，愿将那支队伍拉过来，并当场递交那支队伍的花名册。

权沈斋仍然表情冷淡，不肯就范。原来，吴凤翔此来“规顺”，虽然他确曾是国民党郑县政府通缉的“要犯”，但是，他与军统的牛子龙却有着很深的关系，而牛又是日伪迫不及待要除掉的对象，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敌方的种种疑虑。当权某把吴凤翔前来“归顺”，并表示要拉一支队伍过来的情况报告吉川后，这个老奸巨滑的日军特务头子虽然有所动心，却并未放松警觉，指示权某，可与之联系，争取将此人连同小磨山中的队伍弄过来，但一定要慎重行事，对吴更要严加考查。

这天，权某召见吴凤翔，两人正谈着将小磨山中那支队伍拉过来之事，权某却突然问道：“你知道牛子龙吗？”

吴暗暗吃了一惊，但丝毫没表现出惊慌之色，坦然相告，“我与牛子龙以前是朋友，后来各奔前程，早已失去联系。”

权某见他没什么可疑处，就告诉他牛子龙及其地下特务如何可恶，他们正设法除掉此人。

吴心中已有数，装出一副非常坦诚的样子说：“我与牛子龙以前有那层关系。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想法把他骗到开封来，以便干掉他。”

权某这回真正动了心，一改平常那种谨小慎微的样子，拍着胸脯担保说：“如果你真能把姓牛的骗来，我一定在吉川那儿保举你，你今后的一切都好说！”

吴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这个“任务”。

过了一段时间，吴来向权某报告，说已找到牛子龙，并取得密切联系，但牛某对来开封一事还有些犹豫，看来一时还不可能将他骗来。

吴凤翔尽管没把牛子龙骗过来，但他一系列的出色表演，却打消了日伪特务对他的怀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5月中旬，吉川指示，要吴把队伍先拉到开封来，接受皇军的改编。

牛子龙和吴凤翔商量后，决定利用“改编”之机下手，干掉吉川少将。牛派了王宝义、刘胜武等四名军统特务，混入将被“改编”的队伍中。王宝义充任吴凤翔队伍的副司令，配合吴凤翔直接担任刺杀吉川的行动。同时，牛子龙带领十名军统特务，先期潜伏于中牟县，以作接应。

根据日伪特务头子的要求，吴凤翔把“先遣队”带到开封以西的董章镇后，日伪方面对吴更加信任。

5月17日下午6时许。吴凤翔和“副司令”王宝义春风满面地前往陕甘会馆后院，接受吉川贞佐等日伪高级官员的招见。当吉川的卫士前来开门时，被吴用左轮手枪击毙。

吉川的办公室内顿时一片混乱。

吴凤翔反手一枪，将日军开封宪兵队长藤井治打死。这时，吴的左轮手枪却突然出现瞎火。急乱中，他扔掉左轮枪，取出二十响，向屋内扫射。

王宝义也从窗口外向屋内射击。瞬即，将吉川少将，重田司令部参谋长山本大佐，瑞田中佐等日军头目，全部打死在吉

川的办公室内。

由于后院幽深，枪声并未惊动前院的日军。吴凤翔，王宝义二人完成任务后，从容地撤出陕甘会馆，出了开封城后，向中牟方向急退，同牛子龙的接应队伍会合，顺利渡过黄泛区，返回了郑州。

6. 汤恩伯及其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1940年，重庆统帅部下令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由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兼任总指挥。从此，泛东敌后四省边角地带的所有游击部队，都由汤恩伯一人“总指挥”了。

以前，在泛区开展游击战的正规军有孙桐萱第3集团军之第12军和何柱国的骑2军。现在，汤恩伯率领第31集团军所辖第13、第85、和新编第2军等精锐之师进入泛区，在这前后，奉命开赴泛区的还有李仙洲的第92军。以上各军，于40年底至41年初先后抵达泛区。

汤恩伯在皖北泛区的灵泉县吕大寨设立边区总部。

汤恩伯、李仙洲等部开赴泛区，除加强那块边角地带的抗日游击战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企图挤走在夏邑、永城、肖县以南建立了根据地的新四军第4师，以便将边角地带搞成青一色的国民党游击区。

汤恩伯率领数个正规军进入黄泛区后，给日军以很大刺激。于是，日军决心在汤、李部立足未稳之际，发动进攻，以先发制人手段，将其击溃。

一月下旬，敌一路由信阳沿平汉路向漯河、项城等地进犯，一路由商丘进犯周家口（周口），一路由宿县进占涡阳、蒙城、太和、界首等地，并继续向阜阳进攻。原准备向我进攻的汤

恩伯集团，在日寇的进攻面前，不作任何抵抗，即由涡阳、蒙城、太和之线西撤。我中原局、新四军军部根据这一新的情况，于一月二十八日，指示第4师相机向西发展，牵制日寇，控制某些军事要地，以利将来更好地应付顽军的进攻。但是，第4师主要负责人对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于二十九日命令部队对国民党“实行军事上之进攻”，并于三十一日晚分路西进。二月三日，党中央、毛泽东电示第4师指出：我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是，“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目前，敌快要占漯河……你们应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在未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此后数日间，党中央和中原局又一再告诫，不可进得太猛，不能专打顽军，否则会失败。可是二月七日第4师主力已进至阜阳以北、以东和以南的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地区，分散在广阔的正面上，与顽军直接对峙，使我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月十日，隐蔽集结于新黄河西之顽军第92军第3师，骑8师等部开始向我猛攻，我被迫全部放弃涡河以南地区。四月，顽军继续向我进犯，日伪又对我不断袭击和“扫荡”，我第4师处境更加困难。五月，第4师被迫撤至皖东北地区，豫皖苏根据地除睢（县）杞（县）太（康）和肖县部分地区尚有少数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外，其余全部丧失，军队及党政干部损失四千人。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74页）。

由上可以看出，汤恩伯顽军利用新四军第4师原主要负责人的这一失误，趁机“摩擦”，达到了在黄泛区建立青一色国民党游击区的目的。汤恩伯也通过这一锤子买卖，在黄泛区站住了脚。于是，他牢牢控制住四省边角那一块“烂泥塘”，以准备对日大反攻为口号，大力扩充实力，成为拥兵数十万的“中

原王”。

由于这一地区各种游杂武装遍地，兵源充足，不久，汤恩伯就新扩了一个第 19 集团军，自兼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为副总司令（不久，第 19 集团军由陈大庆接任总司令），接着，又以何柱国之骑 2 军为基干，扩编了第 15 集团军，以何为总司令，陈又新为副总司令。其后，李仙洲的第 92 军也扩编成了第 28 集团军，以李为总司令。自此，泛区的游击军有四个集团军，辖有第 19、第 12、第 29、第 78、第 92、第 13、第 85、暂编第 9、暂编第 15、骑兵第 2 等十多个军，数十个师。

此外，汤恩伯还编有独立旅，补充团等名目繁多的部队。他令第 15 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又新前往汛东汜北成立一个挺进军总指挥部，任陈为总指挥，将四省边区的各种地方游击武装统一编组成八十多个挺进纵队，每个纵队兵力多者三千，少则三四百。

另以第 97 军军长王毓文兼任涡北挺进军总指挥，统辖游击挺进军若干个纵队。

受汤恩伯节制指挥的还有苏北游击挺进军若干纵队，鲁西游击挺进军若干纵队。

汤恩伯把泛区游击武装发展到膨胀地步，正规军和游击队，号称四十万大军。

汤某在此前的军事生涯中，并未干过游击战。但 1938 年 11 月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创办“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时，蒋介石却点名要汤某出任游干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游干班升格，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叶剑英改任副教育长）。游干班主要培训全国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

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以适应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的“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打游击的要求。

南岳游干班下设的各部、处、室行政人员,在汤恩伯任教育长期间,几乎都是由第31集团军抽调干部组成,其中,陈大庆任学员总队队长,李仙洲部廖运泽任副总队长。第一期训练学员1046人,这批学员毕业后,汤恩伯就带着游干班的各种行政人员和相当一部分学员,回到了第31集团军。

汤恩伯率部开赴泛区打游击,那些曾在游干班当过教官,任过职干过事的人,都成了泛区游击战的骨干。

汤恩伯部在泛区的游击战,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得益于叶剑英等游击专家的“点拨”。有一回,叶剑英在讲课中提出游击战的真谛在于“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这一著名论点。汤恩伯听后大受启发,他在游干班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时,指着坐在他旁边的叶剑英,以十分钦佩的口吻说:“过去(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7. 泛西之战(郑州战役)

1941年10月3日。夜。

泛东日军以一个步兵混成旅团万余兵力,在鲤登少将指挥下,于午夜从中牟、花园口两个方向偷渡新黄河。

当时,担任泛西花园口至周家口三百余里河防的是孙桐萱第12军之第20、第22两个师,由于防线摆得很宽,第一线仅以少数兵力担任警戒。

日军在夜暗中偷渡成功,第一线警戒分队仓促应战。日军

火力凶猛，人数亦占优势，警戒分队伤亡殆尽。

第20、第22两师各团、营在睡梦中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抄起家伙赶紧向河防枪炮声紧密处前进。但此时已为时过晚，日军的主力已从中牟方向过了泛区，以强大态势压来。同时，敌人在泛东面早已摆开强大的重炮阵容，以猛烈的群炮火力，向西边轰击，破坏第12军各部的调集运动，支援已突过泛区的日军行动。

泛西河防第一道防线，很快就为日军完全控制。

翌日拂晓，第20、第22师主力，全部退入第二道防线阵地阻敌。

孙桐萱命令第12军的两个补充团推上防线作战。该军的重迫击炮团也奉命全部投入战斗，增援郑州以东中牟方向守军，山炮营向花园口方向轰击，阻击敌人的进攻浪潮。同时，以十万火急电令担任军预备队的第81师，从新郑北进，驰援郑州外围防线。

当天黄昏，第81师主力赶到郑州附近，沿贾鲁河旧河岸抢占阵地，控掘战壕工事，加强第二道防线。

10月5日清晨，日军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掩护下发动强攻，第12军各部与敌展开大规模激战。

贺粹之将军督率第81师官兵，在贾鲁河新堤沿线与敌隔河鏖战。战斗最为激烈的是郑州北郊的大花庄、北李庄。坚守该地的是贺师吴营长的第3营，他们的阵地，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始终巍然不动，敌人发动了一次次猛攻，企图强渡贾鲁河，都被他们打了回去。

大花庄桥头的争夺战特别惨烈。日军调集了大批兵力，不顾一切地向桥头掩杀过来，企图夺取这条过河的通道。吴营长

亲自在桥头阵地指挥督战，敌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潮水般涌了过来，与守军在桥头扭打肉搏。

吴营长端着枪刺在敌群中拼杀，接连刺倒几个日军，但他腹部被敌人一刀劈破，曲肠拖地，仍以惊人毅力扑向敌人，夺取机枪一挺，向敌扫射，毙敌三名，终因血尽气绝，颓然栽倒桥下，壮烈牺牲。

两军在桥头厮打成一团，正在危急之时，北李庄的农民们纷纷拿着大铡刀、铁叉等农具冲上桥头，与鬼子拼杀肉搏，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子弟兵。

日军在大花庄桥头陈尸百余具，始终未能突破桥头阵地。下午，敌人在桥东南五里处的第22师防守薄弱处突破了贾鲁河防线，迂回包围了大花庄和北李庄，吴营誓死守卫阵地，全部战死。日军占领北李庄和大花庄后，大肆屠杀村民以图报复（大花庄被日军枪杀的村民为84人；北李庄被杀村民百余名）。两村房舍被焚烧成一片废墟。

10月5日（农历8月15日，中秋节）。

午后，日军突破贾鲁河防线，第12军的第二道防线全线崩溃。日军的远程大炮和飞机轮番轰击郑州城内外。第12军无力阻止日军的进攻，于中秋节圆月高挂碧空之时，失守郑州城。第3集团军总部（第12军军部）撤往蒙阳县以东之昆山山麓，第20、第22两师退向郑州西南十八里河村一带，第81师撤向郑州西北黄岗寺村一带，对郑州之敌构成半圆形包围态势。

正当第12军向后撤退之时，汤恩伯命令第13军赶往登丰（巩县以西）占领阵地，声称：“孙桐萱的部队抗战不力，将郑州也丢掉了，本军从洛阳以东沿登丰一线布防，若孙军胆敢再

退却,就要毫不留情地解决它!”

第3集团军向西撤退的物资和此时前去洛阳的该集团军的官兵都被第13军扣留了。这一招对第3集团军而言,虽说很不友好,但汤恩伯以精锐之师在此布防,一方面可稳住第12军阵脚,另方面也可有效地阻止日军西进。第3集团军及第12军几乎都是原韩复榘的老部队,经汤恩伯部如此一恫吓,当然会使该部上层将领想起韩某人是如何丢的脑袋瓜,因此,横下心来,与敌死拼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0月7日,夜间。

卫立煌、汤恩伯、孙桐萱等人在密县第85军之110师驻地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第12军确实占领现有阵地,阻止郑州之敌向外扩展,暂时保持对峙状态。以全面的游击战袭击日军,使其不能立脚,待敌疲惫动摇之时,再举重兵全力反攻,夺回郑州。

孙桐萱决定,第12军三个师,要利用日军害怕夜战的弱点,每师分别抽出精锐果敢之官兵,组成三个敢死队(游击队),每队百余兵力,配备轻便精良武器,深入敌后打游击,务使郑州之敌疲于奔命,不得安宁。

其后,泛西正规军组成的敢死队和地方各路游击武装相配合,轮番袭击日军,使孤军冒进泛西的日军坐卧不安,损失日重。同时,泛东敌后的四省边区强大的游击武装,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击战,使敌后方不稳。日军自从占领郑州之后,基本上处于龟缩固守状态,未向四周的中国军发动象样的攻击。

在这期间,军民开展的广泛的游击战中,颇有影响的事件是郑州以南十里铺农民赵继配合第12军游击队英勇杀敌。

赵继原籍山东曹县，年幼时因家境贫寒，加上连年灾荒，无法生活，随父亲一起逃难来到河南，在郑州城南十里铺落户。赵继不识字，但具有山东男子汉的血性，胆识过人，深明大义。早年投军建国豫军，因作战英勇，屡获战功，由士兵升任班长、排长、连长。后解甲归田，回家种地，养家糊口。1941年10月4日，日军沿郑州至许昌的公路南下，至十里铺一带，烧毁民房百余所，屠杀村民六十余人，赵继目睹了敌寇的罪行，决心杀敌复仇。

他把家里人都送往南乡一位亲友家避难，独自去寻找当地驻军。在站马屯遇上第12军的部队，向抗日部队述说了日军的罪行，要求作向导带领部队去杀敌。

10月24日，夜里。赵继引领着几名游击队员，潜回十里铺，摸进日军兵营。他手持大砍刀一把，冲进南门一个兵营。此时，日军正在酣睡，赵继本为行武出身，动作麻利，手起刀落，一口气砍死七个鬼子。然后，顺利潜出。

10月25日，夜间。赵继又带领农民王年成、王来方等人，摸进十里铺北门外的三官庙敌营，向酣睡之敌投掷手榴弹数枚，炸死日军十一名。

10月29日，夜间。赵继带领第12军一个排的游击队，夜袭南五里堡敌营。首先由他独自摸进敌营，提得敌人机枪一挺。正当他提枪回转之时，被敌人发现，打开探照灯，跟着，敌人的机枪朝他扫射，他不幸中弹负伤，被敌抓住。

日军对他恨之入骨，放出几条军犬，将他撕咬至死。国民党郑县政府追认赵继为革命烈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赐给其遗属法币三百元，以抚恤之；第3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赠其妻子银盾一座，书刻“义勇可风”四字；河南省第一区专员

兼保安司令杨一峰为赵继烈士立碑并撰文纪念。石碑立于十里铺北门外公路一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赵继遗孀胡秀花老人将石碑搬到家中避难，那座“义勇可风”的银盾亦一直藏于胡秀花老人的木箱中。

郑州日军在泛东泛西大规模游击战的打击下，立足不稳，损失日重，决心放弃郑州，向泛东撤退。

10月31日，上午8时许。

郑州日军向西南、西北第12军的三个师发动突然进攻，仿佛要向外扩展地盘，而实际上是敌人总撤退前的一次虚张声势的行动。日军在飞机和重炮火力的支援下，发动了多次猛攻，整整激战了一个白天。

敌人以主力数千人接连对黄岗寺一带的第81师发动攻击，战至黄昏时，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约有数百名日军强行冲进黄岗寺寨内，与第81师241团的第1营展开肉搏战。贺粹之师长急令第242团火速救援，遂将突入寨内之敌全部歼灭。

该师第243团乘势反攻，在黄岗寺北门外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小林以下百余人。他们从小林联队长尸身上的图囊中搜出重要文件和作战要图数件，得知敌方总指挥为鲤登少将，其泛西日军的总指挥部设在花园口以南的独立大庙内。

天将黑尽时，第12军总司令部从所部三个师的报告中，得知日军虽炮火凶猛，但冲锋却渐次减弱，因此判断：敌可能要全面撤退。于是，传令全军，咬住敌人，相机反攻。

夜里十时许，各路日军纷纷后退了去。

第12军各部奋起追击反攻。

第 20 师首先将师预备队第 60 团投入反攻，该团轻装挺进，于上半夜尾随逃敌攻入郑州西门，在城内陇海花园与敌打了一阵，敌不支，向东门夺路而逃。跟着，第 20 师主力全部进入了郑州城。

第 22 师跟踪败敌追击跟进，抵达郑州南门外，见敌之骑兵部队向中牟方向遁去，遂转锋东向攻击前进。

这时，汤恩伯命令第 85 军之 110 师也参加反攻，追击败退之敌。

11 月 1 日，第 22 师和第 110 师两部，将日军主力围困于中牟城内，发动猛烈攻势。

第 81 师师长贺粹之率领本师主力从黄岗寺一带直向花园口方向挺进，意在捣毁敌在大庙的总指挥部。擅长游击战的第 81 师部队追击到大庙一带，首先将外围各村庄的日军扫除，迅即将大庙包围，发动勇猛攻击。

翌日午后，敌机数架飞来，低空盘旋，并发出刺耳怪叫声，接着向大庙之敌投放通信筒一个，通信筒被中国军抢了过来，内装有鲤登指挥部先行逃过黄泛区的一个少佐参谋给鲤登的逃跑路线图，并告知泛东（开封）日军正竭力营救鲤登脱险。

第 81 师按照敌标示的逃跑路线沿途设伏，决心尽歼鲤登及其残部。

此时，卫立煌却电令第 81 师活捉鲤登。贺师长只得命令追击部队停止抢炮射击，紧缩包围圈。

鲤登及其残余部队被围困于花园口黄泛区三角地带，处于绝境。

那天，黄泛区突然刮起了强风，把黄泛水流都推着滚向了泛东边，西岸一带裸出宽阔的烂泥塘沼地，舟船不能靠岸，滩

涂淤泥不能徒涉。

泛东日军以排炮向泛西纵深猛轰，又多次出动飞机到三角地带助战，并投下许多帆布船、帆布筒等徒涉烂泥塘的特殊工具。但这些东西，大都被中国军队给抢了去。

黄昏时刻，敌机又飞临三角地带上空，空投伞兵一批，并以飞机发射各色照明弹和信号弹，指示地面之敌的逃跑方向。

鲤登少将及其残余部队与空降之敌会合后，拼死突出重围，在老黄河北岸之敌的掩护营救下，终于从老黄河渡过对岸。

鲤登在突围时被 81 师伏兵击成重伤，黄呢将军斗篷也在突围时丢在了泛西岸边。鲤登逃过黄河后，被日军护送到新乡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日军先后在开封和新乡两地为其开追悼会。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和第 3 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分别将收复郑州和反攻的战果报告重庆统帅部。蒋介石看了战报，不觉失笑，挥笔在战报上批了个“谎报军情，夸大战果”。在他看来，第 12 军及第 85 军 110 师不可能使万余日军如此惨败。

事实上，是黄泛区这一特殊的地形，将日军之优势尽行剥夺，使强敌陷于了游击战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自拔。

正当重庆统帅部要追究第 12 军“谎报军情”之罪时，开封的日伪报刊却登载出了鲤登之“壮烈”和为其开追悼会的报道，这才免了被追究。

8. 淮北“快速纵队”

1941 年春季。

李仙洲率第 92 军进入泛区皖北的阜阳地区后,以第 21 师和 142 师为第一线,沿涡河南岸涡阳、蒙城、河溜、龙亢一线布防。另以廖运泽的暂编第 14 师主力在太和附近沿淝河南岸布防,以一个团警备阜阳城。任命廖师长为阜阳警备司令。

当时,淮北地区情况十分复杂,由于黄水泛滥,淹没了大批村镇和田土,到处都麇集着大批无家可归者及各色各样的无业游民。这些人中间的许多青壮年,自发拉起队伍在敌后活动,有的被县、区、乡政府收编为自卫队之类的抗日武装,有的被抗日游击部队收编。也有不少人拉起武装后四处抢劫,扰民病民,祸害乡里。由于该地区敌我友三军犬牙交错,地形特殊,政情复杂,土匪武装十分猖獗,老百姓深受其害,天一黑人们就不敢出门。进出泛区搞长途贩运的过往客商,大白天也会遭到土匪的拦路抢劫。

廖运泽就任阜阳警备司令后,为了整顿乡风,安定敌后民心,建立巩固的游击根据地,首先倾力剿匪除害。他派出大批正规部队,大张旗鼓地四处剿匪。但是,土匪却因人地两熟,神出鬼没,不但没遭到正规军的围剿,反而还往往牵着剿匪部队的鼻子走,搞得正规军疲于奔命,毫无收获。

初期清剿失利后,廖运泽决定采取“以毒攻毒”办法。他通过多方努力,招降了一些土匪,经过教育,使他们改恶从善,并在其中挑选了一批武艺高强的人,每人佩一支漂亮的盒子炮,一辆自行车,通通着便衣,名曰“快速纵队”。

由于这些人都曾干过土匪,最了解匪盗的活动特点和行动规律,让他们担任清剿,往往事半功倍,捉拿匪贼手到擒拿。在较短时期内,淮北防区内匪盗遭到沉重打击,纷纷洗手不干了。匪盗敛迹,风气好转,民心安定。

“快速纵队”比大批正规军所起的作用还大。

9. 豫中会战时的泛区之战

1944年4月中旬。

日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豫中会战(打通大陆走廊的第一阶段作战——打通平汉铁路南段)。日军将主力六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二十余万兵力投入豫中平原作战。另以第13军之65师团和第64师团各一部(共步兵八个大队,山炮兵二个大队)组成混成兵种联合部队,再加上伪军三个团,共约万余兵力,在第65师团师团长太田米雄中将指挥下,于4月下旬,将部队集结于皖北蚌蟪地区。其战略目的在于牵制泛东地区国民党的各路游击部队,使之不能转调豫中平原作战。

在此之前,李仙洲第28集团军已于42年和43年先后挺进鲁西敌后。

当时,泛东皖北地区只有骑兵第2军(廖运泽已升任该军军长)的三个师,紧接骑2军防区西北方向是陈大庆集团军所辖暂编第9军,共约五六个师的兵力和地方游击部队。

当时,担任涡河正面防守的是骑2军的两个师。军长廖运泽根据敌情判断,敌人主攻方向可能由颍上指向阜阳,便果断变更兵力部署:撤出涡阳河防线,将主力集结于阜阳附近,相机出击。

日伪军于5月初旬开始行动,分别由蚌蟪地区的寿县、正阳关等处向颍上攻击推进。

骑2军以特务团在颍上地区稍事抵抗,即按预定计划向后撤退,诱敌深入。日军果然上当,以为中国军队败北,以骑兵

部队尾随追击，向泛区腹地长驱直入。

当敌骑兵部队深入泛区成孤军状态时，廖军长命令骑 8 师全线出击。

骑 8 师为青海马家军，战斗意志顽强，全师三千余兵力，每人一支骑步枪，一把大片刀，一匹高头大马。官兵性格刚烈豪爽，体质强健，擅长马背上冲刺，作战特别勇猛。

日军骑兵部队正埋头冒进，到达颍上西北四十里铺附近时，猛见侧面尘土飞扬，喊杀声震天，原来是一支勇猛的骑兵杀到，赶紧勒住马头，准备下马战斗。当他们仓促跳下马背，尚未来得及展开队形时，骑 8 师的数千匹战马已冲到眼前，只听大片刀挥舞，呼呼作响，砍得日军人头滚滚落地。日军的这支骑兵部队共数百人，转眼间就被大片刀给砍了个精光。

在这次战斗中，骑 8 师副师长卢广伟少将不幸壮烈牺牲。

日军进入黄泛区遭到当头一闷棒，只得停顿下来，调整队伍，在数架飞机和炮火支援和掩护下，小心谨慎地向前开进。

骑 2 军仍以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战术相抗衡。日军不敢追击，也不敢快速冒进，从颍上到阜阳仅六十华里路程，日军却用了五天时间，才抵达阜阳城外十华里的地方。

日军终于进至骑 2 军预设的决战地域。正当廖军长要下令全军出击之时，日伪军却突然掉头就跑，溜得十分迅速。骑 2 军各师奋起追击，因敌去得太快，而无多少斩获。

日伪军突然回撤的原因有二。其一，日军主力在豫中于 5 月 9 日上午完成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计划。泛东日军已勉强完成了牵制任务，所以回返。其二，敌军前线指挥官师团参谋长到前沿观察战况时，被骑 2 军阵地上之冷枪击毙，战场失主将，军心不稳，所以溜得如此之快。

豫中会战结束，汤恩伯将军因失豫中而被统帅部撤掉四省边区总司令职。泛东游击区与大别山游击区合并为第10战区——敌后游击战区。

第八章 扎根大别山

1. 蒋介石说大别山这个点一定要守住

1938年10月中旬。

旷日持久的武汉大会战已接近尾声，江北岸的日军三路人马，沿大别山南北两麓向武汉推进。其116师团和第6师团于9月底突破田家镇要塞，沿大别山南面逆江推进；第13、第16两个师团正向大别山北麓的沙窝阵、小界岭进攻，与孙连仲、宋希濂两部竟日激战；第3、第10两个师团已占领信阳，沿京汉铁路向南猛犯。南北两面的炮声震撼着绵延数百里的大别山麓。

在大别山中的宋埠镇外一个小破庙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和幕僚们策划战事，蒋介石却突然来到了这座破庙。李宗仁照例客气地“请委员长训示”，心里却老大不快，他深知这位委员长喜欢越级指挥，弄得前线指挥官往往无所适从，有时还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战。

蒋介石的“训示”是：几个月的武汉外围战，已达到了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统帅部决定放弃武汉这座空城，各部队撤出战场，向有利地区转移，第五战区部队大部退过京汉铁路

线,向鄂西山地转进,同时,要留一支精锐部队,保持大别山的战略要地。

用过晚餐之后,蒋介石还没有走的意思,经“德邻弟”提醒后,他才说今晚不走了,要与前线将士同甘共苦,在这破庙住一夜。李宗仁虽为他的安全着想很有些担心,但又不好扫了统帅那种“同甘共苦”的兴致,也就主随客便了。

夜里,李宗仁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蒋介石,参谋副官们纷纷让出自己的床给李长官,李却坚持不授,亲自动手下了一块门板,搁在办公桌上当床。当时,正值秋老虎呈凶时节,武汉这个“火炉”丝毫不减盛夏的热威。那天夜里,闷热还在其次,山区的蚊子却叫人受不了,李司令长官躺在门板上,遭到成群结伙的蚊子的攻击,无法入睡。

蒋某也遭了灾,本来他睡的床上有蚊帐的,但那些蚊子却争相往缝隙里钻,钻进去就十分积极,十分踊跃地扑上去品尝委员长的血肉。蒋介石被叮咬得无法睡觉,提起衬衣乱打一通,结果,飞进去的蚊子更多,只得呼唤侍从进来帮忙,仍然无济于事。

蒋某没法躺着“同甘共苦”,出门来见“德邻弟”也没睡,两人各自拿了把纸扇,到屋子外头对坐乘凉。

月亮也仿佛被战火烧红了,挂在中天发黄发红。

炮声隆隆,大别山在颤抖。

蒋介石又提起守卫大别山的事,他说大别山是中原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我军只要确实占据了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东可以控制安徽省大部,西可以威胁京汉铁路南段,南可以随时出击武汉之敌,并扼制长江水道。因此,大别山这个点我们一定要确保,把它建成一块巩

固的游击根据地，这样，我们虽然放弃了武汉三镇，但中原这盘棋仍然是活的，战略的主动权仍然在我们手上。末了，还要求李宗仁一定要挑选最得力的将领守卫大别山。

李宗仁对蒋某的这些见解“训示”莫不表示衷心拥护，但心里却自觉好笑，因为这些见解基本上都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的。在这之前，白崇禧即对大别山这块理想的游击区大感兴趣，与李某多次商谈过这事，两人的意见基本上就是刚才蒋介石所表述的那些东西。既然它已通过白崇禧副总参谋长将其变为了统帅部和蒋委员长的决策，李宗仁当然只有不露声色地接受最高统帅的“教导”、“训示”了。

日军迫近宋埠镇了，第五战区长官部转移到了西北方向的夏店镇。

第五战区各路人马纷纷奉命向西退却。

李宗仁电令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将军和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将军速来夏店，商讨固守大别山的问题。

廖、李二将军都是李宗仁“桂系”干将。李宗仁对这两位心腹将领说最高当局决定，要我们第五战区留一支部队在敌后死守大别山，将其作为开展中原游击战的根据地，这个决定是很英明的，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大别山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守卫的责任就极为重大了。同时，这里处于敌后，交通不便条件险恶，生活十分艰苦，一切都要靠自己来解决。二位将军谁愿留下担当这个重任？

李品仙的眼光瞅住自己脚背，一声不吭。

李宗仁心想，看来此人是不大愿意的了，便问廖磊，“燕农，你的意见呢，有没有兴趣留下打游击？”

廖磊爽快地说：“行了，就由我来打游击！”

日军对武汉的包围圈越来越紧了，第五战区各部队按计划向鄂西撤退，敌人跟踪追击，特别是从信阳向南推进的一股日军，来势十分凶猛，有切断第五战区部队退路的危险。李宗仁急电在应城附近待机的覃连芳第84军和刘汝明第68军，火速驰赴武胜关、平静关一带阻敌。

命令发出后，李宗仁和长官部人员也卷起铺盖卷儿向西撤退，来到京汉铁路线花园车站以西约十华里的一个叫陈村的地方，天已黑尽，因是急行军，早已人困马乏，决定在此宿营。

稍事休息，长官部通信人员立即开机联络，首先传来的是第84军军长覃连芳将军的报告，说该军正受到优势之敌的强大压迫阻击，无法赶往目的地执行掩护大军撤退的任务。

李宗仁感到情况不妙，急令电台与68军联络，却怎么也呼叫不出刘汝明军长的声音，想必该军的情况更为严重。

电台一直在呼叫寻找第68军。

李宗仁心情极为惶恐不安，直到深夜，越加感到心神不定。李将军自投身军旅以来，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临危不惧，从未有过今日的怪异情绪。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这种情绪太反常，仿佛预感到一种异常严重的灾难将降临。遂惊然而起，急将随从叫醒，令其立即传令：长官部人员紧急集合，火速向西转移。

战区参谋长徐祖贻将军正在甜梦中，突然被叫醒，揉着惺松的双眼说：“长官，您一向都是很镇静的，今晚您是怎么啦，一直烦躁不安，半夜三更了还把大家吵起来。”

李宗仁拉着他一边往门外急走，一边说：“我也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反正我觉得好象要出事,应赶紧离开这里!”

长官部人员紧急出动,向西急行军。天亮后,来到安陆县境,大家都累得走不动了,这才坐下来休息。刚坐下一会儿,就听见后面传来许多人的吵闹声,大家回头看去,见是陈村一带的老百姓们,正慌慌张张地如潮水般涌来。

军人们拦住老乡问是何原因。那些人纷纷叫道:“鬼子进村了!”

一打听才知道,当长官部的人刚离开陈村一会儿,鬼子的骑兵大队就象旋风似的刮了来,老乡们说进村的鬼子骑兵至少有一千多人,要是他们再晚走一步,肯定全都完了。

长官部人员无不愕然。

徐参谋长问李宗仁:“长官,这是怎么回事?”

李宗仁用手搔着自己脑门,“天知道!”

2. 站稳脚跟

1938年10月下旬。

武汉会战结束,奉命留在大别山敌后打游击的部队,除廖磊的第21集团军(辖第48军和第7军),还有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辖第10军)。

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分别任命廖磊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总指挥等职务,统一负责大别山地区的军政工作。

当时,大别山地区的形势十分严峻险恶。日军以重兵驻屯于武汉地区(因该地区是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中最主要的战场,驻有日军精锐野战主力第11军团,平时保持三十多万人的地面部队,以及航空兵和海军舰队,这一地区是侵华日军驻兵最

为密集的),大别山地区仅立煌(今金寨县)和岳西两个县城未驻扎日军。留在敌后的三个正规军和大批地方武装被敌人压迫于以立煌为中心的豫、鄂、皖三省边界山区。

大别山处在南京和武汉之间,依其山势走向,横跨豫(东南)鄂(东)皖(西南)三省,为长江中游平原之战略要域。日军占领武汉后探知国民政府留置精兵于山区,顿感这是心腹大患,于38年冬季出动劲旅分途围攻会剿,深入山区进行大扫荡战。

一路日军由应山向东进犯。第48军一部在应山夹铺一带,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出奇制胜,击溃日军,首战告捷,稳住了大别山西部形势。

另一路日军向鄂东罗田、英山一带出动,因日军兵力强大,来势迅猛,驻扎于罗田地区的第7军措手不及,赶紧向山地退避。日军主力因未“捕捉”住第7军,迅即向驻扎于英山地区的第21集团军总部狂扑。

廖磊率集团军总部火速向北面山区转移。因日军来势迅猛,该集团军在武汉失守前屯积在这里准备长期坚持山地游击战所需的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未来得及转移,为不使其资敌,只得忍痛破坏焚毁。

日军向立煌中心地区推进,游击军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11月中旬,廖磊下令发动反攻,驱逐山区各地之日军,扩大根据地。于是,大别山的三个正规军和部分游击队,分三路发起反击。

第一路,向豫东南反击,经旬日激战,于11月22日夺取商城,敌人立即纠集大批兵力反扑,商城旋即又落入敌手。国军经过调整兵力部署,再度发起进攻,歼敌一部,于11月30

日,再次收复商城。接着,游击军乘胜北进,将潢川之敌击溃,夺取了这座县城。

第二路,向皖西地区出击。11月15日,驻扎于六安县城的日军,经不住游击军的连续猛攻,弃城东逃。游击军乘势东进,在合肥地区与敌展开大规模激战,双方对峙数日,日军兵力不支,溃败逃窜,游击军于11月17日一度收复合肥县城。

第三路,由张义纯将军指挥第48军主力向鄂东反击。首先以区寿年第176师之丘清英旅从霍山一带火速赶往英山河池镇占领阵地,阻击向山区腹地扫荡的日军主力,双方在此激战一天一夜,敌未能撞开丘清英旅这堵铁墙。此时,张义纯军长指挥主力迂回到了敌后,大肆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敌主力受到侧背威胁,全线动摇,渐次退缩。张军奋起反攻,于11月25日和26日,分别攻克罗田、英山两座县城,扩张了大片地盘。

通过38年冬季的反攻,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大到十余县境,游击军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日军未能摧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便对山区实行严密封锁,企图困死饿死游击军。

当时,山区四面交通断绝,经过日军那次大扫荡,物资损失惨重,部队供应奇缺,生活条件极为艰难,又值数九隆冬,江淮地区干寒猛袭,大别山中广大游击军将士处于异常困难境地。

翌年初,第26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徐源泉上将,因部队不堪忍受冻饿之苦,率领部队擅自退出山区,撤退到了京汉线西侧。李宗仁以徐源泉“违犯了军法”为由,当即将其扣捕,电请蒋介石对其予以严办。

蒋介石手谕：“交军法惩办”。

于是，李宗仁派人将徐押解西安行营，徐在西安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解往重庆军法总监部审判。当时任军法总监的何成浚上将对徐有旧谊，当何了解情况后，更是表示同情，经何在统帅部协调，以“将功补过”，把徐某释放。

徐源泉于1935年4月即升任二级陆军上将，同年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6集团军总司令。第26集团军辖第10、第87两个军。淞沪会战时，他兼任长江江防司令，其后率部转战于皖鄂两省。在武汉会战期间，统帅部将其划归第五战区序列，并将第87军调到长江南岸归第九战区指挥，徐集团军仅有第10军，在皖西一带与日军鏖战。

日军第6师团数万兵力，在海军第3舰队掩护下，水陆并进，向安庆猛攻。守卫安庆的是杨森第27集团军的一个军，因敌我力量悬殊，抵敌不住，被迫退守潜山。强敌水陆并进，穷追猛进，又攻陷了潜山。

正在危急时，徐源泉指挥第10军，由霍山突然袭击太湖，并切断了敌之后路，歼灭大量日军。敌遭此突然一击，攻势顿挫，只得向望江、潜山方向龟缩，打了一个漂亮仗。

徐部占领潜山以西山地之王家牌楼、天柱山一带，对潜(山)太(湖)路西进之敌成侧击态势。日军调集主力猛攻徐部，徐部在王家牌楼地区伤亡惨重，第10军几乎被打光。

武汉会战结束后，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被中央一连冠戴四顶“总司令”，一顶“主席”的帽子(即第21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豫鄂皖边区总司令；安徽省

政府主席),而将部队打光了的徐源泉,只有“奉命坚守大别山”,接受廖磊节制指挥的份儿。

徐某擅自退离大别山游击区,除“生活条件太艰苦”之外,恐怕另有原因。

3. 搬来广西经验,建设游击地盘

第21集团军在大别山中心地带暂时站住了脚,获得了喘息时机,廖磊的安徽省政府便于1939年初,紧锣密鼓地进行重建安徽省专署以下各级政权组织的工作。

当时的安徽省各县、镇几乎都驻扎有日军。由于日本政府于38年初就正式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另行扶植“新生政权”。所以,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抓捕杀戮地方官员,摧毁各级行政组织。占领华中地区后,许多县长、专员随军转移,有的潜伏地下,区乡基层行政组织失去依靠和领导,处于瓦解状态。由于政权瓦解,中央政府也就停止了财政拨款。

游击军要在大别山长期坚持,就需解决部队的粮秣给养,兵员补充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敌后广大民众的支持,因此,恢复和建立地方各级政权,使军队有根据地就成为首要问题。

廖磊在恢复和建设大别山地区敌后抗战政权方面,主要得力于省民政厅长陈良佐。

陈良佐原为广西桂林区民团总指挥官,在广西当过多年县长,推行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搞的所谓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积累了一套经验,因此,被白崇禧点名调升安徽省民政厅长。

武汉失守前两天,陈良佐奉命赶赴汉口,白崇禧把中原地

区的敌我形势概约地作了介绍,说:“我们已决定放弃武汉,假如你迟来两天,恐怕就进不了汉口了。统帅部决定长期保持大别山,保持大别山的关键是建立安徽省的地方政权,派你去敌后任安徽省民政厅长,就是要你把广西的经验拿到安徽去,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陈良佐到达立煌县后,李宗仁去电指示:“安徽是中原腹地,政治好坏影响甚大。广西过去几年有成绩,但因地方偏僻,影响不大。你在广西有多年的行政经验,望将经验加以推广。”

陈良佐与廖磊决定,首先着手重建安徽全省各级政权组织,在文化教育方面,照搬广西做法,即每村设立国民基础学校,各乡都办中心学校。在重建行政组织方面,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全省这么多区、乡、村,需要大批干部,这些干部还必须是听从廖省主席号令的“自己人”,否则,干部的思想不对头,路线也不对头,建立了政权组织也是枉然。

陈良佐出了个点子:开办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廖省主席任班主任,陈某人任教育长,由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去充任各级行政干部。这样,全省各级行政干部都是廖、陈的“学生”了。

廖磊完全采纳陈某的意见,于是,陈某调动人马在立煌县船坊街的空坝上盖了几排草房,连同原有的几家破瓦房,作为校舍,挂起了省府干训班的招牌。以后,因参训人员增多,又在那儿盖了些草屋,将其扩大到每期可同时训练学员一千多人。

“干训练”的全称是“安徽省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它要培养训练的是“政教卫合一”的所谓全能干部。政教卫合一就是以行政为中心,教育和地方游击武装从属于行政长官管理。在基层是乡(镇)长兼任小学校长,同时还兼任民团大队长。为适应这一需要,干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有:政治、业务、军事几

个方面，军事训练的主要项目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训练时间，每期两三个月不等。

受训学员主要来源于初中以上文化的失学、失业青年。前后共办了六期，受训人员达一万余人。学员毕业，由训练班发给结业证书一件，另有一块镌刻“干”字的铜质纪念章。学员分配，由训练班本部提出意见，并派往各大单位，再由各主管厅分配工作。最好的是被分配充当省府秘书、科长、视察，少数“品学兼优”的学员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去当县长、区长等职务。

这些学员，到船坊街的烂草屋去镀了一层金出来，满怀信心地奔赴各地充任下级行政官员。县、乡、镇被日军占领了的，他们就在山沟沟或水边边（即远离城镇和交通要道的地方），摆开县、乡、镇的摊摊，开始办公；开办学校，组织民众，打造刀枪，骚扰敌伪，收交公粮军响等勾当，仅大半年时间，在敌占区的安徽省境内就普遍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实行廖磊、陈良佐的广西“新人新政”。

廖磊为了确保他的“新人”能实行“新政”，拿出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省主席、及省保安司令的牌子去压那些地方势力，通令全省，严禁侮辱殴打各级基层行政干部，违者以军法惩处。

命令发出不久，廖某便到各地“御驾亲巡”，了解检查各地执行情况。他来到潜山县时，有个在干训班毕业的人跑来诉苦告状（此人分配到潜山县某乡任乡干部），说他被保安队的一个排长棍责侮辱。廖主席立即把那个排长传来审讯，结果情况属实，廖某大怒，下令将其枪决示众。消息不胫而走，全省震动，再也没人敢动那些从船坊街的烂草屋出来的乡保长们一根毫毛了。

敌后政权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根据地军队和公职人员的供应实现了“自给自足”。皖南地区的公粮收购后,还可供应第三战区的江防部队,皖北地区的公粮供应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等部队。

1939年10月,廖磊因脑溢血病逝于立煌县,李品仙接任大别山防务。

4. 发展民众武装,扩大游击战争

早在武汉会战期间,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即着手组建大别山附近地区的民众抗敌武装,他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委任当时的安徽省政府民政厅长张义纯将军为“安徽抗日自卫军总司令”。

张义纯把发展自卫军的重点放在皖北各县,因为这一地区的人民素有淮北健儿之称,是历史上出壮丁的著名之地。张义纯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后认为,那里的民众民族意识强烈,受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抗日卫国的情绪很高,广大青壮年无不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他认为,仅淮北数县之内,只要有人树起抗战大旗,登高一呼,即使编组十万武装也不在话下。但是此地十分贫穷,如果真的发展十万大军,粮秣供应倒成了大问题。

最后,经过反复合计,决定保持原有的自卫队,再以县为单位扩编自卫军,大县扩一个大队,中县扩二个中队,小县扩一个中队。武器,粮饷均由各县自己筹集。尽管官方有许多限制和面临重重困难,皖北地区仍在倾刻之间,就拉起了六路游击大军,共五万余众。张义纯起用了一批在乡的旧高级军人石寅生、李武德、郭造勋、岳相如、余亚农、宋邦翰等,让他们分别

担任第一至六路自卫军的总司令。

武汉会战结束时，张义纯不再担任民政厅长，回任第 48 军军长，其所兼安徽省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也一并交给省主席廖磊担任。廖磊和新任民政厅长陈良佐虽然都大力主张发展游击武装，但对由张义纯搞起来的那支数万人的自卫军却不很放心，担心他们不听新的省政府的节制号令，决定对淮北健儿武装进行整编。

整编的措施和方法是十分霸道的。首先由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搞了个整编计划，制定了编制表，再将各路指挥官召到立煌开会，在会上突然抛出“计划”和“编制表”，由廖磊宣布整编方案和步骤。随后，即由旅长赖刚率领四个团的正规军前往亳州、颍上、阜阳、寿县一带，监督执行整编。整编大员携带编制表，前往淮北自卫军各路人马驻扎地，实地点验人数，一人一枪，点足一百人，编成一个中队，当即发给军服给养，无枪者遣散回家。

经过这一整顿，六路大军变成了六个团。第 21 集团军对这六个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以提高正规化程度。这六个团的经费给养由省府直接负担，事实上将其变成了省府控制的地方部队。后来，又将这些部队调往各游击区，分别受专署专员兼游击司令的指挥。

廖磊、陈良佐在大力开办“干训班”的同时，就推行了“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和全民参战的行政体制，即由县长兼任国民兵团团长和本辖区游击司令，副团长为专职军官，协助县长训练国民兵团。国民兵团分常备兵和后备自卫队两种，凡年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壮男子，都在“国民兵”的行列，都需接受军事训练，参与配合游击军的战斗以及独立地展

开城乡游击战，达到保土保家，为国杀敌，维护地方政权的目的。

这里所说的大别山游击根据地，是由以下几块游击根据地组成的：大别山中心根据地；皖东根据地；皖北根据地；鄂东根据地。

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兵力配置态势是：以正规军主力置于中心区，作为支撑各游击区的坚强后盾。战略策略是：稳坐大别山，向西（京汉铁路线）向南（武汉三镇和长江水道交通）游击，向东（皖省）发展。因此，大别山根据地的外围，基本上是由少数正规军和游击武装担任警戒。

大别山各游击区的游击军兵力部署情况：

鄂东地区。总指挥为湖北省鄂东专员兼游击司令程汝怀。游击部队有第五战区游击第 16、第 17、第 18、第 19 四个纵队；独立第 1、第 3、第 6 游击支队；直属特务大队；保安第 8 团等，共计万余武装。

皖西北游击区。指挥官为安徽第 3 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司令李盛宗。游击部队为第五战区第 11、第 14 两个游击纵队；第 7 独立支队。

皖东北游击区。指挥官为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游击部队为第五战区游击第 8 纵队，正规军一个营。

桐城、怀宁外围游击区。指挥官为黄师岳。游击部队为第五战区第 13 游击纵队。

以上几块游击区的指挥官因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动。

在廖磊任安徽省主席的 1939 年期间，第 21 集团军和各地游击武装不断向京汉、津浦两条铁路线以及长江航运线出击，皖中、皖北的游击战开展得尤为激烈，打得日军坐卧不安，

疲于奔命。

1940年2月,李品仙接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确定了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

第一,控制敌后广大地区,向敌力量薄弱防守空虚之地发展抗日力量,阻止日军搜刮物资,打破敌人“以战养战”阴谋。

第二,展开大规模游击战争,对敌伪组织和小股部队实施全面袭击、破坏,不断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注重破袭敌军占领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点,牵制和分散敌之兵力,策应主力战场作战。

第三,支援地方政权,掩护各地行政组织,组织和训练民兵,发展壮大地方自卫武装力量。

第四,为粉碎日军对根据地不断的“扫荡”,发动全民参战,动员人民力量,在敌军可能深入的山区险要地段,构筑纵深隐秘工事,阻扰和伏击进犯之敌。

1940年5月,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团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纠集十余万兵力,发起枣宜会战,第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受到威胁。大别山游击军立即四面出击,策应主战场作战;鄂东游击部队在程汝怀指挥下,向长江沿岸的浠水、蕲春,兰溪口等地出击,截断了敌之长江水运线;第48军176师和138师也向长江沿岸的黄梅、武穴、安庆等地发动强大攻势,威胁敌长江航道;李品仙亲自指挥大别山游击部队主力向京汉线南段发动猛攻,直接威压武汉重镇。

大别山的游击战,使武汉日军的后方受到极大威胁,有力地牵制了敌军兵力,支援了第五战区主力的决战。

1941年9月中旬。日军第11军团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纠集武汉地区敌之主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李品仙奉重庆

统帅部命令，指挥大别山的敌后部队大举反攻，牵制日军兵力。他以第48军一部，豫南游击队，鄂东游击队，第7军等各部，分别向信阳、礼山、花园进攻，使京汉线南段之敌受到巨大打击；另以第48军主力向长江沿岸敌之各据点发动猛攻，截断长江水运；第171师和皖东游击部队向津浦路南段发动全面破袭，造成敌之铁路运输一度瘫痪。

大别山敌后游击战的神威，使武汉之敌受到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第九战区的长沙会战。

5. 粉碎日寇的“和平”宣传

日军攻占武汉之后，在国际上大肆宣传吹嘘，说蒋介石的主力已被歼灭，中国大部土地已为日军占领，重庆那个国民政府只是残存西南一隅的地方小政权。还造谣说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和拥护，占领区内生产发展，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等等。

日军占领武汉的初期，千方百计拉拢了几个汉奸，在日军汉口驻军特务部首席顾问井上哲的一手导演下，在汉口南京路胜利街口的商业银行挂出一块“武汉治安维持会”的招牌。

维持会挂牌后，便配合日寇的“和平”宣传，网罗了一些地痞流氓，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告示说：

皇军所至，七噫无惊。
圣战目的，共存共荣。
本会职责，首在安民。
谣言必辟，法纪必遵。
凡我商店，照常开门。
凡我学校，弦歌莫停。

自今布告，永享太平。

日军为使宣传效果更佳，于1939年夏初，从国内运了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来，摆放到占领区武汉、安庆、芜湖等城市的商店货架上，然后向英、美商团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前去参观访问。英美商船队竟接受邀请，双方定于端午节，船队从南京上驶。

大别山游击军侦知这一情况后，将士们无不义愤填膺，决心撕破敌伪粉饰“太平”的假面具，给敌人一点颜色瞧瞧。

在这一地区坚持游击战的新四军第4支队，也决心打破敌人的“和平”阴谋，他们将获得的敌伪情况和安庆之敌的情况及时告知第21集团军有关部队，并提出共同合作，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

廖磊对此十分重视，指示第48军176师师长区寿年，要严密布置，予敌痛击。

区寿年师长受任后，即请安徽省运动委员会怀宁县工作团帮助策反驻在安庆城外湖边的伪军。工作团欣然应承，马上派出得力人员前往安庆，施展策反计谋，全力“运动”伪军。经过多方努力，做通了伪军头目的工作，他们表示在暗中配合抗日游击军活动，争取立功赎罪。

工作团“运动”有果后，区寿年师长命令骁勇善战，长于打游击的韦高振团，挑选精兵组成突击队。突击队乘坐木船，在漆黑的夜暗掩护下，从长江水路悄悄潜入安庆城外湖中。

由于驻扎在湖边的伪军暗中配合，佯装不知，突击队的木船得以从湖中顺利摆渡到对岸，逼近城门。

突击队员上岸后，迅速解决了把守城门的日军哨兵，打开城门，蜂涌而入。

城内驻有日军一个大队，他们还沉入午夜的“太平”美梦中，突击队员猛然闯进营房，手榴弹炸，冲锋枪扫，打死打伤日军无数。

城外驻有一个旅团的日军，但因夜间情况不明未敢轻举妄动，只得呆在兵营静观城内的龙虎斗。天亮后他们才杀气腾腾地赶到城里增援，突击队此时已安全撤出，转移他方了。恼羞成怒的日军，向城外胡乱地打了一阵炮，以泄心中之恨。

日军把死的埋了，伤的弄进医院，被突击队砸得乱七八糟的摊摊，也火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办了好酒好肉等待美、英客人光临。

美英船队不知情况，在日军第3舰队的细心热情陪同下，按时从南京启航，逆江而上。当他们的船队快到安庆时，从长江北岸的隐蔽处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大炮声，一颗颗炮弹在船头前面的江中爆炸，激起数丈高的水柱。

美英船队上的“贵宾”们很快回过神来：这是中国人民在抗议，并不是要击中他们的船队。赶紧掉转船头，一溜烟地向下游方向开去。

第3舰队的军舰也早已掉头逃去，军舰上的日军羞得无地自容。

长江北岸的大炮是第48军176师专门布置的，一共四门山炮，够利害的了。

6. 鄂东游击司令程汝怀

在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几块相对独立的游击区中，最为“独立”的要算鄂东根据地。鄂东当然属于湖北省地盘，行政上属湖北省政府领导，程汝怀是鄂东专署专员，是湖北省主席陈

诚的部属，应接受陈诚的领导。但该地区处于敌后，是大别山之一角，“豫、鄂、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鄂”，即是鄂东的鄂。因此，在军事斗争方面，他又属于廖磊（后来是李品仙）的部属。程汝怀头上有“两个婆婆”，也正由于此，使这块根据地徒添了许多波折。

程汝怀，湖北省黄安县人，早年曾在“桂系”军中任师长，1928年去职，长期闲居乡中。抗战初，他被湖北省政府起用，任命为湖北省第二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此时，程某已年过半百。

武汉失守后，程汝怀率领行署人员和保安第8团在鄂东敌后坚持斗争。1938年初冬，鄂东江北沿岸各县都集结有大批日军，准备大举扫荡大别山。

程汝怀召集幕僚会议，他说日寇为了巩固武汉重镇，解除侧背威胁，必然要以重兵进攻大别山，鄂东是大别山外围，日军进攻首当其冲。仅以我们一个保安团的人马与敌对抗，无疑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为了长期坚持鄂东，必须保存武装。敌人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们敌后抗战力量。因此，我们应避开敌之锋芒，迅速向深山撤退。

大家都同意了程的意见。于是，程汝怀带领保安团和各县县长及部分自卫队，撤向大别山腹地天堂寨、松子关一带。

日军的这次大扫荡，在鄂东地区未捕捉到抗日武装，又遭到第21集团军的反攻，遂从大别山中败退而去，龟缩到长江北岸各主要城镇据点。

此时，鄂东各地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些队伍主要是靠检拾武汉会战时抛散于长江沿岸广大战场上的无数枪枝弹药拉起来的。他们之中拥有人枪上千

或几百不等，拉起队伍后，纷纷自发地开展抗敌游击战。

程汝怀看准了这个时机，决定以专员和保安司令的名义，收编这些杂七杂八的队伍，壮大自己的抗日武装。他先后派遣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重要干部若干人，分别前往鄂东十二个县镇，去做各地武装的收编工作。各地武装的领导人听说程专员要把他们收编成为国家正式的抗日武装，干好了今后在抗战史上，还可以写上自己光荣的一页，都十分乐意收编。

收编工作十分顺利，千军万马如潮涌来。程汝怀将他们统一整编为四个游击纵队，三个独立支队，一个直属特务大队，拥有人枪两万余众。

程汝怀在很短时间内就拉起了这么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引起了湖北省府和第五战区，特别是大别山廖磊的重视。经过一番联络协商，于1939年元旦这天，正式宣布成立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程某人以专员兼任总指挥官（中将军衔），第21集团军第7军副军长兼172师师长程树芬兼任副总指挥。

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部拨给程汝怀的部队如下番号：第五战区第16、第17、第18、第19等四个游击纵队。任命詹剑峰、程鹏等人为纵队司令。第五战区还给了游击独立第1、第3、第6等三个支队和直属特务大队等部队番号。

程汝怀的游击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战斗力有所提高，于是，便在鄂东地区的长江沿线纷纷亮出旗号，骚扰和袭击日军。

1939年5月中旬，驻汉口的日军纠集千余兵力，对鄂东游击区进行扫荡，声称要一举摧毁程某在黄冈大崎山的游击指挥部，彻底消灭游击队，活捉程汝怀。

5月18日、19日两天，进入游击根据地的日军因未找到

游击队，便在黄冈方高坪一带大肆烧杀，架起大炮向山区村落胡乱轰击，人民死伤无数。

程汝怀命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两个营，配合第172师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高山占领阵地，准备在此打击入侵之敌。

程汝怀将指挥部设于黄冈天台山，亲自指挥这次战斗，战前他向参战部队发出命令：“各部队必须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惧的决战精神，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气节，打好这一仗！”

经过整整一天的激战，游击部队在郑氏祠一带打垮了日军多次冲锋。翌日清晨，程汝怀下令反攻，在远坳斜坡开阔地带，歼敌四百余人，活捉日军六个，缴获三八大盖枪三百多条，大炮五门，机枪十三挺，东洋战马五匹，指挥刀三十多把。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

这是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成立后的首战大捷。

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与敌激战竟日，击毙日军一百四十余名，夺取县城。

1939年12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规模空前的冬季大反攻。程汝怀指挥鄂东的游击武装全线出击，直接破袭武汉三镇及其以北地区之敌，战果辉煌，给敌以极大威胁，有力地配合了正规军的大反攻。

程汝怀为了巩固鄂东游击根据地，亦大办军事行政干部训练班。行政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各县行政人员，鄂东地区县以下各级行政组织也很快得以恢复，对筹粮筹款支持游击战争起了保障作用。同时，程汝怀又在黄冈马伏冲开办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自任班主任。游干班分军官、军士两个大队，鄂

东地区游击队大队长以下各级指挥员和军士,都须进游干班受训学习。

由于强敌在军事上的压迫分割,鄂东游击区是非常孤立的。鄂东游击部队和公职人员的粮饷及一切开支,湖北省和大别山中的那个安徽省政府都不负责。因此,只能自力更生,自己筹集,自给自足。为了解决武器弹药之不足,程汝怀收用了汉阳兵工厂逃出的部分技术员工,在黄冈北乡的大崎山中搞了个武器修理所,检修破旧枪支,并能仿造机枪、步枪,打制刺刀等。

1940年秋季,陈诚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对程汝怀抓得很紧。程某也紧靠湖北省政府这边,越来越不买大别山中那个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的帐,在大别山游击区内越来越奉行“独立”路线。于是,引起了李品仙的不满。

一次,有人向李品仙密告,说程汝怀的亲信,罗田县党部书记长跟武汉敌伪暗中交换物资,做生意。李品仙立即以通敌资敌罪,下令通缉这个书记长。

程某马上向陈诚投诉,说李某人无视湖北省政府、省党部的权威,干预了湖北的党政事务。陈诚亲自出面力保这个书记长。李品仙无奈,只得撤销了那道通缉令。

由于鄂东区总指挥部与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李品仙认为如不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于大别山的游击战损害极大。于是,下令撤去程汝怀鄂东游击总指挥职务,并派程树芬前去接任。

程汝怀也不买帐,马上致电陈诚,要求将鄂东游击部队改为湖北省保安部队。陈诚当即复电照准,这样,鄂东游击根据

地就彻底脱离了第五战区大别山游击区的关系，李品仙的那纸撤职命令也作废了。

程汝怀接到陈诚的复电，连夜将第五战区游击第17、第18等几个纵队，改称为湖北省的几个保安旅，独立支队改为保安团，直属大队改为保安营。

程汝怀与李品仙的矛盾暂告一段落。但是，大别山按其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势，其游击战应为一个整体。经重庆统帅部的干预，1942年底，程汝怀失去“独立”，被免职，程树芬接任鄂东游击总指挥职，终于使该地区真正成为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部分。

7. 跃进皖东区，威逼金陵城

这里所指的皖东区，即津浦铁路南段东侧八九个县（定远、天长、全椒、滁县、合肥、含山、和县、巢县、来安）。因这一地区紧靠南京西、北两面、属于日军长江下游占领区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的县镇都驻有日伪军，但游击军却以大别山为强大堡垒和坚强的后方依托，竟坦然挺进到“老虎鼻子底下”，在四面强敌之中，开辟了一块东西长约二百余华里，南北宽约百余华里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它对南京城的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部”和汪伪政府如同芒刺在背，亦是极大的讥讽。

1939年，第21集团军第7军172师的李本一团长，在皖东敌后的古河镇扯起一面皖东区行署和游击司令部的旗帜，这位李专员李司令当时的人马为第五战区第10游击纵队，以及一个营的正规军，拢共约有三四千人的武装。作为游击军，这支队伍不能算弱。

同时，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2师也发展得比较快。梁园、

大马厂、周家岗等地也驻有新四军的队伍。

李本一感到被挤压在古河镇一角很难受，请求大别山支援，加强皖东区力量，也为了与新四军争夺地盘。

1940年7月间。大别山游击总司令部派遣第48军138师前往增援，该师以第412团为前锋，向皖东挺进。第412团经过充分准备，带足粮弹，秘密运动到合肥西北方，距铁路封锁线约四十里的乡村隐蔽起来。

这时，师部派出特工人员前往封锁线做伪军的策反工作，经过特工人员向伪军方面晓以大义，摆明敌我形势和说服教育，伪军方面表示不拦截游击军东进，并将在暗中支持，还派出向导，负责带领该部从日军防守薄弱处通过铁路封锁线。

日军在皖省的铁路交通线一直是游击部队袭击破坏的重点，鬼子对此感到十分头痛，却又拿不出什么有效的防范措施，只得在铁路两侧挖掘宽深各一丈的封锁沟，再在铁道线上每间隔一至二里筑一座碉堡，实行严密的封锁。

那天深夜，第412团在伪军向导带领下出发。抵达铁路线时，已是深夜四点多钟。他们用一块木板搁到封锁沟上，队伍成一路纵队行进，天亮后，队伍尚未过完。

碉堡里的日军发现了他们，用机枪胡乱扫射，接着又用大炮轰击。但这里是日军防守的薄弱地段，敌人驻扎分散，力量不强，又不知到底有多少中国军队在开进，因此，不敢贸然追击，只是龟缩在碉堡里胡乱扫射、打炮。

第138师各团先后顺利冲过敌人的铁路封锁线，挺进到达了皖东游击区。

却说在该地区的新四军第2师一部，见大别山浩浩荡荡地开来如此众多的正规军，料知他们也是为了来争夺地盘，一

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力量还处在发展阶段,有待加强;另一方面考虑到在优势日伪军的包围中,若我军与友军“磨擦”起来,力量内耗,日军趁机出动,必将轻易地把我军和友军都“检”了,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土地如此辽阔,何必为这屁股大块地盘弄得我与友军伤了和气。于是,新四军该部出于民族大义,从国共团结统一抗战的大局着想,在李品仙“桂顽”到来之前一两天,便主动撤出梁园、大马厂、周家岗等地,率军北去,另寻地方打游击去了。

当“桂顽”们与李本一的“土顽”在皖东会师、向砚山、三官集、东王集、大马厂、周家岗等地开进时,所到之处的街道墙壁上,到处都有新四军留下的大字标语:

欢迎五路军(李宗仁、白崇禧率领桂系军队东进抗日时的部队番号)来皖东共同抗日!

五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的一家人!

五路军和新四军团结一致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第48军138师进入皖东游击区后,其兵力布署情况是:

第412团2营和游击纵队的两个大队驻防周家岗;412团1营驻东王集;412团3营和第10游击纵队第3支队,驻古河镇;412团团部和团直属部队驻大马厂。

第10纵队第1支队驻在古河至周家岗百余里地段的北线各小集镇;第2支队驻含山和善后集一带。

第138师413团驻防梁园、砚上集地区。

第138师414团驻守黄山北麓梁帝庙至栏杆集一带。

第138师师部和师直属部队驻在栏杆集。

皖省保安第8团驻柘皋地区。

此时,皖东根据地有游击军万余兵力。皖东区党政军负责

人,由李本一变为第 138 师师长莫德宏将军。

这样一支规模的部队,而且是以正规军为主力,置于皖东,作为游击战来看,是乎过分“露”了点儿,它对南京城的日伪头目所形成的威胁和恐惧心理,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日军不彻底摧毁掉它,是无法解除坐卧不安之感的。

1941 年 3 月初。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调集了第 13 旅团和第 15 师团数万兵力和大批伪军,分别从滁县、全椒、合肥、定远等地,向皖东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扫荡战。日伪军以多路出击,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等手段,企图将 138 师主力压迫于梁园地区,聚而歼之。

莫德宏将军命令少数兵力在各个既设阵地上阻击、迟滞敌人,第 138 师主力却迅速转移到外线静待战机。

3 月 7 日,日军主力推进到梁园附近,与游击军发生激战,双方反复争夺了两天两夜,日军未能突破守军防线。

这时,大别山部队奉李品仙将军之命,已火速赶到皖东。第 172 师主力向合肥附近之敌发起强攻;第 171 师已跨过津浦铁路线,分多路向日军发动攻势。游击队在皖东各地向敌发起反攻破袭,打得进入根据地的日伪军昏头转向。

围攻梁园的日军主力,遭到中国军队内外夹击,死伤千余人,于 3 月 10 日败下阵来,分路向东、北两个方向溃退。

中国军队三个正规师的强大兵力,和各路游击队,奋起反攻追击,将日伪军彻底驱逐皖东根据地。

对于皖东游击根据地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决战,它证明了两点:第一,只要有大别山这个坚强的堡垒,向皖北、皖东及其更远的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也是可能的;第二,日军调集精锐,满有把握地发动这次摧毁皖东根

据地的扫荡战，却遭到中国军沉重打击，之后，就再不敢对皖东区轻举妄动了。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皖东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此后不久，第7军171师进驻皖东根据地，第138师回防大别山。皖东专员兼游击司令李本一亦奉命回部队，担任第176师师长，皖东区由第7军副军长兼第171师师长漆道澄将军任总指挥。

8. 冢田攻大将毙命大别山及日军的报复

1942年12月18日。

第48军138师的高炮部队在太湖某阵地上搞防空训练，下午黄昏时分，训练部队正准备结束演练，回营房休息时，忽然听到从天空中传来嗡嗡的飞机声。

指挥员把手中的小红旗一指，炮兵们循声看去，见铅灰色的天空中，从东边飞来一架日军的飞机。炮手们赶紧填上炮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瞄准射击，碰巧，一炮正中要害。

敌机在天空中燃烧着，拖着长长的黑尾巴坠落于黄梅县境的山中。

阵地上一阵欢呼雀跃。炮手们高兴一阵之后，就没去特别注意那架坠毁于山中的敌机，当时，又值日暮黄昏，也没派人去搜寻敌机残骸。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那一炮揍下来的却是一架非同寻常的飞机，机上坐有武汉日军最高指挥官——第11军团司令官冢田攻大将（此前，冢田攻为中将，日军统帅部正巧于42年12月18日将其晋升为陆军大将军衔），同机坠毁身亡的还有日军第11军团司令部的藤原大佐等九名高级军官。这些人

在南京参加由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之后，飞返武汉途中，被大别山部队一炮命中的。冢田攻大将是在八年中日战争中，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毙命的职务和军衔最高的一个将领。

武汉日军不见司令官的座机飞返，又得到安庆的日军第13军第116师团的报告，说有一架飞机被大别山游击区的炮兵打了下来，料想凶多吉少，马上出动部队，前往鄂东地区的山中搜寻。找了几天，才在黄梅县的山中找到那架飞机的残骸，以及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冢田攻大将等人的尸体。

武汉日军恼怒已极，决心倾巢出动，进山报复扫荡。他们特地做了《第11军对大别山作战的计划》，日军的计划是：先以一部兵力在京汉线上积极活动，声称要进攻第五战区的随、枣地区。再以安庆第13军之116师团和合肥的日军分别佯动，从东边吸引大别山部队的注意力，以达到声东击西的目的。然后，再以主力从鄂东方向深入大别山区扫荡。

第五战区长官部上了日军的当，急令驻于大别山商城一带，以作大别山总预备队之用的第84军，火速西调至京汉路附近，准备策应随枣战事。

日军见已调动大别山的兵力，即以主力从黄梅向北猛进，直插罗田地区。罗田地区的第39军因刚进驻大别山区，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加上日军来势凶猛，措不及防。只得以少量部队配合游击队作掩护，主力则赶紧向西退避。

日军主力插入罗田后，立即兵分两路攻击，一路向松子关，一路向霍山。第48军军部当时驻在霍山深沟铺，对敌军迅猛的攻势亦感到措手不及，只得向岳西方向退避。

日军在霍山扑了空，马不停蹄地向立煌方向猛进。

大别山中心地区此时兵力空虚，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请假回老家去了。副总司令张义纯将军代理总司令全权指挥。他急令干训团的两个大队和集团军特务营前往古碑冲一带阻击敌人，令第7军之173师守卫立煌县城。

1943年1月2日，干训团的两个大队和集团军特务营在古碑冲一带，把日军阻击了大半天。但他们的阵地被日军猛烈的炮火摧毁，死伤很重，防线很快被冲溃，日军乘势猛扑，直向立煌县城杀来。

此时，安徽省政府和各机关团体，以及第21集团军总司令部已向北转移。第173师感到势单力薄，难以拒敌，也扛了枪炮转移了去。

日军顺顺利利地进入了立煌城。

日军此举，意在寻机报复。因此，他们所到之处，见房屋就烧，见人就杀，真正是实行“三光政策”。在茅坪，他们抓住几十个壮丁，将其衣服剥光，再拿刺刀一个个地捅死，尸体就丢在沙滩上。

日军窜到大别山中心立煌县城，既没寻找到游击军主力，也未遇见小股游击武装，连老百姓也见不到一个，找不着游击军决战，也找不到人杀，他们便放开手脚大肆放火烧房子，结果，仅大半天时间，就把立煌县城几乎所有的房屋都烧掉了。

大别山的各个部队，本来是事先准备不足，只以少数部队作掩护，主力纷纷向有利地区的山中闪避，这一退避不打紧，却将各部队之主力都转移到了敌之外线，形成特别有利的主动形势。

突进大别山的日军主力，见大别山部队都不前来决战，退得无影无踪，竟将其判断为：这是敌军（大别山游击军）的游击

战术,是有组织的故意退避,目的是诱骗皇军深入山区,再行歼灭。于是,日军反倒着了慌,在立煌仅呆了大半天,烧了房子,抢了些东西,就赶紧向西逃窜。

这时,撤退到六安独山镇的张义纯将军,还不知日军正在撤退,以十万火急电令转入外线的第39军刘军长,第48军苏军长,第7军张军长,第84军莫军长,立即举全部兵力反攻,歼敌于大别山中心地区。

张义纯将军发出反攻电令之后,亲率第172师,从六安向立煌挺进,到达立煌城时,听说日军于前天夜里就逃之夭夭了。

这一仗,大别山各部队能在强敌锋芒毕露之时,迅速退避转移,各部主力保持完整,且巧妙地跳到外线,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地位,使敌人的报复决战扑空,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却没有及时调整阵容,歼灭深入山区之敌,却又是遗憾的。

9. 八方游击军汇聚大别山区

1944年夏季。

日军打通大陆走廊的第一阶段作战——打通京汉铁路线南段的作战结束后,以黄泛区东面为主的豫鲁皖苏边区游击武装,完全被封锁于敌后,粮饷供给更加艰难,又因为四省边区游击总司令汤恩伯被撤职,该地区原有的众多游击武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日军继续南下“打通”,中国军队精锐主力亦南下决战,保卫西南后方,中原地区大规模的游击战,显得尤为重要。统帅部出于以上考虑,决定成立第十战区。

第十战区为抗战后期完全的敌后游击战区,它是以大别

山游击根据地为核心,加上山东大部,苏北地区,豫东、皖北地区,即泛东地区为根据地。

第十战区所辖部队为李品仙第 21 集团军,何柱国第 15 集团军,陈大庆第 19 集团军,共七个军(其中一个骑兵军),十八个师(其中二个骑兵师),另两个独立旅。另外还有王懋功的江苏挺进军,张轸的豫东挺进军,鄂东游击纵队,李品仙的大别山游击纵队,山东游击纵队,共有数十路纵队,数十万游击大军。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品仙将军,副司令长官有:何柱国、弁中珩、李明扬。

可以说,第十战区是抗战后期,我国东南部和中原大地游击军的总汇集。

第九章 鲁苏逐鹿

1938年5月下旬，徐州失守后，山东、江苏两省全部被屏障于敌后。

当时，奉蒋介石之令退入鲁西南和苏北地区的中国军队，计有石友三第69军（不久升编为第10军团，进入沂蒙山区）；庞炳勋第3军团（辖第40军，驻苏北和鲁西南微山湖西沛县一带）；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驻鲁西南地区）；韩德勤第89军（驻苏北）；缪激流第57军（驻苏北），此外还有山东、江苏两省的水警部队，陈太运的两淮税警部队，地方自卫、保安团队，以及部分零散的正规部队。共计有数十万之兵力。为抗战第一阶段（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前），中国军队开辟的第一个，也是为日军全封闭式敌后游击战区，这里的游击健儿们，前后坚持艰苦的敌后游击战达六年之久。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湖南衡山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为以敌后游击战为重点，大力发展敌后游击武装。并将山东、苏北敌后游击区划为一个统一的游击战区，定名：鲁苏战区。以于学忠将军任战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为副总司令。

由于该战区游击力量雄厚，且形成正规军、地方部队、游

击队相结合的作战形式，游击战声势浩大，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因此，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初期，成为日军重点围攻“扫荡”的对象。

该战区按地域特点和行政建置关系，形成齐鲁游击区和苏北水乡游击区。

(一)苏北水乡游击战

1. 水乡游击区及前期的抗日游击战

黄河决堤后，黄水滚滚而下，经豫东平原，淮北大地而入苏北平原。汹涌的黄河水倒灌下来，泥沙淤积，河道堵塞，扰乱了苏北大纵横交错的河流水系，沼泽地扩张泛滥，造成了严重的水患。

国民党的游击军便在这水乡泽国、河湖港叉、芦苇丛中，展开声势颇为豪壮的游击战，狠狠打击日伪势力。

在这一地区的游击军有韩德勤的第89军，第6独立旅，江苏省保安第10旅；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的十一个纵队；陈太运的税警总队（后改为苏北挺进军，编有若干个纵队）。共十六万兵力。统由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苏北游击总指挥，反共“磨擦专家”韩德勤中将节制指挥。

此外，在苏北长江下游入海口的三角地带，还有直属军委军统局领导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若干，以及其他抗日游击武装，如“陈文部队”等。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苏北地区的地方保安团队和水警部队，就在敌后打响了抗日游击战的枪声。紧接着，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战争蓬勃而起。

1938年5月底，徐州失守后，时任苏北兵团总指挥的韩德勤将军率领所部第89、第57两个军，留在了苏北敌后坚持抗战。

日军占领徐州后，立即分兵数路，清剿韩德勤的部队和其他游击部队。苏北游击军一边与敌战斗，一边利用河湖港叉有利地形，与敌周旋。日军虽出动大批兵力，却未能捕捉住游击军主力，仅占领了一些县城而已。

6月28日，在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第十九天，苏北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湖水系，本已水患严重。日军为了捕捉韩部主力，并阻止其在后方的大举反攻，便打开了苏北运河大堤。顿时，洪水猛犯，遍地汹涌，苏北数县境内尽成泽国。

这可以算作中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决堤事件。日军干下这桩罪恶勾当后，还在广播、报纸上大肆宣传攻击中国，说这次苏北大堤决堤放水，也是中国军队所为。

在武汉大会战期间，韩德勤指挥第89军等部队，在苏北敌后的通榆、运河沿线，展开声势浩大的反攻。6月30日，痛歼阜宁之敌，攻克阜宁城。游击军乘胜进攻，分两路包围了盐城日军，激战数日，歼敌一部，于7月2日攻克盐城。7月26日，游击军又攻取了东台县城。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为了巩固后方，立即调动了大批兵力，准备扫荡苏北游击军，企图将其彻底扑灭。

11月2日。

韩德勤接到蒋介石电报，指示：日军正抽调其野堪军团主

力，会同由山东南下之百川部队，在徐州、皖北地区集结，在东边的连云港地区，敌已有五个海军陆战队正处于待机状态。敌之企图是分进合击，一举歼灭苏北游击军。蒋介石指出，苏北敌后抗战武装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令其倍加注意。

11月7日。日军果然从徐州和皖北的固镇出动，向苏北发动了大扫荡。

从固镇出动的日军为小川部队，他们自灵璧东犯，当天即侵占了泗县。

从徐州南下的日军，以坦克、装甲车开道，步炮兵随其后，浩浩荡荡地向游击军杀来。驻守睢宁的游击军与敌展开血战，日军多次攻城均遭失败。

11月22日。拂晓。

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来到宿迁城外，先以六架轰炸机对县城猛轰滥炸一阵，接着以重型火炮长时间轰击，之后，日军步兵向北门发动进攻。

守城部队为韩部第33师胡文臣团的两个营，这支部队原为两淮盐警部队，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中发展壮大，后被改编为正规军。团长胡文臣出身武林世家，自幼习练武术，技艺高强，此人挥掌可劈碎十块青砖，单臂能举起百余斤重的东西，被人誉为武林豪杰。

胡团长率领两个营的将士坚守孤城，全体官兵与敌人反复冲杀，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有一回，日军从北门冲了进来，双方展开肉搏战。胡团长拿了一把大片刀，大吼一声，冲入敌阵，与十几个日本兵拼杀，只见他手中大刀挥舞，风声嗖嗖，寒光闪闪，转眼间就砍倒了好几个鬼子。官兵们士气大振，奋勇杀敌，终将敌人打退。

后来,日军援军赶到,将县城四面包围得水泄不通,敌机再次飞来轰炸扫射,城内一片火海。

日军以集团兵力发动冲锋,许多阵地上守军伤亡殆尽,阵地被突破,敌人扑进城来,游击健儿们誓死不退,展开顽强巷战。

胡文臣团长在同日军肉搏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全团官兵多数战死。宿迁县城被日军占领。

1939年1月下旬,苏北游击军发动反攻,夺回了宿迁县城。

2月中旬,日军调集了第21师团,第5师团和第20师团等部,从徐州地区南下,大举进攻苏北游击区,意在扑灭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烈火。

日军首先出动飞机,分别轰炸了睢宁、泗阳、宿迁、沐阳、淮阴等处的游击军驻地。

第21师团主力和第20师团一部,以多路向韩部根据地核心淮阴进攻。韩部和第57军112师在宿迁一带与敌血战数日,双方伤亡惨重。

3月2日,韩德勤部放弃淮阴县城,向东转移。第112师师长霍守义带领部队向东南转移,他们到达阜宁县境时,在黑夜里突然与日军第5师团的追击部队遭遇,该师团是日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作战十分凶悍勇猛。当时,韩德勤带领战区副总司令部和省政府机关人员,也刚好达到此地,情况十分险恶。霍师长指挥全师将士,拼死掩护韩部机关的转移。双方在黑夜里激战了一夜,第112师死伤奇重,但韩德勤及其机关人员得以脱险。

各路日军继续扫荡,3月3日,第21师团占领了淮安,3

月5日,第20师团占领宝应;3月7日,第5师团占领阜宁。

韩德勤率领第89军主力和机关人员从淮阴转移到泰州地区,不久,又转进于东台地区。

4月初,苏北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县等六个县的游击队汇聚海门近郊,向县城之日军发起围攻。游击队冲进城去,打死日军特务主任答尼和警备队长久留等四十余人,一度占领县城,威胁南京至上海的长江水运交通。

39年冬季,苏北敌后的游击军,直接投入冬季大反攻战斗的有四万五千余兵力,主要攻击了运河下游地区之敌。游击军曾攻克江都、高邮等县城。

2. “黄桥磨擦战”及韩德勤部 41 年至 43 年的抗战

黄桥“磨擦” 日军称快

1939年2月,新四军两个营的兵力,在扬中渡江,进入苏北。他们在扬州、泰州和扬中沿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部队发展很快。翌年6月下旬,李明扬、李长江调集了十三个团的兵力;向新四军苏北部队发动“磨擦”战,结果,二李的部队被歼灭三个团。

新四军为了冲破苏北顽固派韩德勤的种种限制,打开抗日局面,于7月下旬,以主力七千余人,采取远途奔袭战术,直插黄桥重地,歼灭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所辖保安第4旅两个团和陈太运税警部队一个营。一举占领了黄桥、蒋垛、古溪等地。

韩德勤为了独霸苏北,把新四军污蔑成“匪”,召集李明扬,陈太运等人开会、谈话,统一思想,意欲统一行动,将黄桥

地区的新四军消灭或赶走。

1940年9月底，韩德勤调集第89军主力和省府所辖保安旅，共一万五千余人，分三路进攻黄桥。于是，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黄桥“磨擦”战。

正当韩德勤和新四军苏北部队这两支抗日的武装在黄桥打得难解难分，枪炮声震撼了苏北水乡之时，第57军的霍守义率领东北顽军第112师，从鲁西南与苏北交界地区，乘机南下，进入了苏北淮阴以东的苏家咀一带，声称如果你们还要动手，还要“磨擦”，本军就要继续南下，以“武装调停磨擦”了。

这时，李明扬、陈太运两支人马则陈兵黄桥北面的泰州、姜堰、曲塘一线，静观黄桥方向热热闹闹的“磨擦”战，过了一阵，还打电话去前线，假把意思地查询战场胜负情况。

驻在泰兴的日军，听到黄桥方向隆隆的“磨擦”炮声，一下沸腾起来，他们也扛了枪炮，操起家伙，倾巢出动，急匆匆赶到黄桥西边十五里路的地方，便停止了前进，坐下来聚精会神地参观中国的这两支抗日队伍精彩的“磨擦”战。

鬼子们被不时传来的震动山河的喊杀声和炒爆米花似地枪炮声，激动得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举起枪杆一跳八丈高，热烈欢呼，拍手称快：国共两军磨擦战大大的好！要是你们的力量都“磨擦”得干干净净，就免得大日本皇军进行艰苦的支那征服战了！

直到那边“磨擦”完了，枪炮声完全停息了，鬼子们才意犹未尽地唱着皇军战歌，兴高彩烈地回转泰兴营房。

韩德勤部在黄桥一战中，损失一万多人，吃了大亏，他很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向蒋介石去电报告说：新四军这是“非法越轨”，“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那意思好象

要倾注全力,把吃的那个亏捞回来。

蒋介石心想,你韩德勤的力量能在苏北自保就算不错了,在黄桥吃的那亏,就算了,就不信在黄桥吃的亏,在其他地方补不回来。因此,当即去电,叫韩某“镇静固守,切勿挑战。”

韩德勤部 41 年至 43 年春的抗战

水沼地带扎营盘

1941 年 2 月。

日军为了彻底剿灭韩德勤的游击军,出动了五六千人的鬼子和大批伪军,从泰州、扬州地区北上,采用水陆并进,航空兵轰炸掩护的手段,对当时韩德勤的省府和战区副总司令部所在地兴化县发动扫荡战。在日伪军层层包围中,韩德勤率部向北突围转进,到达盐城西乡的安丰镇。

日军占领兴化县城后,未能捕捉到韩部主力,便在河湖沼地里大肆清剿搜查了一阵,向根据地老百姓炫耀了一番武力,留下了一些伪军驻扎兴化城,便“得胜”而去,返回扬州、泰州老巢去了。

韩德勤率领机关和部队从盐城地区西进,穿过茫茫水沼地,到达里运河的淮安、宝应以东,沼泽地以西的地带,建立根据地。

他的省府和副总司令部设在淮安县东乡的蒋桥镇;第 89 军军部及 117 师第 35 旅驻在淮安北乡车桥镇;第 117 师第 350 旅驻扎盐城西乡的安丰镇;第 117 师第 349 旅驻宝应县陶家林;第 33 师 97 旅驻淮安东乡的曹甸镇。第 57 军霍守义

第112师的部队,分别驻在阜宁县的益林、风谷村一带。独立第6旅驻蒋桥、泾口两地。

这一地区条件十分艰苦。西边,运河沿线都驻有日伪军,为敌人之封锁线;东面,是苏北水沼地,水沼遍野,芦苇连绵。

韩德勤部进入此地,当时,他所能控制的地方仅盐城、阜宁、淮安、宝应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南北长约七十华里,东西宽约八十华里。韩部此时仍有三万多兵力,加上省府机关人员,被日伪军压迫于这块荒僻狭窄的地方,四面受到严密封锁,不仅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连粮秣供给也难以解决,处于十分困难境地。

韩德勤部之所以能在此地,从41年春坚持到43年春,主要因为这里处于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防线的交界处,亦是敌人防守的结合部,因此,这里遭受的扫荡就没那么凶险。

策反伪军

韩德勤要在那块狭窄的沼地里坚持下去,就必须掌握南北两个方向日军的动向,以采取有效的对策,否则,就有被敌歼灭的危险。

驻扎在宝应城的伪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潘干丞,原为韩的旧部,当了伪军后,继续跟韩某暗中勾搭,其部第28师多为韩部的投降分子,表面上服从汪伪政府,暗地里与韩打得火热。韩德勤通过潘干丞这条线,随时掌握南面日军的动向。

对于北面的敌情,他主要得益于淮安县城西湖心寺主持楞定和尚帮忙,策反了伪方人员——淮安县伪知事沙贵章。

楞定和尚是个很有活动手腕的出家人。驻在淮安县城的日军宪兵队长白川笃信佛教,常去湖心寺拜佛,楞定和尚便与

此人拉上了关系,于是,淮安城里的日伪人员都敬他三分。

韩德勤也信佛教,且十分喜欢收藏字画。楞定擅长绘画,便将自己的几幅字画,亲自送上门来,于是,他与韩主席又弄得很熟了。

韩通过楞定与日伪方面的关系,很快将淮安县的伪知事沙贵章暗中串了过来,用一张“委任沙贵章为抗日游击第17纵队司令”的委任状,把沙某紧紧地套住。于是,沙某就天天坐在淮安城里的办公室与日伪军周旋,暗地里却给韩德勤递送日伪的情报。

败退苏北

1943年2月。

日军出动三个师团的兵力,对韩德勤的部队发动春季大扫荡。在西北面,日军太田部队主力,从淮阴向淮安东乡地区进攻;在南面,日军从扬州出动,分两路北进,一路从高邮向宝应北乡出击,另一路从兴化向盐城地区攻击。

韩德勤部遭日军四面包围夹击,虽拼死抵抗,仍不能有效阻止敌人的进攻浪潮,将士死伤奇重,根据地多被日军占领,只得向北转移至苏家嘴一带暂时休整。

日军穷追不舍,大肆清剿扫荡。韩部难以立脚,于3月间渡过运河,向西转移,达到苏皖边界。由于情况复杂,仍难以立脚,他决定离开苏北。走前,对苏北敌后抗战作出安排:正规部队统由第89军军长顾锡九将军指挥;省府保安部队均归江苏省保安处处长贾韞山统领;江苏省政府主席一职由秘书长马镇邦代理。

韩某安排停当之后,带了少数随从人员,离别苏北,来到

了皖北黄泛区的阜阳。此时，重庆统帅部已宣布撤销鲁苏战区。韩德勤所兼副总司令一职，亦被自然取消，改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仍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韩德勤的部队仍旧留在苏北和苏皖边区，打了约一年的游击。其后，第89军军部转归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指挥，顾锡九继续担任军长，所辖部队为第20师和新编第1师。第89军老部队第33师和第117师，从苏北根据地撤退后，转移到了江南，归第三战区部队序列。

3. “二李”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和陈太运的苏北挺进军

在苏北水乡游击区，除了韩德勤直接管辖的第89军和江苏省府所属保安旅、团之外，还有李明扬，李长江任正副总指挥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十一个纵队，陈太运的税警部队改编的苏北挺进军。

1938年5月下旬，徐州失守后，徐州专员李明扬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命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带着一些旧部人员南下，到达泰州，打出了游击总指挥部的旗号。随即派人深入苏北各县各乡宣传抗战救国，组织游击队伍，扩充武装力量。副总指挥李长江所拉起的陈才福、颜秀五等游击支队，大多是当地的青帮会员，具有地方特色和封建行帮特点。

李明扬、李长江的队伍发展较快，先后编成十多个纵队，数万人枪，以泰州和泰兴地区为根据地。

1938年底，成立鲁苏战区，“二李”的部队转归韩德勤指挥。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还深。虽然李、韩为近邻

同乡(李明扬是徐州肖县人,韩德勤老家在泗阳洋河镇),但韩某对李并不那么放心和宽容,李也不大服韩某的那一套。因此,在部队驻防、战斗任务的划分,地方税收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明争暗斗现象。

“二李”的游击军中,不乏有铁血抗战的血性汉子,如第3纵队司令张公任等。

张公任在抗战前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南京失陷后随军撤退到武汉,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少将参议。1938年春,张公任决意返回苏北敌后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他只身偷渡过长江,在泰兴县城东门夫子庙打出“江苏省民众自卫队通如区抗日右翼指挥部”旗号,自任指挥官。当地青壮年纷纷前来报名投军,张公任很快就拉起了一支人多势众的抗日游击队伍。是年秋,游击队袭击日军取胜,接着,又攻占了靖江县城,缴获日军物资仓库一座,将大米开仓济民,另外还缴获罐头、水果等物资十二卡车,他将一部分战利品送往兴化县,犒劳韩德勤的省政府,另一部分犒劳自己的部队。

不久,张公任的队伍并入“二李”部队序列,被命名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3纵队,继续在泰兴沿江一带开展游击战。

1940年1月,张公任率本纵队主力,配合韩德勤的第89军第33师反攻泰兴县城,第3纵队负责攻打西、北两面,第33师攻县城东、南方。战斗打响后,双方争夺异常激烈,日军凭借即设阵地顽抗,且火力配备十分强大,仅第3纵队就伤亡三百余人。

张公任率军征战,积劳成疾,于1940年10月,病逝于苏北游击区。

“二李”部队中也有部分不坚定分子。如副总指挥李长江就暗中通敌，与日伪人员陆小波勾搭，出卖抗战利益。陆某是镇江商会会长，为了把李长江拉过去，他先和李交换金兰帖，结为盟兄弟。1941年初，日伪军发动大扫荡，泰州根据地受到敌人强大的军事压力，形势十分险恶，李长江带了一些人马公开投敌，被南京的汪伪政府任命为伪第1集团军总司令，在泰州城设立总司令部。

李明扬从泰州逃出后，来到泰州北乡的周庄设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领导所属各部继续坚持抗战。

1944年，日军打通京汉铁路线南段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成立第十战区，李明扬被任命为战区副司令长官，所属游击部队，渐次向苏皖边境靠拢。

陈太运，贵州省人，苗族。南京失守后，他率领原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两淮税警总团，在苏北敌后开展游击战。在战斗中部队得到发展壮大，一度改编为游击第8军，陈太运任军长，后来又改为苏北挺进军，辖有几个纵队。

该部以泰县地区为根据地，另有一部挺进军在鲁西南一带活动。自1938年初以来，日伪军曾多次发动扫荡，企图消灭挺进军。但挺进军各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巧妙地避开了强敌的围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43年1月，日伪军以偷袭手段，以包围态势突然向挺进军发动进攻，总部和主力部队火速向外线转移，令第2纵队的两个团在泰县张游庄附近阻击敌人。双方在此激战一天，打翻打沉敌汽艇多艘。

日伪的这次进攻，未捕捉住挺进军主力，于3月初，又调

集了山本旅团和汪伪军李长江所部第9军三个师，以刘湘图的第22师，赵军山的第35师，徐容的教导旅等部，共约二万余兵力，配以飞机轰炸机战队，汽艇百余艘，从四方八面对苏北挺进军根据地，再次发动扫荡战。

在强敌压境之下，挺进军总部和主力部队，于3月13日夜，再次巧妙地跳出敌人包围圈，顺利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东海海滨的惊港地区。

敌人进入根据地后，未见到挺进军部队，感到十分纳闷，认为挺进军决不可能从他们的铁壁合围中逃掉，肯定是隐藏在根据地内。于是，他们派出若干小部队，在根据地内逐片逐村进行拉网搜索扫荡。日伪军在根据地接连拉了几回“网”，扫荡了若干遍，仍未见到苏北挺进军的踪影，只得两手空空地将原班人马撤了回来。

3月下旬，挺进军总部和主力部队，在东海之滨把身于骨养得壮壮的，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喜气洋洋地返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

4. 独臂英雄朱龙

1937年12月14日。

南京失守后第二天，黄昏。

数千名被俘的中国抗战官兵，被日军用铁丝、绳索捆扎串连起来，押着从莫愁湖畔向城外走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身负战伤，只能靠战友搀扶着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挪动。

日军将把他们押到长江边去枪杀。

朱龙是南京卫戍司令部教导团的一位连长，当时三十三岁，他也走在战俘行列中，他的一条胳膊在前一天的激战中，

被炮弹炸断。

日军把他们押到江东门外长江岸边，要他们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站成黑压压的一个大方队。

随着日军指挥官一声凶恶的嚎叫，方队后头几十挺机关枪同时喷吐着血红的火舌。

方队一排排一行行地从后朝前扑倒，几千名被俘的抗战将士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那里的血，象洪水般流淌，漫过泥泞的江滩，淌进汹涌的大江，半河江水顿时变了颜色。

深夜，朱龙在异常寒冷中苏醒过来，他躺压在前头一个死去的战友身上，他的身子又被后面倒下的战友尸体堆压着。他奋力挣脱了捆扎在手臂上的绳索，从尸山血海中往外爬。

清冷的月光，映照着江边那一幅悲壮的国殇图！

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江边，寻见了一条小船。他爬上了那条小船，用他那只尚属完好的手臂，把船撑离江岸，木船顺水漂流，到了大江北岸的江浦县境，搁浅在泥滩上。

他挣扎着爬出木船，爬出江滩，向有村庄的地方走去。当他艰难地来到一个村庄外头走进一个黑洞洞的房门时，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这是一间无人居住的破茅屋。

天亮后，朱龙渐渐苏醒过来，他已没有力气站立起来，蜷曲着身子，发出低沉痛苦的呻吟。

他的呻吟惊动了一位路过这儿的村民，于是，许多村民都跑来了，当他们从稀泥糊糊和血污中辨认出朱龙身上的中国军队服装，都受了感动。

村民杨成兴夫妇把他抬回家去，烧茶喂饭，缝补浆洗，细心照料。村民们纷纷筹粮筹款，买来药品和营养品，精心调养

这位抗战军人。

朱龙得救了，他在人民群众的襁褓中活了下来，可是，他那条被炮弹炸碎的左臂，却永远地失去了。

1938年春天，日军渡过长江，江北沿岸地区亦沦为敌寇之手。

国民党的江浦县政府撤离县城，前往三户汤扯旗办公，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武装。

朱龙告别乡亲，只身前往三户汤投奔游击队，开初，被任命为分队长，不久，升任中队长。

江浦县政府拉起的这支游击武装，人员成份十分复杂，军政素质很差，扰民之事时有发生。朱龙在正规军干过连长，带兵治军自有一套方法，他针对部队的弱点，制定了“不许偷鸡摸狗，不许敲诈勒索，不许骚扰百姓”的军规军纪，并亲自督促检查，发现违纪之事，坚决严办。经过不断教育整训，他带领的那个中队，变成了一支军纪较好，战斗力较强的游击队。

江浦县与南京城隔江相望，江浦地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对南京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和讽刺。于是，日军不断出动兵力，不厌其烦地对这一地区进行疯狂扫荡，企图将这一地区的游击武装剿灭干净。

江浦县的高旺镇，在县城西南仅十余里的地方，是这一地区的一个战略要点。日军对这里的扫荡次数最多，战斗也特别残酷。朱龙中队奉命驻守此地，当他率领游击队进驻这里时，向当地父老乡亲立下铮铮誓言：高旺在，我朱龙在，高旺不在，我朱龙不在。

1941年1月初。

日军为了彻底拔掉高旺这个钉子，竟然出动兵力一千多

人，分三路，包围了高旺。朱龙的部队不幸中了日军埋伏，游击将士们在重围中与敌人反复冲杀，多次突围都遭失败。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顽强厮杀，朱龙的部队伤亡殆尽，在突围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朱龙不愿当敌人的俘虏，举枪自尽，壮烈殉国，时年三十七岁。

朱龙及其游击队的决死搏斗，给日军以很大杀伤，致使日军恼羞成怒，他们把朱龙的头颅砍下来，高悬于高旺街头示众。

日军走后，当地民众将朱龙的头颅找回，送到游击队。江浦县政府举行隆重的军民追悼大会，追述烈士杀敌卫国的事迹，宣布朱龙为抗日英雄，将高旺镇命名为朱龙镇。

5. 陈文部队

陈文部队是一支自发的抗日游击武装，它活动于苏北扬州邵伯湖、高邮湖水网地区。陈文部队的领导人叫陈文。

南京失陷后，陈文邀约了十几个青年，弄到了十多条破旧枪，从镇江附近渡过长江，来到苏北扬州西北乡。不久，日军一个小队从扬州出发，前去扫荡天长，陈文的那支小部队埋伏在公道桥搞了一次突然袭击，日军措手不及，被打死小队长一名，士兵十余个。陈文部队首战取胜，缴获枪支十几条，其中还有一挺轻机枪。从此，“陈文部队”在这一地区名声大振。

陈文部队开始在这一地区收编各式各样的武装，以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到1938年二三月间，这支部队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自命为“江都抗日自卫支队”。

这个支队编制有四个大队。第1大队，拥有火枪三百余，

由一个曾经当过国军营长的名叫杨玉清的人任大队长，第2大队，有人枪三百左右，是陈文部队的主力；第3大队，约有二百来人，由原江苏省缉私队和江苏省保安大队的部分武装编成，队员大都配备驳壳枪一支，武器装备较整齐，军纪却差劲；警备大队，约三百人，辖有轻、重机枪连各一个，另有一个短枪连。

陈文部队以邵伯湖、高邮湖地区为根据地，既打日伪军，又游击其他抗日武装。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欲将其收编为第89军一个团，陈文不肯。1939年7月，陈文部队在高邮湖地区与韩德勤部发生冲突，搞“磨擦”，被韩部歼灭过半，陈文本人也在此身亡。

陈文死后，残部四散，有一部分人员参加了新四军。

(二) 山东游击战

1. 1939年底之前，遍布齐鲁大地的抗日游击战

1937年12月，济南失陷，山东半岛即变成敌后，如同“九一八”之后，东北义勇军顿成燎原之势一样，山东的铁血汉子们，亦在顷刻之间揭杆而起，整个齐鲁大地，抗日烽火遍地燃烧，其波澜壮阔之势，为恒古罕见。

其先后揭杆而起，属于国民党方面的游击武装，在胶东半岛，有鲁东行署主任李先良，鲁省第九区专员蔡晋康，鲁省第七区专员郑维屏，以及秦玉堂、苗占魁等人所领导的大小二三十股武装，共有兵力五万多人。

在鲁中南地区，有青岛市长兼海军陆战队司令，“磨擦专

家”沈鸿烈、临沂专员张里元，以及申从周、王洪九、“磨擦专家”秦启荣等人拉起的几万人的武装，

在鲁西北地区，影响最大的有鲁省第六行政区专员范筑先的二万余人的武装。

山东省的地方武装发展较快较早，开展敌后游击战也较猛烈。

1938年1月下旬，前临沂专员张里元拉起的武装和当地其他民团组织，就配合正规军第40军，对蒙阴日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同时，秦启荣的别动队第5纵队，在济宁城郊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双方短兵相接，进行大规模肉搏战，予日军以狠狠打击。

2月中旬，游击战在整个胶东地区打响，游击队曾攻克一些县城，并冲进烟台城内，与强敌展开巷战。

在鲁西北地区，范筑先的游击战已成燎原之势，向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攻势，已具备了独立攻取县城及个别中等城市的实力，并能独立地与日军精锐师团，如土肥原第14师团进行较量。

徐州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有计划地派遣部队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游击战场。

38年6月初，石友三奉命率第69军挺进鲁南沂蒙山区打游击。第69军进入鲁南山区后，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围剿，条件十分险恶。石友三聘请共产党员张友渔为该军政治部长，在军队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得到了敌后民众的支援，军队如鱼得水，在鲁南敌后站稳了脚跟。

在38年下半年里，石友三的部队作为山东敌后的正规军，对支持这一地区国民党方面的地方游击武装的存在和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6月中旬,石部在各地游击武装配合下,接连打下了诸城、临沂、蒙阴等地。

8月中旬,石友三指挥第69军主力,会同范筑先的地方武装,向省城济南之敌发动猛烈攻势。

由于得到敌后人民的支援和大批游击武装的兵员补充,石友三的部队得到迅速发展,不久,被蒋介石电委为第10军团军团长,所部扩编为两个满员军(第69军,新编第8军)。

38年冬,鲁苏战区成立。

石友三部被编入冀察战区序列,奉命向鲁西北集结,并向河北敌后转移。

1939年春天,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率领第51军从大别山挺进鲁南,与原在苏北鲁南地区的第57军会合,鲁省的敌后游击战进入全盛时期,日伪势力呈土崩瓦解之势。山东省内几股势力雄厚的伪军,接连反正。他们是:

胶东伪军赵保原率领数千人的兵力反正,投入抗日行列,被改编为山东省政府保安第4师;

山东省内兵力最大的伪军张步云率伪军万余人,在诸城反正,被改编为山东省政府保安第2师;

山东伪军刘桂棠部数千人哗变,与日军激战大半天,投向鲁苏战区,被改编为国军新编第36师。

1939年底之前,山东敌后的国民党游击军兵力态势如下: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

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鸿烈

第57军军长:缪激流

第51军军长:于学忠(后为牟中珩)

新编第 36 师师长：刘桂棠

鲁苏战区游击武装：

第 1 纵队：张里元

第 2 纵队：后文礼

第 3 纵队：秦启荣

第 4 纵队：王尚志

第 5 纵队：于练廷

第 6 纵队：秦玉堂

第 7 纵队：蔡晋康

第 8 纵队：周 同

第 9 纵队：王洪九

第 10 纵队：申从周

山东省政府保安部队：

保安第 1 师师长：吴文化

保安第 2 师师长：张步云

保安第 4 师师长：赵保原

另有保安旅十六个，保安团九个。

以上各部，共有数十万兵力。

39 年 3 月下旬，当于学忠率部进入鲁南地区后，日伪军便倾巢出动，企图在于部立足未稳之际，将其一举歼灭。日伪军自临朐分三路出动，其主力沿益都、临朐公路推进。于学忠指挥正规军和秦启荣的地方武装，在滌河畔设伏，待敌主力渡河时，予以突然打击，歼敌一部，给进犯之敌当头一棒。

4 月 1 日，于部向临朐以南的日军据点蒋峪发动反击，激战半日，日军死伤各五百余人。

5 月中旬，游击军突然杀进徐州城，纵火焚烧日伪机关；

城内枪声大作，敌人一片恐慌。

6月初，鲁中、鲁南日军，从各地据点出动，对鲁南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战。

1939年冬，山东境内仅鲁西、鲁南地区直接参加敌后冬季攻势的游击军，就有十二万三千兵力。

2. 沈鸿烈及其发展的游击军

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鸿烈上将，湖北省天门县人，早在北洋政府时期，此人就已是东北军松花江舰队司令。其后，在奉军中担任东北海军副司令。1929年，张学良因中东铁路问题，与苏联军队发生战事，沈鸿烈指挥东北舰队打退了入侵的苏军。东北舰队改编为中国海军第3舰队后，沈某就任舰队司令。

1931年12月起直到1938年初，沈鸿烈以海军第3舰队司令兼任青岛特别市市长。他在青岛为政时间长，对当地情况较熟悉，与韩复榘及所属的军政界人士交往颇深，因此，在山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基础比较深厚牢实。当蒋介石惩办了因抗战不力，丧失山东领土的韩复榘后，很快就任命沈某为鲁省主席。沈某就任沦为敌手的山东省主席之后，能够很快将一大批揭杆而起的民众武装，揽为自己名下，形成一个较强的武装集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海军部将所有的海军舰集中，编成一个大的作战集团，沈鸿烈手下仅剩两千余名海军陆战队员，而对日军的挑战，他加紧练兵备战。他曾向南京政府表示，青岛虽然地小兵少，却有守土抗战的决心。他开初的想法是要死守青岛的，因此，他将海军陆战队全部调到陆

上驻扎；把军舰上的大炮也卸下来，弄到岸上搞成要塞式防御火力。同时，发展青岛的保安队和武装警察力量，使之达到能参战的水平。

12月中旬，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失守，胶东半岛后路有被日军截断而成瓮中之鳖的危险，沈鸿烈的死守青岛计划成了泡影，下令将日本在青岛地区搞的几家纱厂和沧口太阳橡胶厂全部炸毁焚烧。蒋介石和李宗仁等人认为他的这一把火烧得很好，并冠之以“焦土抗战”而备加赞许。

沈某放了那一把火，在得到蒋介石电令同意之后，于12月29日，带领青岛市政府以下各级机关、学校的公职人员，以及武警部队、海军陆战队人员，向鲁西南方向实行大搬家、大撤退。

沈鸿烈把“家”搬到临沂就停了下来，精心整编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参加抗日队伍的青壮年较多，他把海军陆战队扩编为三千人，将市保安队、武警部队、大刀队等合编为警察总队，总队辖三个大队。这样，他这个海军上将，就有了一支不伦不类的六七千人的陆上武装。

队伍整编有了点眉目，他又开始继续向西搬家，跨过冰封三尺的微山湖，于38年1月中旬，到达鲁西曹县。1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他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山东省保安司令。

在台儿庄会战和徐州大会战期间，沈鸿烈指挥他那支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地方武装，经常“猫”在树林草丛间，向倾巢南下的华北日军屁股后头开枪打炮，或干些吃掉小股日军，或夜袭敌营之类的游击勾当。

38年5月底，徐州失守后，沈某带领省府机关和海军陆

战队、警察总队，从曹县向鲁西北敌后挺进，经定陶、菏泽、郓城过了黄河，先在黄河北岸的阳谷地区小住，跟着转进到了东阿县城。6月下旬，沈鸿烈到达聊城，与范筑先的武装会了师，范专员于6月29日，在聊城召开气氛颇为热烈的大会，欢迎沈省主席到敌后领导抗战。

沈某到达鲁西北后，立即着手恢复全省各级行政组织，以行政组织来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工作。他的措施与其他的游击根据地基本相同，即行政专员兼任保安旅长和该地区游击司令，以县长兼保安团长或保安大队长等。

这一套也就是实行军政民一体。这一措施对恢复敌后地方政权收效明显，他很快就在四十多个县恢复了敌后抗战政权，建立了实力雄厚的保安武装。

沈鸿烈在开初时期，也表现出一些政治上的进步性，比如他根据国民党中央在武汉珞珈山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制定了山东省政府的八条施政方针，其中有动员民众，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等内容，受到各方拥护和欢迎。根据施政方针，他对共产党方面推荐的曹漫等人，分别委任为蓬莱、黄县、栖霞、招远等四个县的县长。不久，共产党就在这一地区组织起了一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建立了八路军的胶东根据地。

沈鸿烈除建立了十六个保安旅，九个保安团之外，还有四个保安师和各种游杂武装，总兵力在二十万左右。其中兵力较雄厚，影响较大的有四股：

“磨擦专家”秦启荣部

秦启荣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前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常务委员兼复兴社山东干事长。抗战爆发后，秦被康泽委任为军委会别动总队第5纵队司令，在山东邹县一带挂牌拉队伍，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好几千人的武装。

徐州会战期间，秦某指挥其部在微山湖东北一带与敌周旋，瞅准时机游击敌军。

沈鸿烈就任山东省主席后，委任秦为省府建设厅长，其后，秦某率部东进，在淄博、临朐、莱芜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并继续扩编队伍。

鲁苏战区成立后，其部被冠以游击第3纵队。拥有兵力五六千人，编为十余个支队。因秦部在这一地区多次与八路军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被毛泽东称之为磨擦专家。

1943年8月初，秦启荣及其第5纵队被八路军鲁中部队包围消灭，秦某在突围时被打死。

吴文化部

吴文化，山东掖县人，早年因家贫，投报西北军，1929年追随韩复榘入主山东，任韩部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吴文化的手枪旅，各级军官均由他亲自选用，上下级之间相依为命，令行禁止，打起仗来以一当十。

韩复榘被处决后，吴文化的手枪旅一直随第3集团军参加抗战，不久，手枪旅扩编为新编第4师。

徐州失守后，吴部和第3集团军部分部队留在鲁西南打游击。1939年初，该部奉命向泛东地区转移，吴文化及其新4师官兵行至柳河北岸时，大都不愿离开鲁中父老，纷纷要求留

在山东敌后继续打游击。

于是，吴文化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留在山东敌后。蒋介石很快复电，批准其要求，并将新 4 师划归山东省政府指挥，改为山东省保安第 1 师。

吴文化率部从柳河北上，沿途数次打败企图拦截的日伪军，先在鲁西地区开展游击战，后逐渐转移至鲁山以南地区建立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二三人。1939 年底，日军向鲁南扫荡，吴文化指挥部队与日军一个联队血战，配合友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张步云部

张步云原系山东的一股落草为寇的悍匪，纠集匪众数千人，后为韩复榘招安，被编为山东省政府侦察队第 2 队。抗战爆发后，韩复榘根据张步云带兵打仗惯于依山傍水和干过绿林队伍的特长，为充分用其所长，将其任命为山东省政府游击司令。

山东失陷，韩某被处死刑后，张步云带着他的那几百名悍匪为骨干的山东省政府侦察第 2 队，以打游击为名，重新邀集山林，宣传发动民众起来抗日救国，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加他的队伍。转眼间，张某便有了七八千人，在滨北鲁中的高密、日照、诸城地区建立了一大块根据地。接着，他利用在这一地区的农民中流行甚广的迷信组织“万仙会”，组织起了好几万人的武装，在滨北鲁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1939 年夏天，张步云被沈鸿烈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保安第 2 师师长。由于沈某长期在青岛特别市当市长，在滨北鲁中影

响较大,张步云颇能诚服于沈,接受其调遣指挥。

赵保原部

赵保原原系北洋军阀张宗昌直鲁联军旧部,“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洲国靖安军营长,“七七事变”后随日军进入胶东,在海阳、莱阳地区组织伪“和平救国第7路军。”在日军的全力支持下,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四处拢络入心,拉了将近一年的队伍,仅搞起一支三四千人的武装。

1938年12月18日,赵某反戈一击,宣布反正抗日,并打电报给沈鸿烈,愿受其指挥。沈鸿烈见电大喜,当即复电,加委赵某为山东省政府保安第4师师长,并奖给五千块大洋,作为犒劳其部官兵。

赵保原部都是日军配发的武器装备,组织较严密,有一定战斗力,反正抗日后,得民众拥护支援,队伍很快发展为一万多人。

在胶东半岛上的国民党人李先良、蔡晋康、郑维屏、秦玉堂、苗占魁组织起的抗日民众武装,加上赵保原的保安第4师,共有五六万人,建立了半岛东南地区较为巩固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在38年至43年间,承受了日伪军多次大规模扫荡。

4. 左右游击的刘桂棠

刘桂棠出身于鲁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生活所迫,于二十岁时便平邑县拉杆为匪。当时主政山东的北洋军阀张宗昌曾数度派兵追剿,但刘桂棠在蒙山地区得地利人和,如同鱼游江河,与剿匪部队周旋自如。结果,出动的剿匪部队一次比

一次兵力多,而刘桂棠的匪徒却一次比一次更难对付,反而一天天地壮大起来。到1928年,刘桂棠已拥有匪军一万五千余人,控制了鲁中南整个蒙山地区。

1928年春天,何应钦将军率北伐军到达鲁南,刘桂棠第一次服从了国民革命军的招安,被何改编为新编第4师。刘部第一次扛着国家正规军的旗帜,名正言顺地离开了匪巢鲁南山区,浩浩荡荡地开往河南驻防。

其后,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刘桂棠被阎锡山任命为第25军军长,被张学良委任为第6混成旅旅长,被韩复榘委任为山东警备司令等职,其部先后驻守和征战过河南、河北、鲁西北等地。

1932年6月,韩复榘密谋吃掉刘匪,被刘察觉,当即率部突围北上,打败沿途堵截的东北军,一直杀到热河省境,为日本关东军招降,当上了伪“满洲国第3路军”的总指挥。日军进攻察哈尔省时,刘部匪伪军进犯至长城沽源一带,不久,又反戈一击,投向抗日同盟军,被冯玉祥将军任命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6路军司令。”

抗日同盟军战败后,刘桂棠率领他的那支悍匪部队南下,打败沿途拦截的各路兵马,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顺风,一直杀到河南南阳地区,方才驻足休整。

1934年初,刘桂棠及其四千余人的匪军从南阳窜回山东,韩复榘认为如不剿灭这股悍匪,山东省就不得安宁,遂调集重兵,对立足未稳的刘匪进行围剿,打得刘匪部队四处乱窜,最后在诸城地区被韩部国军重重包围,经二十昼夜艰苦血战,刘匪军被打散,刘桂棠只身逃脱。

1935年秋,刘又在河北宣化收集旧部三千多人,经半年

时间的整训,恢复了一点战斗力,于翌年初,刘带领其匪部三四千人的队伍南下。但他此次南下运气不佳,没走多远,就被宋哲元和商震两路人马包围,匪军被歼灭。刘桂棠再次于乱军之中只身逃脱,跑到天津,投降了日军的特务机关。

“七七事变”后,刘桂棠被日军封为“皇协军前进总司令”,跟在日军屁股后头返回了山东,很快又拉起了一支土匪武装,配上日造枪炮,耀武扬威地跟随日军参战。

阵诚将军在回忆武汉会战江北战场情况时,曾写道:1938年9月,“敌第十师团及刘桂棠匪部附炮兵两联队,重炮两大队,骑兵一联队,继续西犯,与我张自忠军激战于春和铺附近……”由此可见,在“七七事变”后,刘桂棠匪伪军是随日军参战最早的伪军了。

38年10月8日,刘桂棠匪军遇上了一个强手狠人,在豫南柳林地区,他被胡宗南的第17军团,一下子歼灭了千余兵力。

武汉大会战结束后,刘桂棠又回到了山东,在日军的关照下,匪伪部队有了发展,羽毛渐丰,实力增强,便不再听从日本鬼子的招呼了,带了部队转入鲁中山区。

沈鸿烈见刘桂棠脱离敌营,独树一帜,便派人前往联系策反,经一段时间的说服教育,于1939年10月12日,刘率部哗变,与日军血战一场。因日军对刘部哗变感到十分恼怒,决意将其彻底消灭,而刘部匪徒作战大都十分顽强,因此,这一仗杀得双方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双方死伤都很惨重。

刘桂棠正式宣布反正抗日,其部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6师。

刘部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余武装,以蒙山地区为根据地,开

展对日游击战。

在整个鲁南地区，国民党方面设有“鲁南游击指挥部”，由第57军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荣子恒任总指挥官。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游击军，除荣子恒和刘桂棠的部队外，尚有鲁苏战区游击军张里元的第1纵队，申从周的第10纵队，王洪九的第9纵队等部。

5. 守土抗战的范筑先

1938年12月5日。

国民政府传令全国军民，明令褒扬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令称：

自客岁日寇侵鲁，留驻河北（注：这里说的河北指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孤军抗战，卓著勋。前于反攻济南之时，命其幼子亲率挺进队直扑敌营，致罹于难。此项聊城之役，又复躬领卫士，以寡御众，血战竟日，慷慨捐躯。聊城县县长郑佐衡，警察局长林金堂，亦各尽忠职守，以身殉城。范筑先、郑佐衡、林金堂临难不苟，志节堪嘉，应予特令褒扬。

范筑先，字竹仙，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南彦寺村人。1881年12月12日生，1904年时，因家乡遭受水灾，生活无着，投入北洋陆军，从备补军渐次晋升为哨官、营长、团长、师参谋长、旅长等职。1912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胜利后，他被冯玉祥委为高级参议，1933年初，出任山东省沂水县县长和第三路军指挥部军法处长。

其后，范筑先调任临沂县长，为政清廉，革除旧弊，关心民众疾苦。他本人生活简朴，保持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吃粗粮，

穿布衣,从不摆官老爷架子,深受民众拥戴。

1936年7月,范再次调任沂水县长,当他打点行装出发时,全城百姓自动聚集街头,夹道欢送。民众代表赠送他一碗清水,一块镜子,一块豆腐,两根小葱,出以内心地赞扬他主持临沂县政期间,“明镜高悬,一清二白”。

1936年冬,范筑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范筑先在聊城主持军政会议,会议决定,第六区所属军政官员,无论敌情多么严重,条件多么艰苦,都必须坚持“守土抗战”,与鲁中父老存亡。大会通过了一道关于守土抗战向全国抗战军民的通电。通电说:

筑先委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日寇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在所不辞。

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个“守土抗战”的通电,对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特别是敌占区人民的游击战的开展,有较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对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关于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战略决策,亦有一定促进作用。

1938年7月2日。

蒋介石电令各省主席及各战区司令长官,慎重重申地方官员必须坚持守土抗战。电令说:

凡战区内或邻近战区地方之县长、专员及其他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形同潜逃,如有未奉附近高级军事长官之命令而擅自先退者,一经查明,即按军法惩处。

范筑先的守土抗战建立在扎扎实实地全民抗战的基础上,他广泛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训练民众,同时收编各种零散的游杂武装。他号召人民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共同兴办游击武装。经过他的艰苦工作和努力争取,组成了五个营的地方武装,以此为基础,向鲁西北敌后全面发展,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各地找那些自发的武装团体的领导们谈判,说服他们参加统一的抗日行动。

他在强敌占领的鲁西北地区,很快恢复了二十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建立了一块比较完整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块根据地里,他组建了三十五个支队、三路民军,约两万余兵力的游击部队。

1938年6月,沈鸿烈率领新组建的山东省政府机关及所属部队进入鲁西北根据地,加强了这一地区的游击战实力。

范筑先所领导的游击军,在鲁西北和豫北、冀南三省交界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大兵团作战。从1937年11月华北日军南下到黄河北岸时起,范筑先的游击健儿们就挥起了抗日的大片刀,先后在漂水镇、范县、齐河、濮县等地与凶恶的日军肉搏厮杀。

范筑先当时已年过花甲,但他处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临危不惧。在濮县七里堂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从战死的游击战士怀中抓过机枪,向蜂涌而来的日军扫射,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游击战士的杀敌热情。

1938年3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嘉奖范筑先及其地方团队坚持守土抗战,痛击日军的先进事迹,并发给奖金三千元。

38年5月初,在台儿庄会战期间,范筑先调集主力在范县、濮县一带阻击日军土肥原师团,与敌反复厮杀,死死拖住南下之敌。

在武汉会战期间,范部曾一度跨过黄河,深入到黄河南岸开展游击战。

38年8月中旬,范筑先与石友三第69军对济南日军发动联合攻势,极大地震慑了敌之后方。范之次子范树民率领“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在与敌人血战中,不幸中弹,光荣就义。范筑先强忍悲痛,毅然将年仅二十岁的女儿范树琨送上杀敌战场,令其接任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队长,接过其兄的纲枪,杀敌卫国。

范家父子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了广大抗日军民的爱国之心,各地军民纷纷致电慰问。范在《抗战日报》上撰文答曰:“为国捐躯,系属军人光荣,承各方函电慰问,弥深感谢。马革裹尸,男儿应俱夙愿,即获疆场殉国,死后何憾!”。

38年11月,日军纠集大批兵力,配以飞机,装甲战车等机械化部队,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战。

11月14日,范筑先及其卫队六七百人被日军包围在聊城,双方血战至翌日清早,日军的大批援军赶到,攻破了县城东门阵地。范筑先在前沿阵地指挥督战,手臂受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时近中午,敌人凭借其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掩护,攻破四面城门,敌人嚎叫着蜂涌而至。范筑先及其守城将士临危不惧,寸土必争,全城都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最后,范筑先及其全体将士,全部战死!

范筑先壮烈殉国的噩耗传出,全国军民一片悲痛,同时也更加鼓舞了亿万军民团结御侮,反抗外敌入侵的决心。

重庆。国民政府举行隆重大会，沉痛追悼守土抗战英烈范筑先。12月15日，国民政府通令嘉免其忠勇卫国，保土保民的事迹，号召全国军民以范筑先为榜样，把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延安。中国共产党为范筑先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八路军高级将领们纷纷亲笔撰写挽联，深切痛悼守土抗战的民族英烈范筑先。

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惟其忠勇；
吾辈尚存，誓必长期抗战，还我河山。

——朱德

6. 于学忠败退山东和李仙洲受阻湖西

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日军对山东的游击军感到异常恼火，决心倾注大的兵力，以异乎寻常的残酷手段，扫荡游击根据地，打垮其主力。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南太平洋上象台风似地席卷美英领地，其战胜的骄狂情绪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与之相适应，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于12月16日，向东京大本营提出了一揽子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方案，其中，在华北要彻底“扫荡鲁南作战之残敌。”

接着，日军纠集优势兵力，对山东军民的扫荡一次比一次残酷，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41年末，日伪军出动兵力五万余人，在大批轰炸机的配合下，对鲁中南地区进行毁灭性大扫荡，遭受扫荡的重灾区为沂水、临沂、费县、蒙阴等地。根据地军民与敌巧妙地周旋，以

游击战对敌正规战，经旬余血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1942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日伪军一万五千余兵力，对鲁中地区采取拉网合围扫荡。

同年11月下旬至12月，敌人对鲁中地区的扫荡尚未结束，又调集兵力二万余人，对胶东半岛游击区发动了大扫荡，采用的手段仍然是残酷的拉网合围。

在强敌大规模的连续扫荡下，许多地方的游击军难以立足，吴文化、张步云等人率部投敌，打起了“和平”旗号，走了“曲线救国”的路。

1943年春，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山东敌后的游击武装展开了更加残酷的扫荡，重点打击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主力第51、第57两军。

1月，日伪军万余兵力，在鲁西北实行拉网合围扫荡。

2月，日军从青岛、潍坊、济南等地调集重兵，发动了号称摧毁鲁苏战区根据地的大扫荡，整个鲁中地区都展开了大血战。

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所在的部队和秦启荣所领导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安丘西南地区。周复将军亲率八百余人向东突围，旋遭失败，又折向西进，在张家溜西南城顶山再次陷人重围，几经苦战，坚持到翌日早上，周中将命令集中火力，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围。他率领几十人的敢死队冲在最前面开路，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周复中将是国民政府军在抗战时阵亡的政工人员中职务最高的一名将军。

5月中旬，驻扎在胶济路的日军第5、第7两个混成旅团，和大批伪军，对沂山北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第51军发动

大规模扫荡。第 51 军的两个师与强敌苦战数日，虽然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但自己亦伤亡过重，无力抵抗日伪军的进攻。战区总司令部遭到日伪军包围袭击，伤亡官兵千余，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上将臂部连中七弹。

鲁苏战区总司令部难以立足，在鲁中南地区艰苦周旋，急电重庆统帅部，要求火速增派部队入鲁支撑残局。

1943 年初，蒋介石命令驻于皖北黄泛区阜阳地区的李仙洲第 28 集团军立即入鲁，增援处于绝境的鲁苏战区。具体行动方案为：在微山湖东西两侧集结部队，建立根据地，接应第 28 集团军主力挺进山东敌后。

第一，以鲁西行署主任孙性斋部，第二区专员曹班亭部，江苏苏北专员汤铁飞部，沛县县长兼苏鲁豫第 3 游击纵队司令冯子固部，苏鲁豫游击第 7 纵队，第 8 纵队，和第 28 集团军 92 军的 121 师一个团等部，由暂编第 30 师师长路可贞将军统一指挥。任务：建立微山湖西侧根据地，掩护第 28 集团军主力从皖北进入鲁西。

第二，以第 28 集团军 92 军 142 师主力（已于 43 年 2 月挺进至微山湖东侧抱犊崮地区），新编第 36 师刘桂棠部，鲁苏战区游击第 9 纵队王洪九等各部，由第 142 师师长刘春岭将军指挥。任务：建立微山湖东侧根据地，迎接第 28 集团军主力从西侧渡过微山湖，再挺进鲁南山区。

第 28 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将军，第 92 军军长侯镜如将军于 1943 年 4 月，率领所部第 21 师，暂 56 师，暂 30 师等部，从皖北阜阳地区出发，穿过涡河和陇海铁路封锁线，进入了湖西地区。此时，集结于微山湖西边的国民党游击军共有二万多兵力。

这样一支庞大的战略部队开进敌后，必然引起敌方的恫惧。第28集团军主力刚到湖西地区，日军便出动大批兵力，在坦克部队配合下，对李部发动突然侵袭。李部因刚到新地方，情况尚不十分熟悉，仓促应战，损失很大。

由于李部入鲁还有与八路军争夺地盘的目的。所以，接着又跟八路军发生“磨擦”，李部在湖西踌躇滞留了三个多月，“屡经冀鲁豫部队打击，伤亡逃跑过半，其窜过微山湖与刘桂棠军会合的刘春岭一四二师两个团，以抢掠为生，被鲁南八路军阻击，不能前进一步。如李、侯不率主力过铁路，势必被八路军消灭。”

此时，于学忠已率第51军残部渡过微山湖。李、侯等人见战区总司令官带着一身的枪伤归来的惨景，无不受到极大憾动。

于学忠部未等李仙洲部前来接防就败退出鲁，从此，在山东境内，“已无顽军”的正规部队，留在敌后的“土顽”，亦难以立足，要吗打起汪伪的“和平”布片，以图自保，搞所谓的“曲线救国”，要吗被日伪军扫荡消灭。

山东境内，国军的游击战基本完结了。

第十章 挥戈江南

1937年11月初。

震惊中外的淞沪大会战在尸山血海中已鏖战了三个多月，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全中国，但当他们倾注了陆海军所有力量，狠狠打了三个月，却连中国东海岸边上海这座城市的门槛也没能踏进。

11月5日。在濛濛阴雾中，水天浑沌的东海海面上，一支由八十多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黑压压地向杭州湾开来。

日军第10军第6、第18、第114师团，以及军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后备兵团等十数万兵力，在杭州湾漕沿镇、金山卫和全公亭等地纷纷登陆。

日军从南方迂回攻击，上海防线终于动摇。11月12日，上海失守。

日军分数路沿京沪铁路线向南京推进。他们一路走，一路烧杀淫掠，整个京沪沿线，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火龙。

整个长江下游三角地带狼烟遍野，哭号恸天，无村不戴孝。优秀的长江文化的结晶，在侵略军炮火中化为灰烬。

沿太湖南侧推进的日军有三个多师团，烧杀的火光映红了烟波浩渺的太湖水。湖州城居民第一天被杀三百多人，长兴

城被杀二百多人，五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另有六个集镇被烧成一片废墟，居民被集体屠杀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嘉兴城居民被杀一千多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嘉兴特派员张宗良在湖州双村被日军抓住，凛然不屈，惨遭杀害。

溧阳、溧水、金坛等县被日军烧杀更惨。

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展开了杀人大竞赛，仅南京城内的中国军民就被屠杀三十余万人。

富饶美丽的长江下游三角地带全部沦为日军的铁蹄之下。这一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人杰地灵，文化发达，湖光山色，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民殷实。这里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是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最为深厚的地区之一。“江浙财团”和民族工业家、实业家们的家当老本大都集中于此。

日军的野蛮入侵和占领，打破了这里中国人的各种利益，侮辱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新四军和第三战区的正规军、地方民团武装，忠义救国军以及军统、中统潜伏人员，民间青红帮，大、小刀会，台湾义勇队等等，所表现出来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如此强烈的民族性，都市骑士风度和现代牛仔风度，他们与日军斗智斗勇，短兵相接，英勇顽强。

江南地区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将日伪势力迫压在狭窄一隅，使其深陷于民族复仇的汪洋大海之中，其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游击战争图画，在今天，仍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1. 浙江民众游击力量的发展

1937年12月中旬。

日军从太湖地区分途南犯，向浙江省会杭州城扑来。第10集团军韦云淞将军率部在杭州西北之天目山一带，冒着寒冷的冬雨，在泥泞的阵地上与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血战。

隆隆的炮声震撼着杭州古城。

杭州城内的居民，已在省市当局统一组织下，向后方疏散完毕，一条条街道店铺关门，行人绝迹，全城一片死寂。

12月23日。铅灰色的天空，仍旧下着淅淅沥沥的苦雨，仿佛是天公在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为长江下游三角地带所惨遭的不幸而哭泣流泪。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将军及其省府人员，乘坐大卡车从城里出来，卡车在雨中缓慢地向钱塘江大桥以南开去。省主席深情地凝望着这座即将陷入敌手的文化名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味儿。

最后从城里出来的是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将军，他身上披了件雨衣，身后跟着几个卫士，他是在检查了城里军民的撤退情况后，才离开杭州城的。他从风雨中步行来到钱塘江大桥南头，这里有一队工兵立在雨中，等待着什么。

刘建绪在工兵前面站下来，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声音有些发哽地对他们说：“城里都撤完了，干吧！”

工兵按下电钮，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轰然断毁，坠入江水之中。

滔滔潮水，隔断了南北两岸。

北岸(浙西)连同天下闻名的杭州城，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了。南岸(浙东)，刘建绪的第10集团军主力沿岸抢占阵地，准备固守。

1938年1月。

白崇禧将军奉蒋介石之令，来到浙江金华，与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将军一起，召集三角地带（江南）的军政长官会议，黄绍竑、刘建绪和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等人参加。会议主要商讨了长江下游三角地带的抗战大计，决定第三战区今后将以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袭击骚扰日军。同时决定由黄绍竑兼任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以便广泛动员和组织浙江的民众武装，配合正规军打游击。

会后，黄绍竑在金华组建了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和浙江省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在各县、区、乡恢复和健全了行政组织，编练民众武装。

38年1月，浙西“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在吴兴潘店附近的铜盆寺宣告成立，接着，整个浙西敌后的杭、嘉、湖地区，游击队纷纷扯旗上阵，配合正规军打击日寇。

1月下旬，在黄绍竑支持下，浙江省第一支战时政治工作队在兰溪成立。跟着，全省有七十五个县成立了战时政工队，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三个区政工队，五个省政工队，共有政工干部和政工队员三千余人。政工队员都配发武器，深入敌后，发动民众，恢复政权，开展游击战，颇似电影上的八路军武工队（1940年6月以后，各县政工队改为青年服务队，隶属于三青团浙江支部）。

浙江省第三区第一战地政工队组建后，立即北渡钱塘江，到敌后开展游击战，38年6月在海盐茶院附近与敌遭遇，政工队副队长王国，干事长吴甦等二十二名政工人员英勇牺牲。

浙江省政府在丽水碧湖成立了政治训练团和青年训练团，黄绍竑兼任这两个团的团长，专门集训战时工作人员。另

外；省府还在丽水举办童子军教练人员集训营，第一期有二百余名教练受训。

38年5月，绍兴地区成立了自卫妇女营、少年营和青年营，这三个营都是武装抗敌组织，由浙江省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贺扬灵兼任这三个营的营长。绍兴妇女营率先北渡钱塘江，深入到海宁以北开展敌后游击战。这些英姿飒爽的江南女子，到处袭击小股日军，破坏上海至杭州的铁路交通，他们英勇战斗的感人事迹，在当时的国内外报刊上登载很多。

到1938年春天，浙江省的民众武装和游击队已遍布全省各地。在浙东地区，由原省会警察部队、内河水警、省府警卫队，以及地方团队改编充实，统一组建成了“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共有八个支队。

各地行署专区，将原有的地方团队，改编充实成为九个自卫总队。

各县自卫队皆拥有上万至几百的武装。

38年8月，省主席黄绍竑到前线各地视察，诸暨县举行抗日肃奸大会，集中全县群众武装接受黄省主席的检阅，该县仅参加检阅的土枪队员就有两万多人。

稍后，全省各县都建立了国民兵团，由县长兼任团长，另以一名军官任副团长，负责实际训练和指挥。

游击队拉起来了，为了解决武器弹药不足的问题。38年9月，省政府在丽水大港头兴办了“浙江省铁工厂”，即省属兵工厂。铁工厂下设三个分厂：云和小顺分厂，制造步枪；石塘分厂，制造轻机枪；玉溪分厂，制造手榴弹、掷弹筒及各种爆破品，以及制造迫击炮和炮弹等。兵工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到后来，每月可制造步枪千多条，轻机枪五十多挺，手榴弹五六

万枚。

地方游击队，由于得到充足的武器装备，成为一支较有战斗力的武装。

1939年1月初，黄绍竑在浙西敌后天目山建立“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行署”（后改名为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负责指挥浙西敌后二十二个县的游击战。

1940年1月，日军突破钱江防线，浙东一部为日军占领，省政府在姚城建立“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钱江右岸指挥部”，负责这一地区的敌后游击工作。

第三战区长官部将浙西天目山为根据地的游击区，划为本战区第1游击区，通常在此配置一个正规军，与游击队一起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0年夏季。

俞济时率领第68军三个师在新昌建立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部，奉命将浙江省所属四个游击纵队整编为暂编第9军（暂32、暂33、暂34三个师），将浙江省一个保安纵队整编为暂35师。

浙江省政府发展的地方游击武装主力，被整编为正规军后，不久，又撤销了省府“抗日自卫团总部”，但该地区的游击战并未受到削弱，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三战区部队本身就担任游击战任务，同时，忠义救国军的力量已在三角地区发展壮大起来。

2. 江南野鼠——忠义救国军之一 城乡游击战

“江南野鼠忠义救国军”之说，笔者仅见之于日本方面的

资料。

江南野鼠的特点不外乎：到处打洞（建立根据地和地下据点），到处生儿繁殖（发展游击势力），到处乱窜破坏（开展破袭战，大搞恐怖活动）。

江青主持创作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对忠义救国军已作了形象的概括，忠救军司令胡传魁腆着肥嘟嘟的大肚皮，唱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

如歌词所说，忠救军起于中日战争的乱世，他的骨干分子为军统特工人员和青红帮骨干会员，其社会基础也可说是青红帮会众。忠救军的领导人是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上海青帮舵把子杜月笙对这支队伍有相当影响。他的一部分成员曾投降日军，如1939年11月9日，忠救军淞沪区副总指挥何行健带了一些人投敌，被日军改编为和平救国军。汪伪政府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的私人武装——税警团中的一部分人，亦是忠救军的投敌人员。这些可称为“勾挂三方来闯荡”的“曲线救国”者了。

忠救军活动的地方主要是上海近郊的太湖地区。他开初起于上海城，后发展壮大，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内有潜伏人员，专搞暗杀策反等地下活动。在上海近郊、浙西莫干山、天目山、淳安；安徽的广德、屯溪等地建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总指挥先为刘志陆，后为周伟龙。

忠救军发展到顶峰时，有二十多个支队，号称十万大军。因其为军统特务武装，组织严密，武器精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冒险精神。他的主要人员本来就是军统特工和青帮中闯荡江湖的好汉，具有搞暗杀、爆炸、潜伏伪装、策反等功夫。后

来,相当一部分骨干人员又经过“中美合作社雄村训练班”(在安徽省的屯溪雄村),美军洋特务们传授了几手美国牛仔那种翻墙越室,扒火车炸桥梁的手艺,就使这支队伍更加具有神奇色彩。

1937年8月15日,夜晚。

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内客厅里,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正跟瘦精精的青帮三巨头之一的杜月笙大吹牛皮。戴笠显得特别激动,说他在十几天前向军统天津站去了两回电报,那里的特工就拉起了一支两千多人的军队,拥有长短枪七八百杆,这会儿正在天津敌后大搞日本军的恐怖活动。于是,他提出更大的设想,准备在上海拉一支一万多人的武装,他已把这支武装的名字都取好了,叫作别动队。他这来找杜某,是因为杜在上海黑势力中有很大大号召力。

杜月笙对此大感兴趣,两人一拍即舍,商讨了成立别动队的具体办法。

一个月后,别动队拉了起来。他的组成人员分别是:在京沪一带搞情报和行动工作的特工人员;正在接受军统特别训练,预作军统特工的两三千名高中、大学生;上海各区保卫团中部分与杜月笙有瓜葛的帮会人员;新招收的部分社会青年和工人,无业游民,青红帮会员等等,共一万零八百人,编成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

1937年9月上旬,由蒋介石电令,将这支武装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别动队成立后,戴笠和杜月笙对其进行短期突击训练,分别在青浦设立“技术训练班”,在佘山设“教导团”;在松江设“特训班”。训练的主要内容为:游击战——侦察、擒拿、破坏,

突击、暗杀等。

37年11月上旬，淞沪会战结束前，别动队全部开赴前线作战。

第1、第2两支队进入浦东防线，担负掩护正规军撤退的任务，完成任务后即化整为零，就地坚持游击战，后来，他们在浦东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第3、第5支队共五千余人，开赴南市，配合第55师一个旅掩护大军转移，与敌激战三天三夜，打得十分亡命，使凶悍的日军在此付出重大伤亡。这两个支队完成任务后，第5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就地开展游击战。第3支队按上级命令，逃进法租界，把枪支弹药交给租界巡捕，一部分潜入地下，在上海城内搞日伪的恐怖活动，另一部分由俞作柏带领，穿过敌占区，辗转到达安徽忠救军的根据地。

第4支队的主力两千余人，奉命在苏州河北岸占领阵地，掩护大军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全体官兵誓死不退，与日军血战，孤军无援，直至全部战死苏州河畔。

第4支队一部和特务大队以及几个训练班的官兵、学员，跟随正规军转移，先后退到苏州、溧水、繁昌、九江等地，后来到达安徽祁门附近。

别动队经上海一战，损失惨重。但它是军委会军统局直接领导的特务武装，有蒋介石撑腰，又扎根于青红帮势力之中，得到第三战区的重视和支持，他大量吞并地方团队和游杂武装，很快在上海四郊、浙西、皖南等地建立了根据地，拉起了数万人的武装，由戴笠将其整编更名为“忠义救国军”。

退入浦东的忠救军吞并和联合其他武装，配合上海城内的潜伏人员，频繁袭击日军，使驻扎上海的日军损失很大，日

军恼羞成怒，调集重兵对这一地区的游击队进行大清剿。

1938年1月18日。驻上海的日军发言人向各国宣布：由于浦东地区中国游击武装活动剧烈，威胁上海安全。于是，日军决定在这一地区戒严，封锁内外交通。在此通告各国商人，“浦东全区正进行军事行动，期扫除该区游击队三千余人，故不得不杜绝交通，外商堆存浦东货物，暂不准前往搬运。”

日军以牛刀宰鸡战术，出动大批兵力，原想对付小小的三千多人的忠救军，是完全不在话下的，哪知，他们扫荡了一阵子，不但没有捕捉到这些江南野鼠，反而使野鼠们翻了天，活动更加频繁了。日军毛了，采取烧毁村庄的办法来收拾他们，上海四郊，无数村庄被扫荡的日军烧毁。

4月底，上海近郊的游击队又冒了出来，向松江地区的日伪军发动攻击。

5月下旬，游击队集结大批力量在南翔、大场等地与日伪军展开激战。

1938年8月13日，也就是上海“八一三”抗战一周年这天，夜里，三百多名游击队员摸进上海虹桥机场，将机场内的日军全部打死，机场设施尽遭破坏，直到翌日凌晨，游击队才撤退机场，逃之夭夭。

几天后，游击队又聚集浦东川沙县城附近，向县城之敌发动强大攻势，守城的伪军抵挡不住，弃城逃窜。之后，伪军在日军的支援下杀回川沙县城。川沙县伪维持会委员，汉奸瞿木香自恃有日军撑腰，残害百姓，作恶多端，游击队将其抓捕，公开处死，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

38年底，上海地区的日军出动三千多兵力，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向上海近郊发动扫荡。日军首先向南汇地区进犯，

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仅 12 月 13 日一天，日军就将鲁家汇、张江栅、召家楼等处烧成一片焦土，民众被屠杀数百人。

17 日，日军攻占南汇县城，把对游击队的仇恨都发泄在这座城镇建筑物上，寇兵大肆纵火焚烧，把城内精华区变成一片废墟。

当日军对浦东地区的忠救军进行大肆扫荡退任时，忠救军熊剑东部却于 12 月下旬，在京沪铁路沿线的崑山、太仓、常熟、嘉定四县境内，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连续激战三天三夜，摧毁敌军据点一批，毙敌数百名，其中还打死日军大佐联队长一人。

1939 年 2 月下旬，上海伪军陈安有部八百余人，在调往沪西青浦县时，向忠救军投降。

39 年冬季，忠救军淞沪地区副指挥何行健（原别动队第 1 支队支队长）率部投敌，使上海郊区的游击力量受到一定削弱。

1940 年 11 月 19 日。

汪精卫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纷纷爬上“天马号”专列，从上海前去南京为汪伪政府朝贺捧场。“天马号”贵宾专列由数百名日、伪军随车护送保镖，铁路原途的日伪据点，更是百倍警惕，戒备森严。

那天早上，“天马”从上海开出，来到苏州城外外跨塘附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黑烟冲天而起，“天马”被猛地掀翻在铁轨之外，当即死日军大佐两名，内阁庆典专员两名，情报人员多人，各国使节及随车军队死一百余人。

这起爆炸事件是忠救军精心策划并实施的。汪精卫的还都典礼尚未开场,就被笼罩上一层浓厚的阴云。

忠救军“苏嘉沪挺进总队”在莫干山那浩浩荡荡的参天竹海中建立的根据地,亦很使日军伤脑筋。这些江南野鼠躲在草丛竹海中,平时看不见找不着,瞅准机会,他们便通过吴兴向金泽,章练塘一带出击,打得日军防不胜防,蒙受了重大损失。日伪军多次进山扫荡,都是两手空空而回,日军在一怒之下,将根据地附近的丰草和数十里宽的参天修竹烧了个精光,声称要彻底烧死江南野鼠。

1941年底,汪精卫政府特工总部所属“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内,特地设立了一个机关,名叫“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简称工作团),该特务组织是专门对付忠救军地下人员的。

3. 江南野鼠——忠义救国军之二： 都市恐怖活动

这里述及的都市恐怖活动,特指忠义救国军配合上海、南京城内的潜伏人员,或单独对日伪人员进行的暗杀、爆炸等活动。

上海失陷后,军统在这里设有地下工作站(上海站),上海站下设“行动小组”,专搞情报和恐怖活动。行动小组的组长由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青红帮中的狠人,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组长陈默担任。

1938年1月1日至8月8日期间,忠救军地下人员在上海制造的爆炸和暗杀日伪人员主要事件有:

38年元旦,清早。

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伪“市民协会主席”、汉奸顾馨一，大清早起来去开门，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大捆手榴弹爆炸了。顾某受了伤，从地上抬起头来一看，门前到处是抗日救国大同盟的传单。

同日，日军在上海公共租界游行示威，队伍正行进中，猛地一声巨响。日军们赶紧趴到地上，待硝烟慢慢散去，只见四个日本军人躺在血泊中痛苦地蠕动。

在1、2月间，上海租界接连发生爆炸十多回，日本领署和伪上海市政府均遭炸弹袭击。

正在四处钻营讨好日军，争取当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的汉奸范罡，被军统地下人员击毙在威海卫路家门口。

伪“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汉奸范耆生、关阴波，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前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汉奸周凤歧，伪上海总工会副会长周柳五，上海市伪自治会会长、汉奸陈沅等人，均在38年春夏前后被忠救军地下人员暗杀。

6月25日，伪“上海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在元旦清早被警告性爆炸后，仍不思悔改，继续为侵略军效劳，四乡收刮粮食以作日伪军粮，被忠救军行动小组刺杀毙命。

38年夏季以后，青红帮中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开始投敌，于是，这些人物也就陆续受到地下人员的制裁。

在公共租界内地位跟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的青帮头子，捕房头脑汉奸陆连奎，在中央饭店内被刺杀。

杜月笙青帮中弟子，法租界捕房头目，汉奸曹炳生，在马路上被行动小组用冲锋枪扫射毙命。

杜月笙帮中心腹弟子余叶封，参加伪“新亚和平促进会”，负责收购棉花供给日军，被杜月笙的弟子、军统特务们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包厢里。

俞叶封受到制裁后，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发起组织人、上海青帮三巨头（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之一的张啸林，受到极大震摄，从此闭门不出，还顾了二十几个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住在张公馆内。同时，在张公馆的前门还有日本宪兵重兵把守，日夜巡逻。结果，行动小组买通院内一个保镖，张啸林被那保镖击毙在自己的公馆里，同时被打死的还有杭州锡箔局长、汉奸吴静观。

接着，原中国通商银行大老板，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潜伏人员用两万块大洋买通了傅家厨师朱老头，在禁卫森严、如临大敌的虹口傅市长公馆，被朱老头一斧子砍死，为民除了害。

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在四马路望平街，被潜伏人员狙击成重伤。

两个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被潜伏人员行刺，侥幸保全性命。

39年2月19日，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在上海愚园路住宅内被刺死。

8月16日，南京汉奸组织“黄道会会长”常玉清被刺死。

12月21日，与汪精卫一起从重庆潜逃的大汉奸丁默村（汪伪行政院社会部部长），在上海静安寺被刺受伤，险些丧命。

日本宪兵补充队队长高英三郎，在日军野战医院治病，被潜伏人员下毒毒毙。

日军间谍，“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大白天在街道上散步，被潜伏人员用暗枪击毙。

1939年底之前，潜伏人员暗杀上海城内日军间谍和汉奸要员共六十多人，造成敌人重大损失的破袭行动二十多次，日军停泊在江中的舰艇，也屡遭他们爆炸、焚烧。

日军运输舰唐山丸号、卢山丸号、顺丸号、沅江丸号，南通丸号、音户丸号等先后被潜伏人员烧毁，造成日军物资重大损失。

在这期间，被潜伏人员烧掉的日军汽艇有二十多艘。

1941年初，汪伪政府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周佛海任银行总裁。忠救军潜伏人员接连暗杀了伪中央储备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李翔聊，职员王汉臣，庶务科长潘旭东，设计主任楼桐，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等人，吓得储备行职员不敢上班，银行濒于关门。

汪伪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派吴四宝为行动大队长，对重庆国民政府设在租界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职员进行报复暗杀。

潜伏人员马上改变“行动”方针，不再暗杀储备行人员，专杀日军军官和敌伪特工人员。自41年1月下旬开始，先后被暗杀的敌伪人员有：日军大佐森贞一郎，伪特务行动队中队长王荣，伪工运执行委员胡兆麟，伪上海情报处长兼日本海军司令部情报主任朱建功，伪上海印花税局长卢志印，日本交易所经理谢克昌，上海日军军部情报队长周鸿业，伪上海青年团团团长周宝大，副团长余清廷，日军特务部情报员尾村及助手许富荣，日军新编第4旅团长福本少将，万里浪的助手徐国权。伪特务督察长毕刚被刺杀后九天，继任督察长秦人杰又被枪毙

于白利南路同一出事点。

潜伏人员在上海、南京城内大搞恐怖活动，对日伪打击很大，日伪方面下了大的决心，千方百计破坏潜伏组织，捕杀潜伏员。

汪伪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通过争取中统苏沪区副区长、上海行动总队队长苏成德的叛变，打开了破坏上海中统和忠救军潜伏组织的缺口，将中统在上海的地下人员几乎一网打尽。

南京地区的忠救军经常派遣人员进城搞暗杀活动，他们进城后总是去找忠救军南京行动总队头目何柏椿接头，哪知，何某早已投敌，潜进城去的一批批忠救军人员，都被何某扣捕，有的跟何柏椿投敌叛变，充当汪伪特务，反过来对付忠救军；不肯投敌变节的，就被他们杀掉，忠救军在此损失十分惨痛。

1940年，国民党在南京的潜伏人员贾国民等三人，被汪伪特务机关侦悉破获，惨遭逮捕枪杀。

1941年，国民党南京市委的潜伏人员陈觉吾和陆某等人，被汪伪特务侦破抓捕。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张小通被李士群破获后，押至中央路大树根76号内（伪特务机关行动科办公点），被汪伪特务用砍刀肢解成数块，然后用硝酸水毁尸灭迹。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陆庆颐等二人，被捕后，经汪精卫批准处以死刑，被押到雨花台枪杀。

忠救军潜伏在南京的特派员邵明贤、王林等四人被汪伪特务破获逮捕，邵明贤遭枪杀。

忠救军潜伏人员黄逸光、黄征夫在执行暗杀汪精卫的行

动中，被汪伪特工破获抓捕，黄逸光被枪杀，黄征夫被投进监牢。

军统为打击南京汪伪特工的嚣张气焰，决定杀几个汪伪特务头目。军统特务强一虎奉命潜入南京，买通了伪南京区警卫大队分队长刘良，结果，事未成功，反遭汪伪特工抓获，强一虎被枪杀，刘良被叛无期徒刑。

打进汪伪南京特务机关“南京政治保卫分局”的忠救军人员张大纲，也被汪伪特工挖了出来。

4. 苏南、浙西游击战

在苏南、浙西地区的国民党方面的游击军计有：第三战区部分正规军；江苏省政府苏南行署主任冷欣部；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属部队；忠救军苏浙行动总队所属武装。

长江下游三角地带被日军占领的初期，第三战区配置于钱塘江南岸的仅为刘建绪第10集团军的两个军，后来，冷欣率第63师和方日英第40师进入苏南，在金坛县设立苏南行署和第三战区第2游击区指挥部，开劈了以溧阳、溧水、金坛、郎溪、广德、宜兴等县组成的一块敌后根据地。

浙西行署则以天目山为根据地，与莫干山的忠救军划为第三战区的1游击区。

在这一地区的游击军，主要以日军占领的京沪铁路线、沪杭铁路线和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为袭击、破坏的对象。

38年1月2日，第10集团军一部渡过钱塘江，与北岸游击队会合，向杭州之敌发动反攻，双方在郊区激战了一整夜，游击军攻占了六和塔、南星桥一带阵地。

2月中旬，杭州郊区的游击队袭击沪杭线弹药地区的日

军据点,在当地民众的大力配合下,奇袭取得圆满成功,打死日军数十人。日军恼羞成怒,于17日从笕桥出动大批兵力,赶到乔司镇,未能找到游击队,于是,在镇内四处纵火,见人就杀。该镇居民被屠杀一千六百多人,房屋被烧毁二千余间。事后,游击队赶回,将遇难居民集体掩埋,并立石碑一座,上刻“戎寅公墓”,俗称“千人坑”。

3月份,游击队在浙西、苏南地区全面出击。5日,游击队派出敢死队数支,分头夜袭杭州观音桥、凤山门、古荡等处的日军据点,毙敌数十人,搅得整个杭州城的日伪军坐卧不安。同时,游击队截断了杭州与长兴之间日军的交通线,先后攻克了德清、海宁、嘉兴、吴兴、海盐、泗安、长兴、溧阳等县城,京沪地区的日军感到大惊失色。

4月5日,游击军包围并向富阳之敌发动猛攻,打死日军六百余名。

5月初,游击军袭击了京沪铁路线上之日军,一度攻克武进县城,缴获战利品颇多。

5月中旬,第10集团军28军62师一部深入到浙西敌后之海盐县,以便衣队混进县城,发动奇袭,里应外合,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死伤严重,残余日军败逃至乍浦。该部一度占领海盐县城,使嘉兴一带的日伪军大为震惊。

武汉会战期间,第三战区部队配合游击队,在苏南浙西敌后展开大规模游击战,牵制京沪地区的日军兵力。8月份,游击军先后攻取武康(毙敌四百余人),接着又连续攻取了平湖、富阳、乍浦、海盐等县城。

8月23日,国军游击队与新四军一部配合,在苏南丹阳地区夹日军汽艇,打沉六艘,击毙日军五十余人。

9月中旬,第28军与游击队配合,在钱塘江北岸富阳一带发动反攻,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和第28军军长陶广均亲赴北岸指挥。富阳日军战力不支,弃城东逃,败退杭州。此役日军遗尸一千余具。

11月初,浙西太湖沿岸游击队著名女英雄蔡一飞率领游击队转移时,在长兴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一昼夜血战,游击队损失惨重,抗日女英雄蔡一飞英勇牺牲。

11月下旬,沪杭铁路线因屡遭游击队破坏,致使日军的交通处于瘫痪,日军不得不组织“铁路防护团”,专门守护这条铁路线。

1939年1月初,游击队歼灭了溧阳县城之敌,大肆发动民众,清除日伪势力。接着又在南京城以东的句容至溧阳一线,大规模破坏公路。

3月1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江南游击战计划:第一,以第10集团军之一个师另一个旅的正规部队,配合沪杭挺进队,向沪、杭地区出击,摧毁该地区日伪政权,扫荡敌伪势力,建立根据地。

第二,以第32集团之两个师的正规部队,配合京、沪挺进纵队,向京、沪地区出击,建立游击根据地。

第三,江苏、浙江两省政府及省党部,选派党政干部若干,随军行动,恢复游击区各级政权。

第四,于3月30日前将以上各项计划准备完毕,4月1日夜开始行动。

3月下旬,第28军62师和游击队,为了截断杭州至南京间的陆上交通,炸毁武康三桥埠大桥,并发动敌后民众,将三桥埠至埭溪间五十多公里的公路彻底破坏,使日军京杭间的

公路运输中断了将近四个月。

6月初,顾祝同令冷欣第63师和钱塘江南岸守备部队,挺进到杭州附近,支援那里的敌后游击战。

10月6日,游击队在杭州东北的临平附近设伏,用地雷炸翻日军运兵列车,伏兵乘机出击,歼敌三百余名。

10月14日,夜间,游击队攻入杭州市区,在日伪机关和艮山门火车站、拱宸桥一带大肆纵火焚烧,造成杭州城内日伪军一片恐慌混乱。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了一整夜的激烈巷战,天亮前顺利撤退而去。

39年冬季攻势期间,苏南浙西和上海地区游击武装,向敌发动了全面反攻,在浙西,以刘建绪第10集团军和天目山各路游击队会合,分别攻入杭州、富阳、余杭等大中城镇,与敌展开近战夜战,烧毁敌人物资仓库多座。

1940年秋季,第88军奉命挺进苏南溧阳、宜兴地区,加强了那里的敌后抗战力量,巩固了苏南根据地。

5. 长江航线腰击战

日军占领武汉后,长江水运成为武汉侵华日军第11军团三十多万人马的补给线,在芜湖至湖口间几百里的航线上,配置了第106、第116两个师团的兵力。但因这一地区水网纵横,湖沼遍地,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只能勉强占领长江沿岸一线,构筑坚固的据点和堡垒式防御工事,并层层设障,在海军舰队和航空力量的支援下,被动固守,掩护水上运输。

第三战区以唐式遵第23集团军两个军(第50军,第21军),共六个师的兵力,加上皖南、赣省部分地方武装,配置于长江南岸芜湖至九江一线。其目的是以战略兵团的正规军威

助敌水上交通，以游击手段，寻机腰击敌水上航运。

第23集团军游击敌之水上运输的主要手段有两种：布设水雷和游动炮兵。

游动炮兵

也可称作炮兵游击队。沿江部队都组建有这种炮兵队，一般以连为单位活动，他们配备轻便炮火无需构筑专门炮兵阵地，利用江南沿岸连绵无际的芦苇掩护，随时潜至岸边，躲在芦苇丛中，向江中敌舰或岸边敌据点开上几炮，待敌回过神来，向发炮的地方轰击时，游动炮兵们早已抬着炮杆“游动”转移了。

军委海军部应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之请求，曾派出三组游动炮兵技术指导员前往南岸部队，实地指导训练游动炮战技术。每组有海军军官二人，炮兵三名。

这种游动炮兵的游击战，对敌之水上运输威胁很大。39年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本战区游击战计划中，对长江南岸的游击计划为“江岸游动炮兵同时破坏由安徽铜陵至江西湖口间日舰运输。”

日军运输舰逆江航行，游动炮兵纷纷出动，敌舰队在这数百里的航线上，屡遭腰击，躲过了这儿的游动炮火，却又在那儿遭袭击，游动炮兵们神出鬼没，打得日军运输舰队胆颤心寒。39年8月10日，游动炮一个排单兵出击，在皖南地段，一举打沉日军运输舰一艘，重创敌舰一艘。

布设水雷

武汉会战后期,海军布雷队在武汉附近水域,迎着敌军舰队的猛烈炮火,冒死冲抵敌舰布施漂雷,炸沉敌舰多艘,取得相当战果。于是,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下令,派遣了两个布雷别动大队,共六个中队,三百人,深入到敌后皖南一带布放漂雷,阻敌水上交通。

海军布雷别动大队穿过层层封锁线,到达皖南第 23 集团军防区。布雷队员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具有制造、折装、运输和下江施放漂雷的技术,也可称为海军中的一支特殊的游击队员。他们除自己下江布雷外,还兼任指导沿江驻防的陆军部队的制雷、布雷技术,后来,第 23 集团军各军、师、团几乎都有自己的布雷小分队。

开初,海军布雷别动队,分散配置皖南长江沿线,在陆军兄弟的掩护下,排除千险万难,到江中布雷。

放布水雷是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差事。每个漂雷重达二百公斤,需六个人抬运,每次布放四十个漂雷。先要将水雷秘密抬运到江边,再弄上木船,划到江中间布放。要使漂雷取得最大效果,就得冒险,最佳时机是迎着敌舰开来方向,提前数华里之内抢险布放。往往是运雷木船还没到达江心布雷点,敌舰已发现目标,没头没脑一顿炮火,布雷队九死一生,损失特重。

后来,他们在青阳等地靠近江边的山中秘密设置监视哨所,发现敌舰船运输队上行,及时电告布雷队,于是,布雷队提前在有利地段作好准备,出奇不意地用漂雷袭击敌舰船,收到

理想战果。

由于敌舰船受到漂雷多次袭击,被炸沉炸伤较多,便加强了对沿江的封锁,布雷分队越来越难以通过敌沿江封锁线。

一次,第50军一个营前往繁昌附近,掩护布雷队下江布雷,遭到大批日军包围,全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布雷分队只能利用大风、大雨、大雪、大雾等恶劣天气,乘坐橡皮船,从港湾湖叉间,利用荒草芦苇的掩护,隐蔽地接近江岸,进入江中安放漂雷。

有一回,布雷分队冒着严寒前往冰湖布雷,队员们潜入水下安装水雷,有二十余位战士被冻死在湖水中。

有时,他们也将水雷陆用。一次,日军分乘三辆卡车,后面还跟着一辆装甲车,由彭泽县方向向守军驻地湖健桥开来。布雷分队便将一个漂雷放到桥下的河水中,并将触发点靠在桥柱上。敌人的汽车、装甲车轰轰隆隆开来,桥身震动,触发漂雷,桥被炸塌,敌之装甲车、卡车坠入河中,日军死伤三十多人。

1941年5月初,第21军147师派出一个布雷分队,他们在漆黑的夜晚抬着两个漂雷向马当进发,他们抄小道巧妙地避开了日军据点,顺利穿过封锁线,来到预定的布雷港湾,布放好两个漂雷,悄然离去。翌日早上八点钟,敌二千吨级运输舰一艘,在江湾触雷倾覆,舰上和岸上的日军乱作一团,岸上的日军划去十多条木船抢救舰上的人和物资。

过了两个月,这个布雷分队又乘夜出发,前往湖口布雷,被据点里的日军发现,掩护分队在黑夜与敌混战,布雷小组抢险布雷。水雷顺江漂流,于翌日上午在下游彭泽附近撞上日军巡逻舰一艘,当即将其炸沉。

有时，游击队还以手榴弹打敌炮艇。

第21军驻防铜陵期间，一次，他们派出一个游击小分队，前往被日军占领的老舟镇打游击。老舟镇四周河沟环绕，夏季芦苇葱茏，是名符其实的青纱帐。游击队员们躲在青纱帐里，侦察敌情，寻找战机，发现一艘日军的炮艇驶来，停泊在芦苇荡中，到了黄昏，炮艇仍未开走。游击队员们聚在一块，决定碰碰这个洋玩意儿。行动方案商量好了，他们便分散开去，从芦苇丛中悄悄向敌艇靠近。

天黑后，日军在炮艇上挂起一盏煤汽灯，坐在甲板上悠闲自得地狂饮“太阳牌”啤酒。

猛然间，芦苇丛里响起一声尖利的哨音，跟着，机关枪“哒哒”地从苇丛里扫了过来，手榴弹也从各个方向掷向炮艇。艇上日军措手不及，非死即伤。

手榴弹一直不停地在艇上爆炸，直到把炮艇炸沉为止。

日军舰船遭游动炮和水雷攻击，损失惨重，在第23集团军驻防期间，共击毁击伤日军大小舰、船、艇二千多艘（只），水运线路经常中断。

日军运输舰队被打怕了，后来，他们的舰队开航前，两岸日军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并出动飞机沿江搜索扫射，以大炮向南岸驻军阵地胡乱炮击。尽管如此，他们的舰队也不敢走长江中流，只得冒险靠北岸航行。

为了报复游动炮兵和布雷分队，日军集中大批兵力，对南岸进行了无数次的扫荡。他们发现沿江老百姓多有掩护、帮助布雷分队和游动炮兵的行动，就将那里的老百姓全部抓来，集合在雪地里，用刺刀逼迫他们脱光衣服，许多人被活活冻死。日军还把易遭袭击地段的老百姓全部驱赶出家园，造成许多

无人区。

39年6月初,日军以飞机十多架,军舰十六艘,汽艇几十艘,配合陆军向大通一带扫荡,敌机首先施以轰炸,炮舰停泊在江中向岸上轰击扫射,一连攻击了三天,敌军才登岸扫荡。

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该部与敌激战十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最后几天在江边展开的大血战中,打沉敌汽艇二十余艘,毙敌九百多人。日军丢下满江浮尸,狼狈逃窜。

1939年冬季,日军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在铜陵,贵池间登陆扫荡。第23集团军将敌包围痛击,几乎全歼该敌。

1940年秋,第21军147师组织了六个突击队,利用芦苇、丛林掩护,于黑夜中巧妙地运动到马当守敌附近,于拂晓时发起突然袭击,干净利落地击毙日军一百五十多人。此时,埋伏四野的其他部队发起总攻,很快将马当的矶田守备队大部歼灭。

第147师突击队奇袭马当取胜,将日军设在这里的弹药库尽行焚毁。他们还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停泊的日军舰船猛烈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

在这次夜袭战中,第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6. 篱笆国界——清乡之一

1941年5月。

汪精卫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一道正式的“照会”,照会以不无埋怨和自嘲自讽的口吻说,本政府号称为是在威名赫赫的大日本皇军扶殖保护下成立的全国性政权,但至今统治地域极为有限,统治力量极为薄弱,被国共两党和世界舆论讥讽

的“所谓政令不出南京城并非过言。”

在中国的侵华日军总部也承认情况“确实如此”。

在江南日军占领区国民党方面的游击活动一直十分活跃，虽然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在日本兵用刺刀开创新的疆土上任命了县、区、乡长，属于南京汪政府“国家”的一部分。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却一直完整存在，当然，大多数都转移到乡村山沟，水沼荒草地里去办公。由于重庆国民党方面有忠救军这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控制上海、南京间广大乡村，并大搞恐怖暗杀勾当，杀得上海、南京城内的日伪官儿们都不敢出门，乡村伪政权、那些土老伪区、乡长们，要吗打着“和平”旗号，暗地里为重庆方面的人办实事，要吗压根就不敢上任，躲在日伪军占领的县城不出门，只有在日军出动扫荡时，才抓紧时机跟在日本兵屁股后头，到自己治下的疆土上露一下脸儿，过一下区、乡长的官瘾。

忠救军控制上海、南京郊区乡村后，这些地区的财政税收，也进了他们的帐簿，因为这里的商人、农民都甘愿向重庆方面的县、乡政府交纳。汪政权的人就只有干瞪眼儿，喝西北风了。

忠救军和游击队一方面袭击敌伪补给物资，另一方面又封锁物资运输，上海、南京城里的日伪人员和军队以及市民的吃、穿、用就极为困难了。1941年度，汪精卫政府的全年预算支出为三亿一千二百万元，实际上财政收入几乎等于零，只得厚着脸皮向日本政府借款三亿元，才算勉强可以糊口过日子。

日伪方面为解决财政这一难题，伤透了脑筋，大日本皇军也不惜卑躬屈膝，礼贤下土地去请青帮头子张啸林，组织“新

亚和平促进会”，搞一些棉花和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结果，当张
某邀约兄弟伙正要干的时候，就被忠救军给一个个地暗杀了。

在这一地区，日伪军只能占领中心城镇，孤立固守点线，
小股日军不敢离开据点，不敢上街散步什么的。

日伪人员们的这一副孤立被动的可怜样儿，不但使汪伪
高层官员对“和平”大业发生动摇，就连日军中的一些高级官
员也感到可悲可叹。

参与建立汪伪傀儡政府的日方头号特务影佐祯昭在日记
中写道：“我今天认为：建立和平政府的愿望是失败了。汪氏的
心情也许会是同样的吧。”

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更是动摇了，在日记中悲叹道：
“日方如此，令人悲观。”开初对日军武力“期望很大，但什么也
办不到。这样逐渐丧失了内外的同情，政府也被人看不起。”

鉴于这种状况，汪伪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为了生存，都需要
进行“清乡”，清出一块相对安全的地盘来，供养汪精卫的“国”
和日军在南京城的那个总司令部。

清乡得到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的支持，日军大本营统
帅部批准了中国派遣军关于清乡的用兵计划。日本政府给了
汪记南京政府五亿日元，作为清乡费用。

清乡——即清除长江下游三角地带抗日游击军的军事、
政治活动。它充分体现了日军和汪政府的共同心愿、共同要
求，因此，在这一活动中，双方都表现得异常热情，“积极主
动”，“勇挑重担”。

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长江下游三角地域国民政府治
安建设指导纲要》，日军方面很快组成了清乡指挥部（所），成
立了清乡指挥机关，由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挂帅，

第13军团司令官泽田茂将军负责军事指挥。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有特务宪兵机关的机关长金子俊治,重藤机关的机关长重藤宪文,梅机关的晴气及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小笠原清等人。

汪精卫政府也于41年5月16日完成了《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5月22日决定了清乡委员会的人选:

委员长:汪兆铭

副委员长:陈公博 周佛海

秘书长:李士群

日伪双方都排列出最高规格的指挥部人选阵容,到底由日军方面负责,还是汪政府方面负责?一时间,为“领导权”的归属问题闹得有些伤和气。在汪政府方面看来,清乡不打汪政府名义,你日本人师出无名,肯定徒遭世人耻笑,更加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反抗。在日本军方面看来,你汪某政府算个什么东西,没有咱们日本皇军撑起,你拿什么硬火去赶跑新四军、忠救军?

最后,还是第13军团司令官泽田茂懂得一点中国的儒家学问,站出来打了个园场,走了一回“中庸之道”,才算把这件事搁平了。他说本次清乡分为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两个方面,两个方面都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仅有军事清乡,达不到清乡的效果,仅有政治清乡,只是一句空谈。因此,日军方面和汪政府方面应各负其责,军事清乡统统地由皇军去干,政治清乡则归汪政府方面负责。

7. 篱笆国界——清乡之二

1941年7月1日。

第一阶段第一期清乡开始。

日伪军突然宣布：京沪铁路线以北，长江以南的苏南无锡、苏州、常州、常熟、江阴、昆山、太仓几个县境内，实行军事封闭戒严。在这一地区内的所有车辆、轮船、木船等交通工具一律停运，外界与这一地区的水陆交通也同时被封锁中断。

戒严令发布之后，大批日伪军便进入这一地区，实行清乡扫荡。第13军团司令官泽田茂将军把清乡的总指挥部设在苏州城内。参加清乡的日军有第5、第15师团，约七万多兵力，直接投入清乡作战的为十个大队。

参加清乡的伪军为任援道第一方面军主力：徐朴诚第1师，三千多人；徐凤藻第2师，二千多人；龚国梁第3师，二千多人；程万军第5师，五千多人。另外还有伪军两个独立旅和伪特务武装“中国模范警察队”两千多人，“和平义勇总队”土匪武装五百多人。

在第一期清乡区域内的常熟、江阴一带，主要为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部队，在苏州、无锡、常州、太仓、昆山等地区活动的，主要为忠救军。为了暂时避开日伪军的进攻锋芒，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主力渡过长江，转移到了苏北根据地，忠救军大部主力分别向上海附近和浙西地区转移。

日伪军大军压境，并未捕捉到抗日游击部队主力，只是在江阴东部，与忠救军一股尚未来得及转移的部队，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

敌军的军事清乡比较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接着，他们抽出日伪军共一万五千人，在清乡地区边缘插竹片，实际上是圈定真正属于汪伪国的国界。一万五千名日伪军，经过十多天挥汗如雨，大于苦干，于7月20日圆满完成了这一“篱笆国界”工程。苏州、常州、太仓等县共约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用竹

篱围了起来，共计用了二百多万根毛竹。

在篱笆国界（日军称为“隔绝幕”，汪精卫称为“模范区”）的重要地段，都拉上铁丝网，通上电流，修筑碉堡，派兵镇守。

被竹篱笆圈进去的六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共有六千多个村落，一百五十多万人，其中有二千五百个村庄还被他们划为危险的“敌性部落”。

拉上篱笆国界之后，李士群带着大批伪方特工人员进入该地区，在日伪军配合下，首先对那二千五百个“敌性部落”，逐一进行扫荡，“剔抉”新四军和忠救军的地下人员、小股游击武装、县、乡、村干部，以及抗日积极分子。共有二千八百余抗日志士惨遭杀害，数千人被捕关押。（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逮捕了汪伪政府主席陈公博，并于1946年3月8日，在苏州高等法院公审，由高院首席检查官韩焘代表国民政府对陈公博提出起诉，起诉书列述了陈的十大罪状，其中第八大罪状为“托词清乡，残害志士”。陈公博曾在法庭上狡辩，说清乡中残害抗日志士都是下边人搞的，与他无关。）

政治清乡，是在汪精卫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企图把篱笆国内搞成汪伪政权治下的模范样板区，主要执行者为特务头子李士群和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人。

李士群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在清乡区大办政治训练班，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灌输，使其成为死心踏地的伪国良民，再任命这些人作为清乡区内县、乡、保、甲长。他还搜罗了土匪流氓一万六千多人，组成一支伪保安队，以维持清乡区的“治安”。

清乡区内实行保甲连坐法，发放良民证，限制民众言论和行动自由，大搞法西斯恐怖。他们把这一地区划分为“和平区”、“匪区”、“半匪区”几个等级，把民众划分为“良民”、“自新

户”几个等级，分别加以控制迫害。他们划定的所谓“自新户”，主要是指曾参加抗日活动的群众和新四军、忠救军的亲属。伪方特务们强令这些人写“悔悟书”，并张贴于自家门板上，或写在白布上，缝制在这些人的衣服背上。被划为“自新户”等级的人，其言论和行动稍有不慎，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政治清乡者们，还在篱笆国内搞所谓的“新国民运动”，以期达到“思想清乡”的目的。他们在大、中、小学校普遍推行“青少年团”的组织制度，拉笼一些幼稚青少年，充当“模范青年团员。”“青少年团团员”和“模范青年团员”都着统一制式服装，其中“模范”团员系红色领带，左臂上戴个红袖套，上面印一个圈圈，圈中印一个“模”字，跟希特勒的党卫军没区别。

汪伪特务们在那块清乡区内穷折腾了两三个月，日军方面和汪伪党棍们都架势吹嘘，说他们已彻底消灭了抗日武装，“治安恢复了，日军和南京方面的要人不需特别警戒便可活动”。“日本人单独行动已无危险”，清乡的目的已完全达到了。

于是，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前往视察清乡区，然后洋洋得意地发别讲话宣称：“由于日中双方的认真努力，进展顺利……随着治安的确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工作都有很大进展，特别是明显看到军、政、教三者浑然一体，为建设新中国不断取得战果的状况，对此项工作的成功衷心感到满意。”

汪精卫在南京城内听说清乡的这些“辉煌战果”，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在李士群陪同下，坐了日本军的飞机来到苏州，再由四个骡形大汉用一架滑杆抬着，躺在滑杆上视察清乡区。

汉奸张北生费了好大工夫，强拉了两三百个农民，每人手

里拿面纸旗，夹道欢迎前来视察的“汪主席”。之后，又开了个二百多个农民参加的“庆功”大会。

汪精卫巡视了苏南清乡区，感到喜不自禁。其实他那块“篱笆国”还没有太湖西南，冷欣以两个师和几个游击纵队控制的游击根据地面积大。不过，汪精卫心不厚，就那屁股样大的一块篱笆国他就感到满足了，因为，他那个于40年11月19日就向全世界宣布的“主席”、“委员长”的宝座，老是悬在半空中也怪难受的，现在无论如何，总算沾了一点地气了。

在这之后，日伪军相配合，又接连搞了第二期第三期清乡，清乡地区扩展到京沪铁路以南的苏南地区和浙西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苏北沿江一带。但是，这以后的各次清乡，效果越来越不如人意。因为抗日游击队已摸准了清乡者的那几下伎俩，采取了对策，日伪军以后的清乡，与扫荡战没多大区别。

在1941年9月发起的第二期清乡中，日军方面才猛然发觉汪伪第1方面军第3师，从师长以下各级主要军官，早已被忠救军策了反，在清乡中与忠救军通风报信，勾勾搭搭，暗中配合，破坏清乡工作。第13军团司令官泽田茂拍案大怒，调动日军主力，突然将伪第3师包围缴械，并将该师军官全部扣捕关押。

8. 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上海，南京一带的国民党游击队竟敢如此放肆猖狂，毫无疑问是因为有第三战区正规军撑腰。要彻底摧毁京沪地区的游击队，就必须首先摧毁顾祝同的第三战区。

于是，日军施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日军对第三战区使用细菌战的时间为：1940年夏秋季，

1941年秋冬季,1943年春季。

日军施行细菌战的地区为:浙东宁波地区,浙中义乌、金华地区,浙赣边衢州、龙泉、庆元、玉山地区。

1940年10月4日。

日军飞机一架窜入衢县上空投放带有跳蚤的小麦、粟米等物,不久,这一地区发现许多腺性鼠疫病人,患者咳嗽,痰中带血。跟着,疫情扩展,有多人暴死。经当地卫生部门检查确认为鼠疫。后来,疫情漫延,日趋严重,无法控制,亦无特效医药。经第三战区和浙省当局共同会商,决定将鼠疫发病集中地区的水亭街、罗汉井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掉。至11月,鼠疫仍未能控制,死亡仍在增加。

10月22日。

日军飞机一架到宁波、鄞县、慈溪一带上空,投掷带有鼠疫杆菌的小麦、粟米、面粉等物,随之鼠疫流行。经卫生部门检查,确定为败血型鼠疫,很快就有百余人暴死。宁波政府下令封锁疫区,并将开明街一带约五千平方米内的所有房屋烧毁,以期阻止疫情横流。

11月初。

日军飞机一架到金华、衢州一带上空撒播状如豆子的黄色小颗粒,经当地医院检查化验,发现豆粒上染有鼠疫杆菌。金华一带鼠疫突发,暴死一百六十多人。

12月初。

浙江宁波、鄞县、慈溪、衢县、庆元、龙泉等各地鼠疫漫延,死亡不断,军民极为恐慌,情势严重。

省主席黄绍竑于12月5日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鼠疫流行情况,要求中央赶制大量鼠疫菌苗以之救援。

12月6日,顾祝同向重庆国民政府发出急电:

密查敌机在浙江境内散播毒物,业经该省卫生署检查断为鼠疫杆菌,则以后继续投播,传染甚虞;敬请转飭卫生署所属中央防疫处生物学研究所赶制大量鼠疫苗苗及血清以应急需。

1941年2月3日。

防疫处处长容启荣陪同国联防疫专家叶墨博士一行,前往浙江实地调查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其后写出报告:

日军在衢、金、鄞各地投散之物,经过与鄞衢两地发现疫病流行之情形,继至民众医院复查该院所存1940年12月28日敌机散布之颗粒,当由叶墨博士会同吴技工昌丰、柯专员主光施行动物试验,并将颗粒制成标本,实施显微镜检查,确含类似鼠疫杆菌。

1941年10月。

日军飞机再次到义乌东阳一带撒播鼠疫物品,造成该地区大面积鼠疫蔓延,染疫暴死者无数。中央卫生部防疫大队奉命前往疫区协同当地卫生人员抢救病人。全国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队长刘宗猷,在义乌疫区抢救鼠疫病人时,因战火逼近,仓促工作中自己也感染上了鼠疫,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1942年5月——9月底。

浙赣会战期间,日军细菌战部队“南京荣字第二六四四部队”随第13军团主力到金华一带进行细菌战。其目的是以造成无人区来彻底摧毁第三战区的战斗力,他们施行细菌战的时间是日军主力从衢州向东撤退时,方法有三种。

第一,细菌战部队人员把装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轻铁瓶和玻璃瓶掷进沿途村庄的水井,沼泽地,以及民房院子。

第二,将三千个特制烧饼,用注射器推进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然后发给在浙赣会战中被俘的三千名中国军战俘,在监督着他们吃下之后,便将其全部释放,以便让他们回部队中去传染瘟疫。

第三,将特制的蛋形和长扇形的饼干染上细菌,分给日军官兵沿途“丢失”,“丢失”的地点大多在行军沿途的村镇院墙角落,树木下面以及行人休息地点,仿佛是日军行军途中无意“丢失”的。

结果,在日军进攻路线,到处都有严重的鼠疫及各种瘟疫蔓延,造成无数的中国军民受灾死亡。东阳有一家五口人,全部死于日军制造的瘟疫。直到1943年春末,浙赣边界一带的瘟疫还相当严重,龙泉地区因鼠疫严重,至使该地与云和间的客车停运。

9. 战斗在敌人心脏之一

——唐生明中将打进汪伪政府军委会

在抗战期间,新四军和忠救军都有地下工作者打入汪伪政府机关,专做情报和策反工作。新四军地下工作者潘汉年等人,甚致可以搞到汪精卫、李士群的机密情报。在日伪军“清乡”中,新四军部队就是从地下工作者那里准确地获得了敌伪的动向,提前安全转移,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新四军地下工作者徐楚光打入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情报局的上校秘书兼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可以随时掌握日伪最高当局的机密情报。1945年8月,日军刚宣布投降,徐楚光等人就成功地策反了汪伪首都警卫第3师,令

其开到了新四军的根据地。

新四军某部派遣的地下工作者杨天，通过在汪伪财政部警卫队当队长兼上校警官的哥哥杨叔丹（此人后为重庆军统潜伏人员），经常刺探日伪方面的情报。

新四军汤景延部六百余人，在汪伪的江北清乡中假意投降，巧妙地骗取了李士群等人的信任，被编为“南通地区第五清乡警察大队”，汤被任命为大队长和“苏北分区专员”。但是，到了1943年9月，汤景延所部突然打死汪伪特务金沙组组长翟某和南通县伪警察局长傅某，把部队开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日伪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1940年春。

常桃警备司令，中将唐生明奉命前来重庆，受到蒋介石的特别接见。

蒋介石说：“我决定派你去上海。去上海的任务由戴笠告诉你。”

唐中将说：“戴已对我讲了，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地下组织大部遭到敌人破坏，他叫我打入敌人内部展开工作。我去是否合适，请校长再考虑。”

唐生明是黄埔第四期学生，所以他尊蒋介石为“校长”。

片刻之后，蒋介石才说：“这个任务很重要，很艰苦也很危险，我已考虑过了，你是我学生，我是了解你的，只有你去才合适。还有什么要求，可找戴笠具体商量。”

戴笠代蒋介石向唐下达的任务是：利用唐某在上海的旧关系，打入日伪内部，设法与在那一带活动的忠义救国军取得联系，并尽力帮助这支特务武装的发展，设法掩护在上海、南

京的潜伏人员,使之不再遭受打击破坏,已被捕的,要想法营救出来;相机向伪方人员转达蒋介石的宽大政策,策反、瓦解汪伪阵营。

唐生明领受任务之后,军统派遣了一个名叫张素贞的女特工前往上海,在唐生明过去的关系网中“放风”,说他过不惯战区的艰苦生活,前途又无望,意志消沉,牢骚满腹,什么都不想干了,有可能带着家小到上海来等等。

两个多月后,唐生明带着妻室儿女,在张素贞的陪同下,经香港转往上海,暂时住在旧友潘三省家,潘某与汪伪政府一些要人来往密切,特别是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有很深的瓜葛。

唐一到上海,就被李士群盯上了,他以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刺探唐来沪的真实目的。

唐生明大大方方,“坦诚亮底”,说老蒋把他弄到常德那个背时地方,对岸就是日军,双方说打就打,战斗频繁,成天血腥味儿。警备司令,形同地方武装,不见晋升,也不可能晋升到他头上。战乱之地,交通断绝,物资枯竭,生活艰苦,还有什么搞头。这仗打赢打输,与他个人何关系?不如图个清闲,到大上海来过几天好日子。

李士群觉得有点道理,但仍不能完全相信。有一回他以设宴请客为名,想把唐灌醉,“酒醉听真言”。唐生明将计就计,敞怀痛饮,假装醉如烂泥,嘴巴关不住风,神吹武吹,但他“吐露”的“真言”,除了想舒舒服服地过几天好日子外,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

阴险狡猾的李士群对唐某的“真言”虽不敢全信,却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汪精卫对唐生明这样一个自动脱离重庆的“大家伙”，十分感兴趣，认为利用这个出走抗日阵营的中将，又可向国人和世界吹嘘一番“和平”的威力和胜利，给重庆抗战政府脸上抹一点黑，为汪精卫脸上争光。于是，加紧了对唐生明的拉拢工作。继李士群的几次“考察”之后，陈璧君、周佛海等要人又对唐进行了多次“盘察面试”，都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汪精卫亲自出面召见唐生明，在与汪精卫的较量中，唐生明越是表白不愿再出山，汪精卫越使劲拉他下水，唐生明越是表现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时，汪精卫对他越是放心。

1940年10月1日。上海、南京的日伪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打出显赫标题：“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就任军事委员要职。”

四天后，他果然被汪精卫政府正式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重庆那边暗地里高兴得把肚皮都笑痛了，却在表面上大唱其戏，于10月10日起，连续十天，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刊登唐生明的大哥唐生智上将发表的“启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

汪精卫、李士群一伙人硬拉唐生明当了伪军委会委员，起到了宣传效果后，便让他暂时闲了起来，直到翌年夏季，才分配给他一项实际工作——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这是要他参加即打新四军又打忠救军的差事，唐生明根据重庆方面的秘密电令，一改平时喜欢玩乐的特点，满腔热情地投入“清乡”

工作。他吃苦耐劳地帮助汪伪整训伪军，借机把一些被俘的忠救军骨干人员安插到伪军中，同时，他设法巧妙地与活动在这一带的忠救军阮亚丞、郭墨涛等几个纵队取得了联系，及时地把日伪军出动“清乡”的情报，转送给忠救军各纵队，使其提前采取对策。使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送出去的情报，新四军也能知道相同内容，造成日伪军的一次次“清乡”行动扑空（新四军也有人员打入敌伪内部，前已述及）。

后来，唐生明与其他潜伏人员配合，成功地策反了汪伪政府第三号头目周佛海。

策反了周佛海之后，唐生明又与周一道成功地挑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与汪伪特工总部部长兼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之间的矛盾，于1943年初，借日军特务头子冈村之手毒杀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一个双手沾满抗战志士鲜血的剑子手，在他主持的汪伪特工总部下，捕杀了成千上万的国共两党在上海、南京地区的地下工作者。

抗战后期，唐生明与京沪附近的忠救军陈默、阮亚丞、郭履洲、毛森等几个总队建立了直接联系，当日军宣布投降后，他直接调遣这些忠救军抢占了上海城。

10. 战斗在敌人心脏之二

少将周镐在南京城的“行动”

1943年初。

军统少将周镐奉戴笠之命，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一道，携带电台一部，从重庆潜来南京。周某此去的任务是重建遭日伪破坏的军统南京站。他们来到南京后，与周佛海的人

秘密接上了头，被安排在长江路 174 号住下。

半年之后，老奸巨猾的周佛海才与周镐直接见面，不久，周佛海将周镐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后来，又将其任命为伪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议。

周镐利用伪职为掩护，于 43 年底，拉了一批人，重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统南京站，下设八个组。

重庆方面给南京站的任务有二。第一，负责同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单线联系，搜集汪伪最高指挥机关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这些情报一般都由周佛海提供，由周镐的电台发给戴笠，再由戴笠直接呈送蒋介石。第二，利用周镐在伪军委会中的公开身份，与汪伪军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文化等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收集他们的军事情报，并相机对其开展策反工作。

周镐与新四军打入伪军委会政治部任情报局上校秘书的徐楚光也建立了良好关系。相互掩护，相互交流情报，互通消息。周镐还利用自己掌管的军事物资运输的汽车和火车车皮，给新四军运送过盐和其他物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之前，周镐及其军统南京站的潜伏人员，早已策划好了抢先接管南京的行动计划。

8 月 16 日。

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政府”。当天，周镐宣布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市中区新街口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内。

“南京指挥部”由周镐任指挥，在参谋长，参议之下，设秘书、总务、新闻、军械、副官、行动等六个处，分别由汪伪政府方

面的五个中将,四个少将和一个上校充任,其中有一个中将,一个少将,一个上校为军统南京站的人,其他人员亦是被周镐早已策反过来的。

除以上人员之外,南京指挥部还有若干工作人员,均是重庆方面的潜伏或策反的人员。

16日夜间,南京指挥部下令抓捕汉奸。于是,以杨叔丹为处长的行动处的人员开始“行动”,先后逮捕了伪中央常务委员梅思平、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四十七人。被抓捕来的汉奸,全部关押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的地下室。

杨叔丹在抓捕伪陆军部部长肖叔宣时,因肖企图反抗,被扬用有毒的达姆枪弹击中腿部,中毒毙命。伪中央考试院长陈群见肖被抓受伤而死,感到自己末日来临,便自杀了。

在大抓汉奸的同时,伪财政部警士队和伪陆军部特务团(都为军统策反控制),奉指挥部之命,一齐出动,封锁了南京的交通和车站码头。

指挥部如此仓促的行动和大张旗鼓的抓汉奸,引起日伪人员极度不安和恐慌骚动。

8月17日。

被指挥部接管了的伪《中央日报》和伪《中报》打出《建国日报》和《复兴报》的新名称,套红登出“指挥部”宣告成立,及《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布告》。

布告说抗战胜利,“是皆我蒋委员长八年以来,坚(艰)苦卓绝之领导,前方将士之用命,后方民众之协力所致。”现在,“蒋委员长已有命令广播”,命令日军无条件投降,日军已宣布接受命令。于是,指挥部作出十条规定,布告天下(南京地区),

布告内容可视为“安民告示”，要求所有日伪军人员，各界民众，各行各业职员等，必须严格遵守布告条规，不得有违，否则，“当按军法惩究。”

周镐的行动虽然来得迅速，周镐的布告虽然口气强硬，但对于那些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等待蒋介石发落，但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军并无威胁力。8月17日上午10点钟，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在南京发出通告，说：“从现在起，对仍然采取上述不稳行动者（注：即打着蒋委员长旗号，强令日军投降缴械等行动），均视为不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或越出其意图者，派遣军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为。”

显然，周镐的行动也被列入了“不稳行动者”，而受到日军的警告。

8月18日上午12点，周镐到伪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宣布南京的日伪政权已由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地区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概由指挥部负责。

从伪中央广播电台出来，周镐在行动处武装人员护卫下，前往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集合全校军官、学员训话，声称他是受蒋委员长之命令，将对军校学员进行改编，并宣布逮捕军校校长鲍文沛，企图以此来震慑住这支重要的武装。

哪知，周镐的这一手反倒把事情搞砸了，军校学员们全副武装起来，浩浩荡荡地开到陈公博的“主席”官邸请示行动，他们喊出的口号也十分策略，声称他们只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不接受象周镐那种不知以哪儿冒出来的人的收编。陈公博答应马上向蒋介石去电请示。

南京城的形势开始恶化。

陈公博的卫士团与行动处的武装发生冲突，爆发了局部

巷战。

伪中央军校的几百名武装学员，拥到指挥部外面，抗议抓捕他们的校长，机枪对准了指挥部大楼。

这时，几架日军的飞机也来凑热闹，在指挥部上空打圈儿。

军校学员与指挥部双方一直僵持着。下午，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中佐前来指挥部，说冈村宁茨请周总指挥去商量解决办法。处于进退两难的周镐只得随小笠原前去日军司令部，结果被日军软禁起来，再也未能回到指挥部。

周镐被软禁之后，日军宣布解散指挥部，释放了被抓捕的所有汉奸。

8月21日。

侵华日军南京总司令部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一行，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坐飞机前去芷江接洽投降事宜，何上将向今井武夫下达了有关命令。

今井武夫起立请示道：“在南京有一个自称周镐的人，正以国民政府军前进指挥官的名义为所欲为，此人还自称奉蒋委员长之令行动的，日军方面对此应如何处置？”

何应钦道：“在接受日本投降问题上，除受命于本总司令者外，可一律视为土匪，对他们的不法行为，日军即使采取武力自卫行动，也是可以的。”

周镐的“行动”最后被定上了这样一个性质而告彻底失败。因为他行动得太快了，使重庆方面感到措手不及。在蒋介石和何应钦看来，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间正式的战斗，本是惊动了全世界的大事件，现在一个大国打败了另一个大国，按世界惯例，按同盟国军的规矩，总得应该由胜利国的正式代表

和战败国的正式代表，在规定的时间内，举行庄严的受降仪式吧。要不，象南京那样轻率地行动，有损于战胜国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那样各自行动，会使局势混乱，给重庆政府带来麻烦。

第十一章 华南烽火

1938年10月21日和1939年2月,日军分别占领了广州和海南岛,国民党方面在华南敌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

海南岛敌后游击战,由该岛守备司令王毅领导。广州地区的游击战,分为广州地区,路南(粤桂边区)地区,和粤东(闽粤赣边区)地区等三块游击区。南路游击区设粤桂边区总司令,由第1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兼任。边区总司令部下设三个分区游击指挥官,即广东南路第一区游击指挥官(谭启秀),广东南路第七区游击指挥官(张炎),广东南路第八区游击指挥官(邓世增)。南路地区共有四个游击挺进纵队和粤桂边区游击司令黄瑞华的游击队。

广州游击区设有游击挺进纵队东江指挥所,由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任指挥所主任,编有七个游击挺进纵队和暂2军的两个暂编师。

粤东地区设有闽粤赣边区总部,由香翰屏兼任总司令。游击部队有二个挺进纵队,暂2军一个师和独立第9旅,外三个保安团。

1. 大闹羊城

1938年10月中旬。

当中国军队倾全力进行武汉大会战之际，日军以第21军的三个精锐师团，在一百四十架飞机和海军遣华舰队及海军陆战队支援下，突然从广东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犯。

当时，广东兵力空虚，第12集团军仅有五个步师，其中有两个师是刚征招来的新兵，散布广东各地。日军海陆空并进，来势凶猛，广州顿呈紧张状态。

蒋介石坐阵武汉，那里的大战正进入最残酷阶段，无法抽兵南下，只得一面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派湘省的预备兵团队援救广州，一面令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收缩广东各地兵力，包括迅速调回守卫海南岛的第152师来保卫广州城。

远水难救近火。

余汉谋部在广州外围与敌苦战十天十夜，终因兵力薄弱，无法阻止日军进攻，于10月21日弃守广州。

广州失守的当天，撤退到翁源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全省民众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组织自卫团队，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把日寇驱逐出境。

广州失守后，军事指挥官余汉谋受到军委会撤职留任处分。张发奎就任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地区）司令长官，对广东地区的兵力配置作了调整，决定大力加强游击战，狠狠打入侵之敌，使广州地区之敌坐卧不安，疲于奔命。抽调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专任广州地区游击指挥官（东江游击挺进纵队指挥所主任，后改为游击纵队指挥官兼闽粤赣边区游击总司

令)以加强游击战的领导力量。

广州失守之后,广州四周很快就拉起了各式各样的抗日游击队若干股,游击战的枪声响遍了羊城四郊。

早在广州失守前的10月19日,广州市长曾养甫就在广宁地区,组织西江八属游击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

日军侵占广州城及其附近地区后,先后拉起游击队的有:汤平化的广州区游击别动军第1纵队,吴勤的广州南郊人民抗日游击队第2支队,各县、区、乡长们也就地组建或扩编自卫团队。跟着,莫雄在英德、佛岗地区拉起了北江挺进纵队,伍观琪在禺北地区拉起了第1游击纵队,林祥在西江拉起了西江挺进纵队,伍驹在阳江拉起了两阳挺进纵队,马少屏在开平,王若周在东莞,骆凤翔在惠阳,吴飞在中山,也都各自拉起一支实力可观的游击队。

后来,第四战区长官部将广州地区的各路游击队伍,整编为七个挺进纵队,分别由莫雄、伍观琪、袁带、彭林生、伍驹、骆凤翔、翟荣基等人任纵队司令,统归挺进纵队东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指挥。

在38年11月初,自卫团队和游击队就拥有相当战斗力,配合正规军攻关夺城,较大的战斗有:11月初,广州城西三水地区的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向守敌发动反攻,血战竟日,日军战力不支,弃城溃逃;在广州东面东莞、惠州、宝安一带,游击队和自卫团队在多处向敌发动攻袭,激战竟日。

12月初,便衣游击队员八十多人混进广州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搞得全城日军昏头转向,一片混乱。在混战中,游击队员们冲进敌军指挥机关,投掷手榴弹多枚,炸死炸伤日军一批。

12月2日夜间,宝安县县长兼游击队指挥官梁宝仁,带领一千多人的游击队,分三路包围了宝安县城之敌,经两天多时间的激战,歼灭守城日军,克复县城。

自38年11月初至翌年春,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在广州四郊反复厮杀,并多次深入市区破袭,日军在广州军民大规模游击战的打击下,处于被动守势。

1939年1月2日,白崇禧将军在桂林向中央社记者谈到广州战况时,综合评述说广州地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正发动强大攻势,迭予日寇以重创。目前,敌军正以全力龟缩和巩固广州城,并在四郊各重要点构筑工事据点,以防我游击队的袭击。

1月27日,伪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汉奸练演生遭汤化平的军统广州区游击别动队狙击,练某当场毙命。

汤化平的别动队在这一地区十分活跃,在广州近郊和市内神出鬼没,四处袭击日军。2月1日,他们伏击日军取得全胜,救出许多被日军掳走的妇女同胞。当天,另有五十多名别动队员,机智地潜入广州市郊白云山下的日军天河机场,刺死两个站岗的日本兵,在机场内破袭一阵之后,得胜而去。

3月下旬,驻扎广州的日军第21军,感到实在难以忍受游击队的袭击骚扰,调集大批兵力,对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消灭游击队,即使消灭不了,也要将其驱赶远一些。

一股日军从九江渡江,进入鹤山县扫荡,在状元岗一带跟税警团激战,税警团抵敌不住,正要向后撤退之时,此时杀出一彪人马,迅速占领阵地,冒着日军猛烈炮火,忘命地阻击敌人。激战中无论日军的炮火多么猛烈,那些人就是不后退半步,死死钉在阵地上,狠狠打击来犯之敌,日寇的一次次冲锋

都被他们打垮了。

附近的乡亲们见了那伙人的顽强精神，都大受感动，竟忘了枪林弹雨的危险，成群结队地纷纷赶来，在后面山坡上敲锣击鼓，摇旗呐喊，以助军威。仿佛当年三元里抗英的历史画面重现。

本来打算撤退的税警部队，也受了那伙强人的鼓舞，钉在阵地上拼命抵抗。

日军没料到在这里受到些土游击武装的如此亡命的阻击，冲了几个回合，死伤惨重，也就泄了气，丢下遍地死尸逃回江那边去了。

游击队打了个大胜仗，乡亲们欢声雷动，猪呀羊呀烧酒呀炒米呀，送上阵地来劳军。

那伙强人原来是鹤山县的一伙强盗土匪。匪首名叫何柏，绰号何老二，当时，他已年过半百。二十年代，何某即为鹤山一带著名的土匪，经政府几番围剿，队伍被打散，何某逃到澳门。抗战爆发后，何老二重返故里，以抗战的名义重拉队伍，这是他重拉队伍后的第一仗，就旗开得胜，名声远扬，备享众人恭维，加入他队伍的青壮年源源不断。

鹤山县长见何老二的队伍能打硬仗，便将其收编为县自卫大队，共有千多人的武装，长期坚持在鹤山地区，与敌隔河对峙。

9月中旬，中山县一带的游击队联合行动，向日军发动进攻，歼敌数百人。

10月开始，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向广州之敌再次发动攻势，从中山、江门、三水、虎门、新会等地区出击，主要袭击日伪指挥机关，公路、桥梁、仓库等，敌方损失颇重。

1941年春季,广州南郊一带的游击队又十分活跃起来,当地日伪军无力抵抗,只得从广州向顺德等地增调大批兵力,以加强守卫。

广州地区的游击战一直没有间断过,到41年夏季,广州之敌再次陷入游击战的汪洋大海,被搞得焦头烂额的伪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专门召开各地保安团、队长会议,商讨应付游击队的办法。

9月初,伪军第44师在顺德西海一带大肆扫荡,遭到当地游击武装的迎头痛击,9月3日一仗,毙伤伪团长祁宝林以下五百余人,活捉三百多人。

41年夏秋季,游击队和市内潜伏人员配合,在广州城内大搞日伪的恐怖活动,惩治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

9月10日,伪广东省警务处副处长李式曾在澳门被暗杀。

9月17日,广州市惠爱中路及市内多处发生爆炸,炸死炸伤日、伪数十人。

9月19日,广州城内发生爆炸事件多起。日伪军宣布全城戒严,封锁水陆交通,实行大搜查。

9月25日,伪广州要港司令何瀚澜被游击队员用暗枪击中,三颗仇恨的子弹洞穿汉奸肉体,此人命大,竟然过了两天才断了气。

11月12日,伪广东绥靖公署联络官菊田大尉,被狙击毙命。

1944年4月4日下午6时许,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在文德路被游击战士用手枪击毙,复用手榴弹炸。日军对这个大家伙被击毙既痛心又恐惧。日本天皇特地宣布追赠陈某“勋二等旭日

日重光章”一块，以示慰免和悼念。

由于日伪方面备受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闹得羊城鸡飞狗跳，惊恐万状。1945年初，伪省会警察局通令各乡村联防队，因“形势紧张”，今后，一律不得带武器进城，以免被游击队钻了空子。同时，宣布增设伪保安警察总队，专门对付地下游击队的恐怖活动。

伪警察局，伪宪兵队经常联合行动，在城内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游击队。游击队仍不断进城袭扰活动，搞得日伪方面一日数惊，到夏初，他们只得实行全城宵禁，宣布天一黑，就不准任何人通行，凡穿便衣问话不答者，一律格杀勿论。

2. 南澳突击队

在广东东南部的韩江口外四十余里的南海中，有一个翡翠般美丽富饶的岛屿——南澳岛。

南澳岛总面积约百平方公里，环岛四周港湾曲折，岛内山多林密，形势险要，历称潮汕屏障，闽粤咽喉。这里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山水秀丽，海鲜海滩，阳光迷人，为理想的旅游胜地。

南澳岛象一颗灿烂的珍珠，在碧波万倾的南海中闪耀光华；她象一位美丽善良的渔家少女，伫立在惊涛骇浪中，神态自若，静静沉思，她又象一位伟岸的武士，警惕地守卫着南国门户。

这里为华南海防要地，清朝曾在岛上设生铁大炮一百二十六门。南澳岛与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民族英雄戚继光、郑成功、刘永福的名字相联系。

1565年，戚继光曾在这个岛上扫灭了入侵的倭寇，为华

南人民解除了一大灾害。

八十一年后,郑成功在这个岛上树起了反清大旗,并从这里起兵抗清。

三百多年后,清末抗法、抗日爱国将领刘永福,就任南澳镇总兵,在此守护祖国神圣领土。

三百七十三年后的6月20日(1938年),日军海军陆战队三百余人,在飞机,战舰掩护下,侵入南澳岛。

驻守该岛的保安营在营长罗静涛带领下,在前江、塔边与日军打了一仗,保安营死伤三十人,便伙同南澳县县长林捷之撤退到大陆这边来。

南澳岛陷落敌手。

潮汕地区防军长官第157师师长黄涛将罗静涛扣押,就地枪决,县长林某被押送广州监禁。

南澳岛上的壮丁队揭杆而起,在县城隆澳(后宅)与敌展开激烈拼杀,壮丁牺牲四十余人,其余的退入山中打游击。

7月初,黄涛师长在汕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民众抗日自卫团洪之政第4大队和157师940团吴耀波第1营,选调一百五十名精兵,组成一支突击队,渡海抗敌。突击队取名义勇军。

义勇军统由吴营长指挥。

第157师在饶平县海山岛南部的黄隆设立指挥所,由940团团长李友庄和157师参谋长李宏达,通过无线电台,隔海指挥作战。

义勇军很快组建完毕,队员们一律着便衣,配备轻机枪、手枪、冲锋枪等武器。义勇军的两支小分队,先后乘夜偷渡,都取得成功,在南澳岛上建立了桥头基地。

7月15日，深夜。天漆黑，晚风轻拂，海潮渐隐，大地寂静。义勇军全队在海山岛黄隆镇外的海滩上列队集合，整装待发。

团长李友庄前来为壮士们送行。他站在队列前对官兵们训话，他说：“弟兄们，南澳岛就在那边，那里有我们的三万七千多个同胞，那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一代一代地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她，今天，如果从我们手上丢掉了，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弟兄们，我们都是广东人，我们广东自古都有团结奋斗，大智大勇，不屈不挠的精神。今天，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去打击入侵的强盗！弟兄们，广东的父老乡亲在看着你们，祝你们马到成功！”

队伍不声不响地，依次朝海边木船走去。

李团长与壮士们一一握别。谁也没有说话，谁的心中都明白，可能这就是最后的诀别了。

木船升帆起航，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海的那边，远处有几点微弱的灯光，那是敌人军舰上的灯光。从这儿去南澳岛，有三十里水程。

南澳岛上的日军共有七八百人，分驻青澳和岛东部的深澳，由于他们比较顺利就攻占了全岛，因此，岛上之敌十分骄狂，戒备不严。

义勇军大队夜渡成功，登上岛岸后，随即转入山林隐蔽。第二天，大部主力与先期渡海的两个小分队以及当地壮丁队员会合，总共有六百余人。

吴营长和洪之政大队长分析敌情后，决定首先夺取隆澳重镇。由于他们采取突然袭击，敌毫无戒备，突击队一举拿下

了隆澳，并将伪维持会的大小汉奸十余人全部抓获，当即派人押送回大陆，经审判后枪毙。

接着，义勇军以迅猛的动作，分别向青澳和深澳的日军发起奔袭，勇士们冲进敌营，展开近战，敌军措手不及，死伤数百人。

日军遭此沉重打击，羞怒万分，将负责该岛的指挥官大熊政吉海军少将撤职，另调台湾陆战队司令佐藤清前来坐阵指挥。

同时，日军还增调大小军舰至三十多艘，在南澳岛四周水域日夜巡逻，截断了该岛与大陆的水路，企图将义勇军封锁在岛上，再行消灭。

7月19日。日军舰队运来陆战队千余人增援南澳岛。第二天早上，敌舰队炮火向隆澳近海岸的义勇军阵地猛烈轰击，并有敌机数架前来轰炸扫射。

隆澳及前后港的争夺战特别激烈，在战斗最危急时，广东防军总司令余汉谋将军亲自在电台上与吴耀波营长通话，对义勇军将士的英勇战斗表示亲切关怀和鼓励，并任命吴耀波为南澳守备司令，洪之政为南澳县县长。

战至深夜，敌突进隆澳镇内，义勇军与敌展开肉搏战，敌死伤严重，向镇外退去。

这一仗，毙伤日军近百人。

7月21日，大批敌军包围了隆澳，数度发起猛攻。义勇军寡不敌众，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从隆澳镇撤出，向黄花山、西山和长畔村一带转移。

县长洪之政部退大山中之后，旋被日军包围，经数度血战，未能突出重围，自卫团第4大队伤亡殆尽。日军如潮涌来，

迫其投降，县长洪之政威武不屈，高呼口号，纵身坠下悬崖，粉身碎骨，以身殉国。

7月23日，敌机数架飞来，对义勇军驻地进行低空扫射轰炸。义勇军集中机关枪对空射击，将一架俯冲的敌机打中，敌机拖着长长的烟幕，掠过南澳岛，向北飞去，最后坠落于柘林海面。

7月24日，义勇军向隆澳之敌发动反击，有两个班的士兵战死。

其后，吴营主力第二连被敌人包围于隆澳以西的山洞一带，经两天战斗，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第2连也战死殆尽。连长陈永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排长高强、林×陷入日军包围，以手榴弹同敌死拼，炸死日军十多人，自己也壮烈牺牲。

义勇军被敌围困于山中，电台也在战斗中被敌炮火炸毁，与大陆的通讯联络中断，处于十分困难境地。他们化整为零，在山中巧妙地与敌周旋。夜里，他们在林中烧起许多篝火，引诱日军炮火胡乱轰击。

几天之后，吴营长收拢部队，夜袭隆澳之敌，他们冲进镇子后，放火烧敌营，与敌展开激战。这次夜袭，虽然毙伤敌军约百人，但义勇军却遭到敌人强大火力的狙击，死伤大半。

8月初，吴营长再次集中了所有官兵共百来人，分别夜袭隆澳和深澳两地之敌，结果，多数官兵战死疆场。

自卫大队的小队长何标，精通武功，力大过人，在与敌人肉搏厮打时，双手抓住一个鬼子的脚脖，向围攻上来的敌人横扫竖打，竟将几个敌人打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此时，一个鬼子朝他开了枪，何标胸部中弹，倒地身亡。

拂晓前，仅有少数官兵活着撤离战斗，跑回山中潜伏。

营部勤务兵刘南茂，是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兵，在送信途中，被敌发现跟踪，他不露声色，暗中打开手榴弹盖，待敌追近，拉响手榴弹，与两个鬼子同归于尽。

敌人加紧了对山区的封锁和搜索。

战士张奎标身负重伤后爬进一个山洞躲藏，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日军联队长田太一郎见他已伤成那样儿，便壮着胆子上前审问，张奎标暗暗拉响了手榴弹，与那个敌军联队长同归于尽。

在大陆这边，因与南澳岛上的无线电联系不上，李友庄团长以为他们都牺牲了，心情十分沉痛。

大陆与南澳岛的海峡间，有日军的二三十艘舰艇日夜游戈，无法派人增援海岛。

这天，一个姓陈的炊事兵从岛上泅渡回来了，李团长迫不及待地追问岛上的情况。

炊事兵告诉他，吴营长和一部分人还活着，他们在山中同敌人周旋，并伺机袭击敌人。

于是，李团长马上向余汉谋将军汇报，余指示将活着的勇士们马上撤回。李团长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即全撤回”几个字。

姓陈的炊事兵将纸条揉成团塞进耳中，再塞上棉花团，泅渡回海岛，去寻找尚存的义勇军官兵。

1938年8月末。

吴耀波营长和二十多名勇士穿过日军海上封锁线，回到了大陆。他们的身上衣不蔽体，有的还带着枪伤，他们无愧于祖国的优秀儿子。

3. 琼岛风雷

海南岛形似一只雪梨，四周地形低平，中南部是中外驰名的风景名胜区五指山、黎母岭。碧波荡漾的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滋润着全岛三万三千九百平方公里的沃土，养育了六百多万各族岛民。岛上树木葱郁，举目望去，轻烟薄雾，椰海浩荡，百鸟鸣啭，绿水环绕，仿佛神话传说中的美妙仙境。

1938年10月中旬之前，岛上驻有陈章师长的第152师正规军，日军进攻广州时，奉蒋介石命令，余汉谋将该师调回大陆广东。当时，蒋介石和军委会认为，要在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上进行正规军的大部队作战，胜负取决于海军和空军力量的强弱，我国无强大的海军舰队和航空兵力量以支持掩护，在孤岛上驻扎一二个师乃至数个军的部队，也断难保住岛土。

海南岛的命运系于大陆，大陆能保，海南最终可保；大陆即失，海南最终必失。基于这种考虑，统帅部决心撤出那个师，以增强广州方面的抗战力量。

撤出正规部队，决定在海南岛开展游击战，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命王毅为琼崖（海南岛）守备区司令，负责军事指挥；任命广东省政府保安第3旅旅长吴道观为海南行政公署专员，负责地方行政工作。

王毅的守备队仅有保安第11、第15两个团和自卫总队的七个中队。

当时，日军的军舰已多次向海南岛挑衅，并一直在海岛四周水域游戈。

1939年1月13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海南岛。1月中旬，日军陆军以饭田支队，海军以第5舰队，组成

侵犯琼岛的部队。

1月20日,日军先以陆战队三百余人,在海南岛的乐会登陆,遭到守备部队的奋勇抗击,陆战队退回海中舰上。这股日军行动的目的有两点:其一,试探岛上的抵抗力量的强弱;其二,转移岛上抗日武装的注意力,将岛上的注意力吸引到岛东的中部,而日军主力却从岛北部进攻。

2月10日,日军陆军饭田旅团在海军第5舰队协助下,于深夜三时,在海南岛北部澄迈湾东北角登陆,分左右两路进犯。其左路部队于正午侵占海口市,右翼部队于午后2时许侵占琼山县城。随后向南推进,占领了定安、文昌等县城。

2月1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二千五百余人,于拂晓时在海南岛三亚港登陆,当天,三亚、榆林、崖县均被日军占领。

3月初,日军在海南岛的兵力达六万七千多人。

保安司令王毅及其海南行署抵敌不住,率部撤退到五指山中,游击武装以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为根据地,向沿海各县发展游击活动。

面对海南民众顽强的反抗和游击战,日本海、陆、外三相,于39年4月21日专门召开会议,就长期侵占海南岛问题,商讨办法,最后决定,声称“海南岛政务处理”,“首先应置重点于完成作战和确保治安”,同时,“尽力调查和获取重要资源”。

日军在对游击武装进行反复清剿的同时,对海南民众施行了最为血腥和残暴的屠杀。

他们从各地抓来三万多民工,强迫开采崖县(今三亚市)田独铁矿,他们对民工进行残酷的迫害,有了病也不给治疗。民工们经常以破坏工具等手段进行反抗,日军便对其大批屠杀,杀了就将尸体踢入一个大土坑中。六年之中,海南同胞在

这里就被残杀、打死、病死、饿死者，共一万多人。当地人民称那里为“田独万人坑”。

1942年10月起，日军调集第5、第18两个警备队，对琼山、文昌等地区进行大扫荡，强迫村民迁到集中点居住，把许多地方变成无人区。42年冬到43年，该地区有一万多民众惨遭日寇杀害。文昌县南阳乡的村民被全部杀绝，房屋被全部烧毁。咸来乡木石桥边，一个早上就被日军用刺刀戳死妇女和儿童二百多人。

1942年秋天，日军闯进云龙乡，把四十二个村民关进一间屋子，然后浇上汽油焚烧，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妇，被日军强奸后也推进那间屋子烧死。另有一个孕妇，被日军轮奸后杀死，并剖腹取出胎儿，放在其母尸体上取乐。

七年中，海南岛民众被日军屠杀达二十多万人。

尽管日军以海南岛为其海、空军基地，驻扎重兵于此，施行残酷的扫荡杀戮政策，但国共两党的游击队，却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人民的反抗表现得特别英勇顽强。

国民党政府海南行署和各县、乡乃至保甲等各级行政组织几乎一直都很健全，领导和组织民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

海南十六个县，都成立有抗敌自卫团，每县还有游击自卫大队一至六个不等，共有三十七个大队，外加一个特务大队，数千人的武装。同时，王毅在原有两个保安团的基础上，又新建立了两个守备团的武装。

自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岛上登陆至抗战胜利，海南岛游击武装孤军奋战达七年之久，战旗一直不倒；在战斗中，游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共进行大小战斗千余次，其中较大的

战斗有一百八十多回。当日军驻重兵于海南岛后，游击队四处出击，数度攻克文昌等县城。驻岛日本海军少将和田纯久等人亦在与游击队的作战中，被击毙于海南岛。

后 记

《中日长江大决战》出版后被人褒贬不一。有的以抗战亲历者身份在杂志、报纸上撰文评论，说该书“实事求是，真实感人”。有的单位举行座谈讨论，有的报刊对书中的所谓“新观点”进行转载、摘录、缩写。仅93年春季就有两种16开杂志和一部32开的书，把该书整章整章地抬了去用（其中有两家出版社已来信表示歉意，并作了相应处理）。有些读者来信说希望能再看到这类爱国题材的作品，有的还在信中出题目，要我尽快写出来。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军》早就完稿，因《中日长江大决战》出版后，招来了一些麻烦，所以，搁置至今，才与读者见面。

先是不断传来消息，说哪一级哪一级的人要“理麻”我，又说港台那边的报评，称该书体现了大陆方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着，台湾一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出版权和港台地区的发行权。于是，有好心人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走着瞧吧！”某省读者来信询问作者挨到没有，说他们那里正调查买这本书的都是哪些人。弄得一日数惊。过了好久，又听说此书已被点名批判，是哪一级哪一级的一位领导同志给挡了，要不，肯定挨惨。

春节刚过，有人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题为《情感取向的误区——评〈中日长江大决战〉的失误》的文章，认为

该书把“席卷全国的抗日战争割裂开来”，没有“把握住历史全貌”，忘记了“蒋介石集团”属于非无产阶级这一“内在的联系”，“开脱”了“三次反共高潮”等罪行，此书“以其艺术视角的新意和情感取向的倾斜而构成的矛盾，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的困惑”。

出版社同仁说写文章辩论辩论。我说算了，难得计较。因为《中日长江大决战》一书，无论从书名还是内容，写的都是蒋介石国民党那一部分中国人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作者的情感取向（立场、观点）要么倾向侵略者，要么倾向中国人，其他别无选择。无论哪一部分中国人，抗击外敌侵略，都是无罪可言的。至于在民族矛盾中，国内党派之间的矛盾，纯属另外一回事。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军》就要出版了，我不知道读者对此书会不会感到遗憾。

四川省海外联谊会会长、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德高望重的廖伯康老不辞辛劳，为本书作序；画家长湖信先生精心地作封面和装帧设计，从而使拙作大添光彩；交大出版社对我的作品的出版总是那样的审慎，张蔚河编审，梁凌编辑，对我写的东西又是那样的严格和认真，这里，仅用“感谢”二字，是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仰敬之意的。

祝读者朋友在改革大潮中一帆风顺、破浪前进！

孙挺信

1993年8月·成都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军

作者 =

页数 = 3 0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华北大破袭	
第二章：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第三章：战斗在吕梁山上	
第四章：立马中条	
第五章：太行风雨	
第六章：狼山喋血	
第七章：泛区豪杰	
第八章：扎根大别山	
第九章：鲁苏逐鹿	
第十章：挥戈江南	
第十一章：华南烽火	
后记	
附录页	